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易杰雄/主编 高九江/著

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華夏出版社

〈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 易杰雄 主编 / 高九江 著

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华夏出版社 · 二〇〇〇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高九江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

(欧洲文明的历程/易杰雄主编)

ISBN 7－5080－1966－0

Ⅰ.启… Ⅱ.高… Ⅲ.启蒙运动－欧洲－近代 Ⅳ.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722 号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世 界 知 识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1/32 开本 13.75 印张 279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1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六章　"博爱"的光环
——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

第九章　开辟了人类历史新时代的伟大革命——法国大革命

代总序

博采众长，加速文化现代化



几年前，在我国的报刊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批判西方价值观"。提出这种口号的人尽管动机是好的：担心西方一些腐朽的东西传进来，毒害我们的人民，引起我们的道德滑坡；害怕西方一些有害思潮影响老百姓，特别是广大青年的观念，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信仰动摇。提出和拥护这一口号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很爱国的。但是，由于"批判西方价值观"这一口号对"西方"一词缺乏严格界定，本身毕竟是一个未加分析批判过的口号，因而是一个非科学的命题，特别是如果真正按这个口号做起来，恐怕事情只能与口号提出和拥护者的愿望相反。因此，很有对它进行重新研究的必要。

(一)

讲"西方价值观"，这里"西方"一词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呢？是就地域、方位讲吗？那么与之相对应自然就是"东方价值观"了。日本、韩国与我国同为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属中国领土，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要是一样，哪里还用得着什么"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宣传、提倡的价值观，与国家所反对的民主派人士、精英人物所主张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与几千年前我们老祖宗的价值观一样吗？也不一样。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由于地域相同，就认

定有共同的价值观呢？鲁迅先生在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据懂得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如果在地域、方位上使用“西方价值观”的提法，岂不表明我们连价值观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这一起码常识都忘了，连马克思主义重要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抛弃了?!

有人可能要讲，价值观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文化明显地存在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由东、西方两种文化派生出来的两种价值观怎么可能没有区别呢？如，一般认为：东方文化重道德，西方文化重科学；东方文化重感情，西方文化重理性；东方文化是人文的，西方文化是宗教的；东方文化重整体，西方文化重个性；东方文化重经世致用，西方文化重系统研究；东方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物质，等等。不错，如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使用西方价值观，无疑是可以的。但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西方价值观”，难道西方价值观中重科学精神、重理性、重系统研究、重物质性的东西等等，也都是统统需要批判的吗？反过来，难道东方文化强调尊卑等级、重农抑商等也都是值得肯定的吗？今论只能是：如在文化渊源的意义上使用，笼统地提“批判西方价值观”是不对的。要么，就不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批判西方价值观”口号的提出者可能要说，他们是在承认价值观是一历史范畴，是随时代、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前提下，用它来专指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的。这样讲显然也有问题：既然承认人家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而且事实上他们还处于快速发展中，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至今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就得承认他们的经济基础水平总体上还比我们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就不得不承认，其

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观念形态的重要要素的价值观，一般说来，从总体上讲也要比我们先进。这样，“西方价值观”主要就不应该遭受批判，而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了。

“批判西方价值观”这一口号，从策略上讲也是很不明智的。不错，西方一些领导人也常常使用“西方价值观”这一提法。其实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少数领导人、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如前所述，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也不可能有所有的人的价值观都一致。他们所以要这么讲，无非是为了标榜他们的政府是代表全民的。其实，我们的价值观主要是与西方领导人的价值观有区别，与西方各国广大劳动群众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对西方各国领导人、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与劳动大众的价值观完全不加区分，把整个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这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

“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不仅对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西方”一词未作界定，容易导致思想混乱，而且对“西方价值观”不加分析地都要加以批判，在理论上也包含着许多的错误。

首先，任何一种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无论是从文化渊源上讲，还是从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所对应的角度讲，作魏某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产物与精神条件，必然是既有好的一面，又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些消极的、乃至需要抛弃的糟粕。“批判西方价值观”提法的错误就在于，不加分

析地把自己价值观好的一面和别的国家与地区价值观有问题的一面都绝对化了，特别是没有从总体上加以比较，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事实上，一般说来，几乎可以断言，当一个地区、国家和社会还在健康、协调、快速发展时，它所对应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就还是有生命力的，好的，积极的方面一定是占主导地位的；当一个社会和国家停滞不前，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落后，说明与它相对应的文化及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一定有问题，或过时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已看过时，至少表明，从总体上看它不如那些发展宽的地区和国家的文化。

其次，有些价值观首先由东方提出，如“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有些价值观首先由西方提出和加以强调，如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精神，等等。这些不等于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东方价值观，重视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精神就是西方价值观。其实，它们都是全人类所向往、追求的共同的价值观。事实上，西方各国由于接受工业化过程不注意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教训，现在也很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注意防止和治理污染，合理使用资源，以保证可持续发展；东方人也很向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法治，也很尊重科学与科学精神。

价值观，作为人们对事物作评价和选取的一种思想倾向和标准，从来都是普遍与个别的统一。它必然既有全人类共图的地方，如凡正常人都要追求更好、更幸福的生活，都崇尚真、善、美；又有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如东方人喜欢含蓄、稳重，西方人喜欢直率、豪爽。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共同的东西都是由广大老百姓提出来的，特有的东西往往是这些地区和国家内一些有特殊利益而

又对社会有控制权的统治阶级提出来的。他们以国情特殊把种种特有的价值取向强加到广大老百姓头上，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特权。如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无一例外总要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剥夺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恬法的理论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否认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或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看作是全人类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就曾有过明显的表现：如无限夸大、抬高本民族文化，竭力贬低乃至诋毁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盲目地宣扬什么孔孟之道乃惟一科学真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他是人，迟早必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不可能长久地游离于尧舜孔孟之道之外。邓嘉缜在《复扬辑庵书》中就是这样讲的：“中国之道如洪钟铸鼓，万物都归一冶，若五朝，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辩也，他时洋人终必如此”（《扁善斋文存》君上）。

第三，“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出者还忘掉了这样的基本史实：今天的中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与公元前好多世纪前就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它不仅是历史上我国南北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更是我们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为指导思想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历史上吸收印度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和近代以来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如科学思想等许多好东西的结果。把别人的东西看作都是应该批判和抵制的，把自己的看作都是最完美的，这样就势必使自己缺乏忧患意识，盲目陶醉于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思进取，从而不能虚心学习乃至排拒一切国外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丧失自我批判和创新能力。结果不仅阻碍卧化自身的更新、导致其僵化、枯竭，还反过来成为社会进

步的绊脚石，导致误国害民。而且这种负作用还会与社会进步成正比。

最后，从文化发展史来看，南北文化的融合始有中华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等东方各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始有东方文化。而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东、西方文化日益频繁、多方面的撞击和融合，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家族为核心的文化，它具有人文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特点。所以在管理上表现出注重人际关系、具有家长制的特点。这种管理既有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鲜有明确、系统的规章制度和严格、明晰的计划、规划，主要领导人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对管理本身影响大的弊端，又有相对比较关心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利用人际关系挖掘潜能等长处。

而西方人受科学主义影响很深，甚至相信可以用数学结构来描述世界，相信精确的数量关系的描述是正确地进行决策和达到最大效率的基础。这种思想表现在管理上就是，他们把人员作细致的专业分工，把工厂的每项工作分解为若干部分，测定各部分所需时间，并设计出最佳方案，经理部门恬前按计划确定每个人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人员之间如何很好地相互配合，以保证产品精密、准确，使零件达到标准化和具有可置换性，以及生产的严格同时化和连续高效进行。从而使组织高效率，决策科学化，并实现了专家统治。这就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这种管理的缺点是，把人变成了不过是按机器运转节奏活动的、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只服从某种固定的外在关系，劳动者被

看作只是能活动的物，只能靠高工资把工人留在高度紧张而又枯燥乏味的简单重复的机械运动中。

日本丰田英二吸取西方科层制组织形式和泰罗制管理经验，同时根据东方文化特点，鼓励职工加强联系，努力培养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强调人与人合作，人与机器优化组合，强调利润共享，以此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效益，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日本现代管理方式——即丰田英二的精益方式。这种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管理方式就是典型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产物——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的表现。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虚心学习西方，我认为今天已很难说日本文化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几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去的优秀人材都有，长期以来，各种文化撞击、融合，也已很难说是纯正的西方文化。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光纤通讯、无线电技术、英特网的迅速普及，正越来越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的交流和互相依赖正日益加强，各种文化的撞击和交融也空前加快，全人类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认同和尊重。少数国家少数统治集团为维护自己特权而提出的特殊理由越来越没有市场，以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哪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还想为自己的利益而为所欲为而要国际社会坐视不管已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还死抱着自己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放，而拒绝接受人家好的、特别是整个世界公认的通行的东西，以国情特殊为借口而游离于整个人类文明大道之外，连与其他国家沟通都逐渐成为问题，就更遑论紧跟时代前进了。

"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恰恰是既忘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又未能看清今天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

(三)

"批判西方价值观"口号的提出，是长期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主义"的表现。

早于公元前好多世纪，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就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有自己特色的华夏文明。当时由于这种文明发源早，总体上的确优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所以，华夏民族对那些居住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民族一律斥之为"蛮夷"。所谓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就是华夏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鄙视的称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民族和民族文化本位主义。这两种本位主义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历史。

直到明清之交，中国人还把远渡重洋而来的欧洲人士一律称之为"夷"。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仍把外交、外贸等涉万事务也一律称之为"夷务"。反映出来的仍然是对别国和外来文化的轻蔑和排斥——一种"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自尊自大的"文化本位主义"。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自觉地抛弃了对别的国家和民族不尊重的习惯称呼，开始用"洋"字代替"夷"字，用"洋务"代替"夷务"。1856年6月26日在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上也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自不得提书'夷字'。"从此，"夷务"全部为"洋务"所代替，人们也广泛

用“西学”称呼西方文化。尽管一些顽固的文化本位主义者仍坚持西方不可能有什么学问:“西方所资以富强者，法也，术也，艺也，不足以言学也。”(徐致祥《嘉定先生奏议》卷下）对他们来说，承认西方有自己的术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因为传统的看法是大中华以外的夷、狄、蛮、戎人，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

用“洋务”代替“夷务”，用“西学”称呼西方文化，是中国对中外文化相互关系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尽管“西”相对于“中”，相对于一贯以“中心”、“中央”、“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有一定的轻蔑之意。表明这时文化本位主义仍占主导地位。但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总是承认了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这是“天朝上国”观念的开始破灭。其中既有被迫改变的恼恨，又有向前艰难挪步的足迹。

后来，张之洞等人又开始用“新学”一词来代替“西学”，尽管“新学”一词在他本人那里与仍不及天朝文化的“西学”并没有多少区别，但到了通常按词义本身去理解的广大群众那里，“新学”已有了明显的褒扬之义，它含有赞赏、效法之意。它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旧学”来看的。事实上，“新学”提出、流行之时，也正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入的一个高潮期。因此，用“新学”代替“西学”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西方文化感情和观念上的进一步的变化。这也为后来反对旧传统文化，提出全面学习西方，打下了进一步的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的失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很快又是袁世拷称帝，张勋扶助溥仪复辟，封建主义的实质丝毫未改。官场照样腐败，国家还是越来越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先

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看清了，封建主义所以能苟延残喘，就是由于有作为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的旧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如故。因此，它还可以借尸还魂。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光是在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甚至把它们移植过来，只要社会文化土壤不变，这些被搬过来的发展经济的方法、科学技术乃至政治体制就无异于桔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 枳子。科学技术和经济还照样发展不起来，改变政治制度也仅限于换块招牌而已。于是，他们与袁世凯等复辟派“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针锋相对，发动了“五·四”运动：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科学与民主，提倡自由、平等、个性、人权、法治，宣传西方文化，提出要从经济到思想，从政治制度到文化来一个“全盘西化”。可见，提出“全盘西化”的基本含义就是认为，文明是一个整条，它的各个部分——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文化是互相制约的，它们只有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快速地、健康地发展。因此，学习西方不能只学习其中某一部分。提出“全盘西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充分地现代化”。这与反对派故意把它解释成仿佛中国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要了，把西方文化不管好坏一古脑儿都搬过来是不同的。与普通老百姓就字面上理解也是不同的。“全盘西化”论者也曾考虑到这一口号在受众那里可能引起的扭曲，即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也认为“全盘西化”并无不妥：“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胡适《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1935

年 3 月 17 日）其实，陈独秀、易白沙、鲁迅、胡适、钱玄图等人就都不同程度地表现过“全盘西化”思想。后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向往“法兰西文明”转向追求“俄罗斯文明”，直到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向苏联一面倒”，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归到“全盘西化”派中。因为马克思主义、俄罗斯文明，也是一种西方文明。而且他们都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得很厉害的。当然，如果说“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主张的是中国实行欧美的资本主义，“俄罗斯文明”的提倡者是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之间又是有本质区别的。

作为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又出现过上海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样的事，他们提出要恢复“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德行”，有的甚至主张“还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还不得不在宣言中声明“不守旧”，“不复古”。可见，文化本位主义顽固派在当时已经进步了的社会条件下，宣传传统文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批判西方价值观”的口号所包含的对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看法与态度，不仅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与立场是一种大倒退，连把西方文化看作是“新学”的广大有识之士都不如。它在实质上与 90 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是完全一致的。

（四）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其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对社会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能给社会以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会严重阻碍社会进步。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相互协调、互相促进，才能健康地快速地向前发展。因此，学习先进应当全方位地学，而且应注意首先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观念。文化本位主义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极其有害。这是中国许多代爱国知识分子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才认识到的，也为中外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外历史的发展所一再证明。

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除少数极端顽固派，不少人都看到了坚船利炮的确优于大刀长矛，从而感到应向西方学习。但由于文化本位主义的“道本器末”论——即认为西方先进的器物“乃器械机巧之末”，“非立国之本”，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才是最了不起、最根本的东西——作怪，所以这种学习只能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水平上。你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可慈禧太后们要吃喝玩乐，所以把扩建海军的经费都挪用去修颐和园。由于政治体制问题未解决，注定了光想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的失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更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知“有洋务”，不知“有政务”是不行的，于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更根本的东西

——政治制度。在他们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实行变法，企图引入近代西方君主立宪制。失败后，孙中山又成功地领导了辛亥革命，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国制。但是，紧接着袁世凯称帝，张勋扶助溥仪复辟。事实表明，你想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吗？可广大老百姓还希望有一个好皇帝。只要作魏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的旧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如故，旧制度就还能复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改革都休想彻底，只能眼看着国家越来越落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才发动了"五·四"运动，向传统文化发动猛烈进攻，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很遗憾，这场思想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到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对外开放，虚心学习、吸取外国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出现大好局面，什么时候文化本位主义膨胀，排斥一切外来文明，国家就急剧衰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特别是唐太宗推行儒、道、释三教合一、向外开放、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政策，从而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明末，特别是清初，由于康熙皇帝的提倡，西学传入中国一度出现盛况，所以紧跟着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虚心学习、利用国外一切好的、对我们今天还有用的东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相反，每当文化本位主义抬头、强烈排拒一切外来文化，甚至搞闭关锁国，就使国家停滞甚至倒退，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迅速下滑。美国一个经济史学家根据各国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分析，中国在 1750 年占世谨的 1/3，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一位。但在 19 世纪中国经济迅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



培　尔

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法国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先进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博大的思想渊源，才使它跃居整个欧洲启蒙运动之峰巅，成为全欧启蒙运动的主战场。

法国启蒙运动有一个逐步展开和深化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是它的第一阶段，以培尔和梅叶为代表。培尔（1647—1706）用怀疑论抨击了旧教和新教，批判了经院哲学和为宗教神学张目的 17 世纪思辩形而上学。他颂扬人的理性，认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是荒谬的，而荒谬性正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本质，因此理性和信仰有如水火不相容。他反对道德以宗教为基础，认为玷辱人类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不信神的人也有道德观念，信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有德的人。培尔的思想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因而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个先驱。梅叶是 18 世纪法国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他的影响主要在他死后，在 18 世纪 30 年代以后他所秘藏的《遗书》得到传播之时。

18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以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为代表

的法国启蒙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 20 年代开始，伏尔泰等人发动了对宗教神学的猛烈批判，并开始深入社会政治领域，尖锐地揭露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从而使启蒙思想渐趋成熟，启蒙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但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带有温和色彩。启蒙学者在政治上幻想法国通过改良政体的方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还局限于自然神论。

从 18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法国启蒙运动发展到高潮阶段。其代表人物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卢梭等。这一时期，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波澜壮阔的新高潮。在政治上，他们不仅提出了以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而且卢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哲学上，他们把自然神论发展为战斗的无神论，建立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新形态，猛烈扫荡封建意识形态，迎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

启蒙运动的最后阶段与伟大的法国大革命相吻合。大革命是启蒙思想家革命理论的直接实践，是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因而它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外化”了的思想革命。这一时期，一些后起的年轻启蒙学者如孔多塞等人，直接参加了这次壮烈的大革命，为启蒙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的贯彻实施而积极努力。孔多塞（1743—1794）是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理论家。他崇尚理性，认为改善人类理性即可促使社会进步。他极力维护财产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把资本主义描写成符合理性的、“自然的”制度。在宗教问题上，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把宗教看成是对人民的欺骗，主张政教分离。在教育上，他曾提出统一的世俗学

校的思想，主张普及初等教育，废除宗教学科，强调实科教学。他在大革命中，由于政治上属于吉伦特派，反对雅各宾派而被捕监禁，待处决时饮药自杀。孔多塞是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是法兰西共和国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哲学家。

纵观法国启蒙运动的全过程，它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规模宏大，伟人辈出。法国启蒙运动持续近百年，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各劳动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群众性运动。它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各个思想领域，横扫封建意识的各个角落。它培育了一大批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和富有牺牲精神的"杰出人物"。他们中间有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等，其中为数并不多的哲学家构成了启蒙队伍的主力、核心、先锋和领袖。[①] 梅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在启蒙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在当时就是公认的。正是这批杰出人物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又把法国启蒙运动推向高峰，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二，内容丰富，硕果累累。法国启蒙运动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三等级各阶层的进步思想的大合唱，是绚丽多彩的新思想新理论的大展示。这些思想、观点或见解各具特色，甚至相互之间存在不少分歧，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基本思想内容是统一的，那就是崇尚理性作用，重视科学知识，批判宗教神学，扫荡封建意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法制，改变旧制

① 参见李凤鸣：《法国启蒙运动》，载《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1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度，建立新体制。这批哲学和政治理论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哲学政治思想的最高成就，还直接影响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第三，革命彻底，影响深远。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斗争中，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抛弃了英国启蒙运动的妥协性和保守性，高举“理性”旗帜，以公开的政治斗争形式向封建制度开战，把主要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因此，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色彩，直接触动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思想革命的这种彻底性和深刻性，使法国启蒙运动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不仅直接孕育了法国大革命，而且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法国启蒙思想也曾启迪过无数志士仁人。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赞颂，无不体现着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法国启蒙运动在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3. 启蒙浪潮在欧美的扩展

法国启蒙运动在欧美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法国许多启蒙学者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在欧美各国迅速传播，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启蒙浪潮。

德国启蒙运动是受英法启蒙运动的影响，在特殊的历史

条件下产生的。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封建国家，资产阶级刚刚开始觉醒起来。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后，德国被分割成300多个诸侯小国。这些小国的公侯荒淫无耻，对内敲骨吸髓，对外扩张领土，烽火连年，民不聊生。直到18世纪中叶后，德国的社会生产才逐渐从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十分缓慢。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不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附于封建主。因而，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天然具有软弱性、妥协性和狭隘性。

自然，德国启蒙运动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具有更多的弱点，这就是它的保守性、软弱性、妥协性。这种特征首先体现在启蒙任务上。18世纪上半叶德国前期启蒙运动的任务，只局限于文艺领域内形式上的革新，到了启蒙运动后期才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但是即使在这时，德国的资产阶级仍不像同一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那样积极地去准备进行政治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勇气。"[①] 在德国，首要的还是争取国家统一，结束封建割据，以便大量积累资本。因此，德国启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启发民族自觉思想，结束分散落后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在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既没有英国资产阶级的雄厚经济实力，又缺乏法国资产阶级的强大政治势力，所以，德国的启蒙主义者不敢直接去敲政治自由的大门，只能把自己现实的理想和意识伪装成超现实的精神，着力于在思想上构筑自由的宫殿。诚如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海涅时所指出的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3页。

样："海涅以惊人的洞察力指出，在德国，由于一开头就缺乏实际行动的可能，所以出现了一个升华的过程：没有见诸行动的社会积极性，把它的光芒折射到幻想上面，折射到由音乐，书本和绘画所表现的艺术形象上面，由各种思想原则构成的精巧花纹上面去了。"① 恩格斯也指出："法国在 18 世纪占优势的是政治家，而且是第一流的政治家，而德国则把一切都归结为从现实逃向观念的领域。"② 可见，德国启蒙思想在表现形式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出地体现于文学艺术上，热衷于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空洞抽象和思辩探讨。

以莱辛、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启蒙文学，在德国启蒙思潮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狂飙突进运动"，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康德开启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以晦涩思辩的形式表达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心声。康德（1724—1804）是德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在哲学上，他呼吁人要独立地运用理性，理性为人所固有的认识能力，表露了他的启蒙思想。但他又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对此，德国伟大的诗人海涅作了这样一段精彩评论："在悲剧之后要来一出笑剧。到这里为止康德扮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部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

---

①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64 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 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5 页。



青年康德像

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而老兰普作为一个悲伤的旁观者，腋下挟着他的那把伞站在一旁，满脸淌着不安的汗水和眼泪。于是康德就怜悯起来，并表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于是康德就根据这些推论，在理论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之间作了区分，并用实践的理性，就像用一根魔杖一般使得那个被理论的理性杀死了的自然神论的尸体复活了。”①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同样反映出康德思想的两重性。他强调平民最值得尊敬，反对封建特权，但又声称凡人皆应服从现有的立法权威。他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但又认为路易十六被处死刑是“永世莫赎之罪”。他感到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是道德和幸福之间的矛盾，有德之人未必有福，有福之人未必有德，但又说至善即道德和幸福的协调，只有在彼岸世界中才有可能。他认为他所设想的自由平等的共和政体，亦即“理性天国”，是一个理想，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康德的思想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面性和妥协性，难怪沃尔什说，康德是德国“启蒙时代的一个标准产儿”。②

启蒙运动也扩大到意大利、俄国、荷兰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塞萨尔·贝卡利亚所著的关于刑法改革的书籍，充满了启蒙思想色彩，对于欧美的刑法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俄国，

---

① 雅克·肖隆：《哲学传奇》，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2—163 页。

② 沃尔什：《历史哲学》，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69 年版，第 122—123 页。

启蒙思想也结出硕果，这就是普希金、拉吉舍夫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思想斗争和十二月党人的活动。


富兰克林

启蒙思想也越过大西洋，传到北美，富兰克林和杰弗逊成为启蒙思想在北美的杰出代表。富兰克林（1706—1790）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他歌颂勤劳，同情劳动人民，指出：社会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爱好劳动的人们必须把自己劳动的第一批果实分给——这在他们是不得已的——寄生的、懒惰的人们”。他反对奴隶制度并要求废除它。1775年，他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反奴组织“被非法奴役的自由黑人救援会”。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普选制和一院制议会。他坚持殖民地利益，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在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坚决拥护美国独立，捐出个人财产支持战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杰弗逊（1743—1826）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第一任国务卿、第三任总统。他深受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洛克思想的影响。他崇尚理性，热爱知识，认为人的知识可以引导人类走向更富裕、更美好的康乐之域，相信人类幸福应该是人类一切努力的目标。他反对一切武断的权威，对一切事物都抱一种大胆怀疑的态度。在哲学上，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认为宗教纯粹是个人的私事。在社会思想上，他特别反对奴隶制度，认为它是一种罪恶，

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侵犯，主张解放奴隶。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竭力维护人们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主张建立人民广泛参政的民主共和国。

可见，源于英国而在法国推向高峰的启蒙思想，已超越国界，遍及欧美，形成了国际性的强大思潮。

三 “理性王国”的设计者

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 欧洲启蒙时代，是伟大人物辈出的时代。它曾造就了大批启蒙思想家，这就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2]。其中洛克、梅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是这批伟大人物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封建旧制度的批判者，是资本主义新制度即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设计者。

1. 启蒙运动杰出的思想先驱——洛克

“从 1690 年开始，这位当时尚不为人知的英国人开始震动了西方思想界，公众和学者们讨论、攻击或支持着他关于理智本性、全人类自由、‘真正的’宗教以及教育等各方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19 页。

的观念。洛克虽然生活在17世纪，他的呼声却回荡于18世纪，为那些着手建设自由与宽容异教新时代的人们所接受。”[①] 这就是美国著名学者S·E·佛罗斯特笔下的洛克。



洛 克

洛克（1632—1704）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和启蒙大师。他出身于律师家庭，在牛津大学毕业，研究过哲学、物理学、化学和医学。1666年，正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结识了代表英国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伯爵，担任其家庭教师和医生。在伯爵受英王信任而担任重要职务时，洛克又做他的秘书，这对于形成洛克的政治倾向很有影响。1683年，由于英国各党派之间的矛盾斗争，洛克曾避难于荷兰。“光荣革命”后回国，任贸易和殖民事务大臣。1690年出版了他花费20年功夫写成的哲学代表作《人类理智论》和政治理论名著《政府论》。1693年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著《教育漫话》，提出了他关于绅士教育的思想体系。

在哲学上，洛克继承并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体系。他抛

① 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页。

弃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提出著名的心灵是“白板”的学说，认为人的观念和知识都是从感觉经验中得来的。洛克的经验论哲学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石，直接引导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但是，洛克的唯物主义并不彻底。他认为除感觉之外，知识还有另一个来源，即心灵本身的活动所产生的内部经验或“反省”，并主张第二性的质（色、声、嗅、味等）跟第一性的质（广延、形状、动静等）不同，不是物质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宗教观上，他虽反对封建教会特权和经院主义的愚昧，但又不放弃上帝存在的观念。

洛克的社会政治观带有明显的妥协性。他一方面批判“君权神授”，抨击君主专制，宣扬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又反对共和政体，拥护君主立宪；他一方面提出了分权学说，发展了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即使君主侵犯了，人民也有权推翻他，另一方面又对君权的保留作了一定的让步。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①，“是 1688 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②。

然而，作为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大师，洛克并不仅仅属于英国，他的学说对法国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都是洛克学说的信奉者、传播者和发展者。伏尔泰在回顾他的思想过程时不胜感叹道：“我跑了许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困顿，寻求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都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像一个浪子回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67—6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03 页。

他父亲那里一样。”[①] 伏尔泰对洛克的赞美到了崇拜的地步，他说：“只有洛克才可以算是我们时代胜似希腊最辉煌的时代的伟大榜样。”[②] 的确，在欧洲启蒙运动史上，洛克是一个最伟大的启蒙先驱者。

2. 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

在18世纪的法国，最早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进攻，从而成为启蒙运动开路先锋的，是一个造反的天主教神甫，他的名字叫梅叶。

梅叶（1664—1729）出生在法国香槟省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家庭里。他自幼在宗教学校读书，毕业后，根据父母的心愿，开始从事教职，担任香槟省埃特列平的乡村神甫。40年来，梅叶一直生活在他任教职的偏僻的乡村，长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亲眼目睹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教会的腐败，这对他的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因为梅叶这个低级教士的生活条件接近最困苦的劳动群众，才使他有可能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梅叶在担任教职期间，不畏强暴，坚决维护穷苦劳动人民的利益，同当地大主教和封建领主经常发生冲突，为此受到大主教和领主的刁难和迫害。但他并不屈服，反而加深了对教会和封建专制的憎恨。在临死前几年，他终于将这种仇恨化为三卷厚厚的《遗书》手稿，给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以致命的打击。

梅叶死后，《遗书》先以手抄本在一些人们中秘密流传。

---

① 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8页。

② 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6页。

到 1762 年，伏尔泰首次把它摘要印刷。1772 年，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为《遗书》另出过一个摘要本，并曾多次重版，也是匿名秘密流传。直到 1864 年，《遗书》才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第一次按照他的手写本全部出版。《遗书》的激烈的革命性，在伏尔泰给达朗贝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他说："读它的时候，我吓得发抖。"还说："这部书经常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①]，"梅叶的《遗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使一些读它的人深信不疑"[②]。所以，伏尔泰竭力向人推荐这部著作，认为"梅叶的这本书应当人手一册"，"应该在一切正直人的口袋中都有一本"[③]。由此可见，梅叶的思想对法国启蒙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法国大革命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1793 年，法国国民公会通过为梅叶在"理性的殿堂"建立雕像的提案，赞扬他在抨击宗教神学方面"对人类立下了莫大的功勋"。

梅叶是 18 世纪法国第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时间、空间和自然界的规律性不可能是神创造的，只能从自然本身的永恒存在才能解释它们。物质能够自己运动，它不要什么超自然的精神的推动力。而意识是物质的产物，"砍去头颅，意识也就随之消失"。他以唯物论为武器，批判宗教神学。梅叶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是，他并不信仰上帝，内心里痛恨宗教迷

① 伏尔泰：《伏尔泰书信选》。见梅叶《遗书》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附录，第 245 页。

② 伏尔泰：《伏尔泰书信选》。见梅叶《遗书》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附录，第 241 页。

③ 伏尔泰：《伏尔泰书信选》。见梅叶《遗书》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附录，第 247 页。

信，可是出于职业关系，又不得不违心地向教徒们宣传上帝。他说他写《遗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把人们从迷雾中唤醒。他写道："我的目的，是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睁开眼睛（虽然晚了一点），看一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啊）不幸地诞生和生活在其中的那些荒唐的谬误"。他因此猛烈抨击宗教神学，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宗教是骗人的谎言，权势者利用宗教的目的是统治无知的人民。在全部《遗书》99节文字中，他用80节批驳宗教教义和神学迷信，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无神论。梅叶的唯物主义和公开的无神论，对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直接影响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梅叶无情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它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本质。他痛恨封建秩序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认为财产私有是产生各种社会祸害的根本原因，是压迫和剥削的总根子，因此，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的"自由公社"的理想社会。可见，梅叶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他是代表当时法国第三等级下层群众，特别是早期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梅叶既是18世纪法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又是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

3. 启蒙泰斗和领袖——伏尔泰

在法国启蒙学者中，伏尔泰（1694—1778）是被公认的一位领袖和导师。他是哲学家、史学家、政论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的全部作品组成了一整套丛书，18世纪末编辑的第一个《伏尔泰全集》，8开本有70卷之多，12开

本竟达90卷，仅他的内容丰富、文笔俏丽的书信就编了10卷以上。伏尔泰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革命中积极活动了60余年。长寿使他有幸随着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几乎从头走到底。因此，无论从奋斗时间之长和著作数量之巨，还是从斗争范围之广和思想影响之大来说，伏尔泰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启蒙泰斗。无怪乎雨果说："伏尔泰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出身于巴黎一个富有的公证人家庭，在耶稣会办的大路易学院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因抨击时政和不甘受贵族的欺辱，曾两度被送入巴士底狱，并在1726年被放逐国外。他在英国客居3年，醉心于洛克经验论哲学和牛顿的自然科学原理。回国后写成《哲学通信》，1734年秘密出版。由于书中赞扬英国政治制度，主张信仰自由，成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书被查禁。为躲避追捕，伏尔泰被迫逃亡到偏僻的小城西雷，在他的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古老的城堡中一住15年。在此期间，他广泛地研究了哲学、历史、自然科学和文学，并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历史名著《路易十四时代》，戏剧《恺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子》、《梅洛普》，长诗《奥尔良的处女》，哲学小说《查第格》等。这



伏尔泰

些著作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宣传和完善他流亡英国期间确立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批判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主义。

1745年，国内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伏尔泰重返巴黎，获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不久因冒犯路易十五而再度离开巴黎。1758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边界的佛尔纳定居下来。在这里，他进一步密切了与年轻一代启蒙思想家的联系。他热情支持百科全书派的斗争，利用通信与法国知识界和欧洲各国著名人士联系，殷勤接待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战士，他的家成为欧洲进步舆论的中心和反封建专制、批判宗教狂热的圣地。在这里，他写了不少重要著作，如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史》、《议会史》，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白与黑》等。

在伏尔泰的卷卷雄文中，蕴涵着他鲜明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反封建反教会的政治纲领。在哲学上，他的主要功绩是在法国率先提倡和宣扬了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主张一切观念来自感觉经验，为法国资产阶级提供了反封建的哲学武器。他还运用“自然神论”这种特殊形式的唯物主义，以文学家的犀利笔锋，对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进行了无情批判。在政治上，伏尔泰以毕生的精力宣传平等与自由，提倡理性，抨击封建专制，实现他的理想王国即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虽然伏尔泰对人民群众抱有很大偏见，相信政治权利及国家领导权应该由少数人即富人掌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位伟大启蒙思想家不朽功绩的肯定和赞扬。

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深受法国人民的敬重。1778年路易十五死后，84岁高龄的伏尔泰又返回巴黎，

受到首都人民热烈欢迎。当时一位目击者曾这样描述这次欢迎盛况："伏尔泰来到巴黎，的确在当地人民中产生了好像什么神仙降临地上那样的作用。"伏尔泰去世 11 年后，便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91 年，立法议会决定把他的遗体从巴黎郊外的赛利埃尔移葬于巴黎名人公墓。移葬的那天，有 10 万人执绋，60 万人在街头护卫灵柩。人们怀念他，感谢他，在他的柩车上大书"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一语道尽伏尔泰终生活动的历史价值。

4. 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1689—1755）是 18 世纪上半叶杰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波尔多附近的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家庭。他在青年时期曾在天主教的奥拉托利会学院受过古典教育。1716 年继承了伯文"孟德斯鸠男爵"的封号和波尔多市法院院长的职务。孟德斯鸠个人兴趣不在官场事务上，他醉心于研究哲学、历史、法律和文学等。1726 年，他卖掉了法院院长的职位，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1728 年，他开始到奥、匈、意、德、荷等国作学术旅行、考察。1729 年 10 月到了英国，并在那里居住了两



孟德斯鸠

年。这次考察中，意大利和英国之行对他的影响最大。对于孟德斯鸠来说，如果意大利标志着古老的历史，那么英国则代表着辉煌的“现在”。1731年，他回到法国自己的老家——波尔多附近的拉柏烈德庄园，专门整理所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从事著述工作。

毫无疑问，孟德斯鸠的出身和经历对他的社会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体现其社会政治思想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波斯人信札》，1721年出版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是一部优美别致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闪烁着启蒙思想的政治哲学著作。孟德斯鸠在这本书中假托两个在欧洲旅行的波斯人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朋友、爱人等的通信，从各种不同角度猛烈地抨击和辛辣地讥讽了当时法国极其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风俗习惯，从而间接地号召要对这种国家制度进行变革。这本书很快轰动了法国，风靡一时，孟德斯鸠从此成为法国文坛上的知名之士。但他也因这本书而得罪了官方当局，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就曾为此而一度拒绝批准孟德斯鸠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出版于1734年。它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在这部书中，孟德斯鸠通过对罗马历史演变更替原因的探讨，颂扬了共和制度的优越性，尖锐批判了专制统治，并且论证了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扼要阐述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和政治主张。

孟德斯鸠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他晚年于1748年在日内瓦出版的《论法的精神》。这是他27年辛勤探索的最后成果和理论总结。它并不只是一部法学著作，其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方面。黑格尔曾称

赞它是“一部美妙的著作”，说它以“伟大的见解考察各种法制，认为法制、宗教以及一个国家里面的一切构成了一个整体”①。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孟德斯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的天主教会。这部巨著出版后，轰动一时，仅 1748—1750 两年就连续印行了 22 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孟德斯鸠是一个通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生勤于写作，著述甚多。他对启蒙运动的最大功绩，是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僧侣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进行资本主义政治变革的比较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具体规划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模式和各项基本制度，特别是他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建构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孟德斯鸠的学说，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法制理论被欧美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采用，成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些基本宪政原则。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都吸取了他关于分权和法制的一些政治主张。当然，孟德斯鸠也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具有自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无损于他作为杰出启蒙思想家的光荣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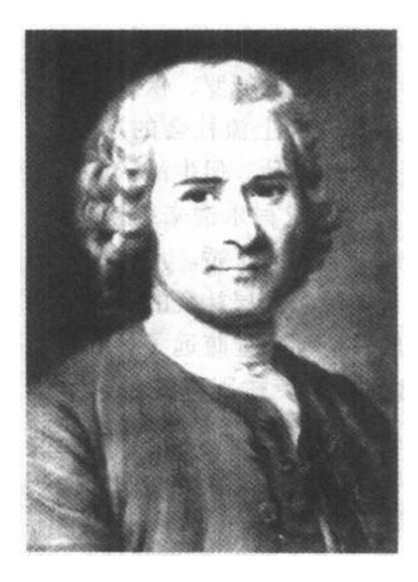
5.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卢梭

在法国启蒙学者中，卢梭是最激进的一个。诗人拜伦曾以夸张手法描写过卢梭：

---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231 页。

……他的预言，
像神秘的古代毕西亚山洞的神谶，
把整个世界投进熊熊的火焰，
直到所有的王国化为灰烬。


卢　梭

卢梭（1712—1778）是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的祖先是法国血统，信奉加尔文新教，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新教中心日内瓦。当时日内瓦是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卢梭常以自己是日内瓦的公民而自豪。

卢梭降生时就失去了母亲，是在姑妈和奶妈扶养下长大的。幼年时代，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的启蒙教育，就是同父亲一起读小说和历史作品。他回忆说，父子俩常常通宵阅读，直到听见早晨燕子的叫声。他10岁时，父亲因与一个法国军官发生纠纷，被迫离家出走。卢梭被送到一位牧师家里住了两年，学习过拉丁文。后来他又被送到雕刻匠家里当学徒。由于不堪侮骂，他弃职逃走。此后，便颠沛流离13年。在此期间，青

年卢梭得到华伦夫人的许多帮助和保护，后来与她长期过着诚挚的爱情生活。这使他有一个安宁的栖息地和良好的自学环境。他勤奋刻苦地学习，对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生物、哲学、文学、音乐等各门学科都有涉猎，积累了广博的知识。他还研读了启蒙思想家洛克、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开始探索时代的重大课题。

1741年，卢梭到了巴黎，被引进"上流社会"的"沙龙"中，结识了许多著名启蒙学者，如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等人，也接触到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夫人。那时，他写过一些歌剧和乐谱一类的作品，但生活依然非常贫困，是靠教书，或给权贵当秘书，或写乐谱来维持生活。在这期间，他同一位不识字的旅馆女仆结了婚。卢梭的生活与经历使他同情下层群众的疾苦，厌恶上层社会的奢靡，因此，他终于同上层社会的沙龙朋友们渐渐地疏远了。

1749年，第戎科学院悬赏征文，卢梭因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获奖而声誉鹊起。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文明进步造成人类堕落和社会苦难的新奇观点，在思想界引起长期争论。1753年卢梭再次就第戎科学院征文题目，撰写了他的最重要的理论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如他所预料，这部具有反叛精神的作品是不会得奖的。但它于1755年在荷兰出版后，却震动了欧洲。在这本书中，他着重阐明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宣传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政治观。1761年至1762年，卢梭又相继发表了极有影响的三部重要代表作。《社会契约论》(1762)在启蒙运动中首次提出"人民主权"论，强调统治者不履行契约，不顺从民意，人民则有权利推翻专制统治，这就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依据。《新爱洛

绮丝》(1761)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它谴责了封建等级偏见在青年婚姻问题上所造成的恶果，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婚姻观。《爱弥儿》(1762)是一部教育哲理小说，它尖锐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提出资产阶级自然教育的主张。

卢梭的为人和论著早为封建统治者所忌恨，路易十五的宠姬彭巴杜尔夫人、首相什瓦则尔等权贵，都把卢梭看作危险的异端。所以，当《爱弥儿》一出版，巴黎法院立即下令当众焚毁，逮捕作者。卢梭因受到通缉而逃到国外。他先后流亡于瑞士和英国达8年之久，直到1770年他被法国当局赦免后，才定居巴黎，靠誊抄乐谱孤苦为生。风烛残年中，他写了自传性著作《忏悔录》。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巨大影响是举世皆知的。

卢梭从小寄人篱下，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并像乞丐一样被送进都兰的宗教收容所。在当时的作家中，他是惟一的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在长期四处流浪中，他目睹广大下层人民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遭受的种种苦难，尝遍人间辛酸，屡受富人的欺凌和侮辱，也得到了穷人的真诚帮助。这种特殊的生活实践，使卢梭学说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这是他比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卓越之处。卢梭因此建立了一个代表18世纪法国平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不平等、倡导人民主权论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卢梭因此成为一名最坚定无畏的反封建斗士。马克思曾称赞说："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1] 路易十五想召见他并准备给他年金，他回避；普鲁士国王也准备给他年金，他谢绝。就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页。

样，在巨大声誉和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面前，卢梭始终保持独立不羁的人格，保持绝不同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清高气节。

在哲学上，卢梭并未摆脱唯心主义和宗教上的有神论的思想，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杰出的，在启蒙运动中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他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成为第三等级中中下层群众的理论旗帜，并在后来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中一度成为属支配地位的革命思想，在《人权宣言》和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政策中得到鲜明反映。路易十六曾哀叹：伏尔泰和卢梭毁灭了法国。罗伯斯庇尔则推崇说："这场革命，卢梭是导师。"在大革命期间，这位导师的遗体以隆重的仪式移葬于巴黎名人公墓，和伏尔泰墓并列。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大厅里，竖立着卢梭的半身像，面对着华盛顿和富兰克林。

6. 百科全书派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

《百科全书》

法国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的重要标志，是著名的《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百科全书》既是启蒙运动的丰硕成果，又是促进运动深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百科全书》的出版不但是近代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事，而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丰碑。

《百科全书》，全名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由狄德罗亲自主编出版的共 28 卷。从 1751 年第 1 卷问世起，直到 1772 年才出齐，历时 20 余年。后来，孔多塞等人又续编了补遗 5 卷（1776—1777）和索引 2 卷

(1780年)。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30余人，撰稿人多达160人以上。其中最著名的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主将，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哲学家，达朗贝、毕丰、哈勒等自然科学家，魁奈、杜尔阁等经济学家，马孟戴尔和博马舍等文学家，等等。《百科全书》汇集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也团结了思想领域一切反封建的战士。它用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用民主思想反对专制统治，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因此，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宗教界的极端仇视，遭到了专制政府的野蛮查禁。但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团结奋斗，英勇斗争，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道道禁令，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为法兰西民族建立了一座精神文明的纪念碑。

首先，它所刊载的由著名学者、专家撰写的大量自然科学条目，汇集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果，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知识的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科学史、技术史仍有重要意义。其次，它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缩影，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百科全书》对于18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乃至人们的穿戴服饰等等无不设立专门辞条予以叙述和记载，是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文化艺术乃至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的一部难得的历史文献。第三，《百科全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启蒙作用。人们称《百科全书》是一部“战斗机器”，一门“可怕的大炮”，从各个领域，向一切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发动猛烈轰击，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声。诚如恩格斯所说：“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

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①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百科全书》不仅仅是一部科学巨著，也是一部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大典。

通常人们把参加编撰《百科全书》的启蒙思想家尊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人物是以狄德罗为首的几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即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他们公开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为《百科全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成为启蒙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坚力量，代表着18世纪法国哲学的最高成就。

拉美特利

拉美特利（1709—1751）虽然在《百科全书》第1卷出版的同年就去世了，但由于他与狄德罗等人的哲学思想一致，公开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所以人们也把他看作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拉美特利出生在法国西北部的圣马洛城，父亲是商人。他青年时期也曾学过神学，准备当教士，但不久就因对神学深感厌恶而改行学医。1733年，他到荷兰莱顿城拜名医和学者波尔哈维为师，不仅学得了高明的医术，也受到了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影响。1742年，他到巴黎任国王卫队军医。这时期他写出了第一部哲学著作《心灵的自然史》，这本书1745年在海牙出版。由于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他受到反动当局迫害，书被焚毁，军医职务也被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0页。

了。他不得不逃往荷兰。在那里，1747年他又因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遭到天主教和新教及当局的联合攻击，被迫再次逃亡。1748年他逃到普鲁士，投奔了当时被看作开明君主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被任命为“宫廷讲师”。伏尔泰挖苦地称他为“宫廷无神论者”。的确，这位“宫廷讲师”未能“安分守己”，继续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与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斗争。在柏林，他陆续发表《人是植物》(1748)、《反塞尼加成论幸福》(1748)、《各派体系的提要》(1750) 等著作。1751年，在一次皇宫宴会上，他因食蘑菇馅饼而意外死亡，年仅42岁。拉美特利的死，遭到了他的诋毁者们的恶意攻击，说这才像一个追求感官享受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这后来成为费尔巴哈拒绝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一个原因。他在《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一文中声明，如果说拉美特利是唯物主义者，那我就不是，因为我不主张大吃大喝，所以那种认为我的学说是“从拉美特利的蘑菇馅饼导引出来”的看法是十分荒唐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费尔巴哈混淆唯物主义的本质和它的名词的错误作了分析批评。

作为医生，拉美特利的哲学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从生理学、医学的角度，阐述了一系列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猛烈抨击宗教神学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对启蒙运动中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狄德罗

“如果说有谁为‘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

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①] 这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对狄德罗的高度评价。



狄德罗

狄德罗（1713—1784）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还是著名的作家、戏剧家和艺术评论家。他出身于朗克里城一个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早年在家乡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后到巴黎第一流的学校路易大帝公学就读，因勤奋好学，19岁时便获得文科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违背父亲的意旨而钻研学问，并带着“初生牛犊”的精神去巴黎闯天下。他后来在回忆中曾经这样写下他的经历：“我到了巴黎，我将走向最高学府的索邦，与穿着皮裘大袍的博士、学者为伍。在途中我邂逅 了一位天仙般美丽的女子。但愿能与她同衾共枕，我如愿以偿了，还和她生了四个孩子。这样一来，我只好放弃我所喜爱的数学、我经常放在口袋里的‘荷马’和‘维吉尔’和我感到浓厚兴趣的戏剧。我欣然地接受了主编《百科全书》的工作，我乐意牺牲二十五个春秋的岁月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主编《百科全书》这样一部史无前例、洋洋大观的巨著，以当时还是一个不知名作家的狄德罗来说，的确是一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沉重的工作。但他不畏困难，不殚精力，坚持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达朗贝于1758年辞去《百科全书》副主编职务之后，狄德罗仍坚持编辑工作。当伏尔泰规劝他移居国外，结束这种工作时，他说那是逃避困难，正是迫害我们的恶棍所希望的，我们要有勇气坚持斗争。狄德罗言行一致，不畏艰险，不辞辛苦，既从事大量编辑工作，又亲自动手撰写辞条1139个，还要与教会和官府不懈斗争。他为《百科全书》几乎倾注了毕生精力，立下了不朽功勋。当然，狄德罗也因主编这部宏著而名垂史册。

狄德罗博学多才，著述甚多。卢梭曾称赞他"是本世纪一位惟一的奇才"，伏尔泰称他为样样都内行的"万事通"。的确，他除去把主要精力用于编撰《百科全书》以外，还单独发表了许多著作。1746年，他发表处女作《哲学思想录》，因其自然神论内容而被当局下令焚毁。1749年，发表《盲人书简》，由于宣扬了唯物主义与无神论而触怒教会和官府，被捕入狱，过了3个月的铁窗生活。此后，他又发表了《论解释自然》（1753）、《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1770）、《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1769）、《达朗贝的梦》等哲学著作。他还写过许多文艺作品，如小说《修女》、《宿命论者贾克》，戏剧《一家之主》、《私生子》等，特别是他的《拉摩的侄儿》，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曾被恩格斯看作是这一时期的辩证法的杰作。此外，狄德罗在美学和艺术理论、文艺批评等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写过许多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论述了一系列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表达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并以此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教会，宣扬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原则，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制造舆论。狄德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直到临死之

前，神甫劝他忏悔，放弃无神论思想，也遭到了他严正的拒绝。他无愧于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启蒙运动的主将。

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1715—1771）是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的重要代表。他出身在巴黎一个宫廷医生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早年曾在天主教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但他对宗教神学一贯厌恶，在学校时读了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洛克的《人类理智论》给予他强烈印象，遂成为洛克的信徒。

1738年，由于皇后的"恩典"，23岁的爱尔维修被任命为总包税官，年薪30万里弗，成为有权势的富翁。但这个"美差"并没有使他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相反，他利用总包税官职务上的便利，进一步了解了上层社会黑暗腐败、营私舞弊的内幕和下层群众的不幸命运，促进了他反封建的进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751年，他辞去总包税官，担任了皇后司膳大臣。这是一个空闲职务，这使他能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和著述。从此他便加入了启蒙学者的行列，与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密切往来，成为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一员。1758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富于反封建反教会战斗性的著作《论精神》，由于其尖锐、大胆的革命精神，引起了封建势力和教会的极大震恐和仇视。巴黎大主教说，爱尔维修的思想"像地狱一样狰狞可怕"，罗马教皇利敏特十三禁止教徒阅读、翻印或抄写这本"可怕的著作"，并下令将其焚毁。1759年2月，皇家律师奥美尔·若利说，有一个密谋集团，他们"维护唯物主义，消灭宗教，鼓吹自由思想，促使道德败坏"，而《论精神》是哲学阴谋的一个环节。

他叫嚷要“拔出宝剑，把所有侮辱神灵的人全部杀光”。反动派的咒骂和迫害并没有使爱尔维修屈服，反而使他在先进阶层人士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更激起爱尔维修的斗争意志。1769年，他又完成了《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简称《论人》），在书的序言中，爱尔维修宣布：“我并不放弃我在《论精神》那部书里建立的那些原则，那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是惟一合理的原则。”遗憾的是，由于反动派的迫害，这部书在他生前未能发表，是他逝世两年后才在荷兰出版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① 这是对爱尔维修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的经典论述。

霍尔巴赫

霍尔巴赫（1732—1789）出身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帕拉蒂内特的一个商人家庭。他幼年丧母，伯父让他移居法国，先在巴黎接受初等教育。他1749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同年回到巴黎，取得法国国籍。1753年他继承伯父遗产和男爵称号。他通过翻译德文学术著作而开始自己的著述活动，并与狄德罗等进步思想家交往甚密，成为《百科全书》自然科学方面积极撰稿人之一，共写了物理、化学、地质、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166页。

物、冶金等学科的400个条目。他家的“沙龙”（即客厅）是法国进步思想家们经常聚会的中心，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探讨哲学和各种学术问题。1770年，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自然的体系》问世，引起了轩然大波，僧侣和官府对它大肆攻击，不久，这本书就被巴黎法院判决公开销毁，罗马教皇宣布该书为禁书。这部著作综合各家所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机械唯物论，使法国唯物主义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因而被誉为18世纪“唯物主义的圣经”。霍尔巴赫还是一个杰出的无神论者，被他的战友们称作“上帝的个人的仇敌”。他以生动锋利的笔调，写了《被揭穿了的基督教》(1761)、《袖珍神学》(1768)、《健全的思想》(1772)等一系列无神论著作，抨击了基督教和教会。他还撰有《社会体系》(1773)、《普遍道德》(1776)等论述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著作。霍尔巴赫以百科全书派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者、集大成者和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而荣载史册。

四　启蒙推动下的西方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 这种革命在18世纪欧洲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启蒙时期是新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崭新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新时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1. 资产阶级文明的累累硕果

列宁曾说："资产阶级的文明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累累硕果"正是启蒙运动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因为启蒙运动是欧洲国家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折点，它对西方近代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启蒙运动刷新了西方的精神文明。众所周知，西方精神文明在中世纪是曲折行进的，而且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主义的外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②]。哲学、政治、法学、科学等都是宗教神学的"婢女"。在反动的封建专制下，这种"精神文明"因其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而成为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创造了反映他们利益和要求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近代精神文明。这种新兴的精神文明，初创于文艺复兴，在启蒙运动中得到极大发展。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极其广泛而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其直接产物就是精神文明诸领域的累累硕果。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高度评价其成就。指出：18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③]；"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下同），第3卷，第5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选集》，第3卷，第247页。

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1]；“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2]；“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3]；“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我们要把这些“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4]。这些评价是公允中肯的。的确，欧洲启蒙学者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各个思想文化领域都做出了非凡的功绩，创造了令人景仰的哲学文明、科学文明、艺术文明、教育文明、道德文明和政治思想文明，为人类精神文明谱写了新的篇章。

其次，启蒙运动促进了西方的物质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848年高度评价过资产阶级为人类物质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 造成这种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从18世纪中叶在英国兴起的产业革命。而启蒙运动是产业革命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在英国，启蒙运动不仅巩固了“光荣革命”的政治果实，而且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启蒙运动扫荡了一切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封建势力和宗教神学，特别是以启蒙思想为指导的法国大革命，为法国产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不仅如此，18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还给予19世纪的科学革命和20世纪的技术革命以深远影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

最后，启蒙运动推动了西方的制度文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虽然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马克思在相对封建制度、集权政治的意义上，经常用“文明社会”、“文明统治”、“文明制度”、“文明政府”等术语来概括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文明进步状况。列宁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①] 可见，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制度文明的一次巨大历史进步。而欧洲启蒙运动直接推动了这种制度文明进步的实现。在英国，启蒙运动对刚刚确立的新兴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巩固作用。在法国，新兴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理想蓝图是启蒙学者设计的，这种蓝图又是在启蒙思潮推动下的法国大革命中实现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胜利。

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加强，资产阶级逐渐由进步走向落后，由革命转向反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新兴资产阶级曾在启蒙时代和上升时期为人类所创造的辉煌文明。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37卷，第109页。

2. 历史局限性

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流所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18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① 首先，启蒙运动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主体，尽管他们"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幸福生活，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确实没有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可能看出）从农奴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个制度中的各种矛盾"②，他们真诚地要立即解放全体人民，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全人类而奋斗的，但在实质上，他们的理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主要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和归宿的。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③

在理论上，启蒙思想也暴露出明显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自然观虽然表现为强有力的唯物主义，但却是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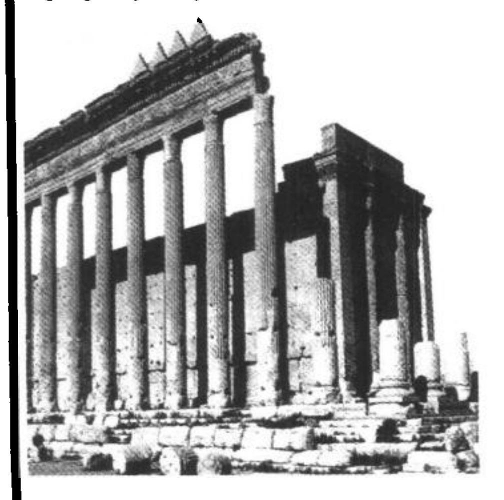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56 页。
② 《列宁选集》，1 卷，第 11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56 页。

械的唯物主义；社会观虽然不失有许多极为珍贵的思想，但基本上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上，虽然也产生了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寻的起源和基础》、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辩证法的杰作，但总体上是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支配；它的理论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他们虽然同情劳苦大众，要为全体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但又总是把自己看作先知先觉者，而把人民群众看作需要由他们来予以启蒙的愚昧无知的群氓；而从根本的性质来看，虽然启蒙思想在反封建的历史时期具有进步意义，但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的一种华美的诺言。尽管如此，欧洲启蒙运动因体现了社会发展必然趋向，在相当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在历史上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因此，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



第二章 一切都要经过理性法庭的审判——高扬理性的启蒙哲学

- 启蒙哲学的理性精神
- 宇宙是一架机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
- 感官就是我的哲学家——感觉主义认识论
- 人性与神性的对抗——人道主义历史观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恩格斯

在18世纪启蒙思想的精神百花园中，启蒙哲学这朵奇葩最引人瞩目。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产生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当中的哲学家们，把"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使哲学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①]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启蒙哲学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符合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的"真正的哲学"。它是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启蒙精神文明的灵魂。因此，对启蒙哲学的研究，能使我们深入地理解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时代精神，把握西方近代精神文明，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今世界，认识现代西方文明。

一　启蒙哲学的理性精神

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思想文化革命，启蒙哲学是这场伟大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启蒙哲学以理性批判的精神，横扫中世纪一切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猛烈抨击神权和王权的反动统治，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前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

1. 中世纪："非理性的时代"

启蒙学者认为，西欧中世纪被宗教的黑暗统治淹没了，人类的理性遭到践踏，愚昧、迷信、偏见等非理性支配了人类精神一千年。因而，中世纪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非理性的统治。马克思也指出："整个中世纪——体现了非理性的时代。"①

欧洲中世纪，统治阶级实行蒙昧主义的愚民政策，把宗教神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惟一的意识形式，哲学、政治、法学等都被合并到神学中，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某一学科的公理只要与基督教的教义或某一次宗教会议的规定相径庭，就会被判定为理性的迷误。宗教、教会和经院哲学强制理性服从信仰，肯定信仰高于理性，迫使人们放弃主观的认识能力，屈从于外在的权威。这就是说，只有宗教和神学才是真理，真理导源于天启，来自神谕，人的理性只能理解和论证宗教教条。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认为，信仰占首要地位，人的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信仰以便理解，而不是理解以便信仰"，因而同信仰相比，理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理性不能抛开神的启示独立地探索自然，不能根据人的自然要求来认识世界。经院哲学家安瑟伦直言不讳地宣称，基督徒必须通过信仰前进到理性；如果理性不能理解，更不能脱离信仰。理性应该维护信仰，反对不信神的人。理性被贬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8页。

为信仰的奴仆，也就是人被规定要遵从宗教教义和封建制度。显然，在中世纪，不仅宗教神学，就是哲学和科学，也由于神学化而丧失了爱智慧求真知的理性本性，成为一种禁锢和麻痹人们精神智慧的蒙昧主义。因此，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推动社会前进，促进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就必须开展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理性启蒙运动，使人们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恢复理性的权威，创造"哲学的世纪"。这正是18世纪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哲学的伟大历史使命。

2. 18世纪："哲学的世纪"

法国启蒙学者达朗贝（1717—1783）在他的《哲学原理》卷首，对18世纪中叶的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他指出，在近300年来的精神生活中，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开始，16世纪中叶宗教改革达到高潮，17世纪中叶笛卡尔哲学胜利地改变了全世界的图景，18世纪中叶无疑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说："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似乎预示着一种更为巨大的转变即将来临。……我们的世纪因此而被人们特别称为哲学的世纪。"[①] 达朗贝所说的"哲学的世纪"，就是法国唯物主义哲

① 见E·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第1页。

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惟有法国唯物主义哲学闪耀着最灿烂的光辉，照亮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①]。因此，本章对启蒙哲学的介绍，重点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这种由拉美特利到霍尔巴赫创制的唯物主义，是18世纪法国哲学以至整个欧洲启蒙哲学的主流、基石和支柱，代表着唯物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喜欢说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或“哲学的世纪”。在他们的笔下，理性就是哲学的同义语。因为他们认为哲学来自理性，哲学就是理性的实际运用。所以，理性在这里不是仅指认识过程中与感性相对立的另一个认识阶段，而主要是指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人的全部理智能力。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除了其他含义外，有两种含义是与宗教信仰相对而言的，即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一是指“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启蒙学者所谓的理性就是在这两种含义上使用的。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他们就是要用这种理性之光去启迪人类，使之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非理性的迷梦中醒悟过来。

因此，启蒙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重视理性，突出理性的作用。当然理性在启蒙哲学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在培根那里，理性与信仰平分秋色。洛克从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00页。

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反对天赋观念，却又认为理性有个限度，对象中有可知和不可知的区分，而且容忍来自于神启的信仰。信仰还拥有一定的地盘。只是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手里，信仰才彻底失势，理性占据了绝对地位。他们以哲学即理性的名义去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和神圣的权威。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现存的一切，包括宗教、自然观、社会形式、国家制度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最无情的审判。他们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束缚了人的头脑，扼杀了人的理性，使人长期处于愚昧无知之中，遭受痛苦和灾难，因而必须从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理性权威，用理性来判断一切，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不难看出，理性批判精神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理性是一面革命的旗帜，是一种前进的动力。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勒所说：“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启蒙主义者注重理性，要借助理性促进社会发展、建立理想的王国，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他们把理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却又充分暴露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而且，他们心目中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他们没有能超出自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① E·卡西勒：《启蒙哲学》，第3—4页。

3.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欧洲启蒙哲学大体经过了由自然神论走向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洛克哲学夹杂着自然神论的因素，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都是自然神论者。以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排除了有神论，也廓清了自然神论，把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成为纯净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标志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恩格斯高度评价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指出："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①] 还说：他们的著作"有极高的价值"，"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②]。

在西方，唯物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古希腊罗马的朴素唯物主义，16至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19世纪以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自然观上，它贯彻了彻底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则，运用战斗的无神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在认识论方面，坚持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认为感觉是认识的惟一来源，感觉的基础是客观物质世界。社会历史观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但又提出"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法国唯物主义的最大贡献，是比前人更彻底地贯彻了唯物论和无神论路线。他们认为世界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7页。

物质的，物质是永恒的。狄德罗指出："世界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现在、过去、将来都始终如一的。"物质是世界上惟一的存在物，是构成自然界的惟一资料。整个世界是一架机器，能够自己进行有规律的运动。拉美特利认为，物质本身就包含着能使它活动的推动力，这种力造成物质的自行运动，通过运动形成宇宙万物。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运用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彻底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有力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和一切为宗教神学张目的哲学怪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表明，在反对一切宗教、坚持绝对无神论方面，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思想。

法国唯物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产物，受其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首先是机械性，即用机械观点来解释一切。恩格斯曾指出，在 18 世纪的自然科学中，只有机械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这就造成了那种"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的毛病。笛卡尔提出"动物是机器"。拉美特利进而肯定"人也不过是一架机器"，是一架靠饮食支持、体温推动的"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是一台极其精致的"聪明的机器"。他说，人和动物不同之处，不过是人这种机器比动物这种机器"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罢了，其间"只是位置的不同和力量程度的不同，而决没有性质上的不同"。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看来，不仅动物和人，就是整个宇宙也是一架机器。这种看法，显然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局限性，是其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古希腊人那里已经产

生，但不占统治地位，到了17、18世纪才占了统治地位。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代替自然哲学的臆造，开辟了近代实验科学的新纪元。新的方法要求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把观察的对象从总的联系中抽取出来进行孤立、静止的研究。这在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中是有积极意义的，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被一些哲学家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之后，就造成了近代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孤立、静止和片面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机械观点一样，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局限性。但这并不是说个别法国唯物论者的思想没有辩证法的因素，而是就整体来说，他们未能摆脱机械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法国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局限性，是社会政治观的历史唯心主义。法国唯物主义者，尤其是爱尔维修，在感觉主义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他把感觉论应用到社会生活上来，首先提出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趋到避害的“自爱原则”是人的永恒不变的天性，是人的一切思想行为的本源。他还从感性原则出发，得出“人是生而平等的”和“人的一切差别都是后天获得的”思想，从而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他注重法律和教育，进而提出“教育万能”和“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并直接导致他的“天才论”。显然，这一套社会政治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所表达的反对禁欲，发展个性，追求幸福，要求平等，运用法制改造社会的进步思想，则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服务的。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它是启蒙的哲学，是战斗的唯物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批判宗教神学，抨击封建专制，变革社会制度的强大理论武器，因而在欧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①。

二 宇宙是一架机器——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

同17世纪的英国唯物论相比较，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彻底的无神论，把神从自然界中彻底地驱逐出去，把无神论和唯物论结合了起来，成为战斗的唯物论；二是把机械论推向了顶峰，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论。这两点是我们把握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精神的关键。

1. 砸烂“发疯的钢琴”

在18世纪法国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荒谬无比的中世纪自然观，迷漫着用宗教教条解释自然的神秘主义烟雾，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0页。

播着作为宗教神学帮凶的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毒素。面对这种恶浊泛滥、理性遭劫的局面，作为启蒙哲学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抨击中世纪自然观，彻底摒弃贝克莱之类“发疯的钢琴”所奏出的唯心主义自然观。

法国唯物主义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中世纪的自然观。中世纪的自然观奉神学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说是神学的一支。它根据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臆造的体系，特别是宗教教条，来解释自然，充满了谎言谬论。在中世纪自然观那里，自然或自然界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由神创造的。其经典依据就是基督教《圣经》“创世说”所记载的上帝六天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原来上帝在混乱黑暗中度过了亿万年游手好闲的生活以后，突然心血来潮，开始创造世界。第一天创造了光，称光为昼，黑暗为夜；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了动物；第六天用泥土造成第一个男人亚当，又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夏娃，为亚当之妻。看守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上帝的智慧果犯罪，被放逐人间。从此他俩在人间生儿育女，以后的人类就是他俩的子孙。经院哲学家认为，上帝是全能全智全善的。它不仅根据自己的意志创造了时间、空间、物质以至整个世界，而且使万物都合乎一定的秩序，有条不紊，实现最佳组合。中世纪神学硬说，地球上的万物有等级之分，循序排列。最低层的是无机物，其次为植物和动物，人处于最高层，成为地球上万物之中心。这样的宇宙是由神来安排的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一事物都有指导自己活动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揭露的，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

中世纪自然观不仅宣扬这种荒唐的目的论，还用天命论蛊惑人心。神既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世界，人世间一切事物都由天命注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法国唯物主义者与这种神学自然观针锋相对，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宇宙的惟一存在。物质能够自行运动，通过运动形成宇宙万物。运动既能创造世界，也能维持世界，根本没有造物主的存在。拉美特利大声疾呼，宗教神学充满了谎言与偏见，“把你的偏见的锁链打碎，把经验的火炬高高举起，你就会给自然以应有的荣誉”！

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为中世纪神学自然观辩护的唯心主义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的“单子论”首先受到批判。他认为世界是由精神性的“单子”构成，惟一最高的单子是上帝，上帝创造了每个单子，并使它们和谐一致，即“前定的和谐”。特别是被狄德罗冠之以“发疯的钢琴”的英国哲学家贝克莱（1685—1753）的唯心主义遭到猛烈抨击。贝克莱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基本公式出发，对世界作了具体描绘：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因为我看见它，摸到它。我之所以说苹果有香气，只不过是因为我嗅到它；所以说它是甜的，只不过是因为我尝到它。桌子不过是硬、黄、方……等等一堆感觉，苹果不过是圆、绿、香、甜、软……等等一堆感觉。换言之，正是因为有这些感觉，我才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并以桌子或苹果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其实，它只是偶然堆集在一起的一堆感觉，并非在我之外真有一个桌子或苹果。不仅对桌子、苹果可以这样说，对于山河大地、虫鱼鸟兽等都可以这样说。任何一物，都不过是“感觉的集合”。贝克莱的这套怪论，在当时就遭到许多

人的嘲讽和质问，其中最尴尬的一个问题是父母生了贝克莱呢，还是贝克莱的感觉的集合产生了他的父母？为了摆脱困境，贝克莱请出了“上帝”。他认为人的感觉既非物质所引起，那就足证它是由上帝所引起的；某物之所以在没有被我感觉的时候仍然存在，那正是由于它被上帝所感觉；各种感觉之所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呈现出来，那正好说明它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所以，“上帝的意志构成自然法则”。狄德罗指责贝克莱的哲学像一架“发疯的钢琴”，“以为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其实，“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代绪论”中，把狄德罗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代表，详细引证了他对贝克莱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唯物主义观点的阐述。

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中世纪神学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哲学自然观的批判，摧毁了与自然势不两立的天国，解除了宗教强加于自然的神学禁锢，清除了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流毒，恢复了自然的“庐山真面目”，从而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给唯物主义本身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 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用自然界自身的原因解释一切事物，这就否定了超自然的神秘主义，贯彻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

他们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上，坚持世界物质性的观点。狄德罗坚决抛弃灵魂和肉体的二元论以及两种实体并存论，而把统一的物质实体看作是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爱尔维修

肯定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自然就是“一切事物的总和”。霍尔巴赫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归结为物质和运动。他说：“宇宙，这个一切存在物的总汇，到处提供给我们的只是物质和运动。”“一些变化万殊，具有无限多组合方式的物质，不断地接受和传达着各式各样的运动。这些物质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各种不同的组合，以及它们必然产生的那些变化多端的活动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成了万物的本质；就是由这些多样化的本质中，产生出这些事物所拥有的种种门类、等级或体系，其总和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自然。”[1] 在这里，法国唯物主义者不仅指出了世界、宇宙的本质是由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物质所构成的，说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同时还指出了由于物质运动和其组合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世间物质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可见，他们试图解决世界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关系问题，认为各种不同物质存在形式的总和，就构成了整个自然界。

那么，什么是物质呢？法国唯物主义者对英国唯物论把物质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抽象实体作了批判，指出物质是具有若干特性的。霍尔巴赫明确指出，“没有特性的物质纯粹是子虚乌有”。狄德罗也说，在我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决不可能是由一种完全同质的物质产生出来的，正如决不可能单单用一种同样的颜色表现出一切事物一样。丰富多彩的物质样式，只能是由物质的某种异质性所造成。由此，他提出了“异质之素”说。认为自然中有无数不同的元素存在，正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下同），第 575 页。

是这些异质元素形成了物质的多样性或异质性。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在唯物论发展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对物质及其特性的这种认识，法国唯物论者对物质概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霍尔巴赫把物质定义为："物质一般地就是一切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我们归之于不同的物质的那些特性，是以不同的物质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不同的印象或变化为基础的。"① 爱尔维修也作过类似的定义，指出："物质并不是一件东西，自然界中只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形体的个体，物质这个名词只能了解为那些为一切形体所固有的特性的集合。"② 在指出了物质的所有特性中，着重论证了意识是有机物质的特性，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定义中可见：物质并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切形体所固有特性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是能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这种物质观念比较接近了科学的物质定义，因为法国唯物论者已经试图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方面来思考什么是物质及其特性的问题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观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法国唯物论者还从物质是惟一实体的观点出发，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材料，对意识是物质的特性，灵魂是肉体的机能作了一定的论证。拉美特利认为，心灵的一切机能，直到意识为止，都只不过是依身体为转移的东西。如果身体死亡了，心灵也就随之消亡了。拉美特利还从人的生理状态和解剖学的启示中，初步提出了意识是人脑的属性的论断。指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587、450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587、450 页。

出，意识活动离不开大脑的生理活动，“因为当脑部受重伤时，动物就没有知觉、没有分辩力，没有认识了”。狄德罗明确指出，人脑是思维的物质器官，具有意识的机能。他认为，人的大脑、神经和感官是一套完整的机构，它们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思想。人脑和神经的关系就像蜘蛛和蜘蛛网的关系，脑膜就如同蜘蛛一样，处于神经网的中心，对大脑来说，“它的网所布成的这座巨宅的任何区域所发生的事情，它都能在中央得到情报”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狄德罗还猜测到了意识是由低级物质的感受性逐渐发展进化而来的。他把“感受性”看作物质的一种普遍的基本特质，并且肯定石头也应当有感觉，只是石头的雕像就只有迟钝的感受性；而人、动物，也许还包括植物在内，则赋有活跃的感受性。他认为“活跃的感受性表现在动物的某些显著的活动上，这些活动也许植物也是有的，而迟钝的感受性，则可以由向活跃感受性过渡而得到肯定”②。狄德罗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物化论的色彩，但它所包含的无机物向有机物进化，低级的感受性向高级的人的意识过渡的辩证法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总之，法国唯物论者否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的作用，对一切都用自然本身的原因、用物质的原因去解释和说明，特别是肯定了意识或心灵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或功能，从而第一次比较正确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论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不仅使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克服了以往唯物主义的种种不彻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389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362 页。

底性，在自然观上达到了彻底唯物主义的水平，同时也有力地反击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捍卫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但他们把人看成是机器，有着浓厚的机械论色彩；对物质的认识也只是在机械力学和物理学的意义上，还不能真正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来揭示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对意识也仅仅看到它依赖于物质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对物质的反作用。因而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克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3. 宇宙无需“第一次推动”

我们知道，自培根之后，从霍布斯、洛克到笛卡尔、斯宾诺莎，都是把物质看作被动的、惰性的东西，物质的任何部分既不能使自己运动，也不能使自己静止。在他们看来，运动纯系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外力的推动，是靠另一个运动着的物体作用。那么第一个物体的运动是什么力量推动的呢？他们就无法解决，只好求助于上帝。牛顿就认为行星是由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的。他说，地球要围绕太阳旋转，需要两种力，一是万有引力，亦即地球指向太阳的重力；二是大小适当的切线力，即使地球沿轨道切线方向运动的横向动力。牛顿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他无法找到这种切线力，最后只能求助于上帝：“没有神力之助，我不知道自然界还有什么力量能促成这种横向运动。”[1]

法国唯物主义者严厉批评了牛顿等人在运动问题上的错误。指出，物质运动的源泉就在物质自身，运动是物质本身固有的属性，无需“第一次推动”。拉美特利说，“物质本身

---

① 《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62 页。

就包含着这种使它活动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乃是一切运动规律的直接原因”。霍尔巴赫认为，物质运动的原因就在物质自身之中。他宣称：“运动乃是存在的一种形式，它是必然地从物质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运动在物质之内是自行产生、自行增长、自行加速，并不需要任何外因的帮助”[①]。狄德罗继承和发挥了梅叶“物质自动”的思想，认为在物质之外设想一种作用于物质的力是不必要的和荒谬的，指出：“物体就其本身说来，就其固有性质的本身说来，不管就它的一些分子看，还是就它的全体看，都是充满活动和力的。”[②] 他说，那些认为物体就其本身说来是没有活动也没有力的观点，是一种可怕的错误，是完全违反全部正确的物理学和化学的。狄德罗还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论证了运动的原因在于物质内部的吸引和排斥，而不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既然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与物质不可分割，那么，运动就必然是普遍的、绝对的。狄德罗指出：“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都在灭，从来没有过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这就是说，物质世界的一切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霍尔巴赫也说，“自然界的一切都处在一种不断的运动之中；它的各个部分没有一个是真正静止的”。当然，静止是存在的。正如狄德罗所认为的，静止和运动一样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二者是有区别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他说：“静止与运动的真正区别，

①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下同），第28页。

② 《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下同），第112页。

就在于绝对的静止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于自然中，而运动则是一种与长、宽、高同样实在的性质。”① 特别可贵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还认识到运动是事物生成、毁灭的原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动力。霍尔巴赫明确指出：“物质的各种变化、组合、形式，总之，它的一切变更，都只是归因于运动。由于运动，一切存在的东西才产生、变化、增长和消灭。乃是运动在改变事物的面貌。”② 这些论述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点。

法国唯物主义关于物质是自己运动的，运动的原因在自然之内而不在自然之外，运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的思想，既批判了前人的物质不动论或被动论，又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运动观是机械论的。因为，虽然他们有人对运动作了分类，提出简单运动和复杂运动，但还是把复杂运动归结为简单运动。在他们看来，生物运动、社会运动在本质上还是机械运动。拉美特利声称：“植物是机器”，“人是机器”。这种把生物，甚至人的社会活动都明确归结为机械运动的观点，是机械论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他们虽然成功地批判了神的“第一次推动”，但仍未能摆脱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4. 物质的持续性和广袤性

时空问题也历来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神学斗争的一个焦点。英国17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和神学家亨利·摩尔

---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56、588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56、588页。

和伊萨克·巴罗认为，空间脱离物质而存在，是有形体的宇宙的无限而不动的根基；时间标志永恒存在的性能，先于世界而有，世界毁灭以后仍然存在。摩尔甚至把空间当作一种和神的特性相联系的实体，公开宣称空间是神的本质的显现的晦暗的象征。这种理论显然是在维护神权和封建统治的。贝克莱主张主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认为时间是人的观念的连续不断地显现的产物，空间即广袤，而“广袤、形相和运动仅仅是些存在于心中的观念”。

法国唯物主义者有力地批驳了这种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时空观，在时空战线上坚守了唯物主义阵地。早在梅叶那里，就否定了时空是神创造的和主观的谬论。照他看来，时间既非现实的单独的存在物，也不是无或不存在，它是原始存在物的持续性，年、月、日等就是表示这种持续性的。空间是客观的，是事物存在的广延性。拉美特利认为，“物质有两种本质属性，即广袤和运动力”。关于广袤，他说：任何一个物体都有长、宽、高三度，占有一定的空间，“我睁开眼睛就看到我的周围只是物质，只是具有广袤的东西。可见广袤这种特性是属于一切物质的，是只能属于物质的，因而也是与物质的实体不可分的”①。霍尔巴赫也认为，广袤性和运动一样，是物质固有的属性。在时空问题上，狄德罗的认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他认为，“在自然中，持续性是作用的连续性”，“广袤是同时作用的共存”②。持续性指的是时间，广袤相当于空间。他把时空同物质的作用即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199页。

② 见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92页。

运动联系起来，从物质的运动方面来说明时间和空间。所以他在论及存在时明确指出："即使是抽象地，我也不能把场所、持续性同存在分开。因此这两种特性对存在来说是本质的。"① 存在代表存在的具体事物，这种事物及其运动离不开空间和时间，只能存在于时空中。同样，空间和时间自然也离不开物质和运动。这是包含有辩证法因素的唯物主义时空观。

就整体来看，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空观和他们的物质观、运动观、意识观一样，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打击了神学和唯心主义，但又带有浓厚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色彩，如爱尔维修就固执于狭隘的直观，把时空与物质割裂开来，认为"抽象地去看，空间就是纯粹的虚无"。当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18世纪的自然科学的条件下，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可避免的，只有当自然科学进入整理材料，综合研究的发展阶段时，人们才能用真正辩证的思维认识自然。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

三　感官就是我的哲学家——感觉主义认识论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

① 见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92页。

立了机械的反映论。这种认识论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感觉论乃是法国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总的特征”[①]。他们批判了唯心主义感觉论和先验论，克服了二重经验论，形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贯彻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其二，这种感觉主义的认识论，由于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因而成为一种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这是我们把握法国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钥匙。

法国唯物主义反映论，在其机械和直观的视野里，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这对于引导人们注重经验，崇尚理性，发展科学，追求真理，有着重要意义。

1. 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18 世纪法国唯物论者都把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经验看作是一切知识和观念的来源。拉美特利认为，人的一切认识的基础是感觉。感觉是客观事物刺激感官引起的。没有感官，就没有观念，没有接受来的感觉，也就没有观念。因此他说：“除了感官以外，再没有更可靠的向导。感官就是我的哲学家。”[②] 霍尔巴赫比喻说，人犹如一架有感觉的竖琴，为接触它的东西所扣击而发出音响。他把感觉定义为：“感觉乃是这种被触动的特殊形式，专门属于有活力的

---

① K·G·巴克拉捷：《近代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9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196 页。

物体的某些器官，是被作用于这些器官的物质的东西的出现而引起的。”[①] 在他看来，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和惟一来源，“思维、反省、记忆、想像、判断、意志、活动等等，都是以感觉为基础的”。爱尔维修甚至说，“人身上一切都归结为感觉”。可见，法国唯物论者肯定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这一点，是继承了洛克的观点，也是同洛克基本一致的。但他们把感觉看作一切知识和观念的惟一来源，克服了洛克把感觉和内心的“反省”都当作观念来源的二重经验论的缺陷，而达到了较彻底的反映论的水平。

法国唯物主义者立足于彻底的唯物主义感觉论，批判了一切背离唯物主义的理论。爱尔维修痛斥了经院哲学家所宣扬的思辩形而上学。他指出：“经院哲学家竟然妄图不借助感觉而洞察知识王国。……他们不着边际的浮夸的语词和永无休止的争论产生了什么结果？在他们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人们找到了什么？只是漂流在观念的沙漠上的大量语词。”[②] 我们不妨浏览一下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争论的一些极其无聊而荒谬的问题：“羊从市场上是被手还是被绳子拉回来的？”“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天使要不要睡眠？”“亚当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究竟是几岁？”“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万能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大石头？”爱尔维修对如此脱离实际，玩弄概念，空谈玄理的神学思辩怪论痛恨至极，指出此乃哲学家的陷阱，真正的哲学家必须依靠经验的手杖而行走，永远不断地进行观察、再观

①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 95 页。

② 见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下同），第 565 页。

察而前进。

他们坚持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先验论，特别是反对笛卡尔等人所宣扬的那种为神学张目的“天赋观念”。霍尔巴赫说：“神学这种超自然的学说，是阻挡自然科学进步的一重无法克服的障碍，……神学不断地反对国家的幸福，人心的进步，有益的研究，思想的自由：它强使人们保持愚昧无知；它指点人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无非是错误。”① 这清楚地表明，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宣扬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是为了反对摒弃经验的宗教神学的蒙昧主义，发展自然科学，促进“国家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这种观点在当时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狄德罗在《论盲人书简》中，也借盲人之口猛烈抨击了先验论，特别是关于神的先验的观念。当一位教长口若悬河地论证神的存在时，盲人对他说：“哎呀，先生！您还是抛开这种从来没有向我呈现过的美景吧！……您如果想要我相信神的话，一定得让我摸得到他。”神属于先验的观念，“摸得到”标志认识的主体触及外物时的经验。狄德罗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一切知识和真理发源于感觉经验，超经验的先验的观念如同神学一样是荒谬的。

法国唯物论者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与唯心主义经验论进行了坚决斗争。列宁曾指出：“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从感觉出发，可以沿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沿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636页。

(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像)。"[1] 狄德罗等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从洛克的感觉论出发，遵循"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而贝克莱则从洛克的感觉论出发遵循"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狄德罗等人尖锐地批驳了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认为这种体系荒谬之极，是"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的，从而捍卫了唯物主义反映论。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感觉是认识的基础、始点和来源，贯彻了唯物主义反映论，这对于打击宗教神学、经院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和先验论，引导人们注重经验和事实，坚持在实验和观察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唯物的感觉论，还是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诚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2] 特别是爱尔维修把这种感觉论发展到极端狭隘的程度，除去"感觉能力"和感性认识，不承认任何理性思维能力和理性认识结果，他甚至明确地肯定"判断就是感觉"，这就根本抹杀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区别，这种唯感觉论，是形而上学的，在认识论的全体上是错误的。

2. 思维是认识的"引导者"

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家是比较典型的唯物论的经验论者。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强调感觉经验作用的同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下同），第1卷，第286页。

时，也注意到了思维的作用，并试图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拉美特利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感官高举着火炬，照亮了理性的路，并指示我跟着它前进的话，对于理性这样一个我认为不是很可靠的向导，我也许会瞧不起的。因此经验在我面前为理性讲了话；就是这样，我把经验和理性结合在一起了。”① 霍尔巴赫举例说：如果设想对一个桃子的认识过程，那么首先我用眼观察，产生了颜色和圆的感觉，脑子里出现一个圆而有色的物体的观念；通过手的触摸和掂量，头脑中形成了柔软、新鲜和重量的观念；用鼻嗅和口尝，大脑产生了香味和甜味的观念等等，“把所有这些传达给我的脑子的、在我的器官上所造成的各种印象和改变联系起来，就是说，把我所接受的这一切感觉、知觉、观念配合起来，我便有了对于一个整体的观念，这个整体我名之为桃子，对这个桃子我能进行思维，或是我对桃子有了一个概念”②。这表明霍尔巴赫在强调感觉的同时，也看到了感觉只反映事物某一方面的特性，而概念才反映对象的整体。

狄德罗是法国唯物论者中对思维的作用、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哲学家。他说：“如果我舍弃了理性，我就再没有引导者了！”③ 他批评爱尔维修把思维混同于感觉时说，一个白痴也有感觉，但不能判断，有些动物的感觉甚至比人更敏锐，但只有人才能判断，因此，把判断等同于感觉是错误的。感觉器官只能是一些见证人，至于判断是理性根据由“这些见证人”所得的材料而再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273页。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02—103页。

③ 《狄德罗哲学选集》，第35页。

进行工作的结果。狄德罗明确指出："一切都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不停地重新进入自身，又走出自身。这是一种蜜蜂的工作。如果不带着蜡重新进入蜂房里面去，你就是白白地跑了许多地方。如果不知道把这些蜡做成蜂巢，你就是白白聚集了许多无用的蜡了。"[①] 他又说："我们有三种主要方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观察收集事实；思考把他们组合起来；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②] 很明显，狄德罗力图把经验与理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克服 17 世纪一些经验论者的片面性，这不仅在认识论上有重要意义，而且他们强调理性，注重思维，正是在贬低神学信仰，蔑视宗教权威，这表现出显明的"启蒙"特征。

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并不真正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本质区别，不理解理性抽象的作用，所以他们最终都未能超出经验论的局限。即使狄德罗，也只是一般地认为应把观察、实验和理性的思考结合起来，对三者的辩证关系没有作出正确而全面的说明和论证，有时甚至表现出一些否定理性认识的倾向，例如，他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所有的抽象都不过是一个没有观念的记号"，这就又陷入经验论者那种唯经验论的泥潭。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社会实践和辩证法引入认识论，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揭示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摆脱经验论的局限性，把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升华为能动的反映论，建立起科学的认识论大厦。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326、327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326、327 页。

3. 真理：哲学的归依

法国唯物主义者十分重视真理问题。拉美特利曾指出，“哲学尽管对象纷然杂陈，却以真理为归依”。这就是说，哲学的领域广泛，课题众多，但它最终的目标是追求和揭示真理。

那么，何为真理呢？法国唯物论者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自然主张符合说的真理观，即认为真理是人的认识同外界客观事物之对象的符合或一致。狄德罗说，真理就是我们的判断与事物的一致。爱尔维修认为，真理是我们的表象同外界事物相符合。霍尔巴赫指出：“真理就是我们观念的正确而恰当的结合。”所谓“正确而恰当”就是指认识和对象之间的“相合性”。法国唯物论真理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彻底贯彻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承认客观真理，承认人的表象和观念有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它廓清了认识领域中芜杂、怪诞和神秘的东西，把认识对象规定为客观事物，从根本上划清了与唯心主义真理观的界限。但是，由于受机械观点的限制，他们不了解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把一门科学、一种真理都视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如狄德罗就曾断言，不用再过一百年，在欧洲将数不出三个大几何学家。这门科学将停止于贝努义等人所达到的地步，人们再不会超出此范围了。然而，事实无情地驳倒了狄德罗的论断。还没有到一百年，高斯不满足于三维空间，就表达了他关于多维空间的非欧几何体系的思想。尔后又有罗巴切夫斯基和黎曼等人进行研究，作出明确的阐发。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唯物论者还考察了认识的“证实”

问题，即如何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狄德罗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认为只有反复实验才能证实真理，驳倒谬误。“猜测要是正确呢？愈实验，就愈得到证实。假设要是真实呢？愈推广，就愈包含真理，愈得到明证和力量。反之，猜测和假设如果是经不起考验的，没有根据的，那么，只要有人发现了一个事实，……它们就破产了。”① 霍尔巴赫认为，区别认识的真或假，必须依赖经验。如果经过经验证明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相符，那就是认识了真理。他说：“物理学的体系，只有当那作为出发点的原则还没有被人充分证明了的时候，才是论争的对象；只要经验逐渐揭示出真理，这些纷争也就中止了。”② 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它不仅直接与中世纪把宗教教条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针锋相对，具有重要启蒙意义，而且包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合理因素。当然，就整体来看，法国唯物主义者始终徘徊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点的门槛前而未能破门而入。因为他们所说的经验和实验，主要还是指日常生活的经验和科学工作者实验室中的实验，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社会实践观点还有很大的距离。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而科学地解决人们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和运用真理改造世界的问题。

把真理同功利联系起来，注重真理的效用，是法国唯物主义真理观的另一特点。霍尔巴赫说，“真理每每为不义的豪强所厌恶，却永远对公众有益”，每一条新的真理，只是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335页。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02—103页。

改善公众状况的一种新的方法。他还区分了有用性和真理性，指出：某种观点的有用性并不是它们真理性的保证。从这些观点出发，他批驳了神学家。神学家断言，宗教对人民有好处的，所以是真理。霍尔巴赫尖锐地批评说，宗教观点不仅没有好处，相反，是有害的。所以，有用并不一定是真理。狄德罗也认为，有用的也可能是荒谬的，而且归根到底它可能是有害的。至于真理，它可能是有害的，但归根结底是有用的。法国唯物论者进而认为，真理是同人们的利益或效用有联系的，霍尔巴赫甚至视效用为衡量真理或确定真理是否值得尊重的标准。他说："最有用的真理就是最可尊重的；我们叫做伟大的真理的，就是那些对人类最有利益的真理；我们称为贫乏的或为我们所不屑的真理，则是这样一些真理：它们的效用，只限于供给某些和我们决不具有类似的观念、感觉方式和需要的人们去娱乐消遣用的。"[①]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这些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开辟了真理价值问题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于批判宗教神学，反对烦琐哲学，注重实际效用，贯彻功利原则有重要启蒙价值。当然，他们把效用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是错误的。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决不能以功利作标准。

号召人民勇敢地去发现真理，捍卫真理，为真理而斗争，是法国唯物论者真理观的又一个可贵之处。爱尔维修认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统治者都基于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维护权势的考虑，害怕真理，掩盖真理，阻滞真理的传播。因此，要达到揭示真理的目的，必须通过斗争。既要同腐朽反动的贵族和僧侣进行斗争，用真理的光辉照出他们的丑恶嘴

①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93—194页。

脸，还要努力排除顾虑多端、裹足不前的思想障碍。爱尔维修鼓励人们说："要揭露比较大的真理，常常必须大胆尝试所致；我们决不能因为害怕提出一个错误的意见，就放弃寻求真理。有些卑劣的懦夫，意图取消真理，有时甚至给它加上放肆的罪名，他们这样做是徒然的。"[①] 爱尔维修推崇开明的群众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断言"他们知道敢想敢说有多大的益处，并且知道允许驳斥谬误的时候，连谬误也不再有危险性。那时谬误立刻就被认出是谬误；它们就立刻自动让位，退入遗忘的深渊。而惟有真理永世长存"[②]。这些旗帜鲜明、鼓舞人心的言论，像战斗的号角，激励人们为摧毁宗教神权，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永恒真理"的"理性王国"而英勇斗争。

四　人性与神性的对抗——人道主义历史观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它是在批判中世纪神学历史观，同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它是以人为中心，以维护人性，赞扬人的伟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争取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为宗旨的一整套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社会历史理论。这种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当时来说，它的进步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432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433 页。

倾向不容忽视，它的启蒙价值不可低估，它的政治意义激动人心。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学，摧毁封建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启蒙思潮的历史哲学基础。

1. 转向人的哲学

在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神学历史观像紧箍咒一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历史观的最大特点，是把神、上帝当作历史的最高主宰，否定人与人的价值。中世纪的神学家赞美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圣、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①]。与此同时，他们竭力否定人的价值，公开宣扬人应当蔑视世俗，蔑视自己。

这种否定人、否定人的价值、否定人的世俗生活的神学蒙昧主义，同朝气蓬勃、富有进取精神的新兴资产阶级格格不入，是新兴资产阶级冲破封建制度的罗网、实现本阶级愿望的严重障碍。因此，新兴资产阶级在登上历史舞台伊始，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一场反神学的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打开了中世纪神学历史观的第一个缺口。文艺复兴鼓吹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人文主义者宣称，他们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重新发现了

①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页。

“人”。他们热烈地颂扬人的力量、人的价值和人的幸福。他们要求重视人的尘世生活，要求把注意力从神转向人，从天堂转向尘世。这种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梏梏，以“人”的尺度评价历史和解释历史的观点，就是后来的资产价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最初表现。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克服了它的不彻底性，形成了战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实现了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彻底转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形态。

2. 抽象的人性论

在近代资产阶级唯物论哲学中，人的学说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其中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最具代表性。法国唯物论者从反宗教神学出发，把带着“原罪”枷锁的罪人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复归为像生物一样具有感受性的活生生的自然人。拉美特利公开宣称“人是动物”，还把人说成是植物。他说：“在我们人身上，也和植物身上一样，有一些主根和毛根。肾脏和乳糜管构成了主根，毛细乳糜管则是毛根。”因此，“人不过是一株倒转来的树木，树木的脑子就是根”[①]。法国唯物论哲学家尽管具体说法不同，但他们都把人归结为自然实体。从自然实体出发，他们把人的本性归结为肉体感受性。爱尔维修最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肉体的感受性乃是人的需要、感情、社会性、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275页。

观念、判断、意志、行动的原则”；人就好比“是一部机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必须做肉体的感受性所执行的一切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用肉体的感受性来说明一切”[①]，来揭示人性和社会的发展规律。

他们用肉体感受性说明人性。爱尔维修认为，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而人人都本能地逃避痛苦，寻求快乐。因此，人性就是避苦趋乐，就是“自爱”或“自保”。它由肉体的感受性产生，并受其决定，因而是人人共有的，永久不变的。爱尔维修写道，“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惟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的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共有的”[②]。霍尔巴赫也说，人“从他们每一个方面看，都是爱慕自己的幸福、忙于自己的保存，营社会生活以便更可靠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的”[③]。狄德罗对人性的看法要比爱尔维修更“理性”一些。在他看来，人性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不单纯是动物，而且是有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性的基础，是决定人性的基本要素。但他同时也大谈自爱，认为自爱或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的本能的产物，是要保全自己和符合自然要求的一种根本原则。

这种抽象的人性论观点，正是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出发，把人是具有感受性的肉体器官构成的机器这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社会生活的结果，而认为人人共有的这种本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99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01页。

③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下同)，第225页。

性是永久不可改变的，也正是他们的形而上学观点的鲜明表现。至于他们所说的“自爱”，实质上不过是借用人类普遍本性的名义，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因而，这种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只能导致历史唯心主义。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我们不应该贬低这种观点的理论意义和启蒙价值。因为，它毕竟是把理解人和社会的钥匙从天上取回到人间了，对于反对“神性”，弘扬人性，抨击专制，发展个性，批判禁欲主义，追求幸福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3. “人是环境的产物”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从感觉主义的原则出发，认为人生来是平等的，人的本性最初无所谓“善”、“恶”。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情感、思想、观念和品德却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呢？他们回答说这是周围社会环境造成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爱尔维修认为，人生下来不邪恶，不狠毒，“人生而无知，并非生而愚蠢”。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凡是人，就是一切构造得同样完善的人，都拥有获得最高观念的能力。自然赋予人的，是一种同等的获得精神活动的能力，它并未厚此薄彼。构造得同样完善的人，都可以产生 同样程度的感情。人们在现实中的差别，不是因为先天的原因，而是他们后天的机遇、地位、所处环境不同造成的，人的精神活动能力是社会环境对他发生作用的结果。霍尔巴赫认为，“人，从本性上说既不善也不恶”。他之变成或者对自己或者对他人有益或有害，乃是由于环境把他引得向善或向恶。霍尔巴赫说，“一个邪恶的父亲只能造就堕落

的儿女；一个腐败的社会所能提供的榜样只适于腐化心灵和精神。一个不义的政府只能造成一批不义的、不和的奴隶，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自己的同伴，不断地彼此侵夺，用尽心机互相谋害，总之，与自己的幸福为敌，也与周围的人们的幸福为敌”[①]。可见，在法国唯物论者看来，人的精神观念、善恶品德，都决定于社会环境。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命题，蕴涵着深刻的革命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在政治上，它是为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作论证的，是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一系列新要求的理论基础。因为，既然人的性格、观念和品德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而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律、政治环境造成了道德堕落、观念愚昧、性格卑下的人，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环境，改变这种政治法律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认为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这就是这种学说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所在。

其次，从哲学上说，这个命题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和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实际内容，不是说自然的人和人的机体是环境的产物，而是说人的性格、人的精神活动是周围环境的产物。既然人的情感、思想、观念乃至品德等都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唯物史观关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 的基本原则。尽管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这个接近是不自觉的和极其有限的，但它却为马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645—6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克思制定科学的历史理论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材料。[①] 倘若他们能从这一包含着唯物主义萌芽和因素的命题的基地上继续前进，就应当从研究人类观念发展的历史转向研究社会环境的变迁史，特别是转向研究社会关系的发展史，进而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正是在这里，法国唯物论者止步了。他们只是在朦胧之中接近了这一任务，却远远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甚至连正确地提出这一任务也未能做到。而且，当他们对“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命题作进一步的推论时，便走向了它的反面，陷入“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

4. “意见支配世界”

决定人的情感、观念和品德的社会环境究竟是什么呢？法国唯物主义者回答说，主要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治制度。例如，爱尔维修就指出：“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各个民族的兴盛并不依靠它们的宗教纯洁，而是依靠他们的法律高明”，“人们的善良乃是法律的产物”；反之，“造成各个民族的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一言概之，“法律造成一切”。那么，法律和政治制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们认为这取决于人的“理性”，而人的“理性”又取决于教育，好的“理性”是好的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只有教育才能使人从愚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的“理性”得以升华，从而也才能使国

① 参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王秀芳、军富），《理论探讨》1990年第2期。

家改变自己的法律和政体。所以，爱尔维修又提出了“教育万能”的论断。然而，不论是法律还是“理性”和教育，通通都属于社会意识，亦即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说的人的“意见”。这样，他们便推论出一个与“人是环境的产物”完全相反的命题，即“意见决定一切”，或“意见支配世界”。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的命题。

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解释什么是社会环境和何者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时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这个自相矛盾的怪圈中。他们把这两个命题并列起来，不能找出其中最本质的、有决定意义的环节，结果，“鲸在水中，水在鲸上”，莫衷一是。他们在这两个互相对立的命题中绕来绕去，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最终还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

不仅如此，他们还沿着“意见支配世界”的斜路走得更远。因为，在他们看来，能够决定一切、支配世界的那种“意见”，不可能是普通人的意见，只有“开明”君主或天才人物的“意见”才有如此威力。所以，他们都幻想通过“贤明”君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狄德罗跋涉万里去俄国规劝叶卡捷琳娜二世，爱尔维修把自己的著作《论人》献给了这位俄国女皇，并在书的“序言”里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幸福和科学，如人们所说的，是地球上的旅客。它现在向北方走了。伟大的君主们在那里呼唤天才，天才在那里呼唤幸福……我把这本书献给这样一些君主。”无怪普列汉诺夫说：“‘一个在王位上的圣贤’——这就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

'deus ex machina' (救急神)。"[①]这种无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把社会变革寄希望于帝王将相的赤裸裸的天才史观或英雄史观，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必然结果，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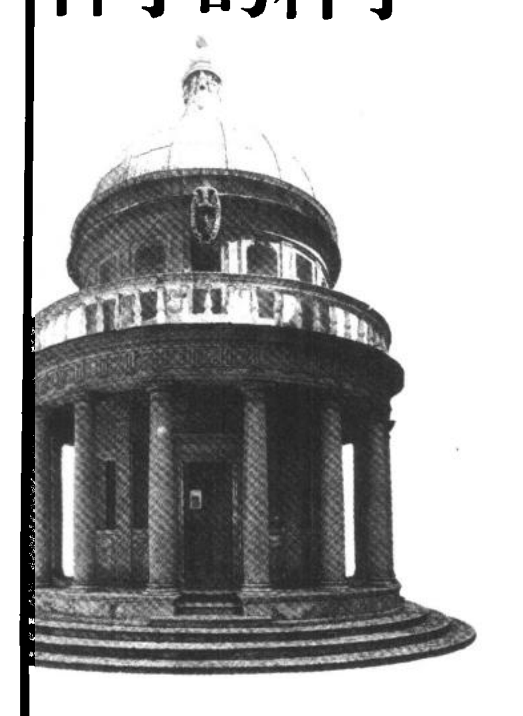
总之，哲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最高成就的启蒙哲学，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启蒙运动所创造的哲学文明。它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奠定了哲学基础，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也深深打上了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烙印。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启蒙推动下的哲学文明。

---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版（下同）第68—69页。

第三章

科学的春天——埋葬神学的科学



- 科学与神学、理性与神性的较量
- 科学和无神论、唯物主义的结盟
- 17 和 18 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就

18 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各门科学在 18 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因此它们便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

——恩格斯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 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科学充分展示了这种威力。启蒙思想家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机械唯物论哲学思想指导下，广泛吸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最新成果，阐发自然神论或公开的无神论，向以罗马天主教会为首的宗教反动势力勇猛进攻，反对神学统治，反对宗教迷信，批判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有力地推动了这场席卷欧洲的思想革命。科学在这场革命中获得了新生，从神学的婢女变为文明的主人，取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科学文明的新时代。

一 科学与神学、理性与神性的较量

从古到今，科学与神学、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然而，在欧洲这种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17、18世纪。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独霸天下，无神论几乎泯灭，科学惨遭迫害。但是，事物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物极必反。当宗教神学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也就是它的灭亡之日。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宗教神学的一次反击战，那么以法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则是一次歼灭战。在这场鏖战中，宗教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

学遭到了科学和无神论的强弩穿身，百孔千疮，溃不成军；而科学和无神论大获全胜，扬眉吐气，在理性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1. 宗教神学溃不成军

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一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教会为维护其教权统治的绝对地位，与封建王权狼狈为奸，制造宗教狂热，残酷迫害一切持有“异端思想”的人。宗教裁判所这个专门公开进行宗教迫害的野蛮机构，经常以火焚和车裂等极刑处死异教徒。反动教会下设的特务机构耶稣会，以卑鄙无耻的手段监视人民，凡对宗教不虔诚或有自由思想的人都被教会特务告密而遭到迫害。有不少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在这场浩劫中惨遭毒手。

1553年，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1511—1553）因提出血液从右心室经肺动脉、肺静脉流到左心室的思想，否定了被基督教奉为正统的盖伦的三灵气说而触犯了教会。因为他们认为否定盖伦的三灵气说，就是反对上帝造人的目的论。塞尔维特因此遭到宗教法庭的酷刑审讯，最后以异教罪判处火刑。临死时，他胸前套着一个浸过硫磺的花环，挂着他的一本著作。神父问他是否放弃自己的学说，他做了否定的回答。火被点着了，他被活活烤了两个小时。这一天是1553年10月27日。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因反对宗教神学，宣传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迫流亡到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几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1592年，他被罗马教会宗教裁判所逮捕，

囚禁数年，受尽严刑烤打，仍至死不屈。1600年2月17日，惨无人道的罗马教廷在鲜花广场将布鲁诺活活烧死。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也因捍卫哥白尼学说而遭到迫害。1615年他受到罗马教法庭的传讯，在法庭上被逼声明和哥白尼学说决裂。但他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的见解，继续从事研究。1633年他再次被押到罗马宗教法庭受审，并以宣传异端之罪，被判处终生监禁。他被囚禁于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村舍，在此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9年。

宗教裁判所残酷镇压一切揭露教会黑暗，宣传“异端”学说，反对封建统治的人。秘密审讯、严刑拷打，处以监禁、流放甚至火刑和没收全部财产，是他们的惯用的伎俩。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尤其猖狂，1483—1498年的15年间，那里受迫害者近10万人，被烧死的竟达1万多人。中世纪欧洲各国遭受宗教迫害的约有500万人之多。这一切足见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的反动透顶和不可一世。

然而，历史的车轮必将穿越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的黑暗隧道。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们引向追求世俗生活的阳光地带。人文主义者把被基督教视为异教邪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展示在人们面前，用现世生活的美好，辛辣讽刺禁欲主义和僧侣主义。他们所强调和追求的世俗世界的意义和凡人生活的幸福，虽未直接正面触及宗教，更没有像18世纪的启蒙学者那样，把教会作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加以攻击，但人文主义者关于现世人生的价值和世俗主义的思想，却随着他们学术、艺术活动的展开广泛传播，对后来启蒙思想家反宗教神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

坏。……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的待遇，就像耶拿战役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将军和官佐们那里受到的待遇一样。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在一切领域中，情形都是如此。……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就一根头发都不能从头上落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①]。狄德罗也曾高度评价过牛顿等一批自然科学家在摧毁宗教神学、培育无神论思想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多亏这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齿轮、缆索、滑车、弹簧的悬摆。"[②]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许多哲学家都对宗教神学进行过猛烈抨击。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等17世纪哲学家，尽管他们的批判还有很大缺陷。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运用自然神论的武器，猛轰了宗教神学。特别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把自然神论发展为战斗的无神论，给宗教神权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对宗教神学"公开地提出控告，像这样大胆的控告以前是闻所未闻的。现在要把罪犯拉到法庭上来，瞧！罪犯就是基督！这已超过了18世纪所要求的宗教改革，这是要在根本上推翻基督教，完全抛弃人从来是从上帝得到直接启示的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0—541页。
② 《狄德罗哲学选集》，第8页。

念。这种批判决意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宗教对生活的解释”①。因此，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他们“在那位〔发明断头台的〕好医生吉约坦以前就把神送上断头台了”②。

哲学家、无神论者和科学家们的联合围攻，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冲锋陷阵，使宗教神学已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威风扫地，臭不可闻。据史书记载，18世纪后期的法国，宗教生活再没有什么吸引力，修道院中的人数在逐渐减少，信士虔诚的捐款也为数甚微。宫廷中的司教倘有虔诚之名，反以为玷辱。传统的信仰通常成了愚昧与出身微贱者的必然陪衬物。那些被列为禁书的作品居然能够在凡尔赛宫的门口公开叫卖了，就是牧师也读《百科全书》。法国大革命期间，议会作出把天主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和分块出售的决定，制定教士公民组织法和神职人员向新制度宣誓的法令，取缔天主教会等革命决策。这些措施进一步从物质上和组织上瓦解了神权政治的基础，从心态上破除了崇拜上帝的信念。大革命时期的几部宪法都坚决否定以天主教为国教，明确写上了信仰自由的条文。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宗教神权统治的溃败，正是科学度过严冬，迎来春暖花开的新时代。

2. 科学：从婢女到主人

在中世纪宗教神权的反动统治下，科学成为神学中的科

① 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唯物论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下同），第47页。

目，沦为教会的婢女。在神学家看来，研究自然本身是应禁止的，一切都只能服从神学，做神学的侍婢。因而，自然科学家不得不压抑着自己认识自然、追求真理的良心，为宗教的利益而从事研究。这就导致了科学神学化的悲剧：阿唐·基希尔这位身为教徒的法国自然科学家竟对上帝的存在提出了6561条证明；1748年法国闹蝗灾时，迪普霍尔茨的传教士拉特列夫写了一本蝗虫神学，证明上帝的智慧伟大，安排蝗虫的头颅很长，嘴在下面，以便在吃食的时候不必深深地弯腰，也不能很方便而迅速地取走食物；对自然界中的每个领域无不提出各自的神学，如星象神学、雷鸣神学、烟火神学、地震神学、岩石神学、液体神学、叶柄神学、昆虫神学等等。神学无论在内在方面或是在外在方面，都阻碍和破坏着自然科学以及一般科学的发展。不仅如此，教会还动辄给科学家加上“无神论者”的罪名，而“无神论”在那个时代就是罪大恶极的叛国罪。就这样，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科学一直屈居于婢女的地位。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这个母体中的萌芽和滋生，资产阶级为了壮大自身，便同科学一起反叛教会。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①在文艺复兴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一道，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为捍卫科学和真理而把自己的殉道者送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06页。

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笼。达·芬奇、塞尔维特、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等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篇章。达·芬奇热情地高歌："火焰烧尽谎言，绞死诡辩家，驱散黑暗，使真理显现！"他公开宣称：真理只有一个，它不在宗教迷信中，而在科学知识中。塞尔维特面对宗教法庭的酷刑审讯，厉声说道："我相信自己的言行都是公正的，我不怕死！我知道我将为自己的学说，为真理而死，但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勇气。"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一书，提出太阳中心说，推翻了基督教奉为正统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掀起了近代自然科学反对宗教神学的第一次革命。科学家们沿着哥白尼的道路继续前进。布鲁诺为捍卫和发展哥白尼学说，惨遭迫害。但上帝和火刑吓不倒科学勇士，布鲁诺临终时宣布："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全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

正是有这批科学斗士的英勇斗争，才使科学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由神学的婢女变为社会文明的主人。恩格斯说，文艺复兴运动"是地球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自然科学也就在这一场革命中诞生和形成起来，……这时候，自然科学也发布了自己的独立宣言，诚然，宣言并不是在一开头就立即发布的，正如路德并非第一个新教徒一样。在宗教领域内是路德焚毁教谕，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是哥白尼……向教会的迷信提出了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①。在17世纪的欧洲，以英国为中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3—534页。

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迅速发展，取得可喜成果，并且卓有成效地应用于航海技术和工业生产，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科学社团纷纷成立，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1666年巴黎科学院诞生，后来，一些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是科学院的重要成员。科学工作不再是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欧洲进入18世纪以后，自然科学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恩格斯对此作过精辟评述："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①

二　科学和无神论、唯物主义的结盟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启蒙运动，与宗教神学的较量有两个明显特点。首先，他们在反对天主教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大体上是沿着怀疑论——自然神论——无神论的上升线行进的。培尔的怀疑论为人们接受伏尔泰的自然神论奠定了基础，而伏尔泰等人的自然神论则为法国唯物主义战斗无神论的传播铺平了道路。其次，科学、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657页。

盟，对宗教神学形成围歼之势，最终使显赫了一千余年的神权威信扫地，从而树立了理性和科学的权威，推动了社会变革，促进了科学文明。

1. 无神论的隐蔽形式——自然神论

自然神论也叫“理神论”，是流行于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提倡所谓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而反对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传统基督教。自然神论者并不直接否认上帝，认为上帝是超越于自然界之外的造物主，世界被创造后，上帝就不再干预，而任由世界按自身规律运动，上帝只是一个“不在家的主人”。他们从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出发，认为原始宗教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教会所崇奉的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传统基督教是“自然宗教”的堕落，关于“启示”和“奇迹”的教义是违反理性的，应当摈弃。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自然神论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神论的隐蔽形式和唯物主义者摆脱宗教的便利方法。

自然神论的产生和流传是与那个时代反对教会统治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因而，在启蒙运动中，自然神论便成为启蒙思想家斗争的武器。伏尔泰就是在启蒙运动中以此为利剑，冲锋陷阵，反对天主教会，打击神权统治的英勇斗士。他认为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是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在他看来，宗教迷信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他说，“第一个上帝是遇到了第一个傻瓜的第一个流氓

所创造出来的”。基督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基础上的，是“最卑鄙的混蛋所作出的各种最卑劣的欺骗”的产物。因而，基督教的圣经和福音书充满了胡说八道和滑稽可笑的内容，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认为所谓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凡人，并不是神，耶稣的画像不过是一幅画着一个难看的裸体男人的画片而已。伏尔泰还无情地揭露了教权主义的罪恶。他指出，全部教会史就是“一连串胡作非为、抢劫谋杀的历史”，是教会僧侣煽动宗教狂热和偏见的罪恶史。特别是宗教裁判所，如同拦路抢劫的强盗，但强盗只要你的金钱，宗教裁判所则要拿走你的一切，包括你的思想和生命。他痛骂基督教和宗教裁判所是屠杀无辜生灵的地狱；教皇和大主教是“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卑鄙的流氓”和“社会败类”。伏尔泰还发动和领导了为教会和宗教狂热的受害者卡拉、巴尔、西尔文和蒙巴里伸冤昭雪的斗争，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他号召人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作斗争，一些人咬住它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它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它，我邀请你们来打猎”，“消灭败类”——僧侣和神甫。伏尔泰同新旧基督教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在整个法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天主教会把他看作不共戴天的死敌，广大群众则称赞他是“无神论者伏尔泰”。其实，伏尔泰还不是公开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虽然始终不渝地反对天主教，但又认为宗教还是需要的，信仰一个可以赏善罚恶的上帝能够约束人们的行动，维系社会的道德。他说：“人如果否认神，必至于恣情纵欲，犯极大的罪恶，这岂不可怕?”所以，“我希望我的供应人，我的裁缝匠，我的仆人，我的妻子都来信仰上帝；我想，这时就很少有人再来抢

劫我和给我绿帽子戴了"[1]。因而，伏尔泰喊出了"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捏造一个上帝来"的名言。伏尔泰的不彻底性，是他的自然神论无法克服的缺陷。但这无损于他作为一位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光辉形象，更不能因此抹杀他同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斗争的历史功勋。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也是一位运用自然神论同天主教会斗争的勇士。他尖锐地指出，宗教教义和信条是荒诞无稽和矛盾百出的。上帝是人想像出来的，"有人说得妙，如果三角形也要创一个神，它们一定给它们的神三条边"。教会所谓神"三位一体"，所谓面包是耶稣的肉，酒是耶稣的血，是违反科学事实的无稽之谈。他嘲讽说，神学著作的"问题之多，几乎和书中的行数相同"，神学家们所从事的是"一种饿死人的职业"。他指责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摧残了许多人，即使瘟疫与最惨烈的战争，也从来不至于此"；修道院这个"永恒的家庭"，它依靠天下众庶而存在，自己不生育一个人，却"永远张大着嘴，和无底洞一般，吞没未来的种族"；教皇颠倒黑白，指恶为善，是个"魔法师"。他指责教会贪婪地攫取大量地产，几乎掌握了全国财富，造成各国实业凋零，田地荒芜，到处散播着死亡。孟德斯鸠猛烈抨击了宗教裁判所的残暴罪行，指出他们打着所谓"为上帝复仇"的旗号，妄加"亵渎神明"、"异端邪说"的罪名，残害无辜。"他们烧死一个活人，和烧稻草一般轻易。"他强烈谴责当时里斯本宗教法庭烧死一位不信基督的十八岁犹太女子的残酷罪行，指出采用这种羞辱时代的野蛮手段，只能说明天主教没有真理，只有靠酷刑来强迫人们接受它。应指出的

① 转引自索柯洛夫：《伏尔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8 页。

是，孟德斯鸠尽管还不是无神论者，但他对反动天主教会的打击是沉重的。他虽然也并不主张消灭一切宗教，提倡信教，但在他的宗教论中却又包含着强烈的反专制的革命性。他说："即使说，老百姓信仰宗教是没有用处的话，君主信仰宗教却是有些用处的；宗教是惟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无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他还说："一个完全不信宗教的君主，就好比是一只可怕的动物，它只有在把人撕碎、吞食时才感到它的自由。"[①]，可见，孟德斯鸠是想把宗教信仰变作一条强有力的缰绳，用它来勒住封建暴君，使其不能再有"把人撕碎、吞食"的自由。诚然，这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但是他却以惊人的机智，给封建暴君以有力的打击。

卢梭也站在自然神论的立场上，猛烈抨击天主教。他尖锐地揭露了天主教狂暴压制异端，掀起宗教战争，残酷实行宗教迫害的罪行，强烈谴责"这种宗教的神是最不公正的，是最残忍的暴君"，所造成的"尽是世人的罪恶和人类的痛苦"。他辛辣嘲讽天主教义违背自然，神秘荒诞，自相矛盾。他还把对天主教的批判，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紧密结合，显示出激烈的反封建斗争精神。但是，卢梭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有限"的。他批判"坏宗教"，反对人格化的上帝，但又不能容忍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而企图建立一种不干预主权者的政治活动，只教人按照正义与良心履行道德责任，涤除社会弊恶的道德化的感情宗教，这就是

---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下同），第139—140 页。

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要树立的国教，即“公民宗教”。当然，他与伏尔泰不同，伏尔泰保留上帝是为了震慑人民，使这些“天然下属”的灵魂因畏惧神的惩罚而按德行生活，而卢梭保留上帝则是为了惩治权贵，使人民得到安慰。所以卢梭的上帝是正义的化身，是人民的安慰者，是惩治权贵的复仇之神。

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都在自然神论的隐蔽下攻击天主教，这是他们在封建宗教势力还很强大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巧妙的斗争形式。但是，自然神论毕竟还不是无神论，它在批判宗教问题上有着明显的不彻底性。因而，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化发展，自然神论不能不让位于无神论。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者，把伏尔泰等人的自然神论发展为战斗的无神论，使启蒙运动中反宗教神学的斗争进入新阶段。

2. 刺向宗教神学的利剑——法国唯物主义者战斗的无神论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高举战斗无神论的旗帜，以机械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武器，给宗教神学以致命打击，把欧洲反宗教斗争推向了高峰。

首先，他们通过深入剖析教会的教义和教规，把宗教神学的荒谬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公诸于世。他们认为，物质既然是整个宇宙的惟一实体，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属性，那么在宇宙中就根本没有上帝的地盘。狄德罗指出，“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霍尔巴赫说：“上帝的存在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但这也正是“一切宗教中最不足信

的东西”，因为上帝是一种不反映任何实在的虚构的概念，“崇拜上帝，无异于崇拜人的想像创造的虚构物，或者简直就是崇拜乌有的东西”。法国唯物主义者用锋利的语言，机智的讽刺，深刻揭露和批驳了宗教教义的自相矛盾。按照教义，上帝是仁慈的，可是他却用灾难、饥饿、战争和疾病来惩罚人类，他却喜欢把人们打入地狱，让他们在那里受苦、呻吟、流血、流泪；上帝是正义的，可是他却对僧侣们无耻地、惊人地残酷压迫和掠夺人民的恶行视而不见，对他的无辜子民的苦难熟视无睹；上帝是全智的，可是他所创造的世界却充满了野蛮、愚昧、恶习、偏见、败行和黑暗。所谓灵魂不灭和天堂地狱之说也是荒谬的。梅叶认为，“我们的灵魂和任何肉体一样是物质的和有死的。灵魂随着我们的肉体强健或衰弱而强健衰弱”，既然这样，“它同肉体一样会死亡，那就意味着在我们此生终结之后不必求奖赏，也不必害怕惩罚。”霍尔巴赫嘲讽道，如果说在身体死后还存在不朽的灵魂，无异于说人们可以无目而视、无耳而闻、无手而能触、无头而会想。至于“原罪说”，同样是无稽之谈。梅叶质问道：为什么万能的上帝却不能事先预防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这一事件呢？如果亚当和夏娃能违反上帝的禁令，岂不证明上帝不是万能的吗？因为“人祖”亚当和夏娃吃了两个果子这样一点小事就要永久惩罚人类的世世代代，这不表明上帝太残暴了吗？梅叶一针见血地指出，原罪说表明“这样的上帝是应该仇视、厌恶和诅咒的，甚至是应该永远诅咒的，因为他比世上过去所有和今后可能出现的一切残酷的暴君还要残酷”①。狄德罗机智地反驳说，如果人天生就有罪，

① 梅叶：《遗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8页。

那么，按照这个教条，就不应该让人降生，除了一脚把自己的孩子“踏在地上踩个稀烂，或生下来就把他扼死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用这种办法可以使人“免于下地狱的危险，并可以保证他得永福”。法国唯物论者还对“三位一体”、“耶稣复活”和“圣餐”等教义信条的荒谬性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其次，法国唯物主义者猛烈抨击了教会维护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和欺压百姓的罪恶活动，严正控诉了宗教神学给人民和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梅叶尖锐地指出，宗教和政治像两个小偷一样，互相庇护和支持。在这种狼狈为奸的关系中，宗教神权所带来的只能是政治腐败、战火连绵、国家衰亡。爱尔维修说，凡是天主教会对国家事务起着决定作用或成为国家教会的地方，社会进步就非常迟缓，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严重受阻；凡是天主教横行霸道的国家，迟早必定会没落衰亡。宗教是战争的罪魁祸首。狄德罗揭露说，“当最高的僧侣通知皇帝说战争是上天的意志时，皇帝就不能拒绝最不正义的战争。僧侣说：‘上帝渴望战争’，于是皇帝就立刻武装起来，进攻自己的邻邦，而这些皇帝中的每一个都力图捉到尽可能多的俘虏，以便拿他们来做偶像的牺牲品”①。所以，爱尔维修痛斥道：“宗教史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宗教在任何地方都点起了不宽容的火把，搞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城市焚毁，帝国残破；而它们从来不曾使人们变好。”② 教会还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灾难。天主教会

① 转引自李武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文史哲》1982年第5期。

② 北京大学哲学家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25页。

在法国拥有将近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每年收租近10亿里弗。爱尔维修说："有些天主教国家，几乎有一万五千所修道院，一万二千所礼拜堂，一万五千所小教堂，一千二百所大修院，有九万名教士在四万五千个教区里当住持；此外还有无数各式各样的院长、初修生、圣职士。他们的总数至少有三十万人。"这些人每年要耗费人民巨大的的财富，假如"把他们的人数缩减到二十万呢？维持费还要六十万里弗一天，一年要花二亿一千万。用这笔款项，有什么舰队，什么陆军养不起呢？"① 教会庞大的经费开支，以地租、息钱、什一税、弥撒费、布施、祭奠费、布道酬金等十种名目，强加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头上，使他们苦不堪言。宗教给科学文化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教会是科学、文化、教育和艺术的死敌。它们残酷迫害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以及一切追求科学和真理的仁人志士。霍尔巴赫说：神学"是阻挡自然科学进步的一重无法克服的障碍，……除了通过迷信的病眼以外，它不允许物理学、博物学、解剖学去看任何事物。哪怕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只要人们无法使它与宗教的假设相符合，就被鄙夷地加以拒绝，恐惧地加以摒弃"。② 爱尔维修也尖锐地指出：宗教是科学的大敌，"祭师迫害的是什么？科学。……科学家的敌人是和尚、阿訇、婆罗门以及不管哪种宗教的全体教士"③。

最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深刻批判了僧侣教士宣扬宗教神学，组织宗教活动的反动社会作用，无情揭露了他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91—492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636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14页。

们骄奢淫逸、贪得无厌、口蜜腹剑的丑恶嘴脸。霍尔巴赫认为，宗教对人民是一种欺骗，是麻醉人民的艺术，是“神圣的瘟疫”。拉美特利说，宗教是一付“神圣的毒药”。梅叶指出，宗教是反动统治者用来“钳制群众，强迫群众受自己支配”的手段，是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而僧侣教士则是鼓吹和传播这种“瘟疫”的罪魁祸首，是煽动宗教狂热，实施宗教迫害，镇压“异端”，残害无辜，扼杀科学的刽子手，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游手好闲的寄生虫。霍尔巴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僧侣、教士向来是咒骂真理的奸徒，因为他们的行动，否定了他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浮词；惰性和激情，更使自己成为奸徒的同谋，这批人是存心使人民盲目，以便宰制他们，从他们的不幸中取利。所以僧侣和教士总是逼迫人们盲目无知，并随时准备迫害那些掌握科学和真理的“异端”者。爱尔维修痛斥道：“祭师……维护什么？无知。祭师迫害的是什么？科学。祭师关心的永远是使人们的目光远离真理。祭师不爱才能，乃是各种人道美德的隐敌。”[1] 梅叶在《遗书》中无情地揭露说，教会豢养了大批的僧侣和教士，这些人便成了吮吸人民鲜血的吸血鬼、寄生虫。“他们的全部生活资料和全部财富，全是由社会和别人的劳动得来的。把只有善良的劳动者才配享有的粮食交给这些什么事也不干、游手好闲、完全无用的人，是多么令人痛恨的不公正现象啊！”他还说：教会拥有大批的教长、修道院长、分院长和领干薪的神甫，特别是人数极多的僧尼，这些人都是完全无用的，不能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他们所能做的仅是祈祷和弥撒，可是，“即使所有的僧侣和教士每天作二十次、三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14—515页。

十次、甚至五十次弥撒，加在一起可以说连一根钉子的价值都没有”。僧侣的行业是建立在谬误、迷信、欺骗基础上的危害人民的行业。霍尔巴赫无情地揭穿了僧侣们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真面目。他说，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一个虔诚的信徒，往往跟他的上帝一起可以做出当最低下的俗人在场时无论如何做不出的事情来”。虚假和伪善的僧侣宣扬“不要杀人”，自己却大批地屠杀无辜的人，劝人“不要偷窃”，自己却大量地掠夺别人的财产，劝人“不要通奸”，自己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因此，教皇、主教、神甫都是一些伪君子、恶棍和败类。

无疑，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战斗无神论，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启蒙价值和历史意义，就是在今天，对于清除宗教迷信思想，宣传无神论，树立科学和理性的权威，也有借鉴作用。当然，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还不能科学地揭示宗教迷信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不懂得劳动群众信仰宗教是由于无知、愚昧，更由于他们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他们不知道光靠宣传教育和揭露，还不能消灭宗教，要消灭宗教必须铲除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然而，尽管法国唯物主义者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毕竟是他们第一次高举起战斗无神论的旗帜，给中世纪宗教神学以毁灭性打击，为欧洲反宗教神学的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3. 科学与无神论、唯物主义联姻

科学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联姻是 18 世纪启蒙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恩格斯指出：“各门科学在 18 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因此它们便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

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①]，"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②]。这说明，科学为18世纪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是对当时科学知识概括和总结的产物。尽管这一"产物"深深打上了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之"分门别类"的、"机械性"的烙印，但是，它毕竟标志着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精髓，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也正因如此，所以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又都是科学战士，他们大力倡导科学精神，重视科学技术，研究自然科学，传播新的自然知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的解放和发展。

不仅科学与唯物主义结合，科学与无神论也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联盟。在本质上，科学与神学水火不容，而和无神论相通。欧洲近代，科学与无神论像一对难兄难弟，在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特别是18世纪科学使人的思维方向得到根本转变，人们的研究视野从神学转向科学，致力于探索自然，从自然本身来理解和解释自然，排除和否定了任何超自然的因素。这就为无神论提供了科学根据，为彻底埋葬宗教神学提供了有力武器。法国的战斗无神论者凭借自然科学的威力，把上帝从自然领域中驱除出去，胜利地进行了一场科学对宗教的大决战，使科学迎来了春光明媚的新时代。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伏尔泰等人的自然神论发展为战斗的无神论，并把无神论与唯物主义有机结合，形成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6—6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神论的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相结合，是法国启蒙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从逻辑上讲，二者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唯物主义是无神论的理论基础，而无神论则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会促进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世界观上应该是一致的。但从哲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是一切唯物主义都能和无神论相结合的，也并不是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在欧洲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以后，唯物主义开始是以神学异端的形式出现的；到了16、17世纪，才出现了公开的唯物主义理论，但它一般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它的思想代表在反神学的同时又对神学作了一定的让步，他们或者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保存上帝观念，或者以泛神论、自然神论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总之，他们都还没有达到无神论的高度，没有实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结合，因此，他们都未能使自己成为无神论者。然而，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切宗教都黯然失色，神被拉下了宝座，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被彻底摧毁。法国唯物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有机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哲学具有鲜明的无神论的特征。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他们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彻底否定上帝存在和上帝创世说；坚持物质运动“自因”论，抨击“第一次推动”的神学说教；坚持唯物主义决定论，批判神学目的论；坚持心身关系的唯物主义一元论，驳斥宗教的灵魂不死说；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信仰真

理观。[①]

综上，科学、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结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彻底摧毁了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宗教神学，把唯物主义推进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新阶段，使自然科学冲破了神学牢笼，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西方近代辉煌的科学文明。

三　17和18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就

17和18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启蒙浪潮汹涌澎湃。就在这宏大的革命潮流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冲破了欧洲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思想牢笼，迅速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培育了代代英才，为西方近代科学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1. 经典力学大厦的奠基人——牛顿

"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②] 这是恩格斯对科学巨星牛顿在

① 参阅于凤梧：《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天津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自然科学领域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的高度评价。

牛顿（1642—1727）诞生在英国林肯郡的艾尔斯索普村。父亲的早世，使牛顿从小经常做活，学习成绩一般。1661年，他以优待生的身份进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先后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665年，牛顿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便留在大学研究室。1669年，由巴罗教授推荐，26岁的牛顿继任“鲁卡斯数学讲座”教授。他对科研专心致志，十分痴迷，有次煮鸡蛋，竟把怀表当作鸡蛋煮了。青年牛顿发奋工作，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很少在夜间两三点钟以前睡觉，有时一直要工作到清晨五六点钟，……特别是春天和落叶时节，他常常六个星期不离开实验室”。由于聪慧颖异，刻苦钻研，他在科研上取得了非凡成就。1687年，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之后，《光学》、《三次曲线枚举》、《流数法》等科学著作相继问世。1703年牛顿被推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705年，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头衔，以表对科学家的推崇。1727年牛顿去世。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国葬的科学家。



牛顿

牛顿在数学、光学、热学和天文学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在数学上，他和莱布尼茨一道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还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发展了方程式理论。光学方面，致力

于色的现象和光的本性的研究。他用三棱镜把白光分解成七色光并确定每种颜色光的折射率，制作了牛顿色盘。关于光的本性，他主张光的微粒说。在热学方面，他确定了冷却定律。天文学方面，他创制了反射望远镜，初步考察了行星运动规律，预言地球不是正球体，并由此说明岁差现象等。

但是，牛顿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一提到牛顿的引力定律，人们就会想到苹果落地的故事。英国人把这棵有传奇色彩的树保留下来，供好奇者观赏。树死后又将它砍成块珍藏在纪念馆里。其实，这对牛顿力学的产生根本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如他在临终前所说，“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这巨人就是伽利略、刻卜勒等科学家。牛顿正是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从而研究得出了运动三定律，即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定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后来，在英国天文学家哈雷（1656—1742）的极力赞助下，牛顿将这一伟大发现和运动三定律汇集写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完成了经典力学体系，说明了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一切力学现象，解决了行星运动、落体运动、振子运动、微粒运动、声音和波、潮涨潮落以及地球的扁圆形状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 200 多年中，再也没有人补充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直到 20 世纪量子论和相对论出现，才使力学范畴扩大。

牛顿力学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在科学上，牛顿学说是一次重大革命。他把始于哥白尼学说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推向了高峰，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第一次大综合，标志着人类科学时代的开始。他不仅直接支持和推动物理学发展达两个世纪之久，而且对各门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到18世纪，他的思想已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就是牛顿力学和热学结出的一大硕果，它使人类历史进入了“蒸汽时代”。在哲学上，牛顿用严密的数学方法，精确地描述了整个宇宙体系按照严格的自然法则运行的和谐图景，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培育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当然，牛顿学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他关于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点，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他提出的“第一次推动”，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但瑕不掩瑜。牛顿是科学史上的巨匠，他对后世的影响是近代史上任何科学家都无以伦比的。

2. 处在襁褓时期的物理学——光学和电学的发展

在17和18世纪，与牛顿力学的辉煌成就相比，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还处在襁褓时期，其主要成就在光学和电学方面。

17世纪以来，由于研究天文学的需要，光学得到了较快发展。1621年，荷兰斯涅耳（1591—1626）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费尔马（1601—1665）又得到了确定光在介质中传播所走的路径的光程极值原理。到了17世纪末叶，牛顿和惠更斯对光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把光学推进了一大步。牛顿探索了改进光学仪器的方法，并进行了太阳光的试验。他用三棱镜把白光（太阳光）分解成七色光并确定每种颜色光的折射率，奠定了光谱分析的基础。他还制作了牛顿色盘，观察到牛顿环。关于光的本性，他主张光的微粒说。荷兰物理

学家惠更斯（1629—1695）则是微粒学的反对者，他创立了光的波动说。波动说和微粒说一直争论到20世纪，才以光的波粒二象性为结论告一段落，也就是说，光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对光的本质的不断深化认识，促进了整个光学的发展。

电学在18世纪取得了累累硕果。早在古代，人们就发现有些物体经过摩擦以后会生电，对摩擦生电人们一直都在研究。到了1650年前后，德国人格里凯制成一台手摇摩擦起电机，还发现了电可产生光和声，以及电可传导的现象。大约在1730年，英国人格雷（1670—1736）把物体分为导体与绝缘体两类，并证明人也是一种导体。有了导体人类就能够制造各种电学仪器。法国人杜菲（1698—1739）制成了验电计，用它测量各种物体的带电量。1746年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马森布罗克和枯内渥斯发明了最早的蓄电池——莱顿瓶，能供储藏电能及放电。莱顿瓶的发明为静电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促进了电的实验。

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1706—1790）用莱顿瓶作了种种实验。1747年，他在实验中发现了金属尖端放电现象，并得出结论：电不是摩 擦产生的，而是通过摩擦集中起来的。它是物质中的一个元素，有正（+）有负（-），从而创造了（+）（-）概念。1752年夏天，富兰克林为了证明他关于电瓶的瞬态放电与天空闪电相同的猜测，在费城作了一次闻名世界的天电传蓄试验。那是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日子，富兰克林父子冒着生命危险做了这次实验：通过同风筝相连的金属线与铜钥匙，搜集到了天上的电贮藏在莱顿瓶之中，然后用它来做实验，证明雷电同实验室里电花完全一样，闪电就是一种放电现象。实验的成功立即轰动了科学

界。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他的论文被译成各国文字发表。1753年，富兰克林将电和尖端放电联系起来，产生了利用避雷针防止雷击的想法。于是，他在自己的屋顶安上了世界上第一个避雷针。然而，当这个新事物在费城刚刚出现时，教会视为异端，居民们觉得是不祥之物。1762年避雷针开始传入欧洲，法国曾一度下令禁止使用。可是1769年意大利威尼斯一座教常被雷击毁，引起地下室的火药爆炸，致使3000多人死亡的沉痛事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到1784年，避雷针在全欧流行，有人在雨伞上也装上了拖地的金属线。富兰克林吸取天电的试验以及避雷针的广泛应用，可说是这个时期有关电学的最重要成就。

生物电与电池。18世纪80年代，意大利解剖学教授伽伐尼（1737—1789）在解剖青蛙时发现了生物电，也叫伽伐尼电。同时代的另一位意大利教授伏特（1745—1827）从实验中得出经过酸浸的金属会产生更强电效应的结论。1800年，他终于用酸浸不同的金属板（银板和锌板）制成世界上第一个电池，从而发明了持久性电源。

库仑与电测技术。1785年，法国科学家库仑（1736—1806）发明了比较精密的弹簧秤，并用弹簧秤作量具进行电力、磁力的测量实验。在1785—1789年这5年当中，他通过无数次对静电的定量试验，证明了静电力的平方反比定律。后来人们把这个定律称为库仑定律，以此纪念他在电测定理论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综上，在17、18世纪，光学和电学都取得了可喜成就。但是，就整体来看，光学和电学尚处在起步阶段。它的大发展是在19世纪下半叶，那次发展标志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爆发，把人类历史从“蒸汽时代”带进了“电器时代”。

3. 拨开炼金术的迷雾——波义耳的化学元素论

化学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直到 17 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波义耳提出化学元素概念时，它才开始成为一门科学。

人类在原始时代就发明了人工取火。有了火，开始产生和发展了制陶与冶金，这是两种最古老的重要化学工艺。古代人又学会酿酒、制醋、染色等。这是化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实用化学工艺时期。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大约公元前 3 世纪。

大约到公元前 2 世纪，化学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就是炼金术时期。中国是炼金术出现最早的国家，但是我国的炼金是以炼丹为目的，所以叫炼丹术。所谓丹就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药。炼丹术起源于秦代，形成于汉代，延续到唐、宋。炼丹术的逻辑是既然黄金不朽，所以人服用金也可不死。故丹也叫金丹。其实这种丹是四氧化三铅和硫化汞，都是有毒之物。我国历史上就有好几个皇帝因服丹而死。西方的炼金术在古希腊已有所流行，后来传入阿拉伯和西欧，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西方炼金术的目的不是要炼丹，而是要炼出所谓“哲人之石”，说这种哲人之石可以把铅、铜等普通金属变成黄金，所以叫炼金术。实践表明，炼丹术也好，炼金术也好，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无法实现的幻想。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实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化学知识，掌握了不少化学实验技术，制造了许多化学实验用具。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炼金术是化学的“原始形式”，“在当时还是必要的”。

医药化学时期是化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它始于16世纪，是以瑞士医生巴拉塞尔斯（1490—1541）为代表的一个学派。他认为炼金术的目标是荒诞的，化学的目的不在于制造黄金，而在于制造药物，为医药服务。他企图把炼金术与医学结合起来，建立医药化学，使化学从炼金家的实验室走进药剂师的药房。医药化学开始摆脱了炼金术的神秘目的，走上研制药剂的道路，使化学立足实用，面向社会，服务大众，这无疑是化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但是，医药化学派没有摆脱炼金术的三要素说的束缚，所以医药化学缺少科学的理论。化学要前进，就要用科学的理论来代替炼金术。这一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任务，是由波义耳完成的。

波义耳（1627—1691）是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1661年他因出版系统阐述化学元素论的巨著《怀疑派的化学家》而获盛名。1680年任皇家学会会长。波义耳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最早使用有刻度的仪器来测定气体和液体的体积。确定了相当多的液体和固体的密度，并提出了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他发现了磷，用一些植物色素检验酸、碱性，在分析化学上也作过大量工作。但是，他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化学元素论。其主要之点是：

第一，物质的构造和性质是复杂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组成，物质有干湿冷热四性。炼金术家提出物质由汞、硫、盐三要素构成，由其比例不同而形成不同性质的各种物质。波义耳根据大量的实验指出，这些传统的观念是不正确的。物质的结构和属性是复杂的、多样的和可变的。

第二，他首次提出了化学元素的概念，试图用化学元素论来代替炼金术的理论。他认为，元素不是属性，而是“某

些不由任何其他物体所构成的原始和简单的物质"，"一切称之为真正的混合物都是由这些物质直接合成，并且最后被分解为这些物质。"所以，物体属性的改变并不是元素的改变，而是构成它的元素的种类或数量的改变，这就同炼金术划清了界限。

第三，他为化学确定了独立的研究目标。他认为化学寻求的不是制造哲人之石和医疗药物的实用技巧，而是应该从那些技艺中找出一般原理。所以，化学不应是炼金术与制药业的附属品，而应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首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物体是由什么元素构成的，物体能分解为何物，又能化合为何物。

波义耳虽然还未能提出鉴别元素与化合物的方法，错误地把火、水和空气仍视为元素，但这无损于他在化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是他拨开炼金术的迷雾，为化学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为走向近代化学开辟了道路。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①

4．摧毁燃素说的武器——拉瓦锡的氧化学说

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末的一个半世纪，是化学发展向近代化学过渡的阶段，也是近代化学的孕育诞生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一是波义耳批判了炼金术，提出了化学元素说；二是拉瓦锡推翻了统治欧洲化学界达百余年的燃素说，建立了氧化学说。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下同），第163页。

1703年，德国御医、化学家斯塔尔（1660—1734）正式提出了燃素说。他认为，可燃物之所以能燃烧，是因为它含有燃素这种火微粒。物体包含燃素越多，就越容易燃烧，如木材、硫、磷就是富含燃素的物质；反之，石头等不含燃素的物质，就不会燃烧。燃烧是物体释放燃素的过程，物体失去燃素以后就剩下灰渣，灰渣吸收燃素以后又变成可燃物。因此，化学变化就是吸收和放出燃素的过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燃素说比炼金术理论能更多更圆满地解释燃烧以及其他许多化学变化，因此，它很快得到许多化学家的信任和支持。英国的布拉克（1728—1799）、卡文迪什（1731—1810）、普利斯特列（1733—1804）和瑞典的舍勒（1742—1786）等著名科学家都是它的信奉者。在燃素说流行的一百年中，科学家们作了大量的化学试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实验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科学燃烧理论的建立，以及近代化学的发展都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恩格斯评价燃素说时曾说，化学“借助燃素说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①] 又说，“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上百年的实验工作才提供了一些材料，而拉瓦锡利用这些材料才在普利斯特列提取出来的氧中发现了想像中的燃素的实在对立物，从而推翻了全部燃素说”[②]。无疑，燃素说在当时对于促使化学摆脱炼金术的陈腐观念，建立起科学的化学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燃素说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不能自圆其说。燃素既然是一种物质，那它就应当有重量，可是为什么金属在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0页。

煅烧释放燃素后重量反而增加呢？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却又为什么比植物轻得多呢？燃素是实在的存在物，但为什么千寻万找不见其影？特别是人们对化学反应更多地进行了定量研究后，越来越多的事实使燃素说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这说明燃素说已成为阻碍化学发展的障碍。只有推翻它，化学才能阔步前进。完成这一“化学革命”的是法国科学家拉瓦锡。



拉瓦锡及其夫人

拉瓦锡（1743—1794）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律师。他天资聪颖，富有创造性，早在23岁时就因研究城市照明问题而获得金质奖章。25岁时成为科学院化学

会员。30岁时已在化学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在农业、自来水、制造火药等方面都有成果。但他不安于只做一个科学家，他有着强烈的官欲。他曾用50万里弗买到一个收税局长的肥缺，同时，又参加了一个维护封建体制的组织。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成了革命的对象。1794年11月28日，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当时他正在监狱中研究汗的分泌，要求缓刑几天，但法庭副庭长科芬霍尔说："够了，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了！"拉瓦锡当时只有51岁，正是科学家的成熟时期，这从科学事业上看，是一大损失。正如数学家拉格朗日所说的："把拉瓦锡的头切断只要一瞬间，但要再有与他同样的脑袋必须要等待一百年。"

拉瓦锡在化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其最大贡献是建立了氧化燃烧学说。18世纪下半期，人们相继发现了多种气体，认识到空气有复杂的成份，这为科学的燃烧理论开辟了道路。1755年，布拉克发现二氧化碳。1766年卡文迪什发现了氢气。1722年卢瑟福发现氮气。特别重要的是，1773年和1774年舍勒与普利斯特列分别发现了氧气。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他们受传统的燃素说所束缚，"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使"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①。而拉瓦锡则科学地总结了舍勒、普利斯特列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大胆突破燃素说，终于在1777年给巴黎科学院 提交的《燃烧概论》的报告中，建立了科学的氧化燃烧学说，把化学从燃素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完成了划时代的"化学革命"。他因此被一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2页。

人称为“化学界的牛顿”，近代化学的奠基者。

拉瓦锡不只是否定了燃素说，建立了科学的燃烧理论，而且还发现了化学反应的质量守恒定律，形成用化学方程式说明化学反应过程的思想，提出定量化学分析的概念。他还给元素作了更明确的定义，并把已知的33种元素排列成表，首次建立了化学元素和化合物的命名法。1789年，他出版了名著《化学纲要》。这是近代化学形成时期最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对整个化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有人认为，它在化学上的意义就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力学上的意义一样，分别是自己学科的奠基性著作。

5. 生物科学的先驱——哈维、沃尔弗、林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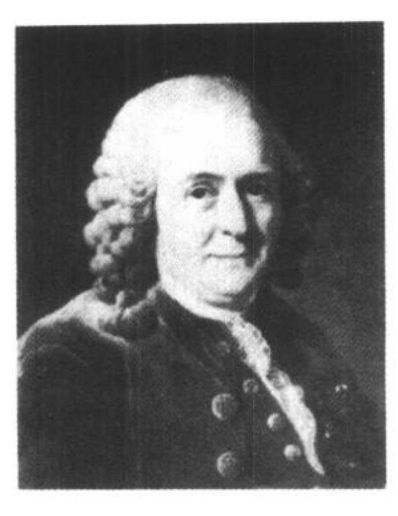
在17、18世纪，生物科学还处于幼稚阶段。哈维血液循环的发现、林耐分类学和沃尔弗的渐成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

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时期，都把古罗马医生盖伦的著作当作医学经典。盖伦用所谓“三灵气说”，即自然灵气、活力灵气和动物灵气解释心血管的基本生理活动。认为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彼此独立，各自进行着周期性的血液来潮和退潮。他的错误理论，也被视为真理，奉为正统，神圣不可侵犯。1553年，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提出血液肺循环的思想，否定了盖伦的三灵气说，遭到教会迫害。英国医生哈维（1578—1657）继续其研究，完成了塞尔维特未竟的事业。1628年，他出版了《动物心脏和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一书，正式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正确观念。指出血液

从左心室流出，经主动脉遍布全身，再经过腔静脉流入右心室，又经过肺循环而流回到左心室，就这样完成了血液在体内的循环运动。在今天看来，哈维的这种理论是很平常的，但在当时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一千多年的盖伦学说，有力地打击了宗教神学思想，而且把人体的血液循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开辟了生理学研究的新纪元。恩格斯高度评价说："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①

生物学在此时期的重要成就，还表现为胚胎发育研究中渐成说的胜利以及早期进化论思想的形成。17 世纪下半叶，显微镜的广泛运用，对胚胎发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比较科学的"渐成说"代替了早期的"预成说"。预成说流行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它认为有机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预先在生殖细胞（精子或卵子）里面已经完全形成，只是以压缩的微型形式存在着，胚胎的发育不过是这种预成的微型 动物的扩大。荷兰人施旺麦丹说："整个人类都早已包含在夏娃的肚子里，当储藏 的卵耗尽时，人类便中止了自已的生存。"瑞士人哈勒认为，上帝在 6000 年前预先造出了 2000 亿个小人卵，小人卵用完，人类就绝种了。当显微镜发明后，人们观察到了精子，有人还在绘制精子图时，把一个四肢俱全的小人画在精子的头部。最早起来反对预成论的是德国解剖学家沃尔弗（1733—1794）。他通过对鸡的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证明，有机体的生殖细胞或受精卵里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组织和器官的雏形，组织和器官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的这种渐成论思想在 1759 年出版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 163 页。



林　耐

《发育论》中得到系统阐述。沃尔弗也因此被后人誉为“近代胚胎学的创始人”。

预成说与渐成说的争论，是物种不变论与进化论争论中的比较早的一个回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达尔文学说的思想渊源时曾指出，“沃尔弗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即渐成说——引者）”。[①] 根据恩格斯的看法，这一年可看作是近代进化论的诞生年。后来，到18世纪末就产生了早期进化论的集大成——拉马克的进化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中，坚决反对当时在生物学中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物种不变论，从多方面论述了生物进化的见解，提供了有机界发展的鲜明图景，在生物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的进化理论，成为达尔文主义的先驱。

在近代随着人们对动植物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对千姿百态的动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使其系统化成为迫切需要。18世纪瑞典的著名生物学家林耐（1707—1778）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最大功绩是建立了动植物的林耐分类法和双名命名法，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统》中，提出了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页。

一个完整的分类系统。林耐采用的是等级从属的方法。他把自然界分为植物、动物与矿物三界，在界的下面又按照从属关系分为纲、目、属、种四大等级。例如狮、虎、家猫是三个不同的种，但它们形态相似，就分在同一属，叫猫属。猫属属于食肉目，食肉目属于哺乳动物纲。他还根据花的雄蕊数目和位置，把植物分为 24 纲；根据血液、心脏、生殖方式与呼吸方式把动物分为 6 纲。1762 年他的分类法包括 8800 个种，已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被人们称为万有分类法。林耐的这种等级序列分类系统后来一直沿用下来，只是在“属”和“目”之间增加了“科”的一级，又在“纲”之上增加了“门”的一级。林耐在 1753 年出版的《植物种志》和 1758 年出版的《自然系统》第 10 版里，又建立了“双名命名制”，也叫“双名法”，就是用拉丁文把种名和属名连在一起，来表示一种植物和动物。这种双名法使过去混乱的动植物名称归于统一，为研究分类学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一直沿用到现在。

尽管林耐的分类法还属于人为分类法，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缺点；他甚至还用造物主来解释动植物物种的形成，主张物种不变，直到晚年才承认往往由杂交可能产生新种。但是，林耐的贡献是巨大的，现代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就是由他奠定的。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在 18 世纪，“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达到了一种近似的完成”①。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 10 页。

6. 数学的伟大成就——微积分的产生和发展

17 和 18 世纪，数学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数的发明，特别是笛卡尔解析几何的创立，把变数引进数学，并经牛顿和莱布尼茨又把变数推广到无限小量和无限大量，建立了微分学和积分学，从而实现了从初等数学到以变量为中心的高等数学的历史性飞跃，使数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变量数学时期。

对数的发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运算的简单化。1594 年左右英国人耐普尔（1550—1617）发明了对数的方法，使乘除运算转化为加减运算。后来，牛津大学数学教授布里格斯（1561—1631）与耐普尔共同研讨了进一步完善这种计算方法的问题，1617 年布里格斯的《一千个数的对数》一书出版，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可供实际应用的 14 位的以 10 为底的对数表，从此确立了后来通用的对数计算方法。1624 年，布里格斯又在其新著中给了 3 万个数的常用对数表，且精确到小数 14 位。在当时，全凭手工运算而制成这样一个对数表，工作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然而他们的努力却使后人节约了不知多少精力和时间。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曾说对数的发明使得天文学家的寿命加倍。其实，从对数中受益的何止是天文学家。对数发明之后不久，又有人应用对数的原理制成计算尺，这是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前科学界、工程技术界普遍使用的高效的计算器具。

解析几何的创立。法国数学家费尔马（1601—1665）和笛卡尔（1596—1650）把变数概念引进数学，把代数和几何

结合起来，建立了解析几何。费尔马在《平面和立体的轨迹引论》一书（大约在1629年左右写定，出版于1679年）中，论述了他的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笛卡尔于1637年出版了他的重要哲学著作《更好地指导推理和寻求科学真理的方法论》一书，该书有一篇附录《几何学》，就是在这篇附录中他系统阐述了解析几何的原理，建立了“笛卡尔坐标”。后来人们通用的就是这种坐标系。由费尔马和笛卡尔创立的解析几何学，通过数学家沃利斯（1616—1703)、牛顿和贝努义（1667—1748）等人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解析几何的建立，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以其在计算方法上的显著优点而被广泛运用于各个科学领域，而且它把变数引进了数学，成为数学发展中的转折点，为微积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尔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而它们也就立刻产生，并且是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大体上完成的。”①

微积分的产生和发展。到了17世纪，人们已经研究了无理数、负数、虚数，在代数关系中也引入了字母作为抽象量的符号，并广泛地讨论了无限大和无限小及与之有关的变化、连续等概念，特别是解析几何的建立，为微积分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航海、天文学、力学发展的需要则进一步催化了微积分的诞生。正是在这样成熟的条件下，牛顿和莱布尼茨（1646—1716）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在研究力学和几何学的过程中，建立了导数、积分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36页。



莱布尼茨

的概念和运算法则，阐明了求导数和求积分是互逆的两种运算，奠定了微积分学的基础。牛顿和莱布尼茨是各自独立地制定了微积分学的。牛顿较莱布尼茨为早，但莱布尼茨的著作却先于牛顿而出版，而且莱布尼茨的表述方式比牛顿先进，因此目前微积分教科书中仍然沿用莱布尼茨所使用的符号。总之，在 17 世纪后半期，经过牛顿和莱布尼茨 的工作，微积分已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进入 18 世纪以后，人们继续大力扩展微积分本身，产生了许多新的数学分支，如微分方程、无穷级数、微分几何、变分法、复变函数等，数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 世纪数学界的中心人物是欧拉(1707—1783)，其次还有拉格朗日（1736—1813)、拉普拉斯(1749—1827）等。但在 18 世纪时，微积分基础本身仍然是不清楚的，分析的逻辑也是不够严密的，还基本停留在牛顿、莱布尼茨所没有完全阐述清楚的无穷小、极限以及微积分中的基本概念。为了严格规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许多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 19 世纪的法国著名数学家柯西（1789—1857）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用极限理论把微分、积分、无穷级数的概念严密化，用极限论建起了数学分析体系，使微积分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和体系完整的数学学科体系。所以人们通常把柯西看作近代意

义上严格微积分学的奠基者。17和18世纪数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微积分的创立和被普遍运用。恩格斯曾热情地赞扬微积分这门新科学，称它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胜利”。①

7．打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康德星云假说

哥白尼学说犹如电闪雷鸣，划破了中世纪黑暗欧洲的上空，迎来了科学文明时代的曙光。在这场科学反叛神学的伟大革命中，天文学以开路先锋的神威，取得了辉煌战绩。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伽利略、刻卜勒、牛顿、康德，天文学获得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

在自然科学与教会的斗争中，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的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起了巨大作用。我们知道，在哥白尼以前的一千多年是地心说统治的时代。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学说，并用本轮和均轮的复杂系统，建起了全面系统的地心说的理论体系。按照这种学说，地球是不动的，处于宇宙的中心，太阳和一切星球都围绕着它旋转。因为托勒密学说同教会的信条相符，所以得到教会的大力支持；同时，教会也利用它来论证上帝创世说。因此，地心说后来成为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神圣不可侵犯。哥白尼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是普通的一颗行星，它和诸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旋转。这就比较真实地描绘了太阳系结构的图景，把被地心说颠倒了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44页。

的历史校正过来了。虽然哥白尼很胆怯，直到临终前才将《天体运行论》这部压了30多年的著作公开出版，但正是它掀起了天文学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也使整个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家们沿着哥白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不仅把日心说建立在更加稳固的科学基础上，而且将天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意大利的布鲁诺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宇宙无限的观点，进一步批判了地心说。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无限宇宙的一个天体系统。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是，用望远镜 观察所得的成果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他于1609年制造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并用以观察天体，获得许多重要发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的四个卫星、太阳黑子、银河由无数恒星组成以及金星、水星的盈亏现象等，有力地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他1632年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反对托勒密的地心说，支持和发展了日心说，因此被罗马教廷判处终生监禁。他在经典力学方面成就斐然。早在18岁时，他在教堂看到灯在风中摆动从而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原理。26岁时，他通过著名的比萨斜塔的重物实验，推翻了向来奉为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落下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建立了落体定律。他还发现了惯性定律、抛物体的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伽利略是经典力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先驱人物，他在力学方面的贡献对宣传和论证哥白尼日心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国天文学家刻卜勒（1571—1630）分析了他的老师第谷·布拉赫的观测资料，发现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极大地丰富

和发展了哥白尼体系。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证明了天体运动和地球物体的运动遵循共同的规律，给予日心说以科学的论证，为天体力学做出重大贡献。但是，牛顿的“第一次推动”又给天文学家投下了神的阴影。正如恩格斯所说：“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下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①

天文学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赶走牛顿请来的“推动”神，彻底摆脱牛顿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世界观的束缚。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牛顿僵化宇宙观的是康德。康德（1724—1804）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早期曾对自然科学作过许多研究，写过一些论著。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继1754年提出潮汐摩擦假说以后，于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康德在这本著作里，提出了著名的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他认为太阳系是由原始星云演化而成的。原始星云这种物质微粒最初不均匀地散布在空间中，在引力和斥力的作用下，这些星云物质开始旋转。在旋转过程中，由于星云物质的相互吸引和相互碰撞，而逐渐凝聚成为今天的太阳和行星。康德还把由原始星云形成太阳系的理论推广到恒星世界去，推论恒星系统也是由于相同的力学规律形成的，并且指出，整个宇宙天体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康德的星云假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自然科学界的重视，直到1796年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独立地提出了与康德星云说相类似的星云假说，并且用力学原理和数学方法加以论证，才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人们也便将二者合称为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

---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1页。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康德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指出："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①] 康德在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因此可以说，康德的星云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②]

在科学上，虽然星云假说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猜想，论证细节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基本思想是颇有价值的，因而它不仅是18世纪天文学的重大成就，而且在今天仍然指导着人们关于太阳系历史的研究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2、3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2、397页。



第四章

艺术家头脑中的理性宫殿——启蒙时代的艺术

- 文学艺术
- 造型艺术
- 音乐艺术



如果说有什么目的支配着17、18世纪的艺术和文学的话，那就是保存和恢复古代希腊、罗马精神的欲望。思想革命的艺术家和作家竭力模仿古代的典范。他们的许多作品选择古典的题目和主题，并且尽可能地引用古代的神话点缀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憎恶古代的文明被“信基督的野蛮人”所破坏，他们看不到以后几世纪里文化成就的价值。

——[美]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
菲利普·李·拉尔夫

艺术是通过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式。它包括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具体形式。在阶级社会中，总的来说，艺术是一定阶级和一定社会势力思想、意愿和感情的反映。不同阶级的艺术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起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革命时期，先进阶级的艺术也是一种革命斗争的武器。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思想文化革命，成为启蒙大军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创造了富有启蒙特征的辉煌的艺术文明，为西方艺术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文学艺术

在启蒙运动时期，有封建贵族的“罗可可”文艺，有随着专制王朝的日趋反动而逐渐失去进步意义的古典主义文学，后期又出现了感伤主义文学。但作为这一时期文学主潮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宣传启蒙思想的启蒙主义文学。启蒙文学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文学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优良传统，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浓郁战斗气息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启蒙文学最早萌芽于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英国，在法国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德国掀起了“狂飙突进”的新阶段，在意大利、俄罗斯

等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所发展。这场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也为自己在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一席。

欧洲各国的启蒙文学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都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在内容上与维护封建专制君权的古典主义文学相对立，否定以王公贵族为正面人物的创作原则，把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歌颂的主要对象，公开抨击封建制度和教会，揭露社会的不平等、不合理，宣扬“自由、平等”。其次，在艺术方法上，现实主义是启蒙文学的基本倾向。它的特点不在于刻划人物性格，而在于具有更多的政论性、社会分析性和批判性。启蒙作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政治思想贯穿在文学作品中，使其成为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百科全书”。再次，启蒙文学的语言具有纯理性的特点。作品中的语言不是诗化，而是流畅的雄辩的政论性散文，富有逻辑性、启发性和战斗力。有些作品，由于哲学意义的深刻、强烈，使其变成小说化了的哲学论文。最后，在文学体裁上，启蒙作家一般都采用小说和戏剧，诗歌极少。为了便于宣传启蒙思想，他们创造了种种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正剧、游记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等等。他们的作品不要求对具体环境和生活细节作真实的描绘，而是用灵活多样的体裁，直接表达对政治、哲学、宗教等问题的看法，宣传作者的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总之，启蒙主义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有着独特的风格。它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在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制造舆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给予19世纪文学以重大影响。

1. 英国启蒙文学巨匠——笛福、菲尔丁

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带有严重的妥协性，封建残余仍根深蒂固，妨碍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革命之后出现的英国启蒙文学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性”为武器，打击封建势力，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英国启蒙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发展。它继承了过去流浪汉小说的传统，选择日常生活题材，以普通中下层平民为主人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英国的社会现实。其主要作家有笛福、斯威夫特（1667—1745）、理查生（1689—1761）和菲尔丁等。其中，笛福和菲尔丁最具代表性。



笛　福

笛福（1660—1731）是英国启蒙文学的主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他出身平民阶级，是伦敦一个屠户的儿子。他20多岁开始经商，到过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与此同时，他还从事政治活动，参加过反詹姆士二世的暴动和“光荣革命”中威廉三世的革命队伍。他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许多小说和政论文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展殖

民地，反对封建专制、等级特权，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大造舆论。

笛福的小说创作虽然从50岁后才开始，但成就惊人。他最著名的小说有《鲁滨逊飘流记》(1719)、《辛格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1722)、《大疫年的日记》(1722)、《罗克·查娜》(1724)等等。“这些小说的创造是文学上真正的伟业。在五年之内，笛福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文学革命。……所以他有充分权利享受‘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的称号。”①



鲁滨逊飘流记插图

《鲁滨逊飘流记》是笛福发表的第一部也是最出色的一部小说代表作。小说是以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赛尔柯克在荒岛上的真实经历为原型的。据当时英国杂志报导：1704

① 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189页。

年9月，赛尔柯克在海上叛变，被船长遗弃在安非南德岛上，4年后被航海家发现而获救。那时，他已忘记了人的语言，完全变成了一个野人。笛福受这一事件的启发，构思了鲁滨逊的故事。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笛福以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冒险进取精神和18世纪的殖民精神为准则，塑造了鲁滨逊这样一个新兴资产者、殖民主义者的形象。

鲁滨逊在青年时代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违背父愿，私自出逃，到海外经商。他被摩尔人所掳为奴，期间逃往巴西，成为种植园主。后来碰上可以获得暴利的贩卖黑奴的生意，便不顾一切去冒险。不期航海遇难，他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的无人荒岛。小说主要描写他在岛上28年的生活。他很快战胜忧郁失望的心情，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和工具，猎取食物，修建住所，制造各种用具，种植谷物，驯养山羊，凭着不知疲倦、百折不挠的毅力，改善了自己的环境。几年后，一些土人来岛上举行人肉宴，他救出了一个将要被杀的土人，把他收为自己的奴隶，取名星期五。最后，他帮助一个舰长制服了叛变的水手，搭乘舰长的船返回祖国。

作者通过对鲁滨逊在近乎“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斗争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向上、勇敢冒险、艰苦创业的进取精神。在笛福的笔下，鲁滨逊与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僧侣和贵族形成鲜明对照。鲁滨逊俨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恩格斯称他为“一个真正的‘资产者’”①，一个道地的殖民者。因为，鲁滨逊把资产阶级的功利观作为考察一切事物的标准。他在沉船中发现了钱，尽管他说“你现在对于我比粪土还不值钱”，但资产者对金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11页。

的崇拜促使了还是把钱收藏妥当。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鲁滨逊也离不开这种功利主义的盘算。他以主人自居，将同他一起从海盗那里逃出的黑人青年爱克沙利作价出卖。他用火枪来威胁，用宗教来"感化"，迫使星期五甘心当奴隶，为他创造财富。他自封为海岛国王，宣称"全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我的百姓都完全服从我；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作者把鲁滨逊这样的资产者、殖民者当作英雄人物来颂扬，正反映了笛福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

笛福的创作开辟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道路。他取材于现实生活，把中下层平民作为主人公，采用回忆和游记的形式，详尽描写人物的生活和活动情况，用以达到现实主义的说服力。当然，他的小说在艺术上还存在不少缺陷，如结构松散，平铺直叙，人物形象的刻划比较粗糙，这反映出英国早期启蒙文学的弱点。

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也是英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激进派。他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在贵族的伊顿学校和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最初，他从事戏剧创作，写了25个剧本。"菲尔丁对于英国戏剧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社会政治喜剧这一个体裁。"[①] 属于这个体裁的喜剧有《咖啡店政客》（1730）、《唐·吉诃德在英国》（1734）、《巴斯昆》（1736）和《历史纪事》（1737）等。由于这些剧本讽刺了英国第一任首相，嘲弄了英国的党派斗争和对外政策，揭露了政府官吏贪污受贿的丑行，被政府禁演。菲尔丁被迫转而从事小说创作。

他对小说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正是他的小说使他在英

---

① 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第218页。

国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菲尔丁共写了4部小说，第一部是《约瑟·安德鲁传》（1742），由4卷构成。它通过贵夫人的男仆安德鲁的遭遇和经历，反映了英国的乡村生活，揭露和批判了乡绅地主的专横淫乱以及维护贵族特权的政治制度。《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1743）共4卷，是以一名强盗头子魏尔德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揭露和批判了英国社会道德的败坏和司法制度的黑暗，嘲笑了议会中的党派斗争。18卷的《汤姆·琼斯》（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也是标志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最高成就的划时代杰作。作品通过弃儿汤姆·琼斯和乡绅的女儿苏菲亚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相偕逃往伦敦的种种经历，反映出整个英国的社会生活，广泛涉及英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从贵族乡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被迫为奴的穷人，形象生动，具有典型意义。小说歌颂了普通平民的善良品德，批判了封建贵族专横暴戾、自私虚伪的丑恶本质和资产阶级金钱门弟的婚姻观念。《阿米莉亚》（1751）是菲尔丁最后一部小说。它通过富家姑娘阿米莉亚和穷军官布斯上尉婚后的遭遇，揭露了权贵对穷人的凌辱和压迫，批判了英国的司法制度。这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已接近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菲尔丁

“菲尔丁是制定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第一人。”[①] 他的较为完整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散见于一些小说的序文及绪论中。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散文滑稽史诗”，意即用散文来写普通人的喜剧性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他主张描写“人性”，用“真实的自然人性”来感化日趋虚伪的“人性”，从而发挥小说的教育作用。他认为无论写人写事都要“严格遵循自然”，反映现实，因此他把自己的小说和浪漫传奇加以区别，以当代的英国社会生活作为他小说的描写对象，并提倡作家应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广泛地直接地熟悉生活。他强调文艺作品应该允许虚构，但虚构的基础仍然是现实，虚构必须是可能的、合情合理的。菲尔丁的这些关于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论，对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大。

菲尔丁有着强烈的民主思想和正义感。他的创作一直循着现实主义道路，其作品富于批判性和民主、战斗的倾向。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史上，他第一次力图把小说作为斗争的武器，不仅揭露了封建残余势力的专横和腐朽，而且批判新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平等现象。这正是当时英国启蒙文学激进派的特点。菲尔丁的小说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拉伯雷、西班牙塞万提斯的传统，把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推向了顶峰。他的小说的优良传统，被 19 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20 世纪的肖伯纳所继承，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① 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第 230 页。

2. 法国四大启蒙作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

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为主要代表的法国启蒙作家，吸取了英国启蒙主义小说和莎士比亚戏剧的优良成果，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把启蒙主义文学推向了全盛时期。它不仅紧密配合启蒙运动的需要，成为唤醒人民、教育人民、打击僧侣和贵族的有力武器，而且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也是当时法国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伏尔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50 多部悲剧和喜剧、10000 多封信札。伏尔泰毕生从事悲剧写作。他的悲剧往往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用古典主义戏剧的形式宣传启蒙思想。悲剧《俄狄浦斯》（1718）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根据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同名悲剧的题材写成的。剧中的俄狄浦斯是一个勇敢高尚、富有智慧的人，他竭力逃避神的不祥预言，但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神的捉弄，犯了弑父娶母之罪。剧本对神恶意地愚弄人、造成命运的悲剧提出了抗议。《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布鲁图斯毫不犹豫地判他死刑。儿子被处决后，他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利用古罗马的历史题材来宣传反暴政、要自由、效忠共和政体的启蒙思想，因

而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了很大作用。悲剧《穆罕默德》（1742）是一部反对教权主义的作品，借揭露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来抨击天主教教会的蒙昧、欺诈和残暴。

在伏尔泰文学创作中，以独具讽刺幽默风格为特征的哲理小说最有价值。他写过26部哲理小说，这些小说是典型的启蒙现实主义作品。它们的长处不在于刻划人物，而在于对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它们的语言不是诗化的，而是流畅雄辩的政论性的散文，它将辛辣的讽刺、轻松的诙谐与嬉笑怒骂结合在一起，极富于讽刺性、战斗性和启发性。《查弟格》、《老实人》与《天真汉》是他的哲理小说三大代表作。

中篇小说《查第格》（1747）不仅注重暴露和嘲讽现实，而且提出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小说的主人公是古波斯巴比伦的一个聪明而又品性优秀的青年。他出于善良的动机做了许多好事，但总是遭到人们的暗算，大祸不断临头。他在这充满邪恶的社会里，看到的是人情险恶，法院腐败，教士伪善，专制君主暴虐无道，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查第格依靠个人才智，化险为夷，平定了国家的动乱，被人民拥戴为国王。他以哲学家的方式治理国家，“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繁荣富庶，盛极一时”。查第格的不幸命运象征人类经历过的种种苦难，作者借此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通过查第格的开明政绩，作者颂扬了开明的君主制。

《老实人》（1759）的主人公老实人原以为世界“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现实生活使他处处碰壁，不得不抛弃了盲目乐观主义。小说正是通过老实人从欧洲到美洲、亚洲受尽苦难的流浪故事，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对人民的残酷迫害和宗教战争的罪恶。《老实人》反对盲目乐观，但并不悲观失望。伏尔泰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王国”。老实人最

后来到“黄金国”，这里石头就是黄金，人们不受金钱势力的支配，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法院和教会，科学文化非常发达，大家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小说最后一章指出，“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烦恼、纵欲、饥寒这三大灾害”，全书以“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句名言结尾。这充分表露出作者关于只有工作和劳动才能创造人类财富，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启蒙思想。

《天真汉》(1767) 的主人公天真汉从小在加拿大未开化的部族中长大，养成了“很天真的想什么说什么，想作什么就作什么”的习惯，来到“文明”的法国以后，他这种纯朴的思想习惯与周围的社会习俗、宗教偏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人家教他念圣经，他天真地按圣经行事，不料事事碰壁，遭到别人的耻笑。他总结说：“我每天都发觉，那本书(指圣经) 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叫人做的，大家倒一件没做。”天真汉和伊芙相爱，他以为恋爱是“自己分内的事”，但别人告诫他必须通过双方的家长。特别成为他们爱情不可逾越之障碍的是天真汉受洗入教时，教会恶意地安排伊芙主持洗礼，于是她就成了天真汉的教母。要同教母结婚自然属于罪在不赦之列。人家告诉他，要破例结婚就必须得到教皇或国王的“开恩”。天真汉怀着满腔怨恨被迫前往凡尔赛去祈求国王，路上说了一些抒发积怨的话，不料被教会密探告发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天真汉的叔父为救天真汉到处求人，但毫无结果。他去求国王的忏悔师，忏悔师正同一位贵族小姐厮混。他再去求巴黎总主教，总主教恰好与一位漂亮的夫人窃窃私语。他又去求主教，主教正偎依着一位小姐在读某夫人写的《神秘的爱》。在天真汉的叔父一筹莫展之际，伊芙自己出面求见了宫廷的一名权臣。大臣表

示，如伊芙肯为他侍奉枕席一次，便可放出天真汉。伊芙决心牺牲自己，救出恋人，屈服了。于是，天真汉出狱了，伊芙却因受污辱悲愤而死。《天真汉》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天主教神权和封建特权，宣传了人的自然权利。

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又是启蒙主义文学先驱者之一。他的主要文学作品是由 160 封信组成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1721）。它以路易十四和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的两个旅法波斯青年与他们亲友通信的形式，评述法国的政治、宗教、社会问题。小说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没有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主要是通过一些零星的形象、片断的画面、短小的故事和寓言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这是一部揭露性、讽刺性很强的作品。它全面地揭露了法国封建王朝的黑暗丑恶和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国王喜欢谄媚，耽于女色，奢靡极欲，穷兵黩武；统治阶级卖官鬻爵，裙带成风，官场腐败；上流社会公开淫婚，贵族妇女"自寻失身之道"，花花公子、唐·璜式的淫徒成为时髦人物；贵族奢侈享乐，醉生梦死，虚度光阴，戏弄人生；社会风气败坏，赌博成风，骗子横行，伤风败俗屡见不鲜；宗教世界异常黑暗，天主教会腐败不堪，宗教战争灾难深重，异教徒惨遭迫害，僧侣奸诈虚伪，教皇是"魔法师"，神甫是色鬼；精神生活空虚无聊，法兰西学院学风浮夸，空谈成风，巴黎大学专务烦琐哲学，神学著作和伪科学书籍到处泛滥。所有这些黑暗现象，虽然写得不及伏尔泰那样辛辣，卢梭那样激愤，狄德罗那样深刻，但也勾划出 18 世纪初法国封建社会腐朽衰败的状况。小说不仅宣传了作者有关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它的清新明快的散文风格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

响，为这类新型文学体裁开辟了道路。

卢梭（1712—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激进民主派代表、卓越的启蒙文学家。他那崇高的文学声誉主要建立在三部文学名著上，它们是《新爱洛绮丝》、《爱弥儿》和《忏悔录》。这三部作品的特点和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是卢梭宣传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

《新爱洛绮丝》（1761）是卢梭著名的书信体小说，写贵族姑娘尤丽和她的青年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的故事。卢梭名其为《新爱洛绮丝》，是因为这对情人和中古时期法国青年女子爱洛绮丝与她老师阿贝拉尔一样，都是以悲剧结束他们的恋爱的。尤丽的父亲是一个封建等级偏见很强的贵族，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出身平民的圣·普乐，命她和贵族伏尔玛结婚。圣·普乐离开了尤丽的家。尤丽在婚后把自己过去的恋爱告诉了丈夫伏尔玛，丈夫表示对他们的信任，请圣·普乐回来。尤丽与圣·普乐朝夕相见，彼此都压抑内心的感情，感到非常痛苦。最后，尤丽因病而死，死前再次坦露对圣·普乐的感情。卢梭通过这对年轻恋人的凄婉动人的感情描写，有力地谴责了封建等级婚姻，揭露了封建等级压抑人的感情的罪恶，宣扬了爱情自由、感情解放，反映了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要求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获得自由发展的思想愿望。《新爱洛绮丝》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时期争取爱情自由的一部代表作。

《爱弥儿》（1762）是一部教育哲理性小说，通过爱弥儿受教育的故事，阐明作者的教育思想。卢梭的出发点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会变坏了。"他认为教育人就是要防止人变坏，恢复"自然人"。卢梭由此出发，提出了著名的自然教育理论，在西

方近代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爱弥儿》不仅是教育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同样受到文学家的高度评价。《爱弥儿》不是用纯理论来阐述教育，而是透过男儿爱弥儿和女子苏菲的形象来抒发其教育主张。它既强于思想，又浓于感情，说理深邃，情绪激昂。《爱弥儿》所以引人入胜，以致使鼎鼎大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爱不释手，因此而打破他那行之多年、不曾更改的生活规律，非彻夜读罢而不能，就因为它的思想境界高而感情最真挚，两者交融产生了巨大的魅力。

《爱弥儿》出版后，卢梭遭封建政府和教会迫害，逃亡国外，四处流浪，被人咒骂为“疯子”、“野人”，更令他痛心的是还遭到来自启蒙学者阵营里的一些人的诽谤。卢梭处境艰难，极为孤立，受到很大刺激，几乎精神失常。在流亡的 8 年里，他眼看自己有被诬为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地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自传《忏悔录》。此书于 1765 年动笔，大部分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写成，最末一章是 1770 年 12 月下旬在回巴黎之后完成的。《忏悔录》共 12 章，全书的主题是通过自己坎坷的一生控诉封建专制社会对人的迫害和腐蚀。卢梭真诚地、坦率地，甚至是赤裸裸地把自己的灵魂和盘端给了读者。在书里，卢梭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继续下去，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但是，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也使他受到了沾染。他偷过东西、撒过谎，做过损人利己的事。他想以这样的叙述说明他的著名人性论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在这里，卢梭历数了他儿童时代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后所

遭遇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平。他愤怒地说：这个社会是“弱肉强食”的，“强权即公理”。这部自传名为“忏悔”，实则是“控诉”，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对封建专制社会的大胆挑战，是对“人权”尊严的勇敢捍卫。在这部自传里，卢梭是把自己作为具有资产阶级个性的人的标本来剖析的。他认为自己与那些迫害他的人相比，是纯洁的。他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更好！’”《忏悔录》虽然是自传，但它思想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反映，情节生动真实，完全像一部小说，是卢梭文学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奇书”。

卢梭的作品富有抒情风味，推崇感情，歌颂自然，崇尚自我，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这就使卢梭成为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先驱。法国的浪漫派夏多布里昂（1768—1848）、斯塔尔夫人（1766—1817）、乔治·桑（1804—1876）和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都深受他的影响。因此，歌德说：“卢梭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狄德罗（1713—1784）是法国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的领导者，著名启蒙文学家。他在哲学、美学理论、文学创作等方面都有很大建树。狄德罗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先驱之一，对戏剧、表演艺术、音乐、雕刻、绘画等均有独

到见解。他的启蒙主义的文艺观点，散见于《绘画论》、《论戏剧艺术》、《谈演员》和《沙龙》等文艺理论著作中。他反对日趋保守、僵化的古典主义文学和浮华纤巧的贵族“罗可可”文艺，提倡符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启蒙文艺。他注重文艺的道德教育功能，强调艺术对社会人生要起指导作用，认为“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他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理论，要求把美建立在真与善的基础上，使真善美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主张文艺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且应该高于现实生活，反映它的本质，因而艺术家要走到生活中去，到乡村去，到茅屋里去，摹仿自然，反映现实。他反对为封建宫廷服务的古典主义戏剧，主张打破悲剧与喜戏的严格界限，把悲喜剧结合起来，建立一种运用日常语言、表现市民家庭生活的“严肃喜剧”或“市民剧”，这种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新戏剧体裁，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正剧”。他的正剧《私生子》（1757）和《家长》（1758）是他的文艺理论的创作实践。狄德罗的文艺理论，对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狄德罗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是由他死后出版的三部小说奠定的，它们是《修女》、《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修女》写于1760年，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书信体小说。它以修女苏珊向科瓦马尔侯爵写信诉苦和求援的方式，控诉了天主教会硬把她关在修道院里，逼她违反人性过禁欲生活。她忍受不了修道院种种野蛮的暴行和迫害，终于逃出了这所宗教牢笼。狄德罗用犀利的笔锋，描绘了一幅人间地狱——修道院的悲惨图画，勾画出教会僧侣的凶残面目。《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是一部对话体哲理小说，是狄

德罗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恩格斯称赞它是“辩证法的杰作”[①]，马克思说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②]。小说通过作者与拉摩的侄儿的对话（拉摩是当时一位有名的音乐家，他的侄儿是一个落魄文人），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这个人知识丰富，才华出众，然而不道德的社会使他变成了玩世不恭、寡廉鲜耻的食客。他洞悉贵族社会的腐烂和罪恶，看到社会的不平等和人与人的险恶，但他甘心混迹其间，只求酒足饭饱，不与现实的罪恶制度抗争。正如狄德罗所说的，“他是高傲和卑鄙、才智和愚蠢的混合物”。拉摩的侄儿这样一类畸形的人完全是那个畸形的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可见旧制度非改革不可了。这正是小说的革命启蒙特征之所在。创作于1773年的对话体小说《宿命论者雅克》，是狄德罗晚年所写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它通过雅克与他主人的漫游与闲谈，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贵族生活的腐朽，批判了宿命论思想。雅克遭到了主人打骂时常说的“上帝是这样规定的”口头禅，发人深省。它激发人们反封建反宗教的意识，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18世纪的法国，除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这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一位杰出的启蒙戏剧家，这就是博马舍（1732—1799）。他的作品有力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宣扬了启蒙思想。他创作的戏剧有正剧《欧也妮》、《两个朋友》；喜剧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和《有罪的母亲》。其中《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是他批判封建专制社会和贵族生活的杰作，这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页。

个剧本在舞台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拿破仑曾对博马舍戏剧的上演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已经是“在进行中的革命”了。

3. 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天才——莱辛、歌德、席勒

18世纪德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决定了德国启蒙运动的首要任务不是进行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戏剧来实现民族统一。这就造成了德国进步知识分子把精神创造力集中于文化艺术，在精神领域里构筑他们的理想王国，形成了18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学的空前繁荣，产生了莱辛、歌德和席勒等杰出的启蒙作家。



莱　辛

莱辛（1729—1781）是德国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在萨克森一个牧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他毕生喜爱戏剧，同时也从事美学研究。他以自己的美学理论、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为德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莱辛的重要美学著作是《拉奥孔》(1766)。它通过对古希腊雕家所作的特洛亚祭师拉奥孔被两条蛇咬死的雕像的讨论，借以探讨造型艺术和诗的界限，驳斥“诗即画”的论点，第一次

明确了画和诗在反映现实上的区别，指出：画适宜于表现物体美，诗则适宜于表现动态美；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反映现实时是选择最精彩的“固定的一瞬间”，而诗所表达的则是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莱辛这样论述诗与画的界限，为的是贬斥古典主义的封建宫廷的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强调表现人的动作。这是符合要求变革、要求行动的市民阶级的愿望的。莱辛的戏剧理论著作《汉堡剧评》（1767—1769）是他在汉堡民族剧院担任剧评家时所写的104篇剧评的辑录。这部《剧评》有破有立，破的是封建的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立的是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他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剧院应当成为改进道德的学校。他反对机械地模仿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主张建立德国民族戏剧即市民剧，也就是狄德罗的正剧。他要求戏剧反映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提倡写“市民悲剧”，要透过市民生活的表象，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莱辛的美学思想和戏剧理论为德国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启蒙时期的德国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实践。他早年的剧作《萨拉·萨姆逊》（1755）是德国第一部“市民悲剧”。他的著名剧作是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和诗体剧《智者纳旦》（1779）。《爱米丽雅·迦洛蒂》是莱辛最成功的作品，也是一部典型的“市民悲剧”。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古斯特勒公爵想诱骗爱米丽雅，采纳宠臣玛利奈利的计谋，在爱米丽雅结婚的路上，雇用强盗杀死其未婚夫，把她劫至行宫，企图霸占。爱米丽雅的父亲虽十分气愤，但无力反抗，为了女儿的贞操，他忍痛杀死爱米丽雅。悲剧尖锐地揭露了封建主的荒淫

暴虐，强烈控诉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滔天罪行。但作品未能指出正确的反抗道路。它与封建专制的斗争，只是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反映出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莱辛以后，德国启蒙运动、启蒙主义文学从 70 到 80 年代进入了称为"狂飙突进"的新阶段。声势浩大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运动，它因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1776）而得名。狂飙突进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它崇尚感情，带有狂热的个人主义反抗情绪。它歌颂自然，反对专制，追求自由。它使德国文学进入繁荣时期，形成了空前的反封建斗争的高潮。恩格斯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①] 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限制，加之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运动并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也未能持久，80 年代后斯便已衰退，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时代。

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大都是青年人，主要有赫尔德尔（1744—1803）、瓦格纳（1747—1779）、棱茨（1751—1792）、克林格尔（1752—1831）等，其代表人物是青年歌德和席勒。

歌德（1749—1832）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城的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 年他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以后又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学习。斯特拉斯堡是狂飙突进运动的策源地。歌德在这里第一次阅读了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特别是结识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使他深受影响，便积极投入狂飙突进运动的洪流，成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34 页。

狂飙突进文学思潮的领导者。这一时期，歌德的代表作是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



歌　德

《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是歌德的成名作。葛兹原是16世纪德国的一个没落骑士，他曾一度参加农民起义，后来又背叛了起义。但歌德剧本中的葛兹却完全是一个理想化了的人物，是一个与诸侯作战、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他参加了农民运动，被拥戴为领袖，后来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在狱中高呼“自由啊！自由”的口号而死去。这个悲剧式英雄形象，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革命精神。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①]。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发表，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反响，很快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歌德也随之名扬四海。这部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鲜明地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市民阶级的思想情绪。小说主人公维特是18世纪德国进步青年的典型形象，他思想敏捷，才华出众，热爱生活，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但他所生活的环境却是一个令人痛恨的腐朽社会。公使馆里的繁文褥礼，上司的无理挑剔，使他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森严的等级，贵族的傲慢无礼，更使他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不可遏。他的才能招来市民的妒恨，他的美好理想招来人们的非议。维特与周围的现实格格不人，孤独而愁闷。看到贤淑、善良的绿蒂，他仿佛在久行的沙漠中看到了绿洲。然而他与绿蒂的爱情也化为泡影。绿蒂屈从传统观念，嫁给了庸俗官僚亚尔培。事业的失败，爱情的破灭，使维特感到自己"像只木偶一样在被人玩弄"。他万念俱灭，以自杀了此一生。小说通过维特和绿蒂的爱情悲剧和维特不幸的社会经历，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揭露和批判了正在衰亡的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和虚伪。这部作品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受到了青年们的狂热欢迎，形成了"维特热"，有人甚至学维特而自杀。歌德怕人误解了他的作品，引起不良后果，劝导青年们"做个堂堂男子而不步维特的后尘"。恩格斯说这部小说"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①。但维特的反抗是消极的、软弱无力的，他的自杀是他憎恨社会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1775年11月，歌德去魏玛宫廷任职，这标志着歌德脱离了狂飙突进运动，也标志着他青年时代的结束。魏玛以后，歌德又创作了最重要的代表作诗剧《浮士德》和其他杰作。1832年3月22日，这位德国最伟大的诗人，负有盛名的世界文学巨匠病逝。

席勒（1759—1805）是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和美学家，主要成就是戏剧。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他是和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文学家。这一时期，他的成名作是《强盗》（1780）和《阴谋与爱情》（1783）。《强盗》主要描述贵族青年卡尔·穆尔与家庭发生矛盾，投身绿林为盗，杀富济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9页。



席 勒

除暴安民，改造社会的故事。剧本歌颂这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①，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青年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精神。剧本第二版的扉页上，席勒写上了“打倒暴虐者”的口号，并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的话：“药不能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这充分揭示了反对封建暴政的主题。此剧上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阴谋与爱情》是席勒的代表作，它比《强盗》更成熟，更富有现实的批判精神。剧本描写贫穷的音乐师的女儿露伊斯和宰相瓦尔特的儿子斐迪南的爱情悲剧。斐迪南冲破门第观念，为了真挚的爱情，不顾社会地位的悬殊追求平民少女露伊斯。然而，斐迪南的父亲为了满足权欲，迫令儿子与公爵的情妇结合，并制造阴谋，使斐迪南怀疑露伊斯不忠。斐迪南中计，因绝望而毒死心爱的恋人，自己也服毒自尽。露伊斯死前说明真相，斐迪南追悔莫及。这一对真挚的恋人成了宫廷阴谋的牺牲品。剧本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尖锐对立，愤怒地抨击了德国宫廷贵族的专横、残暴和荒淫无耻，热情地赞美了市民阶级的道德尊严，表达了市民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恩格斯曾称颂《阴谋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①]。

二　造型艺术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艺术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18世纪法国启蒙艺术家，创造了艺术的新格调，引导了艺术的新潮流，为启蒙艺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1．绘画

自称为“太阳王”的法王路易十四，是欧洲君主专制政体中最有权威的皇帝。他所崇尚的艺术是与他的严肃、紧张、繁琐的宫廷礼仪所规范的生活模式相适应的古典主义风格。他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五胸无大志，不理朝政，沉缅于醇酒美人之中，于是路易十四强大的王权统治下的庄严宏伟的古典主义艺术开始为享乐主义的罗可可艺术所取代。

“罗可可”一词由法语而来，原意是“贝壳装饰”或“岩状装饰”。这个词用到艺术上原本是对罗可可艺术纤细温柔的嘲笑和鄙视，所以时而称之为罗可可，时而称之为“蓬巴杜式”。蓬巴杜是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罗可可艺术流行于18世纪路易十五时代，故又称为“路易十五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始于巴黎，不久便被法国和全欧洲所接受，并遍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3页。

工艺装饰、室内装饰、绘画、音乐、雕塑和建筑等艺术领域。

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绘画，被称为罗可可式的艳情艺术，它以表现上流社会的享乐生活和优雅女性为反映对象。女性化的审美趣味左右着法国沙龙和路易十五的宫廷，美化女性成为当时独领风骚的艺术时尚。这一绘画风格表现出明显的娇媚浮华、缺少精神内容及缺少深刻性。罗可可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华多、布歇和弗拉戈纳尔。华多（1684—1721）是法国罗可可绘画风格的奠基人，擅长描绘贵族们的宴饮游乐、谈情说爱、歌舞弹唱。布歇（1703—1770）是罗可可绘画中最合贵族享乐口味的艺术家，深受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巴杜夫人的推崇，并成为宫廷首席画家。继布歇而起的弗拉戈纳尔（1732—1806）也是宫廷贵妇们很欣赏的画家。他更善于表现实际生活中贵族男女们的风流艳事：舞会上，一位少妇溜到侧室里与情人仓促间接吻；花园里，浮华少年藏在树丛下偷看小姐荡秋千；青年贵族用梯子爬到阳台上与心神不安的少女幽会……。

法国启蒙思想家猛烈抨击了娇柔造作的罗可可艺术。狄德罗在《论绘画》和官方举办的沙龙展览会的评论中，对以布歇为代表的颓靡的贵族艺术进行了无情批判。他写道："我敢对布歇说：'如果你的作品是专给十八岁的不良青年看的，你就画你的女人奶头和屁股吧！但是，尽管人们把你摆在展览会最引目的地方，我们还是不屑一顾的。'""我敢说，高雅、正直、真纯、朴素等观念，对他几乎已经是生疏的了。"狄德罗对布歇的批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审美观点上与没落贵族的尖锐对立。启蒙思想家批判罗可可艺术远离大众，缺乏真情，主张用艺术反映普通人的生活，以理性



布歇的弟子弗拉戈纳尔的作品《秋千》

代替感官刺激，在法国兴起了向荷兰大师的风俗画和静物画看齐的新时尚。在这个艺术的新趋势中表现得最杰出的画家有夏尔丹和格瑞兹等人。

夏尔丹（1699—1779）以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著称，是18世纪法国艺术界技艺高超、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他善于在平凡中发现美、表现美，以精细的观察和虔诚的态度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和朴实无华的静物。他的《午餐前的祈祷》、《痊愈》、《小孩和陀螺》和《洗衣妇》等一系列被上层社会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普通形象，真切地反映了第三等级心灵深处的天地。他的这种朴实、真挚和严谨的画风与罗可可艺术已大异其趣，因而赢得了狄德罗的高度评价。



夏尔丹作品

格瑞兹（1725—1805）是最受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赞赏的画家。他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试图借助绘画宣扬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开创了风俗画的新格调。他以严谨细腻的画风描绘了许多从伦理道德方面劝诫和鼓励世人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打破的水壶》、《农村新娘》、《女孩和死鸟》、《少女的脸》等。

大卫（1748—1825）是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古典主义”艺术的重要代表。在18世纪末期，法国封建王朝已摇摇欲坠，大卫的《荷拉斯之誓》、《处决自己的儿子的布鲁图斯》等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起了鼓动革命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画的展出与博马舍的喜戏《费加罗的婚礼》的



大卫《马拉之死》

上演，同样是呼唤革命的重大事件。大革命爆发后，大卫又成了美术界的旗帜，而且，由于“他把古典艺术和崇高的道德价值组合在一起，很适合于表达革命的政治理论”①，所以有人又把以大卫为首的新古典主义称为“革命的古典主义”。大卫的画风与罗可可艺术形成鲜明对照。

① 《剑桥艺术史》，第2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2. 雕塑和建筑

18世纪法国流行的建筑风格是罗可可式。罗可可建筑以精致的私邸、别墅代替了过去气魄宏伟的宫殿和教堂，用细长小巧的柱子楼梯替换粗大的柱台和楼梯，处处体现出方便、舒适和实惠的特点。在室内装饰和陈设上，起初饰以贝壳、石子，以后添上涡形花纹和千变万化的花草纹，多选择艳丽而富有光泽的色彩，喜欢采用弯曲线条和圆润的转折，还用温暖舒适的护墙板取代冷冰冰的大理石。罗可可建筑柔媚、纤巧、亲切，特别适宜于家庭居室和日常生活。罗可可建筑的代表作有凡尔赛的小特里安努宫和巴黎苏比斯府的公主沙龙等。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著名的雕塑家是乌顿（1741—1828)。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艺术家，不但是18世纪法国，也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整个西方雕塑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以名人雕像为主，作有“伏尔泰坐像”、“华盛顿立像”、“卢梭像”、“富兰克林像”、“莫里哀像”等。这些不朽的形象，不仅充分显示了乌顿积极进取的人生理想，也是肖像艺术领域的杰出典范。为法国大革命播下种子的哲人卢梭，晚境很凄惨。但在卢梭去世的第二天，乌顿即赶到他床前翻制了面型，并据其面型立即创作了生气蓬勃、目光犀利、充满热情的卢梭胸像。罗丹赞美这座塑像是卢梭自传《忏悔录》的“最好的注解”。1778年，年逾八旬的伏尔泰归国，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乌顿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在极短的时间为这位病弱的老人成功地创作了头像、胸像和坐、立的全身像。其中尤以伏尔泰的全身坐

像最完美。乌顿也因此而名扬四海。

三　音乐艺术

音乐是通过有序排列的乐音来塑造形象，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陶冶人的思想情感，升华人的审美境界的艺术。在艺术的长河里，音乐与其它姊妹艺术的发展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古代音乐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进入中世纪，宗教音乐独霸乐坛；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世俗音乐长足发展；17 世纪，巴赫和亨德尔把“巴洛克音乐”推向了高峰；到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所孕育的古典音乐应运而生，音乐天才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名扬天下；19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独领风骚，舒伯特、柏辽兹、肖邦、李斯特、瓦格纳、柴科夫斯基等一批卓越的音乐家轰动世界；20 世纪是欧洲音乐的新世纪，各种新的思潮和流派纷呈斗艳，“印象主义音乐”、“表现主义音乐”、“象征主义音乐”、“结构主义音乐”、“立体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十二音音乐”、“未来主义音乐”、“超现实主义音



海　顿

乐”、“存在主义音乐”、“唯美主义音乐”、“偶然音乐”、“新古典主义音乐”、“具体音乐”、“空间音乐”、“电子乐”、“爵士乐”、“摇滚乐”等使现代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局面。一部音乐史，就是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发展音乐文化的艰苦创业史。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所孕育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在西方音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乐派是因其主要大师均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度过了他们创作的成熟期而得名。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海顿（1732—1809）、莫扎特（1756—1791）和贝多芬（1770—1827）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汲取德、奥、意、法、英各国先辈作曲家的创作经验，谱写了深刻内容和严谨形式高度统一的各种器乐和声乐作品，使音乐从题材、内容到形式、风格等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欧洲的18世纪，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正是这非凡的时代造就了一批不凡的音乐大师。他们真诚渴望成为与大众“自由交谈”的资产阶级艺术家。古典乐派作曲家们的作品表现出反对封建等级观念，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理性”，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歌颂生活、赞美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特征。海顿的《逃兵》、《创世纪》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等都体现了作曲家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对社会生活的新认识、新态度、新追求。著名神童作曲家莫扎特是在旅途演出中成长起来的。在他游历各国的奔波中，贫困使他愈加接近被压迫的“第三等级”，成为具有启蒙主义色彩团体“共济会”的重要成员。他改编谱写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闪耀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深受人

民欢迎。莫扎特曾说："生活苦难压不垮我。我心中的欢乐不是我自己的，我把欢乐注进音乐，为的是让世界感到欢乐。"

世界音乐大师贝多芬，早年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形成了进步的艺术观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1789—1794 年的法国革命激起了他的满腔热情。起初，他把拿破仑当作摧毁专制制度、实现共和理想的英雄。1804 年，贝多芬在法国驻维也纳大使柏纳多特的授意下，为拿破仑谱写了《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并在漂亮的抄本上写上献词。但在大使将要送往巴黎的时候，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传到维也纳。贝多芬闻悉后怒气冲冲地叫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现在他也要践踏人权，以逞其个人的野心了。他将骑在众人头上，成为一个暴君。"说着，走向桌子，抓住标题页的上端，随手把它一撕为二，扔在地板上，不许别人把它拾起来。爱憎分明的贝多芬对王公贵族十分蔑视，他曾说："公爵之所以为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贝多芬之所以为贝多芬，则全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洋溢着革命英雄气概。他的第一交响曲的四个乐章昂扬激奋，荡气回肠，表现出在法国革命影响下的民主热情。第五交响曲世称"命运交响曲"，是人民群众向专制暴政进行英勇搏斗的战歌和凯歌，表达了"通过斗争，获得胜利"的信念。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创作的顶峰。它气势恢弘，有交响乐队、合唱队、重唱和独唱，是一部具有哲理性和英雄气概的颂歌，表现了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该作品不仅第一次在交响曲中加进了合唱，它的宏伟的构思和开浪漫主义先河的表现手法，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启蒙思想出现在18世纪，但其影响广阔而深远。它不只对政治、经济、道德等发生了深刻影响，它所感召的作曲家，直至今日仍闪烁异彩，有力地促进了欧洲音乐文化的发展。



第五章 “教育万能”——启蒙时代的教育

●资本主义教育的形成

●新教育体系的构想

●启蒙时代教育评说

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

——卢梭

启蒙思想家都极为重视教育。他们把教育视为启迪愚昧、发展理性，培养一代资产阶级新人的重要途径。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构建的“理性王国”的教育新体系在西方教育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　资本主义教育的形成

在启蒙运动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英国，还是正在为夺取政权作准备的法国，教育都被教会控制着，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教育的世俗化、科学化和国家化的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新教育的形成。

1.17和18世纪的英国教育

英国近代教育经历了从神学化到世俗化、科学化和国家化的演变。中世纪的英国教育是贵族及僧侣的一种特权，由天主教会控制，国家不问教育。“教会办教育不是因为教育本身是好的，而是教会发现，不给信徒特别是不给教士以学习圣经和履行宗教职责所要求的过去那种文化，教会就不能

做好自己高尚的工作。"① 所以，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教养"的神职人员。这种教育带有明显的反古代教育的特征，大大摧残了欧洲的古代文明。

1534年宗教改革后，英国教会改为英国国教，摆脱了罗马教皇的统治，英国国王成为教会首脑，集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于一身。从此，英国办学校、领导与管理教育的权力又基本上属于国教教会。但是，教会学校的主要办学资金，多数来自捐献，捐献者一般都是行会、工商业者和有一定教育思想的人。他们往往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扩大教育范围，增设实际应用课程，这就使教育出现了向世俗化转变的新趋势。在詹姆士一世和查里一世期间，统治者为了壮大国家实力，也开始重视科学技术，鼓励发明创造，教育的世俗化趋势更加明显，教育的目的从培养牧师和神学者逐渐转向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人才。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启蒙运动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和科学化。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人文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教育思想，影响并造就了英国许多杰出的近代教育家。如弥尔顿(1608－1674)、洛克（1632－1704)、亚当·斯密（1727－1790）等人，他们强烈抨击旧式的教会教育，主张实现教育的世俗化，认为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让学生用七八年时间去啃拉丁文和希腊文，乃是"浪费学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主张在校学生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学习实际知识与技能，使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①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98－99页。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操作，工厂制度在英国普遍地建立起来。工业技术的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广大劳动群众子女接受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和劳动技能。这就促使英国教育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即一方面推动了教育面向社会生产、面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化进程；另一方面促使英国于19世纪初开始出台国家直接管理教育的措施，逐步实现了教育的国家化。

下面就英国17、18世纪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加以概述。

初等学校教育。16世纪宗教改革前，天主教会为了向下层社会灌输宗教迷信，在教堂里附设读经班或唱诗班，收容穷苦儿童。英国国教建立后，原来附设于天主教会中的那些学习场所一律关闭，改由各教区的国教教会负责教贫苦儿童读《圣经》条文，传播宗教知识。从此渐渐产生了一些比较简陋的教区学校。这是英国初等教育的雏形。1662年国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教师必须忠于国教，初等学校的一切权力属于教会。1699年和1701年国教先后成立了"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国外福音宣传会"两个教会团体。它们为了宣传教义，为穷苦儿童设立了不少教会学校。到1750年，"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办的学校竟达1600余所。英国国教会开办教区学校不久，各地纷纷仿效，慈善家竞相解囊办学，成为一时风尚。这类学校总称为"慈善学校"。所有这些由教会、民间慈善团体开设的初等学校，教学设备和师资状况普遍很差，上层社会的子弟基本上不入这种学校。1760年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不仅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也促进了初等教育迅速而广泛的发展。从18世纪后期起，

形式多样的初等学校如雨后春笋，19世纪上半期，还出现了国家创办的初等学校，初步形成英国资产阶级国民教育体制。

中等学校教育。英国在封建社会就有中等教育。产业革命前，英国的中等学校基本上仍是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文法学校和公学。文法学校是中世纪出现的最有特色的中等教育形式。它注重古典语言和文法的教学，使用拉丁语，以满足上层社会职业（如医师、法官、辩护士）以及一般乡绅秘书等的知识需要。文法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升入牛津和剑桥大学，一部分成为一般官吏、医师、法官和教师等。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文法学校也得到相应发展。它的培养对象从原来的贵族、僧侣子弟扩展到大工业家、大商人，绅士等阶层的子弟，也有少数比较贫穷的工人子弟进入文法学校学习。文法学校至今仍然是英国的主要中学之一。所谓“公学”，实际是一种学费高昂的寄宿制私立学校，以培养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为教育目的。公学特别注重古典文学及宗教课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发展，公学虽对学生的身份限制放宽了，但财富限制却有增无减，实际上是贵族、大资本家及富人子弟的学校。产业革命以后，原有的中等教育已不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政府加强了中等教育改革，要求文法学校和公学改革宗教教学，削减古典科目，增设自然科学及外语课程，以培养适应现代化需要的资产阶级新人。与此同时，许多由团体集资兴办的私立中等学校也发展起来，这类学校注重教授工业、商业知识，以满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高等学校教育。大学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独特的创造物。17至18世纪末，英国的高等教育依然以中世纪建立起来的

古典大学为主。英国著名的古典大学牛津大学创建于1168年，剑桥大学创立于1209年。最初，它们都是由城市中的学者与学生团体组织而成的学术机构，不久便由教会控制。能进入这两所大学的学生主要是上层社会青年，资产阶级革命后仍然如此。其教学内容以神学和古典学科为主。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培根的唯物论哲学和牛顿的数学、物理学成就对改变英国大学教学内容有一定的影响。牛津和剑桥大学开始设立自然科学讲座，牛顿曾担任过数学讲座的教授。进入19世纪以来，产业革命的发展，给英国带来了文化科学上的繁荣。大学普遍要求开设新课，出现并形成建立新大学的思潮。1836年创办伦敦大学。随之，地方大学也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

2．启蒙时代的法国教育

17和18世纪的法国教育，基本上是教会控制下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在法国教会团体中，天主教耶稣会的势力最大。它在全国各地开办了许多中学和大学。耶稣会的办学宗旨极端保守，但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吸引了大批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子弟入学。17世纪中叶，仅巴黎主教管区，耶稣会就有1.4万名学生；到该世纪末，耶稣会除大学外，有621所中学。从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中叶，法国专制王朝实行严酷的思想统治，尊崇耶稣会，排斥其它教派，使耶稣会基本控制了法国的学校教育。

1611年创立的基督教“圣乐会”，是天主教的一种教会团体。圣乐会主要致力于中等教育，为培养贵族子弟和牧师开办了许多中学，1626年在法国已达50余所。圣乐会成员

深受笛卡尔理性主义影响，因而在教育上尊重人的理性，注重科学知识；反对机械训练，重视启发思考，发展个性；提倡鼓励表扬，不用恐吓与体罚。这与耶稣会的学校形成了鲜明对比。1773 年耶稣会被解散后，圣乐会代替耶稣会主持法国中等学校。它的教育活动一直继续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圣乐会对于促进法国中等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的冉森教派信徒中有许多学者和作家受笛卡尔思想影响很大，他们不仅从事宗教改革，进行学术研究，还热心教育事业，开办初等学校。他们反对耶稣会教育对儿童的横加压制和滥用惩罚，要求教师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学生。在学习内容上，反对单纯注重古典的拉丁语，主张以学习本民族语言和近代语言为主，同时要学习数学、地理和历史。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死记硬背，注意采用实物教学和进行练习，注重发展智力。这些都表现出西欧进步教育思潮的倾向，也符合资产阶级正在竭力争取发展资本主义教育的趋势，也是法国初等教育上的一种进步。但这种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在开办 20 余年之后，到 17 世纪 60 年代被耶稣会派封闭。

天主教会为了与新教派的办学活动相抗争，于 1682 年成立了“基督教学校兄弟会”。兄弟会开办了免费初等学校，其目的是使贫民子女笃信天主教，同时促使新教徒的子女改信天主教。学校的主要课程是宗教、礼仪、读、写、算，然而繁冗的天主教仪式活动竟占据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基督教兄弟会的学校发展很快，到 18 世纪末，在法国已有学校 122 所，学生 3.6 万余人。在 17、18 世纪，兄弟会对于普及平民初等教育起了促进作用。

17、18 世纪的法国大学仍由天主教掌管。因而宗教改

革运动以后，大学排斥新教徒的情况更为普遍。自 1638 年起，大学就不给新教徒颁发学位证书。在新旧教派、进步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法国的大学极力对抗和扼杀进步思想。如 17 世纪下半叶，巴黎大学禁止使用笛卡尔的著作；卢梭的《爱弥儿》一出版，便被巴黎大学神学院宣布为禁书，当众焚毁。在当时的大学里，只有新设置的一些自然科学讲座，反映了文化科学上的进步。

在 18 世纪，天主教会控制教育的现象不断受到批判，特别是该世纪后半期，出版了许多抨击经院主义教育的著作，其中拉·夏洛泰（1701 - 1785）的《国民教育论》（1763）颇具代表性。他批评教会主办和控制的学校只教古典的拉丁语和进行宗教教育，不能为国家培养善于从事实际事务的有用人才，因比极力主张由国家办学校，提倡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拉·夏洛泰的教育思想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教育改革方案的先声。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尖锐地批判了教会控制的腐朽的封建教育。狄德罗和爱尔维修力求政府取代教会兴办学校，刷新教育内容。卢梭则大声呼吁，要求世人热切关怀教育这桩无比重要的大事，并痛斥当时教育的惊人荒诞，提出根本改造封建教育的任务。他们反封建的教育思想，对法国新兴资产阶级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1789 - 1794 年的法国大革命，给法国文化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法国资产阶级积极改造封建的旧教育，逐步建立起符合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教育制度，实现了教育史上

一次伟大的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先后执政的资产阶级各党派都十分重视国民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资产阶级特色的教育方案，其中孔多塞、雷佩尔提和拉瓦锡的教育计划最有代表性。



孔多塞

孔多塞（1743－1794）是一位哲学家和数学家，是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一。1792年4月，他提出由国家兴办世俗性学校的教育计划。他认为教育是把人民引向康乐幸福的重要手段，搞好国民教育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家应担负教育儿童以及成年公民的责任，建立起包括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中等学校和专门学校（大学）的学校教育体系。各级学校教育应是世俗的、免费的，对男女青年应一律平等。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废除传统的宗教教育，代之以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规范，讲解宪法和《人权宣言》，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他反对教学上的古典主义倾向，重视科学知识的价值，认为学校教育应给数理学科以优先位置，因为数理科学的进展与普及是促进工业革命及发展智力最有效的工具。孔多塞教育计划的基本精神，对19世纪法国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的雷佩尔提（1758－1793）于1793年拟订了一份比较重视解决实施普及教育的物质保

证问题的计划。他认为让贫苦的儿童受教育，首先要给他们面包。他建议，由国家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开办寄宿学校，向儿童提供免费的衣食，从而保证普及初等教育。雷佩尔提计划对体育、德育、智育和劳动教育给予足够重视，认为学校应通过广泛的知识教育，组织儿童参加农业和专设的实习工场的劳动，学习《人权宣言》和法国革命的历史故事等内容，把儿童培养成为身体健壮、热爱劳动、遵守法律和具有文化知识的共和国公民，真诚的爱国主义者。雷佩尔提的教育计划于 1793 年 7 月向国民公会提出，受到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这个计划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革命性。

在雷佩尔提起草教育计划的同时，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受一些议员之托，拟订了一项在学校中进行工业教育和传播技术知识以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教育计划。他强调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振兴工业、富强国家的必要条件；科学研究是提供民族工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的必要手段。他主张进行广泛的知识教育，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并在其教育计划中论述了各种科目对于发展工业生产的意义和作用。在他的计划中，还包括由国家组织广泛的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自然科学以推动工业生产发展的内容。

1793 年 12 月 19 日，执政的雅各宾派通过了一项《公共教育法》。该法令确定了普通教育公立、免费的原则，提出了对教师的政治要求，强调学习《人权宣言》和宪法的必要性，同时主张将接受完初等教育而不务农的毕业生的职业训练列入国民教育计划。

上述教育计划与法令，在当时共和国与国内外级敌人紧张激烈斗争的条件下，是难以付诸实施的。但是，这些计划及法令的基本精神的传播，使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更加

深入人心，对法国以至欧洲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新教育体系的构想

英国著名学者博伊德和金合曾写道："思想的积极和行动的迟缓形成鲜明的对比，是17世纪整个欧洲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其随后一个世纪变得更加明显。"① "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教育机构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理论领域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却弥补了它在实际改革上的不足而有余。毫不夸张地说，所有指导教育新发展的基本思想都是从沸腾的法国生活中产生出来的。"② 这就深刻揭示出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教育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教育的"实际改革"和"行动"迟缓，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却硕果累累，灿烂辉煌，为根本改造教会控制下的封建主义旧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新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伏尔泰、爱尔维修和狄德罗就是构建资产阶级新教育体系的杰出代表。

1. 洛克：绅士教育

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

①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第278、281－282页。
②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第278、281—282。

家和教育家，是杰出的启蒙大师。在近代教育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绅士教育"理论，为英国新兴资产阶级教育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在1693年出版的名著《教育漫话》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绅士教育思想。

洛克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他在《教育漫话》中一开始就指出："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①]因此，他要求英国的资阶级必须使自己的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认为这不仅是"一般做父母的人的责任"，而且"国家的幸福与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洛克关于人之千差万别取决于教育的论断，显然片面而过高估计了教育的作用。但这一思想在当时却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为资产阶级要求政治平等、教育民主提供了理论依据。

绅士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绅士"。洛克认为绅士必须具有四个特质："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②]他说，"绅士需要的是事业家的知识，合乎他的地位的举止，同时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使自己成为国内著名的和有益国家的一个人物"，成为"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为了达到这样的教育目的，洛克首次把教育内容划分为体育、德育和智育三大部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一是体育。洛克认为体育最重要，理应放在优先地位。他指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健康的精神寓

---

①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下同），第4、119页。

②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第4、119页

于健康的身体”。对于一个绅士来说，“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要能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他还认为，“身体强健的主要标准在能忍耐劳苦”[①]。据此，他坚决反对上流社会对儿童的娇生惯养，主张儿童自幼开始就锻炼身体。洛克还根据他的医学知识，拟订了一个锻炼儿童体格的体育保建制度，对儿童的衣、食、住、行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洛克的体育论对当时那种无视身体健康，忽视体力锻炼的经院主义教育传统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二是德育。洛克认为，体育之后，当属德育，没有德育就没有德行。他从功利主义出发论述了培养德行的重要性，指出：“我认为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各种品性之中，德行是第一位，是最不可缺少的；他要被人看重，被人喜爱，要使自己也感到喜悦，或者也还过得去，德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来世就都得不到幸福”[②]，而“德行愈高的人，其他一切成就的获得也愈容易”[③]。因此，他强调要把儿童未来的幸福奠定在德行与教养之上。洛克认为，德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性格，锻炼意志和养成遵守道德纪律的习惯。他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其核心是让儿童服从理性，克制欲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德行的绅士来。洛克的德育论对于抨击封建腐朽道德，批判宗教禁欲主义，培育资产阶级新人，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他把培养上帝观念列入道

① 洛克：《教育漫话》，第23页。
② 洛克：《教育漫话》，第119－120页。
③ 洛克：《教育漫话》，第53页。

德品质之中，表现出反宗教的不彻底性。

三是智育。洛克认为，智育与体育、德育比，居于第三位。绅士教育的智育内容有阅读、写字、图画、国语、文法、外国语、自然哲学、伦理学、地理、历史、几何、算术、天文学、年代学以及一些法律、簿记知识，还有骑马、舞蹈、击剑等。这些智育内容都是针对未来绅士应具有的素质和能力而设置的。他说：读、写、算是为了培养“种种经商处世的本领”；学习文法是为了说话得体，“合乎一个绅士的身份”；伦理学是为了使青年养成“爱好名誉而不爱满足自己的欲望”；历史是“绅士和事业家应该研究的”；学好法律是“从一个保安官一直到总长”都需要的；跳舞可以培养绅士“终生终世具有一种优雅的动作”和“一种丈夫气概”；而击剑和骑马被认为是一个绅士的教养所必备的。洛克精心设计的这套以实用科目为基础的内容极其广泛的知识教育体系，在智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它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渴望和重视占有知识的强烈要求。

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绅士教育的原则和方法。首先是家庭教育的原则。他主张培养绅士只能在家庭里由父亲或聘请优良的家庭教师来进行，反对青少年到学校去受教育。洛克认为，上层子弟进的文法学校是古典主义的，青年绅士“只能学得一点点希腊文和拉丁拉”，不能学到治事处世的胆识与方法；相反，由于“社会上到处流行着粗野与邪恶”，学校是集合了一群“教养恶劣，成份复杂和染有各种各样恶习的儿童”的机关，小绅士去了便会传染恶习，误入歧途。洛克这种强调家庭教育和个别指导，否定学校教育的主张，实际上是对当时教会教育的否定。

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洛克也很有见地。他重视道德教育

的"及早实践"，反对儿童死记道德原则，反对口头说教，主张儿童从小就应该按道德规范去做，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他提出"说理"教育的方法，认为儿童和成人一样，都是"理性动物"，"无论什么应守的德行，应戒的过失，他们无不可以用理说服"。他强调"榜样"教育法，认为在各种教育方法中，榜样是"最简明、最容易而又最有效的办法"，通过榜样，儿童能具体地看到别人行为的优与劣、善与恶，"必能懂得更清楚，印象更深刻"，所以作为教育者的父母、导师要以身作则，给儿童树立良好的榜样。他提倡"荣誉心"教育，认为"尊重与羞辱"对于儿童的心理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如果一个教师能使自己的学生"爱好名誉，惧怕羞辱"就算掌握了教育的一个"真正的原则"，因而主张对学生道德教育时，应多奖励，少惩罚。

在智育教育上，洛克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仍颇有价值的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学首先应启发儿童求学的欲望，激起读书的兴趣，因而教师要寓教于乐，诱发儿童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发问、主动探索。他把锻炼法应用于教学，提出通过对事物的实地考察，通过现实的活动来获得各种知识，如通过地球仪与地图学习地理知识；通过实际的计数活动学习算术；通过了解本国历史、古代法律、当代宪法来学习法律知识；通过旅行，接触较多的人，增长知识和才干。他根据人的知识是从简到繁的特点，强调教学应从易到难，由简及繁，从已知到未知，循序渐进。他针对当时知识教育只重视强记硬背，忽视开发智力的严重弊端，提出智育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发展学生智力。洛克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在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洛克的绅士教育理论不仅对当时英国上层社会子弟的教育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资产阶级各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在西方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洛克作为英国“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在其一切思想中无不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在教育问题上主要表现是，一方面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提出了一个培养实干家的绅士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又为劳动人民子弟拟定了一个旨在加强剥削的“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这个“计划”是洛克在担任英国贸易、殖民委员会委员期间负责制定的。“计划”从劳动人民的子女给社会造成负担，社会“白白养活”他们这样一个荒谬的前提出发，规定在每个教区设立“劳动学校”，强迫所有领取救济金的贫民把3-14岁不能当正式童工的子女送入这种学校。儿童进入学校后父母就不能再领取救济金。这种学校一般附设于工厂，是工厂的一个劳动部门，不学文化知识，只学纺纱、编织和农业操作。儿童作为重要的劳动力，维持着学校的经费，并且“补偿有余”。学校还可通过契约将这些儿童作为“学徒”被雇主所雇。洛克的这一“计划”与他的绅士教育形成鲜明对照，其资产阶级实质昭然若揭。尽管如此，洛克仍然不愧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的许多进步因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卢梭：自然教育

卢梭是18世纪中叶蜚声法国、轰动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他在教育理论上的重大建树，是在教

育哲理性小说《爱弥儿》中创立的自然教育理论。

1762年，被歌德誉为“教师的圣经”——《爱弥儿》问世了。这是卢梭构思20载和撰写3载才完成的不朽之作。他在“序言”中是这样透露其著述意图的：“很早以来就有人在大声反对这种旧有的教育方法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准备提出一套更好的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科学，倾向于破坏的成份多，倾向于建设的成份少。……尽管有许多的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据说，完全是为了有益人群，然而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人忽视了。”[①] 这就清楚地说明，卢梭不只是要竭力砸烂旧教育，而且要积极地为建设新教育设计出理想方案。《爱弥儿》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赢得了巨大荣誉。教育史学家认为，《爱弥儿》是继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最有价值的教育瑰宝，是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宪章。

在《爱弥儿》中，卢梭通过他所虚构的儿童爱弥儿从出生到成人的教育过程，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然教育理论。所谓自然教育，其核心是强调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卢梭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来自三个方面：“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只有当这三种教育能圆满配合，方向一致时，儿童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为此他要求事物的教育、人的教育必须与人们无法控制的自然的教育配合起来，顺应自然的教育。可见，卢梭所说

①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29页。

的自然教育实际上就是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程序进行的教育。

自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自然人"。在卢梭看来，法国封建制度使人道德败坏，人性丧失。因而，他要用"自然教育"去涤荡贵族社会所造成的污泥浊水，培养出"能保持人的本性"的自然人。当然，这种自然人已非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而是社会状态中即现实社会中的自然人。他说："别人要我的学生做军人，做教士，或者做律师，我没有什么意见。……生活，这就是我要教他的技能。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①] 这个"人"就是卢梭在作品中精心塑造的主人公——爱弥儿。爱弥儿就是按照自然教育的目的和要求成长起来的第一个自然人。当爱弥儿年过20岁的时候，"长得体态匀称，身心两健，肌肉结实，手脚灵巧；他富于感情，富于理智，心地是十分的仁慈和善良；他有很好的品德，有很好的审美能力，既爱美又乐于善；他摆脱了种种酷烈的欲念的支配和偏见的束缚，他一切都服从于理智的法则，他一切都倾听友谊的声音；他具有许多有用的本领，而且还通晓几种艺术"[②]。卢梭所描述的这一形象表明，他所要培养的"人"，是与封建贵族及僧侣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新人。显然，卢梭企图从教育目的论上进行革命。

自然教育要求教育的方法也应该是自然的、自由的。这就是要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顺应儿童身心自然发展的特点，防止成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强迫儿童接受教育。卢梭指

①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第9页。
②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第609页。

出，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① 因此，卢梭坚决反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反对封建经院教育强迫儿童盲目服从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威，反对强制灌输传统偏见和呆读死记宗教信条，反对严酷的纪律和体罚。他要求教育者保护儿童的天性，尊重儿童的自由，让他们从生活中、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通过观察取得直接经验，获得有用的知识。这种自然教育的方法与传统的封建经院式教育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卢梭根据他对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的理解，把儿童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并分析了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规定了各个阶段的教育内容。

第一阶段：婴儿期——初生到2岁。这一时期的教育应以体育保建为主，让儿童健康发育。因此卢梭反对用襁褓去束缚婴儿，主张婴儿衣服要宽松肥大，使肢体可以充分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仅有益于肢体的发育和成长，而且也是婴儿的一种学习方式。

第二阶段：幼儿期——2岁至12岁。卢梭称这一时期是“理智睡眠期”，儿童的基本特征是形象思维，认识上只能接受形象，不能形成概念。所以，这个时期除继续进行体育锻炼之外，主要是实施感官教育，使儿童的各种感觉器官充分发育。发展儿童感官的最好环境是大自然。因此卢梭主张从这时起儿童应该离开充满罪恶的城市，到乡村大自然的

①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第84页。

纯朴环境中接受教育。他还为这个时期的儿童安排了游戏、绘画、制图、唱歌等活动，用以锻炼感觉器官。他所设计的游戏是为了发展儿童的触觉；音乐欣赏和唱歌是为了发展儿童听觉；绘画、制图和几何图形的辨认是为了发展儿童的视觉。在幼儿阶段，卢梭强调进行感觉教育，目的是发展儿童感官，丰富他们的感觉经验，让他从经验中学到东西。这无疑是可取的。但是，他又错误地把感觉教育推向极端，否定对这阶段的儿童进行知识训练，杜绝读书；如果儿童已学会读书，那么第一本也是惟一的一本书就应该是《鲁滨逊漂流记》。在卢梭看来，书中主人公的生活和成长正是自然教育精神的体现。

第三阶段：少年期——12 岁到 15 岁。这一时期是实施智育和劳动教育的时期。在智育方面，卢梭认为要选学那些对儿童现实生活有用的知识，即天文、地理、物理、博物、几何以及接触这些知识之前所必备的读写算知识。学习的方法是让儿童通过实地观察，自己发现和解决问题，主动地进行学习。同时，教师要注意儿童的智力培养和学习方法的指导。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① 卢梭对劳动和劳动教育特别重视，把劳动视为每个人的社会义务。他指出："无论贫富或强弱，凡懒惰者，都是窃贼"，都是骗子。劳动可以使人独立生活，只有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他认为通过劳动和劳动教育，不仅可以锻炼双手、培养体力，而且可以促进儿童心智的发展，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 18 世纪上流社会卑视劳动的观念十分盛行的背景下，卢梭响亮地

①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第 266 页。

提出劳动教育，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第四阶段：青年期——15岁到成年。卢梭称青年期为“暴风雨和热情的时期”。青年对外界的欲望已达到“暴风雨”般的狂热程度，需要用道德准绳的约束力量加以调节，指导他们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主要是道德教育，而且要回到都市去进行这种教育。这是由于爱弥儿已在乡村的大自然环境里接受了充分的“自然的教育”，因而不必担心腐化的都市对他产生恶劣的影响；同时，进行道德教育需要了解社会，所以也必须返回都市。德育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博爱精神，培养学生具备善良的感情、正确的判断和良好的意志。德育的方法不是靠道德说教，而要靠道德示范和善良行为的影响。通过观察了解社会，了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培养同情感。通过学习历史、文学和伦理学等人文科学，学会区分善恶，形成善良的感情和正确的判断。通过各种善行训练，养成博爱之心和善良意志。

卢梭在《爱弥儿》前四卷借爱弥儿为主人公，阐述了他的男子教育观；最后一卷通过爱弥儿的未婚妻苏菲的教育，提出了他的女子教育观。卢梭虽然不反对女子受教育，但他关于女子教育思想是保守的。他认为，“女人是特地为了使男人感到喜悦而生成这个样子的”，“女人生来是为了取悦于和从属于男人的”，[①] 因此女子只能充当贤妻良母，接受异于男子的教育。这种教育就是要培养她们贤淑的品质和治家的能力，无需指导她们学习，发展她们的智力。在为民权和儿童的权利而斗争的卢梭的杰作中，竟然如此忽视女权，难

①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第507页。

怪在《爱弥儿》中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受到的指责最多。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在《爱弥儿》问世后11年即1773年，卢梭受波兰政府之邀，赴波兰协助政治改革，起草了《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马克思所说的“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1]，就是指的这份《设想》。其中，专列“教育”一章，阐明了他对共和制下儿童教育的看法，鲜明地提出国家教育论、公民教育论、贫民教育论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爱弥儿》的自然教育论。

首先，在教育领导权上，他明确提出和强调了国家教育论。在《爱弥儿》这本主要阐述教育思想的著作中，卢梭不曾提到国家掌握教育领导权及兴建学校，而是反复论证家庭是理想的教育园地。这和洛克在《教育漫话》中鼓吹家庭教育而贬抑学校教育完全相似。《设想》克服了这一缺陷，激烈反对天主教会控制教育，明确指出公立教育应由国家单独设立的机构领导与管理，它的重要职责就是考核学校校长与教师的工作，并确定其废黜与升迁。他认为，由国家掌管教育的制度，对于共和国的繁荣及未来命运至关重要。

其次，在教育目标上，他明确提出和强调了公民教育论。封建贵族教育一向培养达官显宦；近代教育为国家培养公民乃是新生事物。在大革命风暴即将袭来而资产阶级理性王国即将显山露水之际，教育培养健全公民确是迫切任务。可卢梭的《爱弥儿》却盛倡自然教育，把培养造就自然人作为教育目标。他把自然人和公民截然对峙起来，并竭力否定公民教育，认为自然人先于公民而高于公民。无可否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8页。

“卢梭心目中的自然人，作为旧时代、旧教育的对立面，是跃然纸上而新颖无比的；但作为新时代、新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却是空想”[1]。《设想》克服了这种空想，明确指出共和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培养忠诚的爱国者。因为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必须从儿童幼年起就把爱国主义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他甚至强调，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公民，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最后，在教育对象上，他明确提出和强调了贫民教育论。在《爱弥儿》中，卢梭仅从富贵之家选择学生，有意识地把出身显贵的爱弥儿作为他的教育对象，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说：“贫穷人是不需要教育的，他的生活地位所给他的教育，是他非接受不可的，他不能再有旁的教育。”因而，“让我们从富有之家去选择教育对象”。而《设想》则扩大了教育对象，提倡全民教育，特别强调了贫民教育，指出：按照共和国宪法，公民不论贫富，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国家即使不可能实施免费的教育，也应尽量降低收费标准，使最贫苦的家庭也能支付得起，保证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实现教育的普及。高等学校还应设一定名额的免费生，保证一部分贫穷家庭中的优秀子女也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

综上可见，卢梭的教育思想是划时代的。美国著名学者S·E·佛罗斯特说：“卢梭在教育界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大革命。”[2] 具体来看，自然教育理论的主要贡献和意义在于：

---

① 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人民教育出版实 1984 年版，第 188 页。

② 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5 页。

首先，自然教育否定了腐朽的封建教育，论证了资产阶级启蒙派的教育主张，在抨击封建旧教育和反对封建制度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其次，自然教育开辟了儿童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卢梭第一次把教育的对象即儿童提到了教育的中心地位，并据此提出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儿童教育思想和方法：儿童的身心发展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要以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为依据，以儿童的天性、需要、能力、爱好为基础；教育要重视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行程，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适应儿童的成长和发育；教育要注重儿童的身体的养护、感觉训练、知识教育、道德教育，扩大儿童的教育内容；教育要遵循自然的法则或方法，诸如尊重儿童个性，注重发展儿童智力，重视体育和劳动教育，运用实物教学，实行爱心教育。第三，自然教育理论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促进了法国的教育革命，而且推动了整个欧美教育的改革。正如杜威所说的，卢梭“认定教育应当根据受教育者的天赋，而研究儿童的要求，就可知儿童天才究竟怎样。这种主张非常中肯。我们现在努力追求教育改进，其要点已被卢梭一语道破。卢梭以后的教育改革家无不注重从这个观念出发，去进行研究。”① 第四，自然教育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既影响到与卢梭同时代的德国教育家巴西多（1723－1790）、德国哲学家康德，也影响到19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教育家，如瑞士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746－1827）、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1782－1852）、意大利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1870－1952）和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等。最后，《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

① 杜威：《明日之学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几点设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卢梭的自然教育。它和《爱弥儿》中的教育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资产阶级启蒙派的教育主张，构成卢梭教育思想的全部内容。

当然，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也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理论与实际上的不足。如过分夸大了自然对人的影响作用，否认社会对人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实际上是把社会人生物化了；过分强调了儿童的自由成长，力求超越社会制约而率性发展，必然是“以本能为师”，这就无异于取消教育；过分强调在生活中直接接受教育，造成了忽视系统的科学基本知识的缺陷；让儿童到想像的纯洁无暇的乡村去接受自然的教育具有空想性质，而穷人天性纯朴、不必受教育的观点又导致了对穷人教育权利的否定；关于儿童年龄分期以及德、智、体分段教育的看法存在片面性，将智育期拖得太晚，定得太短，不利于儿童智力的早期培训。然而瑕不掩瑜，对于我们来说，积极地发展卢梭教育理论的合理成份，使之有利于我们的教育实践，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

3. 伏尔泰：“自由人”教育

伏尔泰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和启蒙思想家。他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长期斗争中，十分重视教育问题。在他看来，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于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因此，启蒙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展教育，启蒙愚昧，培养具有“健全理性的自由人”。

伏尔泰终身为自由而战，孜孜不倦地宣传和捍卫自由，所以，他把新教育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健全理性的“自由

人”是合乎情理的。他认为，只有“理性健全”才能成为“自由人”，而只有“自由人”的生活，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真正的人的生活。伏尔泰所说的“自由人”，其实质不过是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科学知识技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哲学家、科学家等。在他设想的范围不大，人口不多的“黄金国”中，就有工程师、物理学家3000余人，这些人就他所理想的新人。

伏尔泰认为，要培养“健全理性的自由人”，就必须消灭宗教狂热和愚昧无知，注重科学知识的学习。因为，宗教迷信是理性的大敌，自由的克星，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引导我们认识自然，了解社会，发展理性，获得真理。所以，伏尔泰对当时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经院主义教育深恶痛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教会控制的学校里，灌输给人们的只是宗教偏见，只是关于“事物的幻象”，使人看不到“事物的真相”，结果破坏了人们善良纯朴的天性，损害了人们的理智。而培养自由人的新教育，则与封建旧教育根本不同。他在《老实人》中写道：“那批卷帙浩繁的神学书”，“谁也不翻的”，人们努力追求的是各种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文学、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在学知识的方法上，他从唯物主义感觉论出发，强调感觉经验，认为观察、实验和实际锻炼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

伏尔泰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要求培养热爱自由、平等的自由人，强调学习科学知识，注重感性经验，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旧教育，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要求。但是，伏尔泰的教育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在教育对象上，他排斥了被他称为贱民的贫民阶层。他认为诸如裁缝匠、洗衣女工、鞋

匠等一类人，只应当干体力活，不必接受教育。可见，他所倡导的普及教育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普及”。在教育理想的实现上，他一方面寄希望于旧制度的推翻和“理性王国”的建立，另一方面又幻想靠“仁慈的国王”来消灭宗教狂热，发展理性，普及教育，这暴露出伏尔泰教育思想的妥协性。

4. 爱尔维修：“教育万能”

爱尔维修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教育万能论者。其教育思想有许多极为闪光的东西。

首先，他主张人的智力天然平等，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爱尔维修继承了洛克的经验论，否认天赋观念，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人的认识，都来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因此，除了病态以外，每一个具有良好感觉器官的人，都拥有同样的认识能力，都可以认识真理，人们在智力上是天然平等的。他说：“凡是构造得同样好的人，都由自然赋予了必要的感官细致程度，足以在数学、化学、政治学、物理学等方面达到最大的发现。”① 爱尔维修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任何天赋差异，这是没有根据的。但他针对当时天赋不平等的封建传统偏见提出的智力平等说，在理论上确认了人人都应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对于冲破封建贵族及教会势力的垄断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他主张教育万能。爱尔维修是广义教育论者。马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00页。

克思曾说，爱尔维修所谈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①。他把环境与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广义教育论。按此理论，人周围的一切事物，人的机遇和处境，都是他的老师。人无处不在受教育，无时不在受教育。他说，人从生到死都在受教育，“我的一生其实只是一场长期教育”。儿童的教育者是他们的感觉，得到多少感觉，他们就受到多少教育。也就是说，“儿童的真正教师是他们周围的对象”。儿童上学以后，仍然接受校外影响和教育，在他们的许多观念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机遇造成的，有一部分是在父亲的家里获得的，是与父母的地位、性格、命运和财产有关的”。成人以后更要接受环境，尤其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教育。由此可见，爱尔维修把人从生到死所受环境的一切影响，包括家庭、学校、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影响，都视为对于人的教育。这就打破了把教育仅仅看作是在学校接受老师教诲的看法，强调要全面而终生地接受教育，广泛地教育人，这是很有意义的。

根据广义教育论，爱尔维修给教育的作用以高度评价，提出“教育万能”论。在他看来，教育是改造人和变革社会的万能手段。首先爱尔维修分析了教育对人的作用。既然人的智力天然平等，那么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什么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呢？他回答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教育所致。”② “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成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9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67－468页。

什么样的人。"[1] 要成为一个坦率、忠诚、勤奋和人道的人，就必须要有良好的环境和教育。爱尔维修甚至认为，即便要使人变得愚蠢，也需要对人进行种种愚蠢的教育。他写道："人生而无知，并非生而愚蠢，甚至非花一番气力不能变得愚蠢。为了变得愚蠢，为了把心里的自然光明扑灭干净，一定要有技术，有方法；一定要有教育在我们心里堆积起重重错误。"[2] 卑鄙、欺诈、恶劣和残暴的人，正是坏的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总之，在爱尔维修看来，"教育是万能的"，是"教育把我们变成现在的这种样子"，是环境和教育造就了人。这种主张对后来的欧洲教育思潮有一定影响。

显然，爱尔维修夸大了教育对人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进而夸大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在他看来，教育是实现社会改革、推动时代前进的惟一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是"意见支配世界"，人的"意见"的改变，只有靠组织起广泛的教育才能实现。通过教育扫除封建迷信和偏见，发展人的理性，提高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就可以改变社会现状，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教育万能论，使爱尔维修在教育作用的问题上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泥潭。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进步要求，具有反封建教会的进步意义。

再次，他反对教会垄断教育，主张国家开办世俗学校。他尖锐地批判了天主教会的罪恶，坚决反对由教会控制与管理学校的做法。他认为，教会既与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

---

① 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476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480 页。

背道而驰，又是科学事业的敌人。教会所垄断的学校教育充斥迷信偏见，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只能使人们既无才能又无美德。爱尔维修感叹地说："一个民族如果把他的公民的教育委托给教皇，这就是民族的灾害。"因此，他认为对"时代和环境已经变了"、"理性的曙光开始显露"的法国来说，必须根本改造学校，坚决排除教会势力对教育事业的干预和控制，由国家开办世俗学校取代腐败的教会学校。实质上，爱尔维修是要求由新兴资产阶级来管理教育，要用资产阶级教育代替封建主义教育。

在爱尔维修所设计的世俗性学校教育方案中，他对学校教育、教学以及管理提出不少有益的见解。爱尔维修斥责当时教育的混乱和无序，认为一切公民的教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以共同幸福为归依"，培养能够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爱国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爱尔维修所大力倡导的"公共利益"，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利益，因此他设计的新教育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理想新人。在教学内容上，主要包括道德教育、知识教育和体育。爱尔维修认为，良好的教育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特别是在当时的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都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显得更为重要。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要以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废除压制个性、宣场禁欲主义的腐朽的封建道德教育，开设传播资产阶级给道德意识的"道德问答"课，培养具有资产阶级道德修养的公民。他还指出，学校要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这些科学知识除天文、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外，还包括文学、历史、政治、伦理等人文科学和哲学，只有熟悉了这些科学知识，才能具备才能和美德。他

还认为，体育工作对培养学生也具有重要意义，健壮的体质不仅有益于公民，也有益于祖国。

最后，爱尔维修的教育学说，还是他直接抨击封建贵族和僧侣的锐利武器。他尖锐地指出，君主们一代不如一代，一个新君主继位，“什么都没有改变，国政依然如故”。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好，“其实，一个常常受着比祖先更坏的教育的君主，有什么理由会更开明呢?”他认为，神学家们道貌岸然，虚伪残暴，原因也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好，由于“满足于经院中的行话，把空名当作实物”，所以使神学们“变得不能分辨胡说与真理”；由于“自幼就养成了行为和思想上假冒为善的习惯”，所以使得主教和神甫们变得“矫情作伪”、“性格卑下”和残忍无比。在爱尔维修看来，只有彻底废除这种坏的教育，重建一种合乎理性的教育，也就是说，只有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才能清除法国社会的污泥浊水，克服社会弊端。这个隐含在爱尔维修教育学说中的革命结论，在启蒙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理论上，爱尔维修将封建统治者腐朽反动的根本原因归罪于教育，把教育视为社会好坏的决定因素，是错误的。

总之，爱尔维修断定天赋智力平等，主张人人享有平等教育权；高度评价教育在人的发展和社会改革中的巨大的作用；反对教会垄断教育，要求世俗势力管理学校；以广义教育论为武器，猛烈抨击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这一切，对当时的法国和后世都发生了巨大影响。

5. 狄德罗的教育思想

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也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甚至夸大了它的作用，认为只要通过教育启发人们的理性，去认识封建专制的罪恶，去扫除人们的愚昧无知，就可以实现社会制度的改变。但他对人的发展的认识不同于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论。他既重视教育，又估什到自然素质的影响。他说，教育确实对人的善恶智愚起着重大作用，但也不能忽视人的天生素质对人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教育并不是导致人们之间差异的惟一因素，只是主要因素之一，教育也并不能创造一切。狄德罗对教育作用的这种必要的限制，较之爱尔维修更接近于对问题的正确解决。

狄德罗有力地抨击了法国的封建教育制度，指出恶劣的社会制度剥夺了广大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使许多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天才被埋没了。教会控制的学校只会使学生厌弃科学，成为宗教神学的忠实信徒，培养不出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才。因此，他要求改革法国的封建教育，实行由国家管理的国民教育制度；呼吁国家广兴学校，实现教育民主，使所有的儿童都能进入学校，接受免费的初等教育，为保障贫穷儿童能够入学，还必须给以物质上的援助。狄德罗关于实行教育改革和教育民主化的主张，不仅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

狄德罗还就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一些有益见解。他强烈反对封建教育的古典主义倾向，认为对古典文化的向往已丧失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意义；相反，使人们把

宝贵的时间精力消耗在诘屈聱牙的拉丁语的空洞无味的文字游戏上。他要求以加强传授科学知识来改造古典主义的中等教育和经院主义的高等教育，主张变革中等学校教学计划，减少古典学科的比重，增加数学、力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自然科学知识，提出创办军事、工程、航海、农业、商业等专门学校。实际上，他是在主张实施实科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他强调加强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创造精神；注重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主张通过"奖励"和"淘汰"制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他坚决反对僧侣当教师，要求教师要具备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一定的教学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以胜任教学工作。

狄德罗的教育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和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促进思想解放，推动18世纪法国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　启蒙时代教育评说

出现于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资产阶级启蒙教育，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从实践方面看，这时期教育仍然被教会控制，资产阶级化的教育改革的实际行动"迟缓"，作用"微不足道"。① 但是，从发展的观点来审视，我们不能低估它的重大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日益发展，推动了教育改革沿着由神学化逐渐向世俗化、科学化和

① 参见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第278、281－282页。

国家化转变，正是在这种转变趋势中包含着资本主义新教育的萌芽，促进了资本主义新教育体制的形成。这一点，从前面对启蒙时代的英国教育、法国教育以及大革命时期教育的阐述中不难看出。

从理论方面看，启蒙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其教育思想文明的累累硕果是与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特别是与洛克和卢梭的名字相联系的，他们为西方近代教育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其主要功绩在于，以启蒙教育为武器，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旧制度和旧教育，给教会垄断的旧教育体制以沉重打击；提出了根本改造旧教育的指导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新教育设计了理想蓝图。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教育体制上，反对教会垄断教育的旧体制，主张建立国家管理教育的新体制。在欧洲的中世纪，教育权完全掌握在基督教会之手。启蒙运动时期，虽然已有私立学校存在，但力量弱小，教育权仍然基本上掌握在教会手中，英国的国教会、法国的天主教会、德国的路德教派都掌握着本国的教育权。然而，随着近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教会垄断教育的旧体制已越来越不合时代的要求。启蒙思想家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在向教会夺取教育权，把教育从培养抽象的个人提高到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的方面立下了首功。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等启蒙思想家痛斥当时法国教育的惊人荒诞，揭露教会垄教育的无穷贻害，抨击旧教育脱离现实生活、不能培养从事实际事务、使国家强盛的人材，主张必须把教育权从教会手中夺过来，由国家统一管理，建立世俗学校，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这些全新的教育观念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接受

并付诸实施，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确立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国家。

第二，在教育目标上，反对旧教育以培养宗教狂徒和达官显宦为目的，要求培养资产阶级的理想新人。启蒙学者猛烈抨击封建教育的培养目标，卢梭尖锐地指出旧教育只能培养出暴君和奴隶，或者培养出集暴君与奴隶于一身的人，或者培养出一些阴险狡诈的人。孟德斯鸠也曾说，专制国家的第一大危害，就是实行奴化教育，这种教育“只是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里，把一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的知识置于人们的精神里而已”，其目的只是为了“培养坏臣民”、“培养好奴隶”。爱尔维修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教育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只宜于造就一批批仅会过寄生生活的宗教信徒和贵族子孙。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变教育目标，培养资产阶级的理想新人。这种“新人”，被洛克称为“绅士”，卢梭名之“自然人”，伏尔泰叫做“自由人”，爱尔维修赞曰“爱国者”。这些理想的新人既不是宗教神学的狂热信徒，也不是贵族豪强和王孙公子，亦非空疏无用的书生士子，而是摆脱了传统的精神枷锁，体魄健康，理性健全，科学知识丰富，道德高尚，勇于追求真理，善于从事实际事务，具有职业技能和自立能力的资产阶级干才。启蒙思想家确立的教育新目标，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和近代教育的必然趋势。

第三，在教育对象上，反对将教育只限于僧侣与贵族子弟，指出必须注重人民子弟的教育，实行普及教育。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中，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对象，实行全民教育，特别强调要关注贫苦儿童的教育问题。狄德罗和爱尔维修都激烈抨击封建的等级教育，痛斥封建制度剥夺了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指出人人都应享有平等教

育权，提倡普及教育。洛克虽然拟定过一个旨在加强剥削的“贫穷儿童劳动学校计划”，但他也顺应时势，呼吁扩大教育机会，使教育由少数贵族的特权变为大多数人享受的事业。这些论述不仅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

第四，在教育内容上，反对教育内容的宗教化和古典化，主张加强和发展实科教育。中世纪的教育是为天国服务的神学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习《圣经》以及与理解《圣经》、传经布道有关的基本知识（即所谓“七艺”），文艺复兴以后虽增添了古典语文、古典文学等人文学科，但却潜伏着另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的危机，由于受教育者都是僧侣、贵族及富有者的子弟，其注定的职业是脱离社会生产的高级僧侣和政治官吏，所以学校一般只重视宗教课程及古典学科的学习，轻视自然科学以及与社会生产相关的其他科学知识。这种情况在启蒙运动时期仍然严重存在着。启蒙思想家针对这种脱离实际生活，背离时代要求的旧教育，强烈主张刷新教育内容，发展实科教育。洛克第一次把教育内容分为体育、德育和智育三大部分，并设计了一套以实用科目为基础的、内容极为广泛的知识教育体系。卢梭彻底揭露了旧教育内容的古典主义的危害性，提出抛弃空洞的文字说教，跳出嚼文咀字的古典教育，呐喊学以致用，追求真正有用的知识，即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社会的知识。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都坚决反对古典主义和经院主义的旧教育，提出要加强各种科学知识的传授，包括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学、历史、伦理、哲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实施实科教育。这一切，不仅顺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潮流，而且初步构建了近代教学论的科学框

架。

第五，在教育方法上，反对经院式的教条主义，提倡行以求知，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中世纪的教育把儿童看作赎罪的羔羊，只要求儿童盲信盲从，因而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只能是死记硬背加棍棒。文艺复兴期间人文主义者提出对人的崇拜，主张培养有个性、身心两健的人，因而在教育上他们注重发展儿童的兴趣与个性，开创了针对儿童身心特点进行教育的先河。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总结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及自己长期的教学经验，提出了直观、循序渐进、启发，量力和巩固五大教学原则，对教育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彻底摒弃了经院式的教条主义的传统教育，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教育方法。洛克关于道德教育的“实践”法、“说理”法、“榜样”法和“荣誉心”教育法，关于智育教学要贯彻“锻炼法”，坚持循序渐进，注重开发学生智力等见解，具有重要意义。卢梭创立了自然教育法，强调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禀性，按照身心发展的自然顺序进行，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在体育方面，他反对贵族家庭的娇生惯养，提倡锻炼。在智育方面，他提倡从现实生活中探索事物的规律而不是死读书；他注重启发儿童的学习自觉性和能动性，反对填鸭式地灌输知识；他主张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征施教，避免拔苗助长；他要求人们利用事物的直观以代替文字说教，等等。在德育方面，他反对清谈空论，强调通过道德示范来培养青年善的品质和善的观念。可以说，卢梭在教育方法上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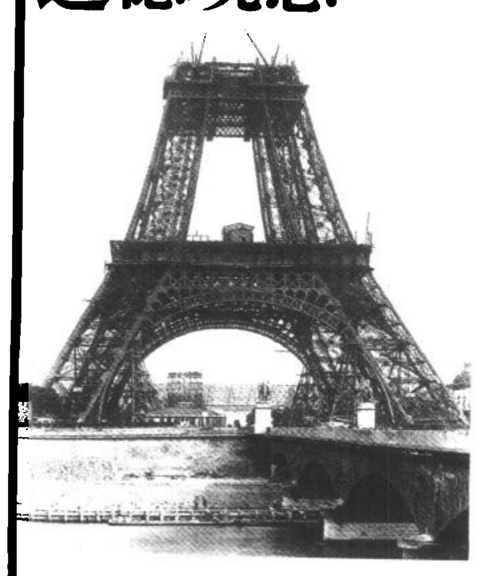
可见，启蒙教育理论宣判了封建教育的死刑，勾勒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远景，预见了教育新时代的来临。然而，启蒙

教育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它具有不可克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实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教育理论，其根本缺陷在于本末倒置，夸大教育的社会作用，妄想在不变革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教育来培植理性，建立起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也根本行不通。因此，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理论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科学教育学的水平。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教育史的基础上，在指导工人阶级为教育权而进行的斗争中，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的客观规律，才使教育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



第六章

“博爱”的光环——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



- 冲破封建宗教道德牢笼
- “理性王国”的道德新秩序
- 功利主义道德评析

一切人类社会的经济都依赖一普遍而单纯的原则：我愿意幸福；但是我和别人一起生活，他们跟我一样，也愿意幸福；让我们寻求使自己、同时也使别人幸福、至少不能妨害别人幸福的方法。我们发现这个原则就铭刻于我们的心中。

——狄德罗

欧洲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要推翻封建主义的旧世界，建立资本主义新世界。在伦理道德领域，就是要砸碎封建宗教道德牢笼，建立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新秩序。“破”为“立”扫除障碍，“立”是“破”的目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以其独特方式完成着这一“破”与“立”的伟大革命，创造着西方近代辉煌的道德文明。

一 冲破封建宗教道德牢笼

新兴资产阶级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不仅要铲除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变革其政治制度，而且要捣毁它的道德王国，彻底埋葬封建主义的和宗教神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道德新秩序而开辟道路。

1. 把人道从神道中解放出来

在欧洲封建专制制度下，神权和王权狼狈为奸，残酷剥削和压迫第三等级。在道德领域，神道和王道臭气相投，扼杀人道，践踏道德，毁灭人性。因此，猛烈抨击神道和王道，把人道拯救出来，就成为启蒙学者的首要任务。

霍尔巴赫说：“社会道德中的第一个道德是人道。人道

是一切其他道德的总体。就人道的最广义说，它就是给我们同类的人的心灵以正义的那种感情。"[①] 狄德罗也认为，"人道是一个对全人类的仁爱精神，……这种品德是其他许多品德之源"[②]。无疑，在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视野中，"人道"是最美好的、最高尚的，是人类道德之精髓。然而，在万恶的中世纪，以王道为代表的封建道德扼杀了它。封建专制制度是泯灭正义、良心、人道的刽子手，是制造恶德、败行、祸害的加工厂。伏尔泰愤怒地指出，在现实社会中，合乎理性的正义和公正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只是强权即正义。在暴君政治下，人们不是当铁砧，就是当铁锤，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卢梭面对世态淡凉，良心贬值，甚至连问路都要付钱的法国，陈词痛斥，疾呼良心。霍尔巴赫无情地揭露说："在现在的世道下，德行，远不能使实践它的人得到安乐，反而使他们时常陷于不幸，……千百种事例可以使我们信服，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德行是被人仇恨、遭人迫害。"[③] 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控诉道，封建制度使真正有道德的人受歧视，而邪恶之徒却高官厚禄、快活享乐，还堂而皇之地戴着有德行的桂冠。拉摩的侄儿愤愤不平地独白："难道你不会像别人那样献媚吗？你不会像别人那样说谎、发誓、作伪证、许诺、食言自肥吗？你不会像别人那样四脚在地上爬着吗？你不会像别人那样帮助夫人跟人私通，并且给丈夫传递情书吗？"但是，他又感到这样做于心不安，认为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2页。

②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下同），第35页。

③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下卷，第78页。

这将“是一切痛苦中最残酷的。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几乎是当时没有生出来还好些”。狄德罗通过拉摩的侄儿这样一个艺术形象，生动、形象、辛辣而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道德。

要摧毁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就必须剥去涂在它外面的那层神圣的灵光，揭穿宗教神学道德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卢梭在《爱弥儿》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道德是骗人的。它宣扬“行事正义，你就可以得福”，然而在现实中坏人命运亨达，而正义的人受苦受难。这使“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良心终于反叛，对上帝发出怨言，它沉痛地喊道：‘你欺骗了我！’”孟德斯鸠尖锐地指出，基督教让人们放弃尘世的生活道德热情，树立热爱和信仰上帝的宗教感情，这就必然淡化人们对亲属、荣誉、公益和祖国的热爱，使国民丧失热爱祖国和法律这一最重要的品德。

僧侣和神学家把宗教与道德联系起来，视宗教为道德的基础。他们宣扬，向往天堂，能使人为善；恐惧地狱，能令人节制；信仰上帝，能弃恶扬善。好像没有宗教，就没有道德，社会就会丧失秩序，人人自危。启蒙思想家们揭穿了这种谎言，用理性解除了道德与宗教的联系，用事实粉碎了道德植根于宗教信仰的谬论。拉美特利和狄德罗认为，道德不建立在信神之上，宗教不是具有美德的保证，如果希望凭借宗教教义来建立道德理论，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爱尔维修通过回顾历史指出，自从基督教在欧洲君主国家建立以来，君主并没有更加英勇、更加有教养、更加人道；爱国者的人数也并没有增加，那么，宗教对道德的好处又在哪里呢？霍尔巴赫以世界各国宗教史的无数事实说明，宗教不是道德的基础，相反，宗教给人们带来分裂、狂暴、罪行和愚昧，宗

教违背人性，毁灭道德。宗教的祭礼要用人作为给神的牺牲品，杀人成为神圣的祭礼。犹太人的神耶和华嗜好鲜血，他的刀和剑饱饮人血。异教人的神丘比特痴迷淫秽，他污辱了好多良家妇女。腓尼基人的神要吃人肉。基督教的上帝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基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霍尔巴赫由此认为，神是“恐怖、狂乱、残酷和不人道的标记”，宗教对于人类道德永远有害。他还据此指出，无神论者最有道德。因为他们遵循自然道德，听从理性召唤，顺乎情感欲望，追求现世幸福，有利社会进步。所以，一个没有任何宗教，受过良好教育的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有神论者的社会将会更为高尚和更为有德。霍尔巴赫这种大胆的预言，这种对宗教道德的公开驳斥，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启蒙思想家还从唯物的感觉论出发，深刻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天赋道德论，肯定道德观念、道德感情以及道德品质都源于经验，是后天的产物，教育的结果。英国启蒙大师洛克对道德天赋说作了最为系统而有力的批驳。他指出，道德原则就像几何定理一样需要解证，只有通过解证才能被人理解和接受，足见道德不是天赋的。其次，不存在全人类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就拿“良心”来说，它随着各民族的环境、社会风尚的不同而截然不同。例如有的民族把老人杀死以减轻生活负担；有的把自己子女养肥了食用等等，这些民族的人不认为这样做是违背良心的。可是，按照现代人的道德观，这则是犯了灭伦大罪。可见，不存在全人类相同的天赋道德观念。洛克还指出，即使有一些人们普遍赞同的道德原则，这也并“不是因为它是天赋的，乃是因为它是有利的”。最后，洛克明确指出，道德原

则同其他一切观念和原则一样，是从经验中获得的，是人们通过后天教育和习俗而得来的。伏尔泰也旗帜鲜明地批判了神学的天赋道德观。他认为，道德是相对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善恶观念、道德标准是不同的，不存在天赋的道德观念。他甚至明确指出，道德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中，与神完全无关，因而道德不能建立在神学基础上。这种批判令人振奋，它铲除了道德的宗教基础和神学根据。

2. 砸碎禁欲主义枷锁

中世纪基督教是以上帝为中心、以天堂和来世为精神寄托、以禁欲主义为道德戒条的一种神学蒙昧主义。它认为只有遵守禁欲的道德戒律，使肉体受苦，才能拯救灵魂，通往幸福的天堂。因此，所有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和神学家，都把禁欲主义作为信条，极力反对和蔑视人们对尘世物质幸福的追求。他们大力宣扬，肉体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罪中，并且既然由肉欲受胎，就都带有原罪”。肉体产生情欲和兽性，由此就产生了罪恶，它玷污了灵魂的纯洁。人的饮食男女都是兽性的冲动，是与生俱来的污点。总之，人的肉体只不过是一个肮脏的、罪恶的“臭皮囊”。所以，人只有弃绝自己的自然欲望，才能赎回自己的罪恶，拯救自己的灵魂。因而在基督教看来，禁欲，使肉体受苦就是德性。霍尔巴赫曾以嘲讽的口吻，对宗教禁欲主义的荒唐理论作过绝妙阐释：“凡人啊！你们生来就是要成为不幸的；你们生存的创造者指定你们要过不走运的生活；那么，顺从它的意旨，使你们自己成为不幸的人吧。打击你那些以幸福为目标的叛逆的欲望；放弃那些出于你的本质要去喜爱的快

乐；不要迷恋尘世上的任何东西；逃开那个只会煽起你们的想像去追求你们应该拒绝的那些好东西的社会；把你们灵魂的动力摧毁；把想要使你们痛苦告终的那种能动性压制下去；受苦吧，忧愁吧，呻吟吧！这对你就是走向幸福的道路。"①

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功利主义为武器，集中火力轰击宗教禁欲主义。拉美特利认为，禁欲主义是违反人性、戕害自己的道德，而与此对立的自然道德则是合乎人性的。因此，这是一种顺应自然欲望的道德，它肯定人的情欲以及一切感官享乐的自然性和道德性。狄德罗提出按照自然情感而生活，认为人的自然感情使人追求感官的快乐，追求自然欲望特别是男女两性结合的自然欲望的满足，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和幸福。但是，宗教道德却剥夺了人的自然感情，使得人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成了一个泥造的塑像。因此，他坚决主张要把封建的严格节欲从美德的目录中抹掉，说再没有比这种禁欲主义"更可笑、更荒谬、更有害、更可鄙的了"。霍尔巴赫指出基督教道德宣扬禁欲主义，要人们自觉自愿剥夺大自然赐给人的各种感官享乐，放弃追求物质利益和现世的幸福，安于贫困受苦，这完全是违反人性的，也是最不人道的。他肯定感官的物质享受胜过千百年来饲养人们心灵的幻影，它是幸福的基础，应予满足。当然，人们应该把"长远的幸福"与"短暂的快乐"相结合，积极追求那些包括精神享受在内的"最能经久的幸福"，而不应一味恣情纵欲，寻欢作乐。拉美特利等人的这些新颖而大胆的论点，在当时犹

①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247页。

如春雷霹雳，把人们从千余年宗教禁欲主义的恶梦中惊醒。

他们还以铁的事实，用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手法，对宗教禁欲主义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入木三分的批判。霍尔巴赫讥讽道，基督教道德把两性的爱看作是万恶之源，照此办理，那么也许妇女只能用耳朵来生小孩了。他还用大量事例揭露了僧侣的放荡淫逸，指出乱搞两性关系是僧侣“神圣”的权利。教士对俗人的妻子有初夜权，他们从姑娘身上抽取什一税。霍尔巴赫还挖苦说，如果丈夫在妻子门口发现有僧侣的鞋子，那就要赶快走开，因为教士为了上帝在拯救他的妻子。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考察了这样一段性病“家谱”：邦葛罗斯得了性病，他是从一位女仆那儿传染来的。女仆的病“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伙伴”。这段“家谱”使僧侣贵族荒淫无耻的丑恶嘴脸和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暴露无遗。

宗教禁欲主义道德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指出，神职“这个禁欲的职业，摧残了许多人，即使瘟疫与最惨烈的战争，也从来不至于如此”。梅叶认为，基督教打着为使人得到天国幸福的幌子，剥夺了人们追求现实幸福的权利；打着使人摆脱地狱苦难的幌子，让人忍受实实在在的地狱般的痛苦。拉美特利揭露道，禁欲主义道德违背自然道德，违反人性，是为反动的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霍尔巴赫愤怒地说：“我们不管在哪里都看到宗教致使世人忧郁，使他们一本正经，使他们逃避喜悦和欢乐，而

且常常使他们采取那种最无趣味、最违反人性的生活方式。”他呼吁人们摈弃宗教禁欲主义，尽情地满足自己合理的欲望。爱尔维修尖锐地指出，宗教禁欲主义道德否定情欲的积极作用，扼杀了人们追求幸福和现实利益的能动性，使整个社会和民族停滞不前，使个人既无幸福又无道德。他因此厉声痛斥道：“不要再顽固地毁情灭欲了，这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原则。”[①] 这些精辟论述，无情地剥开了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道德的画皮，揭穿了它的反动社会作用，也给世人开出了一付沁人心脾的清凉剂。

3．戳穿为道德而道德的谎言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道德王国，必须粉碎一切超功利或反功利的道德说教。中世纪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极力宣扬神学道德论，认为道德与功利无关，只以上帝为本。神学家奥古斯丁就主张，人的德性是上帝赋予的，人只有向上帝忏悔、反省，才能有德性。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说，“美德是我们天赋的本性”，是神的直接启示。他们都把信仰上帝看作是善，把怀疑或反对上帝看作是恶，而且，狂热鼓吹禁欲主义，认为只有灭人欲才能存天理。显然，这是一种反功利主义的道德论。还有一些伦理学家不顾行为的效果是否有利，而单讲动机，宣扬抽象的美德观，认为人为美德而美德，美德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与个人利益和社会无关。这种“为美德而美德”的“超功利主义”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受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88页。

到了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猛烈批判。

爱尔维修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人都自称为了美德本身而爱美德。这一句话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但是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心里。"① 他认为美德之所以受人尊重，因为它对人有利。人们爱的不是美德，而是权力和尊荣。人们把对权力和尊荣的爱当成了对美德的爱。他说："是什么动机决定了隐修士忍受痛苦去断食斋戒，身披忏悔衣，自己鞭挞自己？是对于永恒幸福的希望；他怕下地狱，要想升天堂。"他又说："快乐和痛苦这两个产生修士美德的原则，也是各种爱国美德的原则。对于奖赏的希望使它们产生出来。尽管人们吹嘘自己对它们存着无所为而为的爱，但是，如果爱美德没有利益可得，那就决没有美德。"② 霍尔巴赫也指出，"在这世界上，全然没有利益心的人是绝对没有的"，因而为道德而道德的人也是不存在的。人之所以崇尚美德，并不是为了美德自身，而是因为美德会产生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如果无德不会招致不幸，有德不一定得福，人们就没有理由变成为有德者；纵然对他提出要求，也无济于事。美德不建立在功利之上，它就将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所以，那种"为美德而美德"的抽象道德观是背离人性的，是错误的。

启蒙学者还揭露了这种抽象道德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僧侣教士总把自己装扮成不染世间尘埃、专为上帝拯救灵魂、行善积德的神的化身，然而他们披着神的外衣，却干尽卑鄙龌龊之事。梅叶揭露说，僧侣们劝别人行善以升天堂，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12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12页。

但他们自己却不想用正直的生活和做好事来求得上帝的这种奖赏，反而多行不善，甚至作恶多端。卢梭尖锐地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正义和从属关系这些好听的字眼，往往成了实施暴力的工具和从事不法行为的武器。由此可见，口口声声说是服务他人的上层阶级，实际上是在损他人而利自己”。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以极其辛辣而又尖刻的语言，对贵族与僧侣的伪道德予以谴责和鞭挞。他说，在封建社会里，“一般的道德原则人人乐道，但却没有一个人实行”。其实，动听的封建道德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块遮羞布，是统治和奴役大多数人的工具。

二 “理性王国”的道德新秩序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摧毁了封建主义道德，这就为建立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道德开辟了道路。他们围绕“理性王国”道德新秩序的设计，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人性为根据、功利为基础、利己为核心、博爱为途径的崭新的道德模式。

1. 人性——道德的根据

新道德不是从虚构的神灵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人性为根据。英国启蒙大师洛克认为，人性决定道德原则的实质，道德上的善恶最终取决于人趋乐避苦的天性。因而，能否符合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便是道德的试金石。一

切道德的原则都应当建立在维护和有利于这种人性实现的基础上。狄德罗和洛克一样，也把人性作为道德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封建宗教道德行将就木，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学。这种新兴道德学的基础，就在于客观存在的人性。爱尔维修认为，“我们应当像研究其他各种科学一样来研究道德学，应当像建立一种实验物理学一样来建立一种道德学。”而要使道德学成为这样的科学，就必须先研究人的本性，让人们认识自己，然后才能建立起与经验相符的道德科学。因而，以趋乐避苦或“自爱”、“自保”为核心的感性主义的人性论，便成为爱尔维修整个伦理道德体系的始点和理论基础。霍尔巴赫明确指出，“适合于人的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否则，“不请教人的本性和他同自己同类的真实的关系，就没有道德”。[1] 他认为，人是一个有感受性、有理性的生物。其肉体感受性规定了趋乐避苦或自爱自保是人所共有的不变的人性，而人的理性则可以使人选择最可靠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自爱自保的目的。总之，道德学作为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必须从人出发，以人性为根据。

首先，这是反对神学道德论、建立一种如同自然科学一样严密的道德科学的需要。霍尔巴赫曾尖锐地指出，宗教道德之所以不能使人的道德进步，就是因为它的道德学没有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虚假的、骗人的神秘天国上。什么是真正的道德学的可靠基础呢？在霍尔巴赫看来，这个可靠的基础或根据就是人性。他说：“适合于人的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Respice

①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第319页。

finem（面对你的目的），这就是全部道德学的撮要。”[①] 爱尔维修认为，要建立如同物理学一样严密的道德学，就必须从人的肉体感受性出发，把人归结为自然的人，并用这种自然人取代超自然的神在道德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只有这样，道德学才能从天国回到人间，从神学变为人学。

其次，只有用人性取代神性而建立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现实的幸福。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看来，道德学就是一门“恢复和发扬人的本性”、使人获得幸福的学问。当然，这种幸福决不是宗教道德所宣扬的那种天国的、虚幻的幸福，因为那是虚假的、骗人的、违背人性的。新道德以人性为依据，因而它所鼓励人们追求的幸福是合乎人性的，既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幸福，也有对爱情、荣誉、权力等精神追求的幸福，这是最持久、最实在、最真实的幸福。他们正是以这种人性论为根据，从趋乐避苦的自爱自保的人性出发，推论出道德的功利原则、利己原则和博爱原则，从而建起了一种反对封建宗教道德，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道德新体系。

2. 功利——道德的基础

黑格尔曾在《现象学》中，把功利论说成是启蒙运动的最终结果。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正是力图以功利或利益这个新原则为整个社会，也为社会的道德奠定基础。因此，18 世纪法国伦理思想，无论是在前期启蒙思想家那里，还是在战斗唯物主义者那里，都

①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 88 页。

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功利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创立的新道德的基础。

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是从趋乐避苦的自爱自保的普遍人性中引申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寻求快乐、逃避痛苦的自爱本性决定了人在社会中的道德行为原则，这就是对利益或功利的追求。因为利益是使人能够“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拉美特利从他的感性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生的幸福也就是感官自然欲望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依靠物质利益。因此，追求利益既是实现幸福的途径，也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行为。爱尔维修认为，从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出发，必然逻辑地推演出：“无论在道德问题或认识问题上，都只是利益宰制着我们的一切判断”，利益是道德的动力和基础。[①]

功利或利益之所以是新道德的基础，首先在于它是道德行为的动力。洛克认为，人们对各种道德规则是按其所料到或希望的幸福来理解和接受的。人们之所以遵守道德规则，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会得到利益的，而破坏道德规则就会受到危害。他还说，道德原则的外在约束力决定于是否对人有利。如果道德原则不适用，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人们就会抛弃它。爱尔维修明确指出：“利益是我们的惟一推动力”[②]，“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国家的判断”[③]。他认为，行善或作恶等人类行为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57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37、458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37、458页。

都是由利益所驱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爱尔维修看来，学者埋头搞学问是为了得到荣誉和一个美丽的妻子；守财奴拼命聚敛财富是为了得到一座美丽的别墅；风骚女人照镜子梳妆打扮是为了得到人们的奉承；工匠和农夫辛勤劳动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属，为了打扮自己的情妇或妻子；斯巴达战士之所以勇敢无比，是因为有年轻而美丽的斯巴达女人“奉献在人群中裸体展览，作为给战士们领受的勇敢的奖赏，使青年的英雄们同时享受爱情和名誉的双重陶醉”。简而言之，追求利益和快乐的享受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发动机。霍尔巴赫指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自爱的，所以“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惟一动力”①。“要使人有德行，就必须是谁有德行对谁便有利才成，或者使他发现实践德行的好处。”② 有利是鼓励人实践美德的动力，越对自己有利的道德行为，人越倾向于实现它。

利益是一切道德观念、道德评价的惟一准则和尺度。拉美特利视有用或效用为美德，以无利而有害规定恶习。爱尔维修认为，道德的善恶完全是由利益决定的。利益不同，对事物的评估、态度也就不同，犹如狮子在人眼里是残忍的动物，对于昆虫来说，却只是羊。同样的道理，人类的道德善恶、好坏观念也是同利益相联系的。“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惟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因此，与一个个人相联系的正直，按照我的定义来说，无非就是对这个人个人有利的行为的习惯。”③ 他还指出，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道德判断，

①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273、133页。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273、133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60页。

每个人都把对自己有利的行为称为公正或善，对自己有害的行为称为不义或恶。社会利益支配社会对事物和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凡是有利于社会的事物或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霍尔巴赫强调，道德上的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德行与罪行的标准，就是以对社会有利或有害来决定的。他说："德行就是真实地并且经常地对结成社会的人类有益的一切；不德，就是有害于他们的一切。"[①] 个人的"种种活动，只有当倾向于自己同类们的真实利益以及他在其中生活着的那个社会的真实利益时，才是正当的、善良的和有功劳的"[②]。

应指出的是，在新道德的创立者那里，作为道德基础的功利或利益有着广泛的含义。爱尔维修就曾规定利益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在爱钱上，而是"一般地应用在一切能够使我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上"。从内容来看，它既包括引起人肉体快乐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利益，这是他们所特别强调的，也包括满足人精神快乐的爱情、荣誉、权力等精神性的利益。就主体而言，分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以个人利益为本位，得出利己主义原则，从公共利益来推演，又提出博爱或利他原则。

3. 利己——道德的核心

一位附庸风雅的贵妇人，读了当时法国广为流行的爱尔维修的著作《论精神》后很中肯地评价说，作者是"一个揭穿了一切人的秘密的人"。一名叫圣耶伯尔的资产阶级思想

①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20、203页。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20、203页。

家也说：笛卡尔发现了人，爱尔维修使我们认识了人，他拨开迷雾暴露出人的真面目。那么，一切人的秘密和真面目是什么呢？即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一语道破了爱尔维修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新道德的利己主义本质。

应当承认，启蒙思想家们也很重视利他、博爱，甚至提出以社会利益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利他也好，博爱也罢，都是为了更好地利己。利他或博爱是手段，而利己是最终目的。霍尔巴赫毫不掩饰地说："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爱其他的人，因为他们是他的存在、他的保存、他的快乐所必需的。爱别人，就是爱那些使我们自己幸福的手段，就是要求他们生存、他们幸福，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幸福与此相联系。"[①] 爱尔维修也明确指出："对于别人的爱，在人身上也只不过是爱自己的结果。"[②] 他主张在公益中求个人幸福，以利己为核心，反对牺牲个人利益，认为"那些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癖好和自己的强烈情欲的人，并不是具有美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③]。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本位的利己主义道德观。

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从不同视角，用"自爱"、"自保"、"利己"、"自私"、"为己"等诸种术语，阐明了资产阶级新道德的利己主义的精神实质，论述了利己乃合乎人性、合乎道德、合乎理性的新逻辑。洛克认为，道德上的善恶取决于人的趋乐避苦本性，"所谓善或恶，只是快乐和痛苦自身"。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649—650页。

②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66页。

③ 转引自赫·恩·蒙让：《爱尔维修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下同），第377页。

人作为一个有感性欲望的存在物，必然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快乐对人来说是合乎道德的。所以，人的“自爱”、“利己”之举自然是合乎人性的，是善的。伏尔泰曾这样描述过人的“自爱”的本性：“人人都生来具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倾向，喜爱统治、财富和欢乐，并且对于懒惰有很大的兴趣；因此人人都愿意得到别人的金钱、妻子或女儿，做别人的主人，随心所欲地役使别人，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或者至多只做一些非常对口味的事情。”① 伏尔泰认为，人的这种自爱本性，即使像贪欲等自私欲望也不完全是坏的。他在《哲学通信》中，针对否定自爱的宗教仁爱论指出，人的自爱心是人们联系的纽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没有自爱心，社会就无法形成和继续存在。卢梭在《爱弥尔》中为“自爱”唱了特别赞歌：“人类天生的惟一无二的欲念是自爱，也就是从广义上说的自私。”“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要爱自己，我们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他把自爱、利己看作是人的第一天性，并认为道德上的善和正义都出自自爱。这具有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启蒙作用。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特别是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新道德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狄德罗认为，自利性来自人的感受性，它表现为人的趋利避害。自利“在自然状态中与其说是恶习，无宁说是美德”。正是人的自利本性使他能够维持自我的生存和幸福，而且，只要善加引导，它决不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后果。狄德罗还把个人的利益和快乐作为道德的基础和标准，表现出显明的利己主义特征。霍尔巴赫从感觉主义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91页。

自爱。他说："人从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1] 他还由此认为："决没有哪个人可以称得上是无私心的人；这个名称只是给予我们不知他的动因或是我们赞许他的利益的那种人的。……我们称呼所有把自己名誉的利益看得比自己财产的利益更要贵重的人为无私心的人。"[2] 霍尔巴赫强调，自爱是人所不可缺少的，是它使人一生之中时时刻刻都在寻求幸福，在趋乐避苦中发挥才智。

爱尔维修给人的"自爱"本性唱了最神圣的赞歌。他认为人的永恒的、不变的、共同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私心或自爱。他说："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惟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的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共有的。不管人们的教育有多么不同，这种情感在他们身上永远一样：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3] "人，惟一关怀的是他自己，只寻求他自己的幸福。如果他尊重公道，那是因为他需要如此"[4]，倘若他帮助别人，只是要别人报答自己，是对自己的一种预支。因此爱他人不过是为了爱自己。爱尔维修嘲讽了基督教道德抱怨人的自爱和自私心，宣扬爱别人胜过爱自己的虚伪说教。他指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永远不会为他人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就像河水永远不会倒流一样，这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谁企图阻止利己的潮流，

① 《西方化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75、73页。

②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75、73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01页。

④ 转引自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85页。

那就意味着要驱除春天的狂风、夏天的炎热、秋天的阴雨和冬天的严寒。谁妄想消灭人的自私心，那就是在幻想消灭人性，消灭人本身。因为人从生到死，指导他一生的行动的惟一动力，就是自私心。所谓美德只是挂在每个人的嘴上，并不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在爱尔维修看来，自爱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不仅支配个人的行为活动，甚至能搅动整个世界。他有诗云：

自私心（即自爱）——美德和罪恶之父，
它不停地在各处挖下不幸和堕落的深渊，
形成市民，创立国王，
为人们制定法典；
一再煽起战争和屠杀的火焰，
把地球上搞得天翻地覆。[①]

爱尔维修认为，自爱本性在人身上表现为情欲，即肉体上趋乐避苦的天然情欲，以及追求权力、财富的欲望和虚荣、骄傲、友谊、正义、怜悯等的社会情欲；情欲是精神世界的圣火，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动力。他热情洋溢地歌颂情欲的伟大作用。情欲促使人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情欲引导人们横跨大洋、削山填沟和开凿道路，情欲推动科学技术的发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他痛斥封建的时代扼杀情欲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是人民道德堕落的时代。爱尔维修在充分肯定情欲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指出情欲既可以是一切美德的源泉，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万恶之父。情欲到

① 转引自赫·恩·蒙让：《爱尔维修的哲学》，第99页。

底把人引向美德还是罪恶，在他看来，这不在情欲本身，情欲本身是好的，关键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好坏。爱尔维修从中得出结论：只有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让自爱张扬，情欲光大，才能使人们过上幸福而道德的生活。

可见，利己主义是启蒙思想家创建的资产阶级新道德的核心。但是，这种反映尚处在革命和上升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利己主义，与那种割裂、否定和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极端利己主义截然不同。它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即不仅不否定他人利益、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而且强调个人利益要同社会利益相结合，甚至认为社会整体利益应该高于个人利益，因此这种新道德既包括利己主义，服从利己原则，也内含利他主义，要求遵循利他原则或博爱原则。

4. 博爱——道德的途径

据考证，“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三位一体的政治口号，是罗伯斯庇尔在1790年10月5日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到了1792年9月21日，法兰西宣布为共和国之后，国民公会才把博爱与共和国联系起来，与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而第一次正式列入宪法条文却是1848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①] 但是，“博爱”作为一种伦理思想，早在启蒙学者那里就得到全面阐发。他们在“利己”的基础上，提出了

① 见陈崇武：《论“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博爱”原则。认为按其利己本性，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但个人是社会的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利己的目的，因此，就必须尊重和爱护他人，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一个为自己的利益也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的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就是他们的道德学所宣扬的博爱的基本思想。

英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人本性上固然是趋乐避苦，但人又是一种有理性、有意志的动物。因而人的行动一方面服从着自然感性欲望的驱使，另一方面又受着理性的支配。这就使他们在追求满足和快乐时，不单图眼前暂时的利益和快乐，而是力求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不单注重个人利益，也要重视他人利益。洛克进一步指出，要追求最大而永久的幸福，必须考虑到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结合，这是人的理性本质要求。“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① 因此，在追求个人的利益、幸福时，不能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他说，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时，人要有远虑，有远虑即有德。这种远虑就是要考虑把个人的利益、幸福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幸福结合起来。从长远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并存不悖的，而且，只有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个人的幸福才有最终的保障。洛克以此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念。洛克的这种伦理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伏尔泰认为，遵循自然法的理论，人类生活应以爱为原

①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下同），第6页。

则。他把爱分为两个方面，即爱自己和爱人类。前者是自爱，后者是博爱。自爱和博爱都出自人类自然的本性，是人作为人的本质的表现。但是，博爱是以自爱为基础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有他人的存在，要爱自己就必须爱他人。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断言："正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助长了对他人的爱；正是由于我们相互的需要，我们对人类才有贡献；相互需要乃是一切商业的基础，乃是人与人之间永恒的联系。"正是人们之间互相需要，形成了博爱之心。他号召人们去爱自己的祖国，爱一切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自爱心极其强烈，利己心往往会压倒利他心。如何使两者协调一致，把自爱与博爱结合起来呢？伏尔泰认为这要靠法律、宗教和道德的调控作用。他说，"法律指导这种自爱心，宗教又改进了它"，道德的自然法则调整着它。

卢梭用良心论来解决自爱与仁爱的结合问题，宣扬博爱精神。他认为，怜悯心与自爱心一样，也是一种天生的自然感情，是人人具有的。正是怜悯心使人抑制自己不去做损害他人的事情，不做使他人痛苦的事情，反而使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爱他人，从而产生出宽大、仁慈和人道等一切道德行为。所以卢梭说："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由于它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所以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那么，自爱与爱他人的怜悯心靠什么来调整？卢梭认为靠良心来调节，良心使两者协调一致。"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这是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儿》中对良心唱的赞歌。在卢梭看来，良心使人从自

爱必然走向爱他人，从爱他人走向爱人类。他说："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要爱自己，我们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从这种情感中将直接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同时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所有的儿童都爱他们的乳母……谁有助于我们的幸福，我们就喜欢他。"① 良心使自爱扩展到爱他人，从爱他人又必须扩大到爱人类，所以"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是人类的正义的本原"②。就这样，卢梭在自爱的基础上通过良心把自爱与博爱统一起来了。尽管卢梭错误地把良心说成是天赋的，是超时代、超阶级的，但他对良心的呼唤，对极端利己主义的批判，对爱他人、爱人类之博爱精神的倡扬，则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至今发人深思。我们不妨再来听听他下面这段耐人寻味的高论："一个人如果由于只想到自己，因而只爱他本人的话，他就再也感觉不到什么叫快乐了，他冰冷的心再也不会被高兴的事情打动了，他的眼睛再也不会流出热情的眼泪了，他对任何东西都不喜欢了；这可怜的人既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生气，他已经是死了。"③

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都主张用功利主义原则来统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强调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作为道德的原则。但在具体论证上，又各有特色。拉美特利用"自然法则"来协调自爱与他爱的关系。他认为，自然给人两种最基本的东西，一是享受幸福的权利，二是他按照自己的本性而必须遵守的自然法

①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120页。
②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132页注①。
③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141页。

则。所谓“自然法则”，这是“一种感觉，它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如果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名誉和生命，我们也许就不那么尊重别人的钱包和生命了”。所以自然法则实际上是一种害怕或恐惧的感觉，由于害怕别人夺去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就必然会产生尊重他人财产和生命的行为。这就是说，从自爱心必然会产生爱他人之心。

狄德罗特别注重从人类固有的本性上来阐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他认为，人有两个自然本性，一是利己自爱的本能，二是利他的、社会性的本能，这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他看来，自爱是人的天性，而利他也是自然所赋予人的品质。他对利他或博爱怀有强烈的感情。1767 年，他在给休谟的信中写道，博爱的纽带是自然建立在一切人们之间的，无论民法或僧侣都不能破坏。因此，他反对爱尔维修把人的一切，包括友谊在内都看成利己的说法，他有时甚至认为美德就是自我牺牲。那么，怎样才能使人的利己和利他两种本能达到完满的统一呢？狄德罗认为，对于个人来讲，就应当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控制自己的情欲，既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又要尊重他人的自爱权利。这就是他提倡的开明的自利，亦即合理的利己主义。但要真正达到二者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社会。他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和一个好的政府，能够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而人民也就能够在他们的行为中坚持这一原则。所以，狄德罗和爱尔维修等人一样，特别强调法律和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下，通过教育完全可以把人的利己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以内，发扬利他的精神，实现二者和谐统一。

爱尔维修从“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来论述合理的利己主义。在他看来，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但并不是所有个人利益都是合理正当的。他将其区分为“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和“错误看待的个人利益”。后者由于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一味地无止境地满足个人欲望，处处燃起贪图巨富的欲火，必将是利令智昏。爱尔维修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看待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则是把个人利益包括在公共利益之中，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做到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密切联系起来”。这便是合理利己主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爱尔维修批评了“狭隘的利己主义”，极力倡导了“公共利益”：“要行为正直，就应当仅仅倾听和信任公共的利益”，“一个人一切行为都以公益为目标的时候，就是正义的”，“公共的福利——最高的法律”，“这种利益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他还特别强调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今合。认为二者结合得好，达到应有的目的，就是有德的行为；结合得不好，一味追求满足个人私欲，有损于社会公益，就是不道德的行为。爱尔维修还指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因而人与人之间利益本无分歧。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个人利益同公众利益往往是矛盾重重，其原因是不良的政治和教育制度造成等级的悬殊。只有在“合理”的社会中，二者才能趋于一致，使追求公众利益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他因此提出通过改革立法，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奖善罚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完满结合。这一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要求，有一定进步意义。

霍尔巴赫认为，人都有趋利避害、追求私利的本性，但人都必须在社会中生活，如果一个人只顾追求自己的私利，

以邻为壑，以致损害他人，到头来定会陷入绝境。经验和理性告诉人们，要达到利己的目的，就必须抑制自己有害的盲目冲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益，借以博得援助和爱护。他说："人为了自保，为了享受幸福，与一些具有与他同样的欲望、同样的厌恶的人同住在社会中。因此道德学将向他指明，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它将向他证明，在所有的东西中间，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由此可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爱其他的人，因为他们是他的存在、他的保存、他的快乐所必需的。"① 因此，霍尔巴赫提出了开明的自爱，即由利己起步而走上利他的途径，把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为共同幸福尽义务。他认为这是应积极倡导的美德。"爱美德不过是把我们的利益同有利于人类的利益的行为联系在一起。"② "道德学应该倡议把人类中一切个体的利益、特别是同一社会成员的利益结合起来。"③ 这就是霍尔巴赫笔下的合理利己主义的"博爱"精神。

总观启蒙学者对"博爱"的丰富多样的论述，不难看出，尽管它还是非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反对纯粹的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主张把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今合起来，尊重和维护他人权益，倡导利他精神，则在理论上包含有真理性因素，在实践上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

---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649—650页。
② 转引自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第406页。
③ 转引自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第406页。

5. 爱情婚姻道德新观念

启蒙学者猛烈抨击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观，揭露了封礁社会奴役妇女、扼杀爱情和等级婚姻的罪恶，初步提出和论述了资产阶级的爱情婚姻新观念，为砸碎封建婚姻家庭观念的精神枷锁，释放爱情的核能量，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

爱尔维修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把唯物主义感觉论贯彻到爱情领域，认为肉体的感受性即快乐和痛苦是人的惟一动力，而“在一切奎乐中，对我们作用最强，给予我们灵魂鼓舞最大的，毫无问题是女色的快乐。自然把最大的陶醉放在女色的享受上”①，使爱情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成为培养和激励人的美德的最强大的动力。男人为了取悦于女人，就去努力提高自己的情操和文化修养。男人为了博得女人的欢心，满足她们的奢侈欲望，就去发展科学技术，就去追逐权势和财富。斯巴达战士为了获得最高奖赏——美丽的女人，据去英勇作战，视死如归。爱尔维修由此发问道：“哪一种对于美德的热忱不能为好色的欲望所鼓动呢？”他甚至得出结论：在摆脱饥饿的开化文明的国家里，爱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爱情发明一发，产生一切”。爱尔维修的这种爱情至上论，是与封建禁欲主义完全对立的，是对扼杀爱情的中世纪的抗议，是战斗的呐喊。另外，他肯定爱情对人有振奋和激励作用，这也有合理的因素。但是，他的爱情观却错误地把爱情归结为一种追求肉体的生理自然本

① 北京大学哲学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97页。

能，否认爱情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否认爱情要受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的约束。这种爱情至上主义，在近代就演变为一种“性解放”、“性自由”的理论。

卢梭在名著《爱弥儿》一书的第五卷专门论述了爱情和婚姻问题，表述了一种与封建婚姻道德观截然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爱情婚姻道德新观念。卢梭针对封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提出了在爱情婚姻中男女应当平等的思想。他认为男女两性之间除了性别的差异之外，他们“有同样的器官、同样的需要和同样的能力”，“都具有人类的特点”，因而男女之间在智力、体力以及爱情婚姻上都应当是平等的，尊男鄙女是不对的。卢梭批判封建的婚姻等级观念，提出了婚姻以互爱为前提的思想。他认为婚姻不能纯粹以门第血统来决定，以地位、财产来衡量，因为地位和财产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婚姻主要看男女双方的爱好、才智等，以爱情为基础。他指出情人不是满足感官享乐的工具，而是能够在对方心中燃起爱的热情的使者。爱情令人“神魂颠倒”，人应当追求一种“产生爱情的真正的美”。因此，他主张夫妻婚前必须相爱，夫妻的选择应当“以共同的爱好作为第一个联系”。在选择妻子方面，他强调内在美，说“一个德性优良的妇女就等于是一个天使”。所以卢梭认为娶一个中等姿色的妻子就可以了，结婚之后美丑就无所谓了。一个有思想的男人不应该去娶一个没有思想的女人。卢梭的爱情婚姻道德观，无疑有其合理性和反封建的进步性。但是，他仍然没有摆脱从男女两性结合的“大自然”法则来揭示爱情婚姻道德形成之根本原因的缺陷。

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先驱。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他最早发出了解放妇女、实现男女

在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地位上平等的呼声。他认为男尊女卑、虐待妇女，违反两性平等的自然法则，是不公道、不正义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种认为女子的天赋才智比男子低下的论点是荒谬的。他说，女子的能力并不比男子的低下，“如果男女教育平等，力量亦也相等”，甚至女子的才能还可以胜过男子。孟德斯鸠明确提出男女在婚姻和财产关系上应有平等。在婚姻上，男女要有同等离婚和休婚权。他指出，休婚权一直掌握在丈夫手中，往往使他滥用这些权力；妇女提出休婚，常常只是行使一种悲惨的补救手段。所以，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凡是给男子休婚权利的国家，也就应该给女子同样的权利”。他还说，不允许女子继承父亲的财产是极不公平的。孟德斯鸠深刻指出男女不平等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呼吁立法者制定贤明的法律，战胜奴役妇女的罪恶制度，给妇女以应有的家庭地位和平等的社会权利。孟德斯鸠的这些思想理论，对于摧毁封建婚姻家庭道德，推动西方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意义。

三　功利主义道德评析

启蒙学者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想，都是从资产阶级感性主义人性论出发，把自爱自利看作是人的天性，以人道反对神道，以利己反对禁欲，在功利主义旗帜下，为现实利益而斗争的。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这是一种“积极活动的资

产阶级利己主义"[1]，是新的生产关系下人与人的关系在道德理论上的表现。这种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道德新秩序，在西方道德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新道德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功利论。这种功利主义是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革命时期，即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最初的两次斗争中，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出现了这种理论。……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已经把这种学说理想化了，这种做法是和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反封建的作用完全一致的。"[2] 启蒙学者把道德和功利相连接，在理论上大大推进了唯物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带有唯物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他们抨击封建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利益，戳穿了宗教禁欲主义的骗局，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辩护，强调感性的快乐和幸福，有力地促进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推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其次，新道德的基础是感性主义的人性论。在这种人性论的视野里，人是具有肉体感受性的自然人，趋乐避苦、趋利避害、利己自爱是人所共有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因而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为利益所驱动，一切善恶评价都以功利为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8页。

准。显然，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用纯生物学的、静止不变的观点考察人性，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实质上，他们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当作普遍的人类本性，把私有制社会的人性看作永恒的人性，这表现出他们人性观的资产阶级偏见。但是，它把理解道德的钥匙从天上取回人间，用自然人取代了超自然的神在道德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彻底揭露了封建宗教道德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把人作为道德问题的核心，视幸福生活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人道和功利的要求，因而又有着明显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

再次，新道德的核心是个人本位的利己论。启蒙学者认为，利己或自私是人的本性，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也尊重和维护他人利益，但这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利己。利己是人们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处。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启蒙学者把人类的各式各样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的功利关系"，"在霍尔巴赫那里，个人在相互交往中的一切活动，例如谈话、爱情等等都被描写成功利关系和利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①。美国著名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教授对这种个人主义的危害也有所认识："如果启蒙运动有什么不良后果的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9页。

它可能就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①] 历史早已向人们表明，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王国里，利己主义成为支配一切的思想。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这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利己主义在资产阶级处于革命和上升时期，是有很大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独立自由发展的愿望和要求，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力地冲击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沉重打击了扼杀个人利益、蔑视个人存在价值的黑暗的封建统治，确认和申张了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了人们为自己的现实利益而奋斗的积极性，促进了个性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曾评价说，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利己主义，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公开的进步，这是一种启蒙”[②]。

最后，新道德的境界是利他主义的公益论。在启蒙思想家的道德体系中，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联系的，而二者又都是从感性主义的人性论中推出的。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这正是新道德的一个思想特征。启蒙学者都不仅强调

① 《世界文明史》，第2卷，〔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第3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0页。

利己、个人利益，也积极倡导利他或博爱、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并主张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就是他们的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①] 这种公益论，不仅理论上包含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合理因素，而且在政治上具有反封建的伟大启蒙作用。他们高举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帜，是一面向整个第三等级呼唤革命的旗帜，是一面抨击封建特权、反对封建专制的旗帜。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合理利己主义、公益论和博爱论，深深打上了资产阶级的印记。所谓"合理利己主义"，在现实中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实行，也不可能实行，它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种理想化而已。所谓"公共利益"，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美称。至于"博爱"，正如毛泽东所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马克思也曾尖锐地指出，"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一旦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受到威胁时，"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因此，我们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和对待启蒙思想家所建构的资产阶级新道德。

黑格尔曾评价说，功利主义是西方思想启蒙的"最终成果"。但是这一文明成果，后来经过边沁等人的庸俗化和极端化，使其脱离了启蒙学者所主张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结合的论点，片面强调利己主义，推崇狭隘的个人主义，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页。

弃了启蒙思想家的初衷，成为一种极其荒谬而反动的学说。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功利主义，是同正在进行斗争的、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是有进步意义的；而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则是与站在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是反动的。

马克思主义道德学并不否认功利主义，不过，它既不同于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也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功利主义有区别。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的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①] 可见，我们倡导的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主张言论行动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最大利益，并以这种利益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一切对人民群众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或者是罪恶的。

总之，启蒙思想家所创制的功利主义道德学，就其理论实质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文化中去考察，则无不感到它的思想和精神的卓越，政治和理论意义的深远。随着时代的前进，启蒙学者设计的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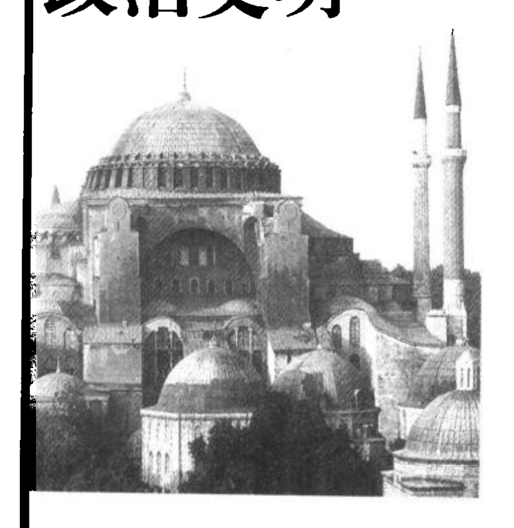
道德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它有着永恒的魅力。



第七章

“理性王国”的政治宣言——天赋人权的政治文明

- 专制是不合理性的非人政治
- 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蓝图
- 理性政治评判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moderne）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

——列宁

所谓政治文明，就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关于民主、平等、自由、解放的实现程度。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实现的。这种新兴的政治文明，在法国是经过大革命而变为现实的。然而早在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中，它的基本理论已见诸于启蒙思想家们的笔端。因此可以说，启蒙运动在理论上创造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而启蒙推动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则使这种文明由观念变为现实。所以，了解启蒙学者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对于正确把握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演变，科学认识和评价西方政治文明，是十分必要的。

一　专制是不合理性的非人政治

马克思曾科学地指出："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① 所以说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就是推行轻视人、蔑视人的非人政治。启蒙思想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猛烈抨击了这种不合理性的非人政治，发布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政治宣言，设计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的政治蓝图，推动了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发展。

1. 封建专制的深刻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欧洲封建专制制度日益陷入深刻危机。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向中世纪封建制度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挑战，也是西方封建制度遭遇的第一次巨大危机。启蒙运动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带有全欧性以至国际性的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思想革命，它使原已危机四伏的封建制度更加日暮途穷，最终走上了覆灭之路。

17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18世纪以后，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衰败没落，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爆发了总危机。

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路易十四以来，法国的封建经济日渐衰败。在农村，土地占有极不平等。全国的土地，三分之二被总人口不及34万的贵族和僧侣占有，而2300万的农民却只占有三分之一。封建领主通过地租等形式残酷压榨农民。教会还向农民征收什一税，即以总收成的十分之一纳税。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使名目繁多的赋税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从1715年到1789年的74年里，直接税增加了69%，间接税在该世纪增加了两倍。这些赋税全部落在了第三等级特别是农民的头上，农民劳动

收入的四分之三被剥夺，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何谈劳动的积极性，这就必然导致封建生产的危机。生产危机加速了政府的财政破产。路易十四晚年，宫廷生活糜烂透顶，奢侈浪费惊人，加之连年战争，致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国债高达25亿里弗。1715年他死时，群情激愤，宫廷治丧处只得趁着月昏夜黑，偷偷出殡。路易十五执政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可耻名言是：今世尽够受用，死后管它洪水滔天。在他统治期间，法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惨败，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兵力，丧失了不少殖民地，使海外财源萎缩。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国政腐败，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宫廷生活穷奢极欲，国王一人使用的马车就有200辆之多，直接为王后一人服务者达500人。凡尔赛宫廷骇人听闻的挥霍浪费，使财政赤字急骤上升，封建经济已到了彻底崩溃的程度。



路易十四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经济，法国君主推行了反动的专制政治。路易十四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经常在内室里召集三四个亲信大臣，根据他们的汇报，单独决定国家大事；他把自己每天的生活细节——起床、吃饭、睡觉，都规定了仪式，使他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中心；他亲自到最高法院说的“朕即国家”这句话，成了人们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典型术语。路易十五成天沉溺于荒淫奢糜的

宫廷生活，大臣的选择、政策的决定等都为几个女宠所左右；专制统治加上秘密的方法，使国中每个人随时可能被手持“密札”者所逮捕，并且无定期地被监禁在巴士底狱，整个法国充满了恐怖。然而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反而遭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导致农民平民连绵不断的起义和暴动。18 世纪初就发生了有名的“卡米扎尔”农民起义，这个世纪中叶起，农民暴动更是此起彼伏。这些起义虽然提不出自己的革命纲领，但它们加深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危机，是封建社会濒临灭亡的征兆。

18 世纪的法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知道，天主教作为法国的国教，在法国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具有精神支柱的作用。路易十四把在法国振兴天主教作为他的天职，无情地镇压和迫害异教活动。在“神权国王”的淫威下，天主教势力更加猖獗。他们用遍布全国的 143 个教区，1700 多个修道院来加强思想控制。他们推行宗教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用残酷的宗教迫害手段强迫人民服从上帝和君主的统治。他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卡拉案和巴尔案，就是有力罪证。特别是耶稣会以最黑暗最残暴的手段，穷凶极恶地扼杀科学和民主自由思想，镇压无神论者和革命者。反动的宗教统治，把法国社会推向了更黑暗的深渊。

从上不难看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已陷入深刻危机。17 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宣告了英国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18 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的全面危机，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敲响了法国封建制度的丧钟，并辐射到欧美，加速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危机和覆灭。

2. 对封建制度的无情批判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思想方面，批判宗教神学，批判蒙昧主义；二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如前第三章所述，启蒙思想家冒着被捕、监禁甚至生命危险，用文学和哲学的语言、幽默加讽刺的手法，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论述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对封建国家制度的批判。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但它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寓于对宗教的批判之中，矛头并未直接指向封建政治。启蒙思想家则不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启蒙思想家对封建制度的政治批判为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道路。

梅叶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他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封建制度的总代表——帝王，认为"现在的一切帝王都是暴君，因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把个人的意志当作国家的法律。他特别抨击了法王路易十四，说任何国王也没有像他那样杀这样多的人，使人民流这样多的血，使寡妇孤儿流这样多的眼泪，破坏这样多的城市和省区。梅叶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官吏、僧侣、贵族。在他看来，这些人和国王一起组成一伙公开的、"合法"的强盗，国王是头子，他们是帮凶和同伙。梅叶指出，无论是官吏或僧侣都善于阿谀奉承，献媚取宠。他们之所以如此在国王面前邀宠和维护王侯的不义行为，目的是与暴君一道，残酷地掠夺人民，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梅叶愤恨地说，所有这些封建统治的卫道士，都"是些嗜血的和残酷的压迫者"，"是一群令人发指的暴徒"，

是一伙灵魂肮脏、行为卑鄙、贪赃枉法、惨无人道的恶棍。他认为，穷人们之所以遭受苦难，就是因为他们承受着王国的全部负担，养活着暴君——国王和省长，还养活着所有的贵族、僧侣、修道士、法官、军人、收税的官吏等等。他愤怒地将这些贪官污吏僧侣教士比作魔鬼、蛔虫、蝗虫、吸血鬼、强盗、恶狼，恨不能“拿神甫的肠子做成绞索，用这种绞索把世界上一切强暴者和高贵的老爷们吊起来，绞死他们”。梅叶对封建专制的这种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当时起到了启迪人民，呼唤革命的积极作用。

孟德斯鸠着力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藐视法律、以人代法的反动实质。他认为，专制制度是一种完全由君主一个人独断专横、藐视任何法律的国家制度。在专制国家，“法律等于零”。因为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君主金口玉言，他的话具有法律的效力，正所谓“朕即法律”，“君主的意志一旦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必须“绝对服从”。尤其荒唐的是，“如果国王是在酒醉或是精神失常时做出这个决定的话，他的敕令仍然是要执行的”。孟德斯鸠指出，没有法治的专制国家，总是按照恐怖原则实行残暴统治。他把专制君主称为暴君，说：“暴君之所以有权力，正在于他能剥夺别人的生命。”暴君可以任意把人处死，甚至权贵们的头颅也有“随时被砍掉的危险”。在这种国家里，“人人都是奴隶”，是被人任意宰割的羔羊。他认为，实行人治的专制国家，不可能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专制君主总是把自己的权力授与善于阿谀奉承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孟德斯鸠曾辛辣地讽刺路易十四：“他常常喜欢一个替他解衣脱靴或进餐时捧奉食巾的人，甚于一个替他攻城夺地、或替他打胜仗的人。”对那些由于溜须拍马而被他看中的人，“即使没有长处，也就

变成有长处了”。这些人就是打了败仗，他也给重赏。孟德斯鸠还揭露了专制制度造成贫富两个世界的社会罪恶。他说，“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财产，同时别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极度贫困中”。在巴黎，廷臣和显贵们过着寄生的生活，“为了一个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须有一百人为他不停地劳动”。孟德斯鸠的批判犹如引爆的巨型炸弹，给封建专制制度以沉重打击。

卢梭曾大声疾呼，“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刺向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把锋利的匕首。卢梭的全部著作渗透着对于封建制度的刻骨仇恨和无情批判。他首先断然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①]。专制权力与人类“自由”、“平等”的天性和自然权利根本不相容，因而按其性质来说是不合法的。他猛烈抨击了封建王权，指出：“有人说，专制主可以为他的臣民确保国内太平。就算是这样；但如果专制主的野心所引起的战争，如果专制主无餍的贪求，如果官吏的骚扰，这一切之为害人民更有甚于人民之间的纠纷的话，那末从这里面所得的是什么呢？如果这种太平的本身就是人民的一种灾难，那末人民从这里面又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②]他得出结论：“暴君可以不是专制主，但专制主则永远都是暴君。”[③] 卢梭指出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把不平等发展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下同），第 125 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15、116 页。

③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15、116 页。

到了顶点，这是人类的灾难。政治上的不平等、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决不是由自然不平等造成的，它同专制王权一样，是违反自然和理性的。他对特权阶级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欺压百姓的恶行深恶痛绝，对于陷入被压迫深渊的劳动群众寄予同情。他还痛斥了封建文化，认为封建文化充满"胡说八道"，是点缀封建专制的花环。卢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深刻、尖锐的批判，在欧洲启蒙运动中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18世纪法国战斗唯物主义者，也积极投入了歼灭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狄德罗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封建专制的实质，指出："在专制独裁的国家中，国家元首就是一切，而国家则算不了什么；一个独夫的意志就是法律，而社会却没有自己的代表。"① 他痛骂封建暴君说，"在所有使人类遭受折磨的可怕的人中没有比暴君更残酷的了……他把臣民看作不过是一些一钱不值的奴隶，一些低下卑贱的东西"。他在《拉摩的侄儿》中猛烈抨击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写道："这是何种的鬼制度，有些人吃厌了一切东西，而其他的人也有像他们一样紧急要求的胃口，像他们一样不断重来的饥饿，却没有东西放在牙齿底下。"爱尔维修揭露道，在封建制度下，一小撮统治者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无度、醉饱欲死的生活，而广大劳动者则"无衣无食"，处于"赤贫"的悲惨状态。他特别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所造成的恶果，指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

① 转引自《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美德"①。封建专制统治者的目的就是要使臣民成为没有思想的愚昧无知的"白痴"，因为他们逻辑是，"偷瞎子的东西可以比偷明眼人的东西容易些，哄骗一个白痴民族可以比哄骗一个开明民族容易些"。

综上可见，在启蒙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的年代里，封建制度已彻底反动腐朽，成为众矢之的。历史向人们昭示，封建专制的旧世界就要灭亡，一个由新兴资产阶级创造的新世界正在西方崛起。

二　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蓝图

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和三权分立是启蒙思想家设计的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蓝图的基本构架。

1. 自由："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启蒙思想家的自由观，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之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自由的用语虽然早已存在，在奴隶制社会已经有自由民的概念，但是启蒙思想家却赋予它新的含义。在他们那里，自由并不只局限于人身自由，而被扩大为各种政治和社会自由。当然，他们各自对自由的含义和内容的理解又不尽相同，各有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476页。

侧重，各具特色。

洛克认为，人类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下，享有“自然的自由”，即在一定的自然法的调节下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人们通过订立契约而进入政治社会后，便享有社会自由。这种自由与自然自由不同，它必须受一定的法律约束，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支配自己财产和人身的自由。他说：“自由，……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自己的意志。”① 他强调，自由是人人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就是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自由，人民也有权收回他们的权力，建立新政府。洛克作为启蒙思想的先驱，他的自由观为后来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根据，为近代人开辟了培育自由意识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法国革命时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②

伏尔泰以个人自由的捍卫者而著称。他在给他的一个反对者的信中写道：“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被人们奉为言论自由的名言而经常引用。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人人享有的一种自然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侵犯。他十分推崇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下人们享有的广泛自由。他说，在英国，“所有的公民不能同样地有势力，却能同样地自由”。这种自由的基本内容，就是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言论自

①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9页。

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选举自由、议会自由和劳动力买卖自由等。

孟德斯鸠特别论述了政治自由。他说，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应该”与“不应该”的区分，要以法律为界。所以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一定社会政治制度下，每个公民都应享有政治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财产自由以及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强调，自由是人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是不能出卖的“无价之宝”。

在卢梭看来，处于“自然状态”的“任何人都没有一种自然权威驾驭他的同类”，人人生来平等，享有充分的自由，自由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是天赋予人的权利。人们维护自由的权利，也就是维护做人的资格。他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的权利，甚至于是放弃自己的义务。一个人放弃了一切，是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作补偿的。这样一种放弃与人的本性不相容；使自己的意志失去全部自由，就等于使自己的行为失去全部道德价值。”① 卢梭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富人获得了合法奴役穷人的自由，穷人则失去了自由的权利，带上了枷锁，人们只有通过消灭暴君才能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不是自然状态下的那种“自然的自由”，而是不平等到了顶点重新转化为平等的自由，是“政治自由”，即服从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自由。卢梭认为，从原始的自由到不自由，再到更高级的新的自由，是自由发展的辩证历程。

---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168页。

狄德罗指出："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①] 他非常重视国家赋予人民以自由的意义，说"如果人们是自由的，那就会有勤劳的人"。他注重贸易自由，认为如果不容许贸易自由，那样的政府会使丰收转化为灾难，将成为最坏的政府。

自由作为天赋人权载入著名的《人权宣言》中。《人权宣言》汲取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观，明确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其次，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想要怎样就怎样，而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洛克说："自由并非像罗伯特·菲尔麦爵士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各人乐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高兴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而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那种自由。'"[②] 孟德斯鸠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③] 为什么说自由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呢？启蒙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作了分析。一是从国家的本性看，如果人们可以不按法律的规定办事，社会就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家就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所以卢梭认为，国家或政府的"本

---

① 转引自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793页。

②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6页。

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下同），第154页。

质在于服从与自由二者的一致”。二是从法律的意志看，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财产与人身安全，因而法律是人民“公意”的表现。“公意”是人民整体的公共意志，当然也包含着个人的意志。服从这样的法律，既是服从了公共意志，也是服从了自己的意志。可见自由包含着对法律的服从。卢梭说：“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①] 他还进一步指出，既然法律体现着全体人民的公意，所以对那些不按法律办事的人，就要强迫他们服从法律，也就是强迫他们自由。三是从自由的保障来看，也要服从和遵守法律。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②] 卢梭也指出，“法律的效力和护法者的权威消失了的地方，任何人都得不到安全和自由”。综上，启蒙思想家关于法律与自由的相互关系的论点，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因而成为资产阶级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载入各国资产阶级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

最后，启蒙思想家们呼吁，要摧毁封建专制，为自由而斗争。伏尔泰指出，自由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是最宝贵的的东西，可是却被剥夺了。他在《天真汉》中写道：“我生下来无挂无碍，像空气一样自由。自由与爱人，是我的第二生命，现在全给剥夺了。”他一方面幻想“仁慈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30 页。
②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 36 页。

的国王”能关心自己的臣民，发展科学和教育，把人们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理性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又期待人民通过斗争争取自由。他在歌剧《萨姆逊》中诗云：“人民啊，醒来，挣断自己的枷锁，自由在向你呼唤。”伏尔泰把争取自由看作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任务，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宣传自由和捍卫自由，以至在他的柩车上人们大书：“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头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他看来，人生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是人间的不平等。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一生下来就被捆在襁褓里，一死就被钉在棺材里；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的制度的束缚”。正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人失去自由，成为奴隶。因此，要获得自由，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必须变革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狄德罗认为，神权和王权交织成两条束缚人类的锁链，如果前一条不被砸断，这后一条就不会放松。他愤怒地说，“人们在用最后一个教士的内脏作绞索把最后一个国王绞死以前，他们决不可能自由”，呼吁人们为自由而战。

2. 平等：等级特权的克星

平等和自由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执着追求的政治理想。许多启蒙学者都从“自然法权论”出发，阐述自己关于平等的社会政治思想。自然法权论是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观点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一方面主观地设想原始人类的生活图景，即所谓原始社

会的“自然状态”；另一方面脱离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来谈所谓人的“自然权利”，追求一种“合乎自然”的理想社会原则。自然法权论虽然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但它是针对宗教神权历史观提出来的，具有反宗教反封建的进步性，几乎为当时所有进步思想家所信奉，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说，发生过巨大影响。

伏尔泰运用自然法权论揭露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违反自然法权，践踏平等的天赋权利。他质问道：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脖子上就套着轭，而贵族的儿子生来腿上就带着踢马刺吗？其实，“一切享有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一切种类的一切动物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①]。然而，在自私的人性和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伏尔泰又不得不承认社会平等只能是一个美丽的词句。平等只是在自然法面前的平等，是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在财产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如果没有“无数一无所有的有用的人”，人类社会就无法维持。每个人都可以在内心里想像自己与他人完全平等，但实际上一个仆人绝不能命令他的主人去给他做饭。因此，“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同时也是荒诞不经的事”。

启蒙思想家中，卢梭的平等观最有特色，也最富系统性和深刻性。卢梭从他的自然法权理论出发，探寻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这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统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88页。

是人类最幸福的“黄金时代”。因为这个时期私有制还没有产生，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不存在奴役和被奴役、服从和被服从的不平等，自然赋予每个人以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人们在自然法的调节下，过着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正是由于卢梭如此渲染和美化“自然状态”，主张“返于自然”，人们才认为他是一个原始主义者。1755 年 8 月，伏尔泰在读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给卢梭的信中说：“人们从来没有为了想使我们成为禽兽花过那么多精力，当人们读您的著作时，人们就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了。”其实，卢梭赞美原始时代，意在对黑暗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鞭挞，对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渴望。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① 卢梭用这一名言，说明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惟一根源。他并不认为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真的是由于某个人头脑里忽然想起而偶然造成的。他说，使人类最幸福的原始社会被破坏而进入“公民社会”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②。铁器的使用，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产生私有观念和私有制。“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

---

①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11、121、121 页。

②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下同），第 111、121、121 页。

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① 社会生产发展引起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的出现导致"自然状态"的瓦解和充满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的形成，这在当时是独具慧眼的深刻见解。不仅如此，卢梭还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不平等的产生既是一种进步，又是一种退步的精辟之论。他认为不平等的产生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使人们进于文明"，"从一个愚昧的、被限制的动物变为一个智慧的生物，变为一个人"，但同时又是一种退步，因为它毁了人类原来自由、平等的幸福状态。而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对卢梭这些包含辩证法因素的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

卢梭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私有制及所有权使人类的不平等由此而根深蒂固起来，而富人又用法律将富人和穷人的状态确认下来，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这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接着，国家机关和官吏产生，人类不平等进一步加深，除了存在财产上不平等外，还出现了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亦即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不平等的第二阶段。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腐败，出现了专制暴政，"当暴君形成，就达到了不平等的顶点"。在这一阶段，"人民既不再有首领，也不再有法律，而只有暴君"，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物极必反，这种不平等必然要向它的对立面转化，重新变为平等。这就是卢梭得出的革命结论，即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暴君，重建新的社会契约，走向新的比自然状态更高级的平等。自然状态的平等——社会状态的不平等——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

①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 111、121、121 页。

迫，这是否定的否定。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学说，包含着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因素。恩格斯称赞他的这一学说，“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①。

那么，卢梭所追求的社会契约的平等是什么呢？他说：“要想使国家稳固，就应该使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这两个天然分不开的等级，对于公共幸福同样是致命的；一个会产生暴政的拥护者，而另一个则会产生暴君。他们之间永远是在进行着一场公共自由的交易：一个是购买自由，另一个是出卖自由。”② 既不要有巨富，也不要有赤贫，这就是卢梭平等观的中心议题。卢梭虽然正确地指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但阶级的局限性使他未能再向前跨出一步，提出消灭私有制以实现社会平等的主张，于是便设计了一个折衷方案，即保留私有制，限制大私有制。这在当时无疑对于反对封建特权，争取人民平等权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实现社会平等，只能是一种空想。

3. 人权：不可剥夺和转让的“自然权利”

1789年革命后不久，法国资产阶级在其政治纲领——《人权宣言》的开篇庄重宣布：“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这一宣布，意义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70页注①。

同小可，它使启蒙思想家系统阐述的人权理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原则和内容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确认。

人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特权的产物。在原始社会里，财产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平均分配，人人平等，因而原始人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区分，也没有人权概念。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人的权利随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阶级特权和等级特权。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维护和强化这种特权。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享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权利，而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权却限制着它，这就必然发生人权与特权的尖锐冲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和阐发的人权理论，正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权、君权和特权斗争的反映。

文艺复兴时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人权。人文主义先驱但丁最早提出了“人权”概念，许多人文学者表达了人权思想和人权要求。人文主义者提出的“人权”，内容侧重于要求重视人的价值和个人地位；要求自由意志和个性解放；反对禁欲而提倡纵情享乐。他们的思想，后来被17、18世纪的思想家，特别是启蒙思想家所继承，从而提出了“天赋人权”论。最早提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的是荷兰政治思想家格老秀斯（1583——1645)。随后经英国的霍布斯等人的发挥和洛克全面系统的论证，又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使这一学说达到更加完备的地步。

这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萎缩在



格老秀斯

人的自然本性里，他们毅然地把他们所认定的人之作为人都拥有的平等、自私、自由、自卫之类的"本性"宣布为人权。在他们看来，既然自然本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因而它必然也是人所共有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正如《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所以，出自本性、与生俱来，人所共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就是人权。显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天赋"亦非神赐之意，而是指固有的、本性的、天然的意思。

洛克明确指出，平等、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个人的自然权利。而且，根据《圣经》"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洛克主张谁的自然权利遭到侵犯，谁就有自卫、报复、惩罚与反抗的权利。卢梭认为，维护人的本性，就是维护人之作为人的资格，就是捍卫天然的权利。他们认为，按其本性来说，人们订立契约，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国家和法律并不是要剥夺人的自然权利，而正是要更好地保护这种权利的实现。"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褫夺或剥夺的"。这段话出自

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这几乎是法国启蒙思想的摹写。《人权宣言》更明确地指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权利，“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简而概之，“天赋人权”论的基本内容，就是认为人人都具有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反抗压迫权和追求幸福权。这些权利是自然赋予人的，是永恒的、普遍的权利，不能转让和剥夺。

人权在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性王国”的政治蓝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人权把人的自由、平等本性提升到人所共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自然权利”的高度，并扩展为以自由平等权利为主的蕴含丰富内容的权利体系。人权是资产阶级“政治机构的目标”、“政治结合的目的”,[1] 因而“天赋人权”论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立法的基本原则。

4. 民主：“主权在民”

民主，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最重要、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国家的真正主权应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启蒙学者认为，主权永远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解除与执行者订立的契约；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立法者，而国家则是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的。在启蒙思想家中，卢梭关于“主权在民”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意义最为重大。

卢梭的“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学说，是他的民主

① 参见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

主义思想的中心内容，也是他全部学说的核心和归宿。他的主权在民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首先，卢梭明确地宣布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他认为最初的国家是由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需要，由人们之间彼此协议而产生的。既然国家是由众人约定而产生，目的在于“能够以全体成员的力量防御和保护每个参加公约者的人身自由和财产”，那么人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统治者的私有物。卢梭因此得出“主权在民”的论断，认定一个国家的主权应当属于人民，而不属于所谓“君权神授”的国君，并且不论国家政体如何，主权应当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

第二，属于人民的主权，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分割。卢梭指出，主权是“公意”即人民公共意志的运用，公意是主权的表现。只有公意才能使国家谋求公共幸福。“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主权者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他不能把自己的意志转让给任何人。任何转让也就意味着用个别意志代替公意，个别意志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偏私，而公意则倾向于平等。所以，权力可以转让，而公意不能转让，主权不可转让。如果转让主权，就意味着出卖生命和自由。同样，主权也不可分割。因为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如果分割了，就不成其为公意了，就不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而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所以，卢梭反对“三权分立”学说，认为一切权力都应归人民所有，不能分割给其他集团和个人，这就根本否定了封建君主篡夺国家主权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第三，人民主权不能加以限制，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是国家

的灵魂，是受公意指导而建立起来的支配全体公民的绝对权力，在它之上就不会有更高的东西存在。假设在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可以限制主权，那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任何人、任何团体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凌驾于主权之上。如果政府篡夺了人民主权，人民有权推翻它。当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必须以社会契约为基础，以遵循"公共利益"和"理性法则"为前提。

第四，立法权属于人民。卢梭认为，主权主要是通过立法权表现出来，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就是法律的创立者。他说："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①人民有创制、批准、修改和废止法律之权。只有人民成为立法者，才能有民主和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主权在民"。卢梭强调指出，由于法律体现了"公意"，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置身于法律的约束之外；无论是谁，擅自发号施令都绝不能算作法律。

第五，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委任的官吏。卢梭认为，只有人民才是主权者，任何个人都不是主权者。绝不能混淆政府和主权者。主权不可转让、不可代表，但主权的行使、运用却可以代表，交由政府和官员去执行。政府及其官员是拥有主权的人民选举出来执行公意的，它本身并不拥有主权，只从属于主权。他说"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吏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②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75－76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32页。

官员成为人民的主人，防止政府篡夺国家主权，蜕化为君主专制制度。

第六，主权在民的国家的最好组织形式，是实行民主共和制。卢梭坚决反对封建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政体，推崇和拥护民主共和制，认为它是实行人民主权的最好的政府形式。他强调指出，在民主制下，必须摆正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确保人民主权。为此，他提出人民不仅要制定和批准法律，选择行政长官，组成政府，还必须建立定期的人民集会制度，经常直接行使最高权力，来监督和约束政府。他反对徒有代表人民之名、并无人民主权之实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制。

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在当时有着极大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它被庄严地写进了《人权宣言》，成为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

5. 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从法律思想文明的角度来审视，规模宏大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在法律思想领域彻底突破封建专制主义藩篱，宣告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在法国乃至整个世界取得根本性胜利的伟大运动。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为杰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著书立说，激扬文字，把资产阶级法律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们的法律思想在西方文明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启蒙学者以"自然法"为武器，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属于自然法学派，都从自然法权论出发，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阐述政治法律思想。启蒙运

动的先驱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三大“自然权利”。根据自然法的教导，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这些天赋权利，否则，每个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所谓“自然法”，就是理智或理性法则，“理性，也就是自然法”。这个法则不仅在“自然状态”下约束自然权利，而且在人们进入社会状态后仍继续存在，它是人们制定法律的依据，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它们的规定和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① 既然自然法是人为法或人定法的基础，是一切行为规范的准则，那么资产阶级就有根据宣布：凡是与自然法相违背的一切旧制度都必须废除，必须按照自然法来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孟德斯鸠也是自然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作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法，有自然法、人为法（或人法）和神为法（或神法）三种基本类型，其中更基本的是自然法和人法。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法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惟一法则。自然法的原则有四条，即和平，寻找食物，自然爱慕，希望相互结合，愿过社会生活。他认为，人类的本性决定人类要过社会生活。然而，人类进入社会后，自然的自由平等消失了，战争状态开始了。这种状态导致了国家机关制订的法律即人法的诞生。人法以自然法为基础，合乎理性地处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可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朕即法律”，法有名无实，“法律等于零”。孟德斯鸠因此尖锐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热情赞颂了实行法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

其次，讴歌法制，批判专制。法制是相对于专制而言

①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狭义上是指统治阶级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和民主制度密切联系，并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其特征的。任何国家均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只有采用民主制的国家才有法制。故法制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可能有法制。因为它们的法律恰恰允许少数统治者个人独裁、恣意专横，公开维护等级特权，以权代法，以人代法。因而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的实质是专制。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专制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对资产阶级法制热情赞颂，竭力宣扬。

启蒙思想家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法律造成一切"的著名论断，一语道出了他们主张法制，反对专制的强烈愿望。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一巨著中，用大量的篇幅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司法专横、刑罚残酷等社会现实，指出必须废除封建专制，代之于适合人类理性的资产阶级法制。卢梭特别强调立法权的重要地位。他把立法权形象地比作"国家的心脏"，提出"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①。他从人民主权论出发，明确提出立法权属于人民。主权者惟一的权力是立法权，政府只是主权者根据法律所建立的，行政权必须服从立法权。狄德罗也说，人民是真正的立法者，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不可转让的权利和幸福。爱尔维修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揭示了立法的基础，认为所有法律都要依据一个根本大法来制定，这个根本大法就是公共福利，它是不可侵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17页。

犯的惟一的最高法律。公共的功利原则是立法的基础和原则，“当法律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时，应当加以改革”[1]。霍尔巴赫针对当时法国立法、法律与宗教狼狈为奸的情形，满怀资产阶级革命的义愤指出：“几乎在任何地方，从属于迷信的法律成了神的愤怒的同谋者。这些法律使一些最与人权相违反的残暴行为合法化。”[2] 因此，他积极主张割断立法同宗教神学的联系，让立法者独立地从事立法活动。尽管启蒙学者都错误地把制订良好法律的希望寄托于“贤明君主”或超人天才的身上，但他们关于法制的思想理论是有重要价值的。

再次，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怎样治理国家？启蒙学者的回答是用法治，废人治。这是他们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克服、避免和防止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人治。孟德斯鸠指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在这里，臣民等于零，君主就是一切。所以，君主专制政体的原则就是恐怖”，这样的君主就必然是暴君。[3] 因此，必须反对人治，实行法治。在启蒙学者看来，实行法治还是人治，是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制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标志。卢梭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惟有在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47页。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第310页。
③ 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8、19、16页。

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①

启蒙思想家认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与民主权利，保障国家政体的民主化。在启蒙学者看来，一个民主的、并且实行法治的国家是最"合理"的，也是最理想的。因而他们都十分强调用法治代替君主专制政治，认为这是改造封建社会弊病、实施民主政治的根本手段。卢梭认为，法律是人民公共意志的体现，只有实行法治，公共的意志才能得以实现，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才有保障。一个国家如果不依法律为治，就不是正当的国家，就没有政治自由和平等，就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实行法治，国家才既不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又不会转向独裁暴政。孟德斯鸠指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障公民自由。"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卢梭说："法律的效力和护法者的权威消失了的地方，任何人都得不到安全和自由。"②

要实行法治，消除人治，就必须严格遵守法治原则。启蒙思想家对此都有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克。洛克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原则的主要倡导者和创始人。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法治原则：(1) 国家必须以正式的法律来统治，不能靠临时性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行使权力。(2) 必须坚决执行已经公布的法律，不执行法律的政府是专横的政府。(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逍遥于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这是洛克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也是所有启蒙思想家认同和强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1页。

②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56－57页。

调的一条根本原则。在他们看来，法律既是人人平等的标志，又是人人平等的保障，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即使是包括君主在内的权贵也不能超越法律。为了贯彻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启蒙思想家坚决反对特权思想，要求手握大权的首脑们严格以法办事，抛弃以权代法、以人代法的封建原则。

综上，启蒙思想家的这些法制理论，当然是为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些思想原则是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向封建专制主义城堡冲杀，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开辟道路的锐利武器。而且，这些理论是法律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西方文明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对现代法制文明建设仍有一定作用。

6. 国家：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共和政体

启蒙思想家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国家学说，即与“君权神授”相对立的“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起源说和用“三权分立”构筑的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体说。

(1) 社会契约

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是欧洲最早提出社会契约论的哲学家，他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避免彼此伤害和受害”通过“相互约定”而产生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1] 近代以后，社会契约论在西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7页。

广为流行，许多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继承、发挥和改造了历史上的传统社会契约论观点，使社会契约论思想日臻完备。在近代社会契约学说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格老秀斯是首倡者，霍布斯是奠基者，洛克是发展者，卢梭则是集大成者。

格老秀斯和霍布斯都认为社会契约是人们自由联合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人们把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转移到一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这样，国家形成了，政府的权力与宗教神学完全分离，君权神授说被彻底粉碎。但是，他们把社会契约和绝对权威联系在一起，认为统治的权力一旦通过契约而建立，人民必须绝对服从，不得反抗。霍布斯甚至据此公开拥护专制制度。

洛克继承了霍布斯的契约说，但反对他为专制制度辩护。他认为，人们是在订立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摆脱了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危险的自然状态，而进入了政治社会，成立了国家，设立了政府。人们之所以自愿放弃部分自然权利，特别是放弃自己对别人的侵犯行为的审判和惩处的权利而订立社会契约，目的只在于更好地谋取公共幸福，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作为缔约一方的统治者如果违背了契约，侵犯了人民的利益和应有的权利，人民有权进行反抗，甚至推翻之。洛克据此提出，君主立宪制是保护人的自然权利的最好制度。

卢梭是西方近代社会契约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社会契约论》的问世，使人们将社会契约学说主要同卢梭的名字联系起来。他在这部名著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国家是由社会契约产生的，但真正的社会契约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是人民同人民自己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契约，而不是在下的人民同在上的统治者建立什么约定。因

此，他反对霍布斯、洛克等人把缔建国家和政府说成是人民与君主订立契约。卢梭的“社会契约”的根本特点，就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坚持了主权在民的原则。第二，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都必须把自己以及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整个社会，并受公意的支配。卢梭说，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自由。人们虽然把自己所固有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社会，但由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转让了出去，这也就等于每一个人都没有向任何人转让。所以，人们在订立契约以后，他们虽然丧失了“自然自由”，却获得了社会自由和生命财产的安全；虽然丧失了“自然平等”，却获得了社会契约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虽然需要服从国家权力，但这是服从公意，因而也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这也就是说，人们在缔约中都可以得到他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在这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与智慧上不平等，但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民主平等的原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第三，卢梭反对格老秀斯、霍布斯关于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人民只能服从，不得反抗的社会契约说，认为人们通过契约而建立的国家是为着实现公意——共同意志、公共幸福、公共利益而存在而实行统治的，所以，当执政者违背公意，破坏契约，损害人民利益时，人民有权用暴力将其推翻。革命反抗的原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又一显著特征。他还据其社会契约说，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的思想。总之，启蒙学者关于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获得了最广泛最深远的影响。

（2）分权原则

分权制衡思想作为人类社会对不合理的集权政治的反抗

和对民主自由生活的追求，存在于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但是，作为一种体系和原则是在近代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其主要代表是启蒙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关于国家权力的分配及其关系原则的理论，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和基石。

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第一次系统阐发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分权学说。他把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立法权归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议会，拥有最高权力，即议会主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即进行外交的权力）由国王行使。行政权和对外权必须从属于立法权 。洛克并没有提出司法权，所以他的分权理论实际上是“两权分立”。洛克的分权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限制君主权力，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强烈要求以及同封建贵族妥协的特点。

孟德斯鸠继承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在《论法的精神》这部名著中，他系统阐述了“三权分立”说。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部分，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即立法权归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君主掌握，司法权归法院执行，这三种权力、三个机关相互制约，保持平衡。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完成了资产阶级分权学说的理论体系。首先，他系统深入地论证了国家权力的必分性。孟德斯鸠认为，要保障政治自由，国家必须实行分权。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

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① 一言蔽之，如果三种权力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时，公民的自由便完了。他还指出，在君主专制国家里，这三种权力都集中于君主一人身上，所以恐怖的暴政统治着一切。第二，他明确地提出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洛克的分权学说中没有提出司法权，"司法独立"的概念自然是模糊的。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性质截然不同，司法权是属于审判机关，法院和法官既不属于君主，也不隶属于国会，审判是独立的。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和"以权制权"的重要支柱。第三，他明确地阐述了权力制衡的原则。孟德斯鸠并不主张三权的绝对分立，而是主张三权既分立又制约。所以他在提出分权的同时，也强调了权力制衡的原则。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②，使权力部门互相钳制。例如，行政部门有权使用否决权来约束立法部门的越权行为。反之，立法部门为了约束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弹劾。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赋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权力，去抵制来自立法和行政的独断行为。第四，他明确指出不仅君主专制制度应当实行分权，即使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也应当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否则，任何国家都有腐化和倒向专制的可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不仅给新兴资产阶级反对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6页。
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锐利武器，而且为资产阶级设计了一个依法治国的完整方案，因而它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革命和进步的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政体形式

启蒙思想家都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但是，这一王国应实行怎样的政体形式，他们的看法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君主立宪制，二是民主共和制。

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热情推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或开明君主制。伏尔泰认为开明君主制度“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是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种美好制度的典范。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类，即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他是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当然，这里所说的“君主”并不是专制暴君，而是“开明君主”，所以他拥护的是开明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易于走向“极端平等”，形成许多“小暴君”，故不宜采用。而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因此君主政体无论如何要比专制政体优越。马克思曾批评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① 其实，无论伏尔泰还是孟德斯鸠，他们之所以美化和推崇“英国样式”的君主立宪制，实际上是想通过对英国制度的赞扬来达到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目的，实现启蒙的作用。因此，他们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件下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卢梭是民主共和制的热烈拥护者。他从人民主权论出发来研究政体问题。卢梭把政体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三种。他反对一人为治的君主专制政体，认为“专制原则永远都是暴君”。他也反对少数人为治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实行开明君主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君主若不是即位时就是昏庸无道的，就必定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的”。不论多么开明的人，只要当上君主，王位必然腐蚀尽他的开明，使其成为专制主。在卢梭看来，只有民主共和制是以公众利益为基础，反映人民“公意”的。他认为，在民主制之下，“一切都用之于共同的利益”，人民负担最轻，而在贵族制之下人民负担较重，在君主制之下则负担最重。因此他表示，“我愿意生活在一个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之下”。所以，民主共和制是人民主权原则所要求的最理想的政体。卢梭的政体学说远比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激进和进步。

三　理性政治评判

“理性政治”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中枢控制系统。这一系统的建立，是以启蒙思想家所创立和奠定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为指导的。所以，从政治精神文明的角度看，“理性政治”的评判，也就是对启蒙思想家社会政治理论的评价。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

供了新的东西。"[1] 这一精辟论断是我们科学评价启蒙学者社会政治理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2] 同理，启蒙思想家所创立和系统阐述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与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等级特权论的封建政治理论相比，在政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跨越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首先，它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时代精神。启蒙运动时期，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封建政治腐朽反动，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正在形成并继续发展。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于是人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具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3]。启蒙学者创立的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法制等为基本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产物。它反映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政治要求，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标志着政治文明的进步。

第二，粉碎了封建专制政治，为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启蒙思想家在政治上的一大贡献，就是用"批判的武器"摧毁了以"君权神授"、"等级特权"论为

①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5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109 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334 页。

基础的封建主义政治。他们关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民主法制、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政治主张，无一不是射向封建专制政治的利箭，无一不是激励人们解放思想，砸烂精神枷锁，投入反封建浪潮，冲破一切阻挠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藩篱的革命号角。启蒙学者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埋葬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的斗争抒写了振古烁今的诗篇，至今一直萦回在人们的心头。

第三，设计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政治蓝图，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理论基础。与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相比，启蒙思想家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向封建专制政治公开宣战，而且在于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思想理论成果，从而形成了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三权分立等为基本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体系，描绘了一幅动人的“理性王国”的政治蓝图。这一蓝图既是指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动力，又是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政治新秩序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第四，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原则，推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观，不仅与封建等级特权针锋相对，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而且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使其成为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系统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理论，包含着历史辩证法的因素，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天赋人权”论彻底否定了神权、王权以及一切封建特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从此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正如

"中国人权白皮书"（即《中国人权状况》）开篇所说："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第一次提出'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后，多少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① "人民主权"论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反对专制，推行法制，反对人治，坚持法治的思想，以及"三权分立和制衡"的理论，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论为西方政治思想宝库增添了许多珍奇异宝，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政治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五，产生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形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法兰西！你是一座世界的钟楼，有一天从你这钟楼的顶端，敲响三下响彻大地的正义钟声，响起三声叫醒人民千年沉睡的呼唤，这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高尔基赞颂法国革命精神的诗篇。卢梭关于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的民主思想对美国独立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被1776年《独立宣言》所吸收。卢梭的思想对法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权宣言》中，在对大革命所起的指导作用上，而且也表现在它培育了包括马拉、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在内的一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今天，卢梭的平等观念，民主思想，法制原则，政府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以及政府篡夺主权时，人民有权革命等思想，仍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卢梭的平等学说不仅"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孟德斯鸠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也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建国后第一次将分权原则载入宪法，法国《人权宣言》庄严宣布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直到今天，"三权分立和制衡"的理论，仍然是一般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和政体构成的普遍原则。

但是，启蒙思想家们没有、也不可能超出他们那个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政治学说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印记，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①]。

启蒙学者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他们不是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求理解社会政治问题的钥匙，而是到人的本性、意志和理性中去寻找。作为他们全部社会政治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自然法权论"，是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自然状态"纯属主观臆造，"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不过是脱离了社会性和阶级性的非现实的人的抽象理性和虚幻权利。他们把以理性为根据的"法的精神"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决定因素，宣扬"法律万能论"和"法律至上论"。"天赋人权"既抽掉了人的阶级性，又抽掉了人的权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65 页。

的社会性，把人权仅仅归结为一种自然属性。"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产物，把包括阶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视为人们通过契约而自觉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和社会观。他们把人类历史命运的改变，寄托于少数的"贤明君主"、天才的立法者和伟大的政治家，走上了英雄史观的迷途。

宣扬超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启蒙学者政治学说的又一缺陷。在启蒙运动时期，启蒙学者打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旗号动员人民群众，投入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然而，这种貌视超阶级的全人类的福音，却掩盖了启蒙理论的资产阶级实质。其实，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伏尔泰认为财产私有权是自由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一切自然法权中最根本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他在《哲学辞典》"财产"这个条目中又公开说：社会并不需要农民成为富人，而是需要"这样一种人，在他的身上除了一双手和一片善良的心愿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们将自由地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他们用这个自由来代替财产"。不难看出，启蒙学者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在政治观念上的反映。他们鼓吹的人权，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人权本身就是特权"，[①] 就是"富人的特权"。[②]"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6、438－439页。

一人权”，“就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的保护”。[1] 他们所标榜的民主，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决不是全体人民的民主。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代表”这一条目中就不承认包括贫苦的下层人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享有普遍参政权，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有权向国民代表大会推选出自己的代表。这是对启蒙学者超阶级的政治学说的一种绝妙的嘲弄。

启蒙思想家企图在保持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这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启蒙学者看来，财产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即使像卢梭这样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未提出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结论。因此，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不过是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法宝，而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只能是一些无法兑现的政治诺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启蒙思想家的平等观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而不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孟德斯鸠等人以为，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只要用法治代替君主的“人治”，就可以使人类进入平等、民主和幸福的新世界，这不过是一种华美的法律诺言，是“幻想的‘法的精神’”[2]。

启蒙学者另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就是其思想的二重性。他们一方面对封建专制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封建君主抱有幻想；一方面号召人民推翻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向封建统治妥协。霍尔巴赫曾大声疾呼“暴君是能够产生罪行的最可恶的东西”，必须推翻，可是就是这同一个霍尔巴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6、438－4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页注。

却又说“人民的不幸产生革命”，要设法防止爆发革命。他还把自己写的《道德政治或建立在道德上的政府》一书献给暴君路易十六，上面写着令人肉麻的献媚之词：“献给公正的、人道的、仁慈的国王，真理和纯朴的友人，阿谀、罪恶、奢侈、暴政的敌人，秩序和道德的复兴者，治下人民的父亲。”罗伯斯庇尔尖锐地指出了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两面性：他们“有时突然发出反对专制制度的呼吁，但他们又从专制君主那里领取津贴；他们时而著书反对朝廷，时而著书献给君主；时而是取悦宠臣的言词；时而是取悦宫妃的诗歌；他们在作品中目空一切，过的却是摇尾乞怜的生活”[①]。这正是他们以及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很难避免的历史悲剧。

历史无情地粉碎了启蒙学者政治学说的华美诺言，宣告了他们真诚解放全人类梦想的破灭。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精辟地指出，启蒙思想家渴望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然而，“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因为，“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

① 转引自别尔纳狄涅尔：《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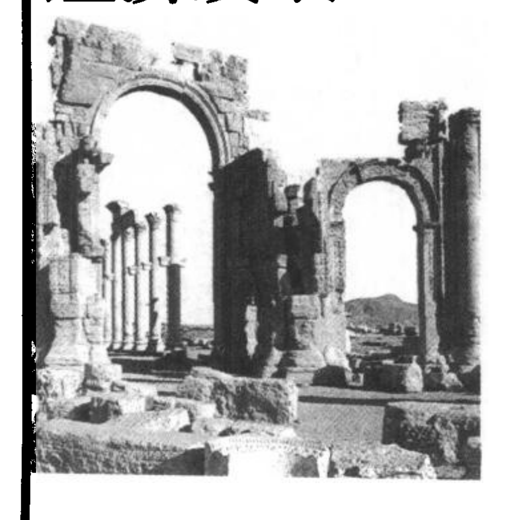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启蒙学者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价值，否定他们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推进西方政治精神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这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以至深的敬意，永远缅怀他们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6－607页。



第八章 新经济时代的曙光——启蒙时期的经济发展

- 启蒙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
-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 富有经济启蒙意义的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

——恩格斯

启蒙运动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为新兴资产阶级创造哲学、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等辉煌的精神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我们在了解启蒙时代精神文明成就之后，很有必要对其经济文明作进一步阐述。

一　启蒙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欧洲启蒙时代，新兴资产阶级创造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不仅包括硕果累累的精神文明，也包括已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经济文明。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反映，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

1．文明的基石

文明指人类社会摆脱蒙昧、野蛮、落后的程度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状态。文明是一个国家、民族进步、开化、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它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积极的精神成果，主要内容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

发展水平；社会政治思想、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起促进作用，二者互相作用，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使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等对应的概念，用以从不同角度表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素的含义，揭示社会文明的物质经济基础，阐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②] 这些精辟论述，为我们把握社会文明的实质及其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

2. 在“第一小提琴”背后

在 17 和 18 世纪，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所加的注中指出：“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③] 无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后所发生的启蒙运动是建立在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与英国相比，法国的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4 页。

是落后的，但它却仍通过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精神文明领域“演奏第一小提琴”，在政治上发动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那么，这岂不有悖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神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吗？否。

其实，在“第一小提琴”背后所隐藏的不是别的，正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对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起“基础”或“决定”作用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18世纪以后，法国成为欧洲除英国之外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法国的城市已有发达的工场手工业，例如里昂的丝织工人已有6.5万余人，亚尔萨斯等地冶金业也具有相当规模。法国对外（特别是殖民地）贸易兴旺。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开始在北部一些地区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迅速增长，富有的大工商业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农场主等控制着商业、制造业和财政金融的资源，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所以恩格斯说：“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①

事实上，恩格斯在用来说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著名的“第一小提琴”的形象论述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了18世纪法国精神文明繁荣的深刻经济根源。他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7页。

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①]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之所以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那样，穿古装唱新戏，而是勇敢地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公开举起科学理性和战斗无神论的旗帜，批判宗教神学，抨击封建专制，宣扬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其根本原因是有法国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②]。对此，任何顽固的封建势力也是抵挡不住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③] 法国革命的历史印证了这些论断的科学性。

二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欧洲诸国的启蒙运动情况不尽相同，但启蒙运动时期，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都得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农业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3—7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3页。

发展，把资本主义经济带向了“起飞”的产业革命新时期。所以说，启蒙时期的经济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准备，是新经济时代的曙光。

1. 资本主义经济“法术”般发展的前奏

当欧美各国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1848年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①] 产业革命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法术”般发展的根本标志，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这种发展的前奏期。

英国的启蒙运动爆发于1688年资产阶级“光荣革命”之后，它虽不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声势浩大，波澜壮阔，但意义不可低估。它不仅为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合理性作了理论论证，巩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而且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作了准备。

马克思曾指出，剥夺农民的土地是英国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在英国历史上，对农民的土地剥夺采取圈地运动的形式。所谓“圈地运动”，就是地主贵族利用其特权，通过暴力手段，将农村中的大片公用土地和农民份地强行用木栅与沟渠圈围起来据为己有。实质上，这是一场土地占有制的革命性变革。圈地运动不只发生在英国，但英国的圈地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278页。

动规模最大，最富典型性。早在13—14世纪，圈地现象就伴随着养羊业的发展而出现，一部分领主强行圈占农民的公共地，将其变成他的私有牧羊场。到15世纪，随着羊毛出口的增加和毛织业的发展，圈地活动已在英国相当流行。16世纪上半期，在大规模的农民反圈地起义的打击下，圈地活动暂时有所收敛。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工业人口的扩大，对羊毛等需要量的增加，圈地运动再度高涨。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利用其政权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它首先是加速了对农民的剥夺，把圈地运动变成了在政府法令批准下的"合法"行动。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或变成雇工、或离乡背井，以乞讨为生。这场残酷的"羊吃人"运动，空前地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而农业技术的改善，又进一步加速了对小土地所有者和小佃户的淘汰，资本主义大农场迅速增长，从而大大加快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

16世纪到17世纪初，英国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地理大发现使英国在海外联系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专制王朝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使商人和贵族阶级把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向海外商业和殖民掠夺。这时期，欧洲各国的海外贸易多半带有海盗掠夺的性质，英国是其主要国家之一，被称为"海盗国家"。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入了大规模地扩张和掠夺殖民地的新阶段。对外商业战争、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使国外财富源源流入英国，成为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16世纪后期，特别是17世纪，英国的各类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中世纪后期已兴起的毛织业，一直在英国经济中

占有重要地位。16至17世纪中叶的一个半世纪里，煤炭生产从年产20万吨增至300万吨。17世纪初，英国已建成100个鼓风炉，年产生铁2.5万吨。随着生铁产量的增长，金属加工业适应采矿、建筑、造船、兵器制造等的新需要，也有长足发展。此外，在制盐、玻璃、造纸、制硝、啤酒、铜器等行业，也兴建了一定规模的手工工场。资产阶级革命后，毛纺织业在英国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居中心地位。制盐、啤酒、丝绸、棉织、冶金等工场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在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手工工场内部出现了较细的分工，如制针的劳动约分为18种不同的作业，这就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为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与英国相比，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大、时期长、影响广。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孕育和催化了法国大革命，而且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近百年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为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法国产业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16世纪法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过17世纪的发展，进入18世纪以后，法国已经成为欧洲除英国之外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18世纪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成长的"黄金时代"。

集中的手工工场，在法国最初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植下兴起的。专制王朝为了加强对外扩张的经济实力、改善财政状况，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路易十四时代（1661—1715），法国全面贯彻实施重商主义政策，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利用国家的财力，创办了上百个"王家手工工场"，还采

取种种措施，扶植工商业的发展。17世纪末，法国大约已有手工工场近200家。但它的主要形式还是分散的手工工场，生产者一般都散居在四处为工场作工。进入18世纪以后，法国的工场手工业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而且在技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到大革命前夕，尽管分散的手工工场仍占优势地位，但集中的手工工场已增至514家，生产规模也扩大了。从各个工业部门的情况来看，最为发达的是纺织业（包括毛、麻、丝、棉）、采矿业以及冶金业和奢侈品工业。当时，雇佣50—100工人的大型手工工场已不少见，在阿贝维尔著名的洛贝制呢工场中，拥有工人达1700多名。采矿和冶金业集中程度最高，已拥有几个在全欧洲首屈一指的大企业。18世纪末法国年产生铁13至14万吨，相当于英国产量的两倍多。坐落在勃艮地的克勒佐公司就是欧洲最大的冶金企业，拥有蒸汽机、汽锤、4座高楼、两个炼铁工场，还有自己的煤矿，又附设了玻璃工场等，已是工业革命开始时的水平。著名的昂赞煤矿公司拥有12台蒸汽机，雇佣工人达4000名。1771—1787年该公司利润额增长3倍以上，年收入达120万里弗。在轻工业中也有一些集中的手工工场，例如在巴黎郊区的几个从事花边、纺纱、棉织业的工场规模就很大，有200到500名工人集中在车间里干活。此外，里昂的丝织品，阿尔萨斯的色布和印花织品，巴黎的化妆品、服装、家具、工艺品等，在国外市场上都享有盛誉。法国整个工业的水平是西欧大陆国家中最高的。

法国的对外贸易，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支持下，有很大的发展，一直是国民经济中最为发达的部门之一。还在17世纪时，大量的商业资本就已集中在波尔多、南特、拉罗舍尔、马赛等港口。路易十四时代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和

舰队，创立了享有垄断权的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北方公司、中东公司等，并扩建了许多大海港，从而大大加强和扩大了对外贸易。1716 年到 1789 年，法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 4 倍。到大革命前夕，年贸易总额已达 11 亿里弗左右，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当时，与法国有贸易往来的，包括整个欧洲以及美洲、印度和近东地区，其中与殖民地的贸易大约占四分之一。法国商人在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还经常从事奴隶贩卖和海上劫掠。在肮脏的奴隶贸易中，他们将酒、枪支和一些生活用品等，以高价卖给非洲几内亚沿海一带居民，同时在那里以每名 500 里弗的低价“购买”黑人，运抵西印度群岛，而后又以几千里弗的高价卖出，再从那里收购食糖、咖啡等产品，运回法国和欧洲各地高价售出。对外贸易和贩卖奴隶使商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

法国金融业异常活跃，经济实力最为雄厚。金融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是包税人和银行家。从 17 世纪末起，法国宫廷便将各项税收以合同形式承包给包税人。1720 年 40 名包税人组成了“包税总会”，垄断了全国大部分间接税的征收。他们称为总包税人，掌管了所有包税人入股的资金。这个包税总会在 1726 年承包了 8000 万里弗税额，到 1774 年增至 1.52 亿里弗。从 1726 年起的 50 年里，它从包税中获得的纯利润达 17.2 亿里弗。从中，一般包税人各获利 125 万里弗，总包税人获利高达 1000—3000 万里弗。法国的银行业以购买公债为重要经营项目，是依靠王室的国债制度发展起来的。到 18 世纪，巴黎已有银行 60 余家，里昂有 100 多家。资金最雄厚的银行是 1776 年建立的巴黎贴现银行。初建时，它拥有资金 1200 万里弗，1789 年增至 1 亿里弗，发展成为

全面进行金融活动的大银行。另外，像拉博德银行、拉维尔银行资金也都相当雄厚，以从事对王室和贵族放债为主要业务。1789年法国的国债利息高达3亿里弗，接近于当年对外贸易总额。迅速增长的国债和不断提高的利息，使银行家很快成为巨富。

较之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十分缓慢。法国的农奴制自12世纪后就已开始瓦解。到17世纪时，绝大部分农民都已通过赎买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仍是法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直到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属于封建主（包括国王、贵族和教会）所有。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也必然要在农村中逐渐成长起来。进入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已开始出现在法国北部一些地区。农村还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农民为了挣钱去交纳封建贡赋，在家里为包买主从事各种手工生产。在农村位于上层的富家和大地主，变成了农业资产阶级。他们占有较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并通过土地兼并开办大农场。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农村，而且正和它在城市中的力量汇合在一起，瓦解封建社会的根基，促使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可见，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强大，这就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2. 产业革命正在孕育

欧洲一些国家的启蒙运动、产业革命的情况不尽相同，时间也先后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一致的，这就是各国都是经过启蒙运动之后发生的产业革命。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其内在必然性是启蒙运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启蒙运动时期亦是产业革命的孕育期。

产业革命的本质特征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革命。所以，有人又将其称为"工业革命"。当然，产业革命不单包括工业部门的彻底改造，其他如交通运输、农业、商业都被带动起来，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是一场以工业技术作为巨大杠杆改变整个生产面貌，引起经济"起飞"的伟大革命。它使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开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新时代，把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引向了工业社会，从农业文明引入了工业文明。

就产业革命的性质来说，它既是技术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的出现，给独立手工业者以毁灭性的打击，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最终确立起来，形成两个彻底分裂的对立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列宁指出："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阴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使劳

动大量社会化。”①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先进国家先后发生了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形成的深刻社会经济条件，首先是有前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较大发展；16—18世纪期间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17和18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为产业革命提供了政治前提。英国最早最集中地具备了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因而成为产业革命的摇篮。

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18世纪中叶100年间，英国的社会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圈地运动中大批失地农民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使英国具有了广阔的国外市场；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为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工场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为过渡到机器大生产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所有这些，就为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准备了必要的前提。同时，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手工工场的生产也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和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贪欲了。于是，进行生产技术改革，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迫切提上日程。这种技术革新始于棉纺织业。1733年钟表匠约翰·开伊发明了飞梭。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利夫斯发明珍妮机。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特窃取木匠海斯的发明，制成水力纺纱机。1782年瓦特发明了复动式蒸汽机。1785年棉纺工厂开始采用蒸汽作动力，以后又应用于棉织工厂。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一切工业部门的机械化，人

---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415页。

类进入了“蒸汽时代”。

继英国之后，法国在1830年也开始了产业革命。在此之前近百年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则直接孕育了这场深刻的工业技术革命。如前所述，在法国启蒙时代，封建专制制度受到猛烈抨击，宗教神学惨遭鞭挞，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巨大解放，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迅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特别是启蒙推动下的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给产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这一切，都为法国产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在法国之后，德国、美国、比利时、瑞士等国于19世纪上半叶先后发生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3. 新经济文明的两重性

在阶级社会中，文明是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早在1847年所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①]所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个时代，文明就不能不打上阶级对抗的印记，资本主义文明当然不能例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下的文明都具有两重性：既推动社会的进步，又产生和扩大社会对抗。资本主义经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整个产业革命的孕育期或准备期，资本原始积累的全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程，既是一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文明的形成史，又是一部充满了“血和火”的罪恶史。马克思曾指出，剥夺农民的土地是英国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正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加速了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为产业革命准备了大批自由劳动力，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然而也正是圈地运动使无数农民丧失土地，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沦为乞丐，变为雇工。因而马克思说，“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同样，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也是这种两重性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③]“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④] 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就是在这种“血和火”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仅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如此，就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产业革命亦已发生，正处于上升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仍然在“两重性”的矛盾中运动。一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页。

面，它通过产业革命，使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术"般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开创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崭新时代；另一方面，它又将无数沦为雇佣劳动力的工人置于他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①] 1779年在英国兰加斯特侯爵领地内参加捣毁机器的工人有8万之众。19世纪最初15年间，在英国各工业区，到处曼延着称为"鲁第运动"的反对使用机器的工人斗争。这种斗争表明当时工人阶级还未明确认识到自己苦难的真正根源。但是，它却显明地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阶级局限性。

三 富有经济启蒙意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启蒙运动中，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论题。18世纪的法国，出版了大量经济学论著，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说，其中以魁奈为主要代表的富有经济启蒙意义的重农学派影响最大，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1. 重农学派

重农主义是在重商主义走向没落的背景下出现的。西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2页。

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开始，城乡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形成。这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商业资本。特别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的开展，商业资产阶级积聚了大量货币资本，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适应，重商主义应运而生。重商主义的理论特征，是把货币这种在流通领域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看作财富的惟一形态，认为一切财富都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的。这种经济学说，曾在扩大市场，发展贸易，促进商业革命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当产业资本代替商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重商主义便转而成为它的发展的障碍，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

18世纪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全面推行财政大臣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结果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更加凋敝。农业的落后反过来又阻碍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使法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713年，国家财政赤字高达财政净收入的32倍，柯尔培尔主义宣告失败。路易十五继位后，没有吸取教训，仍把重商主义政策当作救命稻草。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劳所奉行的理论就是重商主义走到极端的变种，是一种迷信信用货币的谬论。他主张只要增加信用货币就是增加国家财富。他开办银行，滥发纸币，结果通货膨胀，银行倒闭，许多人破产，约翰·劳被解职逃往国外。这一失败宣告了重商主义政策在法国的彻底破产。新兴资产阶级要在经济方面另谋出路，重农主义就在这种背景下应用而生。

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早就有一些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农业，他们试图通过对发展农业理论的探索，来

寻求法国经济振兴的途径。这些经济学家的有益探索，为重农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们是重农主义的先驱。其中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是其最杰出的先驱者。他最早猛烈抨击柯尔培尔主义，坚决反对以追求货币财富为宗旨的政策。他指出货币不能吃，也不能穿，只能作为交换和支付的凭据。他谴责重商主义把货币“变成了偶像”。他强调社会财富来源于农业生产，应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他主张经济自由，认为国家不应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重农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先驱者的思想，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在经济学上划时代的理论体系。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并据此提出一系列发展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从而吸引了一大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派。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维多·米拉波（1715—1789）、杜邦（1739—1817）、利维埃（1720—1793）等。他们写文章、办杂志、定期举行集会，以此来宣传和解释魁奈的学说。重农学派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杜尔阁。他虽然不承认自己是重农学派的成员，并且从来没有参加他们所组织的活动，然而他的经济观点和魁奈一脉相通，并进一步发展了魁奈的学说。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学说在他那里得到了最高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两部经典著作中，科学地揭示了重农学派的两个本质特征。首先，马克思认为，“重农主义者已经把剩余价值的起源的研究，从流通的领域转移到直接生产的领域”[①]，并把资本主义生产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下同），第13页。

方式当做一种客观规律或"自然形式"来研究。他说:"他们的伟大功绩正在于,他们把这种形式当作社会的生理学的形式来考察。也就是,把它们看作是由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引起,而不以意志、政治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的规律。错误不过在于,他们把一个确定的历史社会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是抽象的、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规律。"[①] 重农学派虽然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说成是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而永恒的规律,但它第一次深入到生产领域内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开创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正是肩负"经济启蒙"的重农学派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独特贡献。[②]

重农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矛盾性,即"这个体系的封建外装和它的资产阶级本质"的矛盾。[③] 重农学派代表了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每当他们提出其要求时,总是打着"封建招牌",好像他们是在诚心实意地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这种矛盾反映了当时法国正从封建制度突围而出的资产阶级尚有软弱性、妥协性的历史特点。重农主义表现了浓重的"贵族情调",这使得重农学派在启蒙运动中不仅遭到反动顽固势力的攻击,也受到一些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如卢梭就对重农主义维护专制政体表示特别憎恶、反感。后来有人因此就把重农学派看作启蒙运动的反对

---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下同),第11—12页。

② 参见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273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18页。

派，这当然是不对的。马克思透过重农学派的封建假象，揭示了它在当时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启蒙学说，指出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①] "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②] 马克思还写道："重农学派虽然有它的假封建主义外貌，但他们同百科全书派齐心协力地工作。"[③] 无疑，重农学派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个侧翼或分支。重农主义学说后来成为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制定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重农主义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重农学派最早深入到生产领域内部，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先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加以阐述，因而马克思把它誉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主义产生于法国，但它的影响则不限于法国。它对英国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以至整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2. 魁奈和他的"自然秩序"论

魁奈（1694—1774）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开创者。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早年丧父，从小独立谋生。他勤奋好学，研究过多门学科，尤以医学最为擅长，曾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42页。

医。1749年被任命为凡尔赛宫的宫廷御医，1752年因治愈了王子的疾病而封为贵族。

约在1753—1756年间，60岁左右的魁奈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一经涉足这一领域，他的天才便得到了充分发挥，很快就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757年，他在著名的《百科全书》上发表了《农民论》和《谷物论》的经济论文，阐明了法国农业破产和农民状况恶化的原因是谷物价格低廉和农民赋税过重。在第三篇论文《人类论》中，他论证了国家财富是由农业产生的，财富引起人口增殖。约在同年，他撰写的《赋税论》，主张改革税制，实行土地单一税。1758年，魁奈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1760年又写了《经济表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农主义经济理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魁奈吸取了法国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思想，并在经济领域里加以发挥，予以新的解释，使其成为整个重农主义学说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所谓社会的“自然秩序”，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社会制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有关的政策、法令等只有符合这种“自然秩序”时，整个社会才处于健康状态，各业兴旺，人民幸福。反之，人类社会就会陷于病态，这时就需要“开明君主”把社会恢复到“自然秩



魁　奈

序”。他还认为，社会“自然秩序”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权利、经济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显然，这种“自然秩序”实际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的“秩序”。魁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探寻和建立符合这种“自然秩序”的经济理论体系。

“纯产品”学说是魁奈“自然秩序”论的重农主义体系的核心，是其他经济理论的总纲。他认为，在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所谓等价交换就是指生产费用相同的商品的交换。既然交换是等价的，那么，流通领域就不可能创造财富，财富的惟一源泉只能是农业生产，因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增加物质本身。魁奈所说的物质本身的增加，就是指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除了扣除用来补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和工人与农业资本家食用的消费资料之外，产品还有剩余。这些剩余产品即“纯产品”。他指出，农业是惟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生产“纯产品”。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工业也只能改变财富的形态，把农业部门生产的东西加以改制或组合，使之适合人们的需要。这就好比给厨师半斤黄豆，他可以调制出一盆美味的佳肴，但并不能增加黄豆的数量，要是把这些黄豆让农民种在地里，他可以成数倍地奉还你。因此，工商业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工商业是“不结果实”的部门，即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的部门。显然，魁奈关于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纯产品”的观点是片面的。但是，“纯产品”学说的理论价值不可低估。它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重商主义者关于流通领域是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还由于他把生产品明确划分为“扣除”和“剩余”这两部分，从而为把“纯

产品”提高到“剩余价值”的概念来认识奠定了基础。所以，马克思对魁奈的“纯产品”学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指出：“重农主义者已经把剩余价值的起源的研究，从流通的领域转移到直接生产的领域，并由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打下了基础。”①

魁奈在“纯产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阶级结构论。他说：“国民被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纯产品”的惟一生产部门，所以从事农业的阶级就成为惟一的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封建地主、国王和官吏以及占有什一税的教会僧侣，他们是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从生产阶级那里获得“纯产品”。不生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由于工商业不创造“纯产品”，不是生产的部门，所以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不生产的阶级。在这里，魁奈并不是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分阶级的，而是把社会成员对“纯产品”的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惟一依据，这就必然混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界限，不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可是，魁奈最早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并企图通过阶级分析来说明社会现象却是值得重视的。

魁奈依据“纯产品”学说，进一步阐述了资本的理论。他认为，既然“纯产品”只能在农业生产中产生，只有农业才是生产部门，那么只有投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资本，而工商业资本则不是生产资本。重商主义把资本只归结为货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13页。

币形态，只抓住了商业资本这一从属形态。魁奈否定商业资本，虽有片面性，但他抓住了生产资本这一决定性的基本形态，就得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因此，马克思对魁奈的资本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在资产阶级视域内分析资本，本质上是一个属于重农主义者的功绩。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近代经济学的真正创始人。"①

魁奈的贡献还在于，他在《经济表》中首次阐述了再生产理论。他把全国土地上总产品的产值假定为 50 亿里弗。然后提出，生产阶级以其中的 20 亿补偿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下余 30 亿是剩余产品即纯产品。这 30 亿纯产品中的 20 亿以地租形式被土地所有者阶级收去，余下 10 亿用来作下一个生产过程的投资，因而需要用它去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即农业生产资料。土地所有者阶级所收去的 20 亿地租，要拿出 10 亿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以另外 10 亿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不生产阶级从另两个阶级处得到了 20 亿，10 亿留下准备下一个加工过程，另 10 亿则也要用来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这样，生产阶级缴地租用去了 20 亿，但从出售生活资料中收回 20 亿，从而使得再生产有了保障。不难看出，魁奈《经济表》的这种再生产理论，有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例如，把农业视为惟一的生产部门，把地租看作惟一的剩余价值形态，这就不可能把社会生产正确地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没有从价值增值的观点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而不能完全科学地了解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规律；社会的产品总额仅限农产品的 50 亿里弗，没有把不生产阶级的 20 亿里弗产品一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1 卷，第 11 页。

并包括在内。但是，它作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进行全面分析的天才尝试，功不可没。马克思指出："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①《经济表》的科学尝试的意义在于：它把资本运动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过程表现为这种再生产过程的形态；它确定了各种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以及两种不同性质消费的区别；它还把劳动的两个重要部门即工业和农业的流通也视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魁奈的《经济表》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再生产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魁奈作为一位经济革新家，以重农主义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改变法国经济状况，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魁奈认为，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自给自足，投资和收入相等，不能增加新的社会财富。只有资本主义租地经营的"大农业"，才能大规模地、合理地利用自然力，创造大于生产费用的新的财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纯产品"。因此，他极力鼓吹增加农业资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重农学派主张"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②

第二，提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在魁奈看来，自由竞争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一切垄断、限制和政府干涉都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3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违反“自然秩序”的。所以，他要求给资本家以完全的活动自由，解除各种专制和关税限制，允许他们进行自由贸易，政府不但不应干预经济事务，而且应当鼓励自由竞争，这就是重农学派所鼓吹的“放任政策”。魁奈等人坚决反对重商主义者的干涉政策，提出了“任其做，任其行”的著名口号，其意思就是放任资本主义经济完全自由地发展。

第三，实行“单一税”制。按照魁奈的社会阶级结构论，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中，只有土地所有者阶级是既不创造财富，又不加工原料的游手好闲的人们，但是却又以收租、收税的方式占有纯产品的大部分。因此魁奈认为，全部国家税收都应由这个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负担，对农、工、商业中的资本家和劳动者课税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也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这种“单一税”制的主张，实际上部分剥夺了封建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权益，保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魁奈等人“对于土地所有权的表面颂扬，也竟一变而为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确认。一切课税都要课加在地租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对土地所有权实行局部的没收，那正是法国的革命立法想要实行的事情”①。

综上可见，魁奈经济理论的实质，就是要实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变革，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秩序”。然而，保守的懦弱的政治思想，使他把自己理想的实现寄托于开明的封建君主，这就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下文述评的杜尔阁的经济改革，昭示出魁奈学说的历史命运。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21页。

3. 杜尔阁的经济改革

杜尔阁（1727—1781）是重农主义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长期的神学教育，当过修道院院士和名誉副院长。1751年，他放弃神职，开始从政。1761到1774年，他被任命为利莫日州长。1766年，他发表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被视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前驱。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杜尔阁出任海军大臣，1个月后，调任财政大臣。在任职期间，他积极推行重农主义的经济改革，触犯了封建贵族阔吏豪门的利益，两年后，被迫辞职。从此，他脱离政界，潜心研究自然科学。



杜尔阁

同其他重农主义者相比，杜尔阁的经济理论更少有封建主义外观。马克思说：在魁奈及其门徒那里有封建假象，而在“杜尔阁心目中，这个假象却已消灭，并且重农主义体系也已当作挤入封建社会樊篱里面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表述”①。在杜尔阁的著作中，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特征更加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18页。

鲜明。在政治上，魁奈等人主张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杜尔阁则主张实行有法制保障的君主制度，比较接近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思想。在经济理论上，杜尔阁赞同魁奈的基本观点，但也作了不少补充和发展。马克思说："在杜尔阁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①

首先，杜尔阁发展了魁奈的"纯产品"理论。魁奈认为，"纯产品"之所以产生于农业，是因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大自然赋于土地以生产"纯产品"的能力，因此，"纯产品"是自然的恩赐。杜尔阁虽然也认为"纯产品"是自然赠予的，但他强调这是自然对农人劳动的赠予，不是对土地经营者投资的赠予。他说："土地离开了劳动，便不能生产任何东西。"② 自然力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才能造成剩余产品。"惟有农人的劳动才能生产出超过劳动工资以外的东西。因此，他是一切财富的惟一源泉。"③ 这样，"纯产品"就比较明确地被表述为农业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土地所有者占有"纯产品"，就是占有了别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在评述杜尔阁对魁奈的"纯产品"论的这一发展时指出："这个'自然的纯粹赠予'，在他手里已经暗中转化为农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没有为土地所有者所买，但会在农产品的形式上被他卖出。"④ 但是，杜尔阁和魁奈一样，并没有摆脱农业是制造财富的惟一部门的偏见，所以，他总是停留在特殊形态即地租形态上来认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1），第 28 页。

② 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下同），第 27 页。

③ 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 21 页。

④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1 卷，第 24 页。

剩余劳动，把地租当作惟一的剩余价值。

其次，他丰富了魁奈的阶级结构理论。魁奈把整个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杜尔阁在此基础上又把生产阶级分为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把不生产阶级分为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工人。这样，就把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都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级，即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杜尔阁还给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下了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他指出，所谓资本家阶级就是企业家、制造业主和雇主阶级，他们拥有大量资本并依靠资本叫别人劳动，通过垫支资本而赚取利润。所谓雇佣工人阶级就是只有两只手，除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以外就一无所有的阶级。当然，杜尔阁还没有完全摆脱魁奈在阶级分析上的混乱，他把不生产“纯产品”的整个工业部门中的资本家和工人，都称为生产阶级的受雇阶级。

再次，他推进了魁奈关于资本及其收入的理论。魁奈把资本只局限于农业部门，而杜尔阁详细考察了资本的五种用途：购买土地、租地经营农业、搞工业、经营商业和放债。他认为利用资本购买土地，就可以得到地租；用资本经营农工商业，就可以得到利润；用资本放债，就可以得到利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后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就只有出卖劳动来挣取工资。在这里，杜尔阁虽然相当完备地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但是，他与其他重农主义者一样，都错误地把土地看成是各阶级收入的源泉，而没有认识到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才是价值的真正来源。

最后，他实行了重农主义的经济改革。杜尔阁不仅对重

农主义的经济学说有重大的发展，而且在他担任法国政府财政大臣时，还着手实行重农学派的经济纲领，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取消了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实行全国自由贸易；减少了输入城市的粮食税，并把这种税转派到封建特权者身上；实行了赋税代替徭役，废除了农民在建造街道时的徭役义务，代之向各特权阶级征收街道税；实行了酒类贸易自由，废除了兼营酿造的封建领主的专利权；取消了行会组织，解除封建行会规章对工商业自由发展的束缚。杜尔阁的改革触犯了王室和封建权贵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最后被迫下台，他的各项改革方案和措施也随之被取消。这些改革方案和措施，直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才得以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杜尔阁试图预先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①杜尔阁改革的失败，充分暴露了重农主义企图依靠封建专制政权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大厦的根本错误。这一失败也表明，只有通过政治大革命才能建立起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连杜尔阁本人也预感到，改革的失败兆示着革命的降临。他在下台前夕给路易十六写信，责备他反复无常，警告他说：英国国王查里一世就是因为无主见而丢了自己的脑袋。历史的发展，应验了杜尔阁的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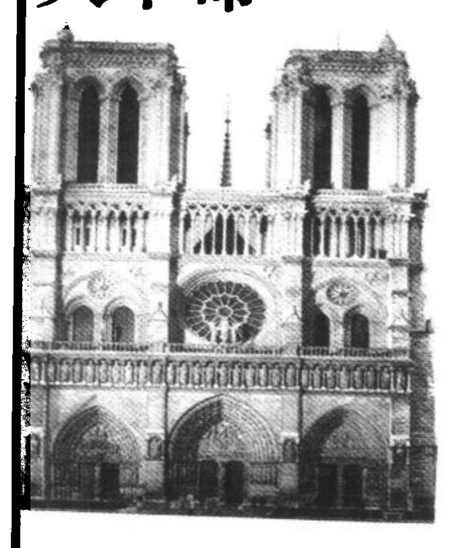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42页。



第九章

开辟了人类历史新时代的伟大革命——法国大革命

- 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 大革命历史巡礼
- 一代风云人物——罗伯斯庇尔
- “一次壮丽的日出”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列宁

在欧洲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经历了三次决战。这就是1517年的德国路德宗教改革运动，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几次大搏斗中，法国大革命声势最浩大，革命最彻底。时至今天，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大革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次革命的作用之大和影响之深。列宁认为：“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①

一 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它是法国封建王朝专制腐败和全面危机的必然，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矛盾的产物，也是启蒙思想孕育和催化的结果。

1. 封建王权的专制和腐败

法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早在公元5世纪末，封建制度便初步建立起来。到10世纪已经发展和确立了一整套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0页。

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王权机构。16 世纪，法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从此进入封建专制时期。17 世纪后半叶，“太阳王”路易十四执政之时，法国称霸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然而，也正是从这时起，法国封建制度开始没落。进入 18 世纪以后，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全面危机，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

从路易十四起，以君权神授为理论依据的专制主义达到顶点，王权成为不可动摇的、不可分享的绝对权威。路易十四曾声称“朕即国家”。路易十五则说：“我只是从上帝那里接受王冠，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我一个人，不依附于他人，也不能让别人分享。”路易十六更干脆地说：“因为我想这样做，这就合法。”在这种专制主义王权观念的导引下，路易十四以来，法国的专制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王独裁横暴，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贵族和僧侣巧取豪夺，敲骨吸髓，欺压百姓，扼杀正义，胡作非为，荒淫奢靡。封建阶级的这种腐朽反动统治，必然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导致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全面危机。这种全面危机是引发大革命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原因。路易十四之流本想用专制和暴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万万没有料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倒引来了一场埋葬封建统治的政治大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惟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56 页。

2. 新经济与旧制度的矛盾

法国的革命家把 18 世纪腐朽没落的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称为“旧制度”。旧制度与新经济即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是大革命产生的经济根源。

最初，专制王权为了得到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反对地方封建贵族割据势力，曾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在这种联盟中，封建王权保护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16、17 世纪，法国专制王权采用包税制度和国债制度，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以重商主义政策和对工商业的扶植以及减税、努力统一度量衡与货币等手段，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通过抑制地方大贵族势力，打击地方封建割据，为资本主义创造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然而，到 18 世纪，中央专制王权已完全战胜地方封建势力，集中了一切大权；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发展成为欧洲除英国之外最发达的国家，“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1]，王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破裂了，而和贵族联合起来，把矛头转向了资产阶级和整个第三等级。此时，专制君主制的作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正像马克思所说：“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么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07 页。

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①

事实确实如此。到了18世纪，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法国专制政权开始打击金融界和工商界，企图通过掠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来缓和财政危机。专制政府以增设关卡、加重赋税、强行借贷、无理罚款、封闭银行等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的手段，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破坏资本主义金融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正常发展；以推行行会制度、工业法规、贸易垄断政策，阻碍先进生产技术的运用，限制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特别是封建行会制度，“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的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同样，行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行会极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惟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②。这样，行会制度就限制了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和大量商品的生产。

显然，旧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障碍物、资产阶级前进的绊脚石。恩格斯指出：“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钳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钳制。”③ 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活动上受着旧制度的钳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41—3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7—508页。

而且政治上仍属于被统治的第三等级。他们没有政治权利，只有纳税的义务，在社会上还遭到特权等级的歧视，忍受专制制度的残暴统治。这一切都使得已经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处于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之中，迫使资产阶级跟要求彻底埋葬封建制度的广大劳动群众结成同盟，发动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

3. 启蒙思想的孕育和催化

大革命的思想根源，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18 世纪，封建旧制度爆发了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全面危机，法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极端反动的黑暗时代。资产阶级以及整个第三等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日趋白热化。正是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法国启蒙学者提出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思想，犹如一道道划破黑夜的闪电，对于行将到来的大革命起了呼风唤雨的巨大作用。启蒙思想不仅起了震聋发聩的精神解放作用，而且为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启蒙思想直接孕育了法国大革命。

对此，许多名流学者都有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唯物主义成了法国革命的信条"，法国的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为大革命"作了准备"。拿破仑曾说："大革命是思想家的业绩。"著名的大革命史学家奥拉尔在讲到法国民主制和共和国的起源时说："人们往往这样雄辩地写或说：民主制和共和国都是像完全组织好了似的从 18 世纪哲

学、百科全书派著作、革命先驱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1]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表达了启蒙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巨大作用："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2]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里举其荦荦大者，以其说明启蒙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催化和孕育的重要作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一书出版轰动了整个巴黎，大家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他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对大革命产生了显著影响，《人权宣言》宣称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伏尔泰终生为自由而战，晚年仍不懈努力，并预见了大革命的起潮。他在《致寿维兰的信》中说："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没有福气看到它了。"又说："这光明已散布到远近各处，时机一到，革命就要立刻爆发的。"这对当时日趋临近的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一种十分真实有力的召唤吗！狄德罗主编的巨著《百科全书》使唯物主义"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

---

① 转引自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页注。

宣言》提供了底本"[1]。卢梭对大革命的影响最为直接和重大。拿破仑曾说，假如从来没有过卢梭，也就不会有法国革命。路易十六被关在大庙里时曾阅读伏尔泰和卢梭的一些著作，叹息说："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罗伯斯庇尔推崇说："这场革命，卢梭是导师。"卢梭的名字成了雅各宾党人的思想旗帜，他的学说成为革命的行动纲领，《社会契约论》成了必读的革命圣经。马拉在大街上满怀激情向公众朗诵《社会契约论》；罗伯斯庇尔把卢梭的这部著作放在案头作座右铭；圣鞠斯特在发表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著名演说中，指出这个专制君主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破坏了社会契约。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是推动法国大革命不断深入的中坚力量，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对他们有广泛影响，起着巨大的动员和号召的作用。卢梭的理论对《人权宣言》、1791 年宪法，特别是 1793 年新宪法发生了重大影响。总之，启蒙运动是酝酿大革命的思想酵母，是大革命的思想渊源。

二　大革命历史巡礼

对爆发于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可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加以研究。这里仅就大革命的爆发、革命发展上升线的三个阶段、妇女在大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人权宣言》、《1791 年宪法》和《1793 年宪法》作些简要叙述和分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10 页。

1. 捣毁巴士底狱

从1787年起，在法国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日益强烈。特权等级主张召开三级会议主要是反对王室向他们征税并企图通过会议迫使第三等级更多地纳税。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群众则要利用三级会议对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实行类似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国王被迫于1788年7月宣布于次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这样的会议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了。

在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期间，反封建的宣传运动达到了高潮。号召人民进行斗争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如米拉波的《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庇尔的《致阿图瓦人民的呼吁书》，特别是修道院长西哀耶斯的《什么是第三等级?》流行最广、影响最大。这个宣传运动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推动了群众性反封建斗争，并从中涌现出一批反封建的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以及米拉波、西哀耶斯便是由此而被第三等级选为代表的。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在距巴黎23公里的凡尔赛宫的宴会厅（改名“三级大厅”）召开。出席会议的教士代表290人；贵族代表269人；第三等级代表584人，其中占比例较大的是律师、地方法官和商人。会议的第一天，第三等级代表便在自己的集会上仿效英国，自称为“下院”，并当即宣布等级划分已不复存在，正式邀请另两个等级的代表共同审查代表资格。他们坚决主张三个等级合厅开会，共同议事，表决时以人数计算。于是，三级会议一开始便发生了冲突。国王和特权等级坚持三个等级分别开会，按等级进行

表决。双方难以调和的僵持长达一个多月。鉴于王室和特权等级代表的顽固态度，第三等级代表于6月12日开始单独进行代表资格的审查。17日又根据西哀耶斯的提议，自行组成国民议会，推举巴伊为主席。国民议会的建立，标志着自1302年开始的三级会议历史的终结。

6月20日，国王下令封闭了会场，国民议会代表在一个网球场集会，进行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庄严宣告：“不制定出一部王国宪法并使宪法得以实施，议会决不解散。”网球场宣誓事件对特权等级震动很大。6月22日，一些高级教士代表和自由派贵族代表也来参加国民议会。23日，路易十六召开“御前会议”，宣布撤销国民议会的一切决议，命令三个等级分别议事。国民议会的代表抗命留在会场继续开会，并重申了网球场誓言。24日大部分教士代表加入了国民议会。25日在素有自由主义声望的奥尔良公爵率领下，47名贵族代表也加入了国民议会。路易十六被迫让步，于27日命全体特权等级代表加入了国民议会。这就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国民议会。议会决心实现网球场誓言，于7月9日正式改称制宪议会，并开始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

路易十六表面屈从于议会，暗地却在调集军队准备用武力驱散制宪议会。7月11日国王与其顾问们决定行动，首先下令将同情第三等级的财政总监内克免职并逐出法国，同时撤换各部大臣，任命一批顽固派贵族上任。这个消息于7月12日传到巴黎。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一直关注会议进展情况并不断举行集会的巴黎人民立即沸腾起来。13日，一队队群众在寻找武器，准备起义。原来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人在市政厅成立了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新的市政府，资

产阶级成了巴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国民自卫军，号召公民参加。群众从残废军人院找到2.8万枝枪和几门大炮，将自己武装起来。更多的人拿起了大刀、长矛、木棍，只经过几次不大的武装冲突，资产阶级和武装的群众便于当晚控制了巴黎大部分地区。但是，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的巴士底狱还由国王军队守卫着。巴士底狱原是军事堡垒，后改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14日，成千上万的起义者将巴士底狱重重包围。常务委员会派人与监狱守备司令官德洛纳联系，要求放下武器，交出堡垒，但遭拒绝。起义群众发起了进攻，经过4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破巴士底狱，处死了德洛纳。7月14日（后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7月15日，常务委员会选举议会主席巴伊为巴黎市长，任命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巴黎的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拉法耶特在这一天还下令拆毁巴士底狱；人们在其废墟上竖起一块书写着“这里埋葬了巴士底狱”的木牌。17日，出于形势所迫的国王亲自来到巴黎，从市长巴伊手中接受了国民自卫军的红白蓝三色徽章，以示承认革命。



路易十六

在巴黎革命胜利的鼓舞下，革命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各大城市平民纷纷暴动，攻打市政厅，组织常务委员会，建立国民自卫军。各地农

民起义更是风起云涌。这场革命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

2. 革命的上升线

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它依次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三个执政阶段，并在雅各宾阶段达到顶峰。马克思说："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①

（1）君主立宪派执政（1789·7—1792·8）

巴黎革命胜利后，制宪议会成为国家立法机关和实际上的革命领导机关。领导制宪议会的是三级会议期间带头进行反抗王权斗争的活动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拉波、西哀耶斯、拉法耶特、巴伊等。这些人始终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故而称为君主立宪派。制宪议会就是在君主立宪派领导下，运用立法手段，对法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制宪议会通过的第一个立法文件就是关于废除封建制度的法令。法令于1789年8月4日至11日陆续通过，通称八月法令。法令宣布"将封建制度全部废除"。按规定无偿废除的有：人身义务、领主法庭、打猎特权、教会什一税、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

权等级免税权、买卖官职制度等，还规定任何公民，不论出身门第，均可担任教会职务和军政官职。法令规定对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以赎买方式予以废除。八月法令在根本原则上废除了封建制度，是资产阶级改造封建法国的重要一步。

8月26日，制宪议会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这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它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对封建王权和封建特权，提倡人权和法治的主导思想，宣布了资产阶级借以立国的各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1789年原则”，它是改造封建社会，引导法国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指针。

然而，路易十六不仅拒绝批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而且秘密调集军队，准备发动新的反革命政变，武力解散议会。10月1日和3日，由王后出面在王宫两次欢宴奉调军官，宴会上军官们的反对气焰十分嚣张。这个消息使巴黎人民怒不可遏。10月5日，由大批妇女带头，一支群众大军向凡尔赛进发，一路高呼：“要面包”，“处死教士、处死贵族、处死王后”的口号。当天下午到达凡尔赛，包围了王宫。晚11时，神志颓丧的路易十六批准了“八月法令”，答应保障巴黎粮食供应。10月6日晨，群众和禁卫军发生冲突后攻入王宫。国王被迫接见群众，答应批准《人权宣言》，同意将王室迁到巴黎。当天下午，在群众队伍簇拥下王室人员到了巴黎，住进杜伊勒里宫。几天后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经过这一事件，巴黎人民不仅又一次粉碎了国王的反革命阴谋，而且使国王和议会置于巴黎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大大加强了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

在十月事件的推动下，制宪议会又加紧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反封建法令。一是改组国家政治体制的法令。主要包括

政府基本原则的法令，规定国家机关实行分权制，立法权只属于一院制议会，国王掌握行政权，但必须依法行使；司法改组的命令，规定法官选举产生，审讯公开；改组地方政府的法令，规定地方官由选举产生；全国统一区域划分，设郡、区、县三级的决议。二是改造原第一等级和天主教的法令。这些法令的主要内容有：没收全部教会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出售；教区按新的行政区划分，主教按郡设立，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全体教士都要进行忠于宪法的宣誓。三是改造原第二等级的法令。1790 年 3 月 15 日有关废除封建权利的法令宣告：“一切特权，一切财产所附有的封建性质贵族性质，概予废除。”6 月 19 日关于完全废除贵族制度的法令宣布：“永远废除世袭贵族，任何人都不得再接受或是授予他人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代理主教、男爵、骑士、老爷、绅士、贵人以及一切类似的头衔。”四是废除封建经济法规的法令。主要有 1790 年 3 月 2 日取消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的法令，4 月 3 日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法令，10 月 3 日废除国内税卡和商品入市税的法令等。

制宪议会推出的一系列反封建法令，使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更加深了。封建王室决意勾结外国势力扑灭革命，于是就发生了 1791 年 6 月 20 日夜间，路易十六一家化装出逃事件。国王出逃未遂，却召来了一场宏大的民主共和运动。巴黎群众连日在马尔斯校场集会，要求废除国王，实行共和制。制宪议会通过了国王系被他人“劫持”的决议，为国王辩护，而对共和运动坚决反对，不惜镇压。7 月 17 日，拉法耶特指挥国民自卫军竟向手无寸铁的集会群众开枪，打死 50 余人，伤数百人。这就是“马尔斯校场流血

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君主立宪派已从卓有成就的革命领导者转变成了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障碍物。

平息共和运动后，制宪议会于9月3日正式通过宪法。停职中的路易十六只得依从立宪派，于14日批准了宪法。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1791年宪法》。宪法概括了制宪议会已公布的各项反封建法令，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体制，即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1791年宪法》是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国家根本大法，是法国从传统的贵族社会跨入了近代公民社会的法律标志。

按照宪法的规定，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30日解散。新选出的立法议会于10月1日开幕。立法议会有745名议员，主要由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代表人物有布里索、维尼奥、加代、孔多塞等）和中间派组成。立法议会就外国武装干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立宪派主和，吉伦特派主战。国王抱着反革命目的，想利用吉伦特派挑起战争，引狼入室。1792年3月，他任命吉伦特派组阁。4月20日，向普、奥宣战。战争初期，法军大败。立法议会在7月11日通过了“祖国在危急中”的决议，开始征集各郡义勇军。从马赛开来的一支军队，高唱《马赛曲》到巴黎汇合。这支军歌后来成为法国国歌。但是，国王却否决了组织义勇军、解散国王卫队等决议。这就再次激起了巴黎人民要求彻底废除王权的斗争。8月9日夜，在新组建的巴黎公社[①] 领导下，两万起义群众和国民自卫军包围了杜伊勒里宫。10日，起义者奋勇攻入王宫。国王逃到立法议会请求保护。巴黎公社代表向

① 自中世纪以来，法国取得自治权的城镇就称为“公社”。这里的巴黎公社就是巴黎市政府。1871年工人的巴黎公社也是从这里借用的名称。



柳特《马赛曲》

立法议会严正地提出废除国王、选举民主新议会的要求。慑于武装群众的压力，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国王暂时停职，召开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

8月10日起义终于推翻了王政，也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大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君主立宪派虽然被新的革命浪潮淘汰了，但他们执政三年里所颁布的“八月法令”、经济法规、教会改革、“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则彻底废除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君主立宪派是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奠基者，其功绩不可抹杀。

(2) 吉伦特派当权 (1792·8—1793·5)

8月10日起义胜利的当天，立法议会在决定国王停职后，任命了由6名部长组成的临时行政会议行使行政权。6名部长中除丹东外，均属吉伦特派。这表明，1792年8月10日后，吉伦特派掌握了政权。

在吉伦特派领导下，立法议会和行政会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坚决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8月15日立法议会通过决议，规定今后公布任何法令均不得再用“以国王名义”，必须写明“以国民名义”。9月4日立法议会全体成员宣誓，要竭尽全力反对国王和王政，并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发出了使用共和国称号的公告。与此同时，一系列打击封建势力的法令颁布出来。被国王否决的流放反抗派教士的法令开始执行；8月15日宣布王室人员和逃亡贵族家属为人质；17日成立特别法庭，审判8月10日起义时的反革命罪犯；26日下令将没有逃亡的反抗派教士予以监禁。此外，对军队将领也进行了调整。立法议会还颁布了一些新的土地法令，将没收来的逃亡贵族土地作为“国有财产”分块出租或出售，在农村公社按户无偿分配公有土地，特别是8月25日的法令宣布，废除“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一封建原则。这个法令的重要性在于，它把“八月法令”规定需要赎买的以及其他立宪派法令规定继续保留的所有封建权利，基

本上都无偿废除了。

根据立法议会的决议，1792 年 9 月 2 日至 15 日进行了国民公会代表的选举。通过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 9 月 21 日开幕。在国民公会的 750 名代表中，吉伦特派占 165 名，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被称为“山岳派”的代表近百名，其余约 500 名是中间派，被称为“平原派”。在开始时，平原派是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因此吉伦特派执掌了国民公会大权。国民公会开幕第一天就讨论了国家政治体制问题，通过了废除君主制的决议。次日即 9 月 22 日通过决议宣布，自即日起改称共和元年。共和国从此正式诞生。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利用共和国成立唤起的全国人民的新的爱国激情，齐心协力，去完成最后粉碎国内外封建势力联合进攻的任务，无疑是国民公会的工作重心。然而，执政的吉伦特派却宣称，反封建的革命已经完成，现在要进行的是反对山岳派和人民群众的所谓“消灭无政府状态”的“第三次革命”。这就导致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亦即后来成为雅各宾俱乐部主人的雅各宾派）的激烈斗争。双方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废王路易十六。雅各宾派支持人民群众提出的审判国王的要求，他们坚持惩办国王，以推进共和国的革命。吉伦特派出于担心外国武装干涉进一步加强的考虑，不肯惩办路易十六。11 月 20 日在杜伊勒里宫的铁柜里发现国王卖国通敌的确凿罪证，吉伦特派再也无法为国王辩护。经过审讯，路易十六于 1793 年 1 月 21 日被送上断头台。

1792 年底到 1793 年春，法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物价高涨，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战争财，而工人连最低生活

也难以维持。就在普遍要求限价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平民革命家，被称为“忿激派”。其主要领导人有雅克·卢和瓦尔勒等。忿激派在一份请愿书中概括出群众限价运动的基本要求，即以政府法令的形式统管经济、限制物价并以恐怖手段强制推行。吉伦特派不仅拒绝这些要求，而且对忿激派进行迫害。雅各宾派在一度动摇后，终于同忿激派联合起来反对吉伦特派。在罗伯斯庇尔提议下，国民公会于 1793 年 5 月初通过对粮食实行最高限价的决议。

吉伦特派领导作战不力，引起人民的极端不满。国王被处死后，国内外敌人更加仇视法国革命政权。1793 年 2 月 1 日，英国参加对法作战，伙同普、奥、西班牙等封建国家，组成反法联盟。3 月，吉伦特派将领杜木里埃在前线溃败，叛变投敌。此时，在旺代郡发生王党分子的武装叛乱，公开要求恢复王室。

面对内扰外患，吉伦特派仍加紧进行所谓“消灭无政府状态”的“革命”。在加代鼓动下，国民公会成立了由吉伦特派组成的“十二人委员会”，专司调查巴黎公社的“无政府”活动。5 月 24 日该委员会下令逮捕了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以及忿激派的领导人瓦尔勒和女活动家多布桑。这就激化了矛盾，使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最后决定诉诸武力，从而爆发了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的人民起义。起义迫使国民公会通过决议逮捕了布里索、加代等 29 名吉伦特派代表。吉伦特派至此倒台。

吉伦特派垮台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对限价运动的敌视态度。限价运动的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和经济自由原则，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正如立宪派因不肯跨进共和国大门而倒台一样，吉伦特派因拒绝限价的要求又敌视革命的派别和群

众而被推翻。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吉伦特派在发动和领导共和运动，结束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国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3）雅各宾专政（1793·6—1794·7）

随着吉伦特派的倒台，国民公会完全处在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领导之下。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新建立的雅各宾派政权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包括无条件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进一步打击封建势力的一系列土地法令；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全民应征入伍的法令；改组并加强了行政机构救国委员会；制定了表明雅各宾派施政方针的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就是国民公会于 6 月 24 日通过的“共和元年宪法”，又称“1793 年宪法”。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是雅各宾派政治和经济主张的总纲领。这些措施对于打击国内外封建努力，宣传民主政治原则，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雅各宾派仍然不予满足广大群众关于全面限制物价的要求，甚至镇压要求限价的群众，逮捕忿激派领导人。这是因为限价运动提出的实行国家管制经济的要求和推行政治恐怖的主张，与雅各宾派所追求的卢梭设想的民主制共和国的社会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得雅各宾派不得不考虑改变自己的政策。从 7 月下旬起，前线局势急剧恶化，反法联军已在北部、东部和南部攻入法国领土，西部海岸又被英国海军封锁。共和国军队到处在败退。旺代叛乱军接连取胜，吉伦特派领导的联邦派叛乱已蔓延到 60 个郡的部分地区。经济和财政状况也已岌岌可危。在巴黎，9 月 4 日和 5 日连续举行了大规模群众武装示威，要求实行全面限价，施行恐怖政策。当时，领导巴黎公社的埃贝尔派已站在了示威群众一

边，肖梅特代表群众向国民公会提出了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建立由“天套裤汉”[①] 组成的革命军，逮捕嫌疑犯，设立断头台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公会不能不接受群众的要求。9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接受巴黎公社的口号“将恐怖提上议事日程”，制定全面限价的法令等等。这些决议标志着雅各宾派政权开始转入恐怖统治。

9月5日之后，一系列实行恐怖统治的法令陆续制定和实行起来。经济恐怖以全面限价法令为标志，包括严禁囤积居奇法令、粮食饲料等限价法令、建立供应委员会法令、在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法令、商品价目表和对批发商与零售商利润额的限制以及关于商品运输费的规定等等，此外还包括无偿征发军饷和军需品的规定。政治恐怖以嫌疑犯法令和救国委员会集权体制为特征，主要内容有改组革命法庭、在全国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国民公会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绝对权力、无套裤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加强等等。

恐怖统治在初行时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在一段时间里发挥出巨大作用。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的现象得到遏制，投机商人敛迹，指券贬值停止，币值回升，经济混乱得到控制。在对敌斗争中，群众踊跃参军，积极参加镇压叛乱，迅速扭转了危险局面。10月2日，平息了联邦派叛乱。12月底，旺代叛乱基本被平定。在抗击外国干涉军方面，法军于10月16日打败了奥地利主力军；12月19日赶走英

---

① 当时贵族盛行穿紧身的套裤，平民则穿着普通长裤。称平民为无套裤汉有与贵族对立之意。

国人，收复土伦；普鲁士、西班牙军队也都被击败。到1794年初，全部外国军队被赶出国土，共和国军队反击出去，进入外线作战。恐怖统治在保卫共和国、拯救革命方面具有重大历史功绩。

但是，它也带来了某些消极有害的后果。在恐怖统治期间，违反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相当严重。特别是对发生过叛乱的地区，特派员更是不加区别地滥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十分残暴。对于被捕人员，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政敌，更是不肯放过。1793年10月16日处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31日将在押的21名吉伦特派成员全部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等为革命立下很大功劳的第一批共和主义者。一批立宪派成员，包括国民议会的第一位主席、巴黎市长、网球场宣誓的领导者巴伊在内，也被处死在断头台下。此外，一些特派员不加区别地打击富人，强征捐税等做法也是过分激烈的。

恐怖统治作为一种战时体制，是形势所迫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因此，在1794年初随着对敌斗争的胜利，恐怖统治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就应及时终止，恢复正常秩序。可是，雅各宾派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1794年3月开始，雅各宾政权虽然放宽了一些经济恐怖的政策，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取消经济恐怖。政治恐怖不仅原封未动，而且随着国民公会中政见分歧的出现和雅各宾专政内部的斗争，恐怖日益加强。1794年3月，救国委员会将埃贝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逮捕并送上了断头台。4月5日，又将主张结束恐怖统治的“宽容派”代表丹东及其同伴送上断头台。6月10日，罗伯斯庇尔又强使国民公会通过了《惩治革命敌人法令》，通称牧月法令。该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和预审制，允

许陪审员可根据“物证、文件、精神与口头的证据”判罪。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使恐怖急剧扩大化了。法令颁布前8个月时间里，巴黎被判决处死者平均每周32人，已属杀人过多。自法令颁布起到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平均每周的死刑数竟骤然增至196人。不仅如此，被处死的人中，原特权等级所占比例已很少了。6月间只占死者的16.5%，7月更降到5%。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军人、官员，尤其是无套裤汉（占40%以上）。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①]。因而，罗伯斯庇尔政权的倒台已是无法避免的了。7月27日，国民公会中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者即热月党人发动了政变，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通、勒巴等人逮捕。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热月政变”。7月28日，罗伯斯庇尔等19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专政被推翻了，但是，罗伯斯庇尔及其政权在夺取大革命胜利中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任何否定恐怖统治和否定罗伯斯庇尔等英雄人物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过，热月政变也表明，任何伟大的人物和革命的事物，一旦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变为过时了的东西，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3．妇女在大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女权运动的兴起

大革命期间，广大妇女在“自由、平等”思想影响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冲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旧传统，走出家门，投入革命，争取自身解放，成为推动革命前进和社会进步的一支巨大力量。

(1) 妇女与法国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各个重大事件中都有妇女参与，特别是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向凡尔赛进军，妇女更是起了主导作用，并且始终是事件的中心人物。用泰纳的诋毁之语来说，这是由罗亚尔宫的侍女们加上洗衣妇、乞丐、穷老太婆、卖鱼妇、女看门人、女裁缝、家庭妇女、甚至还有资产阶级妇女组成的一帮“乌合之众”。[①] 就是这样一支以巴黎“贱妇”为主的大约6000人的队伍，冒雨跋涉了6小时，在5日下午到达凡尔赛。国王接见了6位妇女代表，许诺给她们面包，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国王被迫举家迁回巴黎，从此王室被置于巴黎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妇女，在回巴黎的路上，她们不断向围观者高呼：“我们把男面包师、女面包师、小面包师统统带回来了，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

如果说十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的经济的性质，那么1791年7月的马尔斯校场事件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妇女及其组织积极参与了这场因路易十六外逃未遂而激起的民主共和运动。一份由41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书写道：“法国人民选出代表的目的是要他们制定宪法，而不是要他们将领导权交给一个出卖和背弃了自己最神圣誓言的领袖，一个表现出最背信弃义的意图的领袖。”7月17日，哥德利埃俱乐部

① 参见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页。

在马尔斯校场发起和平示威和签名运动，要求路易十六退位。妇女们也登上“祖国之坛”签名，其中许多人不识字，画上十字以代签名。下午，群众聚会遭到开枪镇压，造成50余人死亡，其中至少有一名穿着用“杂色布拼凑起来的裙子”的劳动妇女。248人被捕，包括13名妇女。

在1793年5—6月从国民公会中逐出吉伦特派议员的事件中，妇女的作用也很突出。5月19日，和忿激派联系紧密的著名妇女俱乐部“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雅各宾俱乐部送交要求彻底行动的蓝皮书，其中第一项就是从国民公会及政府机构中驱逐吉伦特派人。她们身着红裳，头戴红色自由帽，在她们的会议上、在街头大声诘难吉伦特派人。妇女们积极参加了5月31日至6月2日推翻吉伦特派统治的人民起义。“是谁敲响警钟?”一个困恼的吉伦特派代表在暴动开始时问道，旁听席上的妇女高声回答：“是我们!”

在限价运动中，妇女也起了重要作用。1793年初的物价上涨来势凶猛，引起了广泛持久的群众骚动。2月22日，克莱尔·拉孔勃率领一群妇女到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上要求举行一个“关于对基本消费品进行‘管制’的公众讨论”。23日两个妇女代表团为了肥皂涨价到国民公会请愿。24日又有两组妇女来到国民公会递交请愿书。她们要求对物价上涨采取行动，建议将那些囤积生活必需品的投机者“处以死刑”。她们还威胁说若再不采取措施，她们就要干预对无套裤汉的征兵。25日晨爆发了真正的群众平价运动，以中心区的女商贩和圣马瑟勒郊区的洗衣妇为首的男女群众冲进杂货铺，强迫店主降低物价。后来，雅各宾派转而支持忿激派和巴黎妇女的限价主张，导致了坚决反对限价运动的吉伦特

派的倒台。然而在雅各宾派执政之初的6月至9月间，物价仍然快速上涨。忿激派和“贱妇”们对雅各宾派开始感到不满，强烈要求他们兑现曾许诺过的实行全面限价的“统制经济”及政治恐怖政策。她们和忿激派以及埃贝尔派联合起来，给国民公会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雅各宾政权从9月开始转入恐怖统治，实行全面限价。

妇女在历次革命事件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大革命中的妇女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推动革命前进的一支巨大力量，也再次证明马克思的科学论断：“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①

(2) 女权运动与《女权宣言》

一般而言，妇女解放运动在西方通常称为女权运动，是指女性为争取与男性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妇女解放起着先导和启蒙的重要作用。人们通常认为女权运动始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其实，早在文艺复兴运动时就拉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帷幕。在这场以艺术返古为特征的新时代浪潮中，女性重新被奉为美与智的化身——圣母玛丽亚。宗教改革运动第一次正式将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提了出来。这不仅表现在它为牧师婚姻的合法化进行了论战，而且还在于它把反对传统婚姻观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世俗社会。启蒙运动使资产阶级“在神权中发现了人权”，西方资产阶级妇女则“在人权中发现了女权”，所以资产阶级发表《人权宣言》之后，西方女权运动的领袖也发表了《女权宣言》，从而掀起了18世纪末女权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71页。

在大革命中，法国妇女不仅为反封建的革命而战，同时也在为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而不懈斗争。在革命初期，一些有胆识的妇女就起草了“陈情书”，控诉男人压迫妇女、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你们扫除了一切陈腐的偏见，但却保留了最古老、最普遍的偏见，把王国半数的居民排除在显要岗位、尊严和荣誉之外，而且还剥夺了她们与你们平起平坐的权利……你们粉碎了专制主义的权杖……但是你们却日复一日地听凭1300万奴隶戴着1300万独裁者强加给她们的铁锁链!”[①] 一些由妇女主办的报纸和主编的小册子也就妇女权利问题提出建议和要求。但是，1791年宪法的颁布，打破了妇女们二年来的理想。宪法只把公民权赋予25岁以上的“积极”男性公民，从法律上使“人权”男性化，妇女享受公民权的希望成为泡影，妇女享受人权受到限制。为了冲破这一限制，她们一如既往地参加革命，在推动革命发展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争取自身的权利继续努力。1791年9月，杰出的女权运动领袖奥林普·德·古热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妇女与女公民权利宣言》，简称《女权宣言》。1792年3月，她们根据《人权宣言》，向立法议会递交了一份由319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成立妇女国民自卫军。4月，鼓吹推翻“性别暴政”的妇女活动家艾塔·帕尔姆到立法议会发表要求还给妇女被长期剥夺了的自然权利的讲话，指出“既然妇女和男人分担了革命的风险，为什么不能和男人共享革命的成果呢？男人最终获得了自由，妇女却仍然是千万种偏见的奴隶”。1793年5月10日，“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成立。它是雅各宾派的支持者，明确提出“新宪法中

① 《外国女权运动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

有关男性普选权的条件应扩大到妇女身上”。然而，令人失望的是，1793年6月雅各宾政权颁布的新宪法却赤裸裸地规定：妇女、罪犯和残疾人不是公民，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7月13日，雅各宾派重要人物马拉遇刺身亡。古热严厉斥责了凶手科黛的卑劣行为，同时她认为这是排斥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结果，“在对妇女关闭了荣誉、就业和机遇大门后，你们为妇女打开了犯罪之门”。古热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可是，雅各宾派却把科黛的凶杀与妇女参加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力图把人们对科黛的仇恨扩展到全体妇女身上。于是在10月关闭了巴黎所有妇女俱乐部，逮捕了一些俱乐部的领导人。11月处死了一批妇女政治家和女权活动家，其中包括古热、罗兰夫人等。限制、镇压妇女的政策并没有因为雅各宾派的倒台而结束。共和三年4—5月间，热月党人宣布“妇女要获得男人许可方能外出活动”。5月20日，国民公会宣布禁止妇女参加论坛。24日又规定禁止妇女参加政治集会，或组织5人以上团体。至此，妇女完全被限制在家中，革命初期曾享受过的自由权利丧失殆尽。

这场女权运动结局虽然是悲剧性的，但意义重大。首先，这场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不仅改变了妇女的形象和地位，而且也是对大革命中所推崇的男性化“人权”的一种挑战与矫正，它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丰富了大革命的内涵。

其次，这场运动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妇女的公民权问题。法国直到1945年8月17日，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颁布法令，才正式给予妇女公民选举权。但是，在这次女权运动中，妇女的许多权益得到了法律确认。如1792年9月20日

颁布的法令：婚姻法使结婚和离婚世俗化并对两性一视同仁；继承法保证了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新法律下的妇女21岁即为成年，能立债务契约，可在民事诉讼中充当证人；有关妇女财产的立法给了妇女一些支配其财产的发言权，并承认母亲有权参与与其孩子有关的决定。在那个时代，法国妇女能在法律改革方面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这不仅是法国，乃是整个世界女性的骄傲。

最后，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不仅点燃了法国女权运动的火焰，而且对整个西方女权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影响既来自法国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更来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权宣言》。宣言作者古热认为，《人权宣言》结束了封建专制，但"人权"的男性化使妇女的地位依然如旧，妇女仍然受到歧视，男女不平等随处可见，因此，她决心为妇女权利呐喊。《妇女宣言》模仿《人权宣言》，提出了17项妇女与女公民的权利，其中有3项是改写的，14项基本照搬，仅将《人权宣言》中的"人(男人)"改写为"女人和男人"，使"人与公民"成为一个包括男女两性的概念。就这样，她把《人权宣言》中宣布的各项权利逐一运用到妇女身上，还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把锋芒直接指向资产阶级革命家男性至上、歧视妇女的父权制观念，并且大声呼吁女同胞们行动起来："醒来吧，妇女们！理性的警报已响彻全球，认清自己的权利！"《女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要求男女平等的宣言。它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法国妇女平等意识的形成，揭开了法国女权运动的序幕，而且为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女权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斗争方向。

4．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人权宣言》

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制宪议会便于1789年8月26日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文献。

《人权宣言》以启蒙思想特别是孟德斯鸠、卢梭等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其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全文除前言外共17条，其基本内容是关于人权、政权和法制的一些原则规定。

人权问题是贯穿宣言的核心。宣言的前言写道："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和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宣言第1条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2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11条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宣言特别强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第17条）。宣言还规定了公民不受非法逮捕和非法处罚等原则。

在国家政权方面，确立了"主权在民"和"权力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关于"主权在民"，宣言提出了国民主权论，指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第3条）；提出了人民行使主权的两种方式："全体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第6条），即实行直接

民主制或代议制；强调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只能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利”。关于“权力分立”，宣言第16条规定：“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这里的所谓“分权”就是指“三权分立”。

《宣言》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不溯既往，无罪推定以及禁止非法控告、逮捕或拘留等基本原则。

《宣言》虽然有很深的资产阶级印记，有不少缺陷，但不失其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签发了旧制度的“死亡证”。《宣言》用政治纲领和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启蒙思想家反对神权和王权的斗争，宣告了以神权政治和专制王权为特征的旧制度的灭亡，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宪章。在《宣言》发布时，法国资产阶级尚未取得完全胜利，革命和反革命仍处在激烈的较量之中。《宣言》的发表对于激发法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明确革命的目标，组织革命的队伍，动员人民起来为急取人权而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革命推动作用。法国革命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有力推动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敲响了整个欧洲封建制度的丧钟。《宣言》无愧于“旧制度死亡证明书”的美称。

其次，《宣言》颁发了新体制的“出生证”。它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原则，为法国和欧洲各国政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论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时指出：“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8页。

著名史学家阿尔贝·索雷尔认为，宣言所确认的各项宪政原则，“形成和开创了近代欧洲”[①]。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把《宣言》看作是资本主义新体制的出生证或计划书。

最后，《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明财富。《宣言》颁布后，随即载入“1791年宪法”，直到今日仍构成法国宪法的指导原则。现行法国宪法序言宣称：“法国人民庄严宣告，恪守1789年人权宣言书认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予以确认和补充的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原则。”它不仅是法国“大革命和自由的信条，而且也是新时代的信条，成为法国所有宪法和迄今世界大多数宪法的基础”[②]。甚至“是此后百年中世界上所实现的一切政治进步的泉源”[③]。惊天动地的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但《宣言》宣布的资产阶级借以立国的各项基本原则却并没有随之而消逝。它作为法国革命长久保留下来的胜利果实和文明成果而永存。

5. 大革命中诞生的根本大法
——《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

宪法作为根本法，不是法一产生就有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法性文件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在英国，但英国宪法是由许多分散的宪法性文件所组成，不具备成文法

① 转引自洪波：《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宪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② Jacques Godechot: 《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Paris, 1975, P27。

③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6页。

典形式。如 1679 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 年的《权利法案》，1701 年的《王位继承法》等。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 1787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1791 年法国宪法是继美国宪法之后的又一部成文宪法。1793 年法国共和元年宪法，是近代史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

(1)《1791 年宪法》

在启蒙思想家宪政理论的影响下，法国人民在大革命前夕掀起了一个要求制定宪法，限制专制王权的运动。制宪议会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791 年 9 月颁布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1791 年宪法》。

这部宪法以 1789 年《人权宣言》为序言，正文由前言和八篇组成。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宪法以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和分权思想为指导，宣布法国为君主立宪国，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权由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的国民议会行使，它有制定法律、监督各部部长、控制财政、外交和决定宣战与媾和等大权，是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权由国王行使，他是行政最高首脑、海陆军最高首长，对议会通过的法律有搁延否决权。宪法规定："在法国，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并且只能根据法律才能要求服从。"宪法还规定，国王在登位时必须对宪法宣誓，国王的任何命令须经各部付署签字才能执行等，从而对国王的权力实行了严格限制。司法权属于法院，法官由选举产生，实行司法独立。

第二，宪法宣布废除一切封建制度，取消一切等级特权，确认资产阶级的各项权利，为公民规定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第三，在选举制度上，宪法将年满 25 岁的男子定为公

民，又以财产资格限制将其划分为“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两类。“至少已经缴纳了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者享有选举权，为积极公民；未达到者无选举权，是消极公民。这就在全国700多万公民中把大约300多万人排除在选举之外。这显然违反了人权宣言的精神，背离了权利平等的原则。然而，按照财产分配权利的资产阶级原则，较之于按出身门第分配权利的封建原则仍是个巨大的进步。

第四，宪法继续维护法国殖民统治。它既肯定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法国殖民地和属地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不适用本宪法。

这部宪法在公民划分和殖民政策等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制定和实施结束了法国的封建统治，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标志着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正式确立，对于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至于法国近代历史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2)《1793年宪法》

新建立的雅各宾派政权加紧制定新宪法，用以取代君主立宪制宪法。1793年5月30日，国民公会推出塞舍尔、圣鞠斯特、库通等5人起草宪法，草案于6月24日通过。这即《1793年宪法》，又称作《共和元年宪法》或《雅各宾宪法》。它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基本上体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是雅各宾派政治和经济主张的总纲领。

这部宪法由序文和124条正文组成。序文是罗伯斯庇尔主持制定的新的《人权宣言》。新的《人权宣言》共35条，虽然它仍以1789年的《人权宣言》为基础，但内容有增删变化，有新的发展。一是按照卢梭思想删去了1789年《人权宣言》第16条体现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内容。二是

强调了主权的统一性。第 25 条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不可动摇的和不可让与的”。三是增加了一些体现人民主权思想的更加激进的条文。主要有：“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第 1 条）；“法律应当保护公共的和个人的自由来对抗执政者的压迫”（第 9 条）；“让自由的人把篡夺主权的人立刻处死”（第 27 条）；宣布自由雇佣与被雇佣，但不得自卖或被卖，法律不承认有仆人的身份；提出人民享有劳动权、救济权、教育权以及起义权。四是给所有权作了具体规定：“所有权就是各个公民有随意享受和处分其财产、收入、劳动成果和实业成果的权利。”（第 16 条）这个定义为拿破仑起草民法典时所接受，成为资产阶级保护私有财产的一项最基本的法律原则。

宪法规定法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一院制的立法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议员由普选产生，每年改选一次。取消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划分，但妇女仍然没有公民资格。立法议会有权制定法律，发布法令，决定国家的财政收支，征收赋税，批准条约，宣战媾和，设置军队，任免军队总司令等。执行会议是最高行政机关，隶属于立法议会，由间接选举产生。它执行立法议会的法律、法令和决议，对立法议会负责。司法权由高等法院行使，法官选举产生。

这部宪法公布于 1793 年 8 月 10 日。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公会宣告将其推迟到“和平恢复以后”实行。1794 年 7 月雅各宾政权被推翻，所以这部宪法实际上始终未能实施。但是，它在法国历史上仍具有重大意义。它不只对于发动群众、捍卫革命果实和推动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起了极大作用，而且通常被认为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

法，是最终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蓝图。

三　一代风云人物——罗伯斯庇尔

法国大革命造就了大批革命领袖人物，诸如米拉波、布里索、丹东、马拉、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等等，罗伯斯庇尔是其中最出色、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马拉曾称他是"一位长期赤忱为国并且不惜甘冒生命危险的人"，是"不可腐蚀者"。圣鞠斯特称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且还说"你创造的奇迹使我简直把你想像成上帝"，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1. 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政治家。

1758年5月6日，罗伯斯庇尔生在法国北部阿图瓦省阿腊斯城的一个律师家庭里。他6岁丧母，9岁时父亲出走，他由外祖父抚养。他起初在阿腊斯城上学，1769年转入巴黎路易学校。1778年考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在大学期间，他对社会政治问题十分关注，终日孜孜不倦地阅读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力求从中寻找答案。在启蒙思想家当中，卢梭的著作对他影响最大。后来，罗伯斯庇尔成为卢梭学说忠实的信奉者和坚定的实践家。

1781年罗伯斯庇尔大学毕业，返回家乡任律师。他同情劳苦大众，反对天主教会，攻击封建专制制度。1788年

撰写的名为《致阿图瓦人民的呼吁书》的小册子，在反封建的宣传运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第三等级的拥护。在1789年4月26日阿图瓦省阿腊斯城选举会议上，他被选为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他再度来到巴黎，参加了全国的三级会议，加入雅各宾俱乐部，从此投入了法国大革命的洪流。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积极参加了法国革命每一阶段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值得指出的是，从革命初期开始，他那较之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更为鲜明而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就闪烁着耀眼的光芒。1791年8月11日，他发表演说，有力地抨击选举中的财产资格限制，反对“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划分，提出了普选权的主张。他还根据卢梭学说，反对1791年宪法允许国王对议会颁布的法令有暂时否决权。1792年9月5日，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在国民公会中，他曾针对吉伦特派坚决反对惩处国王的论点反驳道：“国王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人民不也是不可侵犯的吗？国王不可侵犯是建立在虚构之上；人民不可侵犯则是建立在大自然不可违反的权利之上。而你们用不可侵犯的盾牌来掩护国王，怎能不将人民的不可侵犯性作为国王不可侵犯性的牺牲品呢？”正是由于有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惩处国王的斗争，才迫使

掌权的吉伦特派公开审判路易十六，并将他送上断头台。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罗伯斯庇尔积极的革命活动和激进的政治主张，赢得了群众广泛的信任。在吉伦特派掌权的后期，国内外局势万分危急。为了拯救祖国，挽救革命，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勇敢地领导巴黎人民于 179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已成为革命绊脚石的吉伦特派政权，建立了雅各宾专政。

罗伯斯庇尔是雅各宾专政的灵魂。在内忧外患，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罗伯斯庇尔政权力挽狂澜，毅然接受广大群众关于全面限价、实行恐怖的要求，不惜采取打击资产阶级本身的一系列战时措施，推行恐怖政策，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以无套裤汉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迅速平息了国内反动势力的叛乱，打败了反法联军的入侵，为挽救革命、拯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罗伯斯庇尔是“不可腐蚀的人”。许多革命初期的著名人士乘革命之机，大发横财，而他则居住在巴黎的一个木工师傅家中，过着小资产阶级的俭朴生活。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资产阶级革命，很少顾及私人生活。他曾先后两次恋爱，但都因重任在身，无暇他顾，至死也未顾得上结婚。

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党人发动了“热月政变”，年仅 36 岁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政权倒台了。这是历史的悲剧。在这悲剧后面，有着复杂的原因，自然雅各宾派将恐怖扩大化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罗伯斯庇尔的历史功绩。罗伯斯庇尔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列宁曾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罗伯

斯庇尔之类“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①]

然而，罗伯斯庇尔的政敌曾别有用心地给他强加了很多无奇不有的罪名。例如说，罗伯斯庇尔曾想把路易十六的女儿、后来的昂古莱姆公爵夫人从大庙里放出来，以便随后同他结婚，自行加冕为法国国王，同她联合进行统治。还说罗伯斯庇尔嗜血成性，他觉得断头台的刀锋不够犀利，曾设法试制一种可以同时杀掉9颗头颅的利剑等等。尤其是热月党人在肉体上、政治舞台上消灭罗伯斯庇尔的同时，还侮辱他的尸骨，在他的坟头刻了两句诗：“过路人，不管你是谁，切莫为我的命运悲伤，要是我还活着，你就得死亡。”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也把罗伯斯庇尔说成是“以嗜血为乐”的专制暴君、杀人魔王。简而言之，罗伯斯庇尔的主要“罪名”即他是恐怖政治的全部负责者，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这显然有失公允，违背事实。首先，不能否认雅各宾政权推行恐怖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马克思说：“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②] 事实也已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恐怖统治挽救了革命和法兰西。其次，罗伯斯庇尔作为雅各宾政权的最高首脑，对恐怖扩大化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牧月法令，是经他同意并强行通过的。这其中的历史教训确实值得认真总结。但是，把具体执行恐怖政策中所出现的全部问题都归罪于罗伯斯庇尔，把他说成是嗜好杀人的暴君，这是不公正的。罗伯斯庇尔反对无限制的实行恐怖。他曾多次讲，实行恐怖政

---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2页。

策完全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不是根本目的，因而是暂时的。他在执行恐怖政策中也是比较有节制的。他曾指责一些官员的残暴行为“将会玷污大革命、毁灭大革命”，并尽其所能从断头台上挽救过不少人的性命。1793年10月3日，他反对起诉73名吉伦特派议员的提案，从而使他们免遭处刑。1794年3月19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上保全了8000多名在王党分子起草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的性命。1794年初，他先后下令召回了在南特、波尔多、里昂等地大搞恐怖活动，滥行杀人的国民公会特派员。他还提出要在各地区成立人民五人甄别委员会，慎重甄别嫌疑分子，只对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极刑。拿破仑在最后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与拉斯卡斯的谈话中曾为罗伯斯庇尔的所谓“暴政”、“残酷”进行过辩护，他说：“他们把一切罪责都推在罗伯斯庇尔身上”，便使罗伯斯庇尔“成了大革命的替罪羊”。①

罗伯斯庇尔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称他是“英雄人物”②。列宁指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人给法国作出了民主革命和抗击反共和国的君主联盟的最好榜样”③，是以“进行真正革命斗争的伟大典范而载入史册的”④。

① 乔治·吕德辑：《罗伯斯庇尔》，美国新泽西州，1967年版，第1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7、275页。
④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7、275页。

2. 卢梭学说的信奉者和实践家

青年罗伯斯庇尔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特别是卢梭学说对他影响最大。他曾宣称卢梭是他的导师，他是卢梭学说的忠实信徒。据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特回忆，罗伯斯庇尔曾拜访过卢梭，还给他写过献词："圣人啊！你教会我认识自己，你教会我在年轻时就尊重自己的人格，对社会秩序的重大原则进行思考。"在另一献词中写道："在你最后的日子里，我见到了你。这段回忆是我骄傲和欢乐的源泉；我凝视着你那庄重的面容，看到了人们不公正的行为给你带来的深切忧愁的痕迹。"[①] 罗伯斯庇尔"性情容易激动，而且秉性胆小，从来没能显示出有多少行政上的能力，但是他狂热地献身于他的主张，弥补了他本身才能上的缺陷。他曾经采纳过这样的信念，认为卢梭的哲学为拯救全人类提供了巨大的希望。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不管是对他个人或对别人来说，随时准备使用各种手段使这种哲学付之实现。这种对鼓舞广大群众的信条的一片热情忠诚，使他最后赢得了一批追逐者"[②]。美国著名史学家伯恩斯和拉尔夫教授的这番饶有意味的议论，是不无道理的。从罗伯斯庇尔一生的言行中，从雅各宾专政时期所推行的政策措施中，我们确实不难看出，罗伯斯庇尔的的确确是卢梭思想的精神产儿，是卢梭学说最忠实的信奉者和坚定的实践家。

---

① 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2 页。

② 《世界文明史》，第 3 卷，［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第 35 页。

罗伯斯庇尔革命思想充分表现在《革命法制和审判》一书中，它是罗伯斯庇尔从1783年至1794年7月所发表的一部分重要论文和演说的集子，全书共有23篇。从中可见，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就是在大革命的实践中运用和发挥了卢梭的政治学说。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基础。罗伯斯庇尔认为，“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发展人的一切才能，是一切政治团体的目的”。然而在法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只有少数的贵族享有各种特权，而绝大多数人民却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是违反天赋人权的。因此，他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理性的共和国，以便保障人们不可剥夺和侵犯的天赋权利。

第二，人民主权是民主共和制的基本原则。罗伯斯庇尔认为，代替不合理的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国家，应该是“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种民主共和制必须实行人民主权原则。他说：“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因而人民有权“更换自己的政府”，“召回自己的全权代表”。[①] 在1793年制定新宪法时，他要求把下列条款写进宪法中去：“主权在实质上属于法兰西人民；所有公职人员都是受人民委任的人员”。这就是说，人民是主人，政府公职人员是公仆。当然，他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中、小资产阶级。为防止颠倒主仆关系，他还提出限制公职人员权限的各种措施，如缩短公职人员任期，取消兼职，权力分散，立法和行政领域

①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下同），第138页。

分开，人民控制舆论，严惩渎职的公职人员等。

第三，建立革命法制，坚持以法治国。罗伯斯庇尔和卢梭一样从民主国家性质出发，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法律是公意的表现，因此，共和国的任何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立法权必须属于人民。他指出，立法权只能由人民掌握，一切公民都有权参加制定法律。为了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立法议会和一切法定政权机关的辩论必须公开进行。罗伯斯庇尔还强调，在建立革命法制时，必须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说："法律对一切人都应当平等。""一切公民都有参加选举议员和制定法律的平等权利。"① 不管何人触犯了刑律，都要依法制裁，特别是对公职人员和执法人员犯法更要严惩。

第四，用"美德"管理人民，用恐怖统治敌人。罗伯斯庇尔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体现卢梭的政治民主理论的共和国。对这样一个国家，在治理上自然要以"美德"立国，如他所说的，"共和国的灵魂在于美德"。但在特殊情况下或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如雅各宾政权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就必须把恐怖提上日程。依靠美德来管理人民，借用恐怖来打击敌人。他说："如果在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力量是美德；在革命时期，这种力量就既是美德又是恐怖：没有美德，恐怖就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② 他在驳斥攻击恐怖政策的人时说，不对革命的敌人实行恐怖，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自由的亵渎。雅各宾

---

①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138页。

②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176页。

政权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恐怖行动，从而拯救了革命和共和国。

四　“一次壮丽的日出”

黑格尔曾热情赞颂法国大革命说：“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①] 时至今日，法国仍在欢庆它。新华社巴黎 1989 年 1 月 1 日电：“一只巨大的热气球今天下午在巴黎市中心瓦窑公园腾空而起，乘坐热气球的飞行员，随着气球的升起，不断向地面抛洒 1789 年《人权宣言》的文本。法国首都和外省今天放飞了 98 只热气球，标志着大革命 200 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始。与此同时，巴黎和外省还组织了朗读《人权宣言》的活动。”[②]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有如此盛誉，在于它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

首先，大革命开辟了法国历史的新时代。法国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成就，这是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19 页注。

② 见 1989 年 1 月 3 日《光明日报》。

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总之，法国大革命"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2]，彻底摧毁了神权和王权，埋葬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宣告了法国资本主义新社会制度的胜利，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法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其次，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一次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政治革命。1789—1794 年的法国革命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第三次大决战。同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法国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因素更加明显、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思想理论准备更加成熟、人民群众更加觉醒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具有彻底性、深刻性和广泛性的显著特点。说它更彻底，是因为"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3]。大革命是波澜壮阔的法国启蒙运动孕育和催化的产物，它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系统的理论指导，这就不仅使大革命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而且创造出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和第一部共和制宪法，特别是《人权宣言》，宣告了资产阶级借以立国的基本原则，奠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法制基础，这一切正是法国革命的深刻性之所在。所谓广泛性，是说这次革命与英国革命不同，法国资产阶级与以无套裤汉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3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710 页。

城市平民和农民结成联盟，从而形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保证了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比较英法两国革命时说：英国“在 1648 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封建贵族和反对占统治的教会”，而法国“在 1789 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度、贵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①。正是“这个联盟保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②。法国革命的彻底性、深刻性和广泛性使它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占有显赫位置。

最后，法国大革命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这次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法国的国界，预示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不是一国范围的革命，而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而是“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它不仅反映了它所发生地区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③。法国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人民反封建的斗争，鼓舞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纪元，“以至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 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12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9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8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829 页。



● 尾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启蒙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 启蒙：社会文明发展的加速器

● 吸取西方启蒙文明精华，加速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毛泽东

西方启蒙文明早已成为历史，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灰土”。我们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从精神文化的视角反思启蒙文明，就不难发现它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价值。

一 启蒙：社会文明发展的加速器

康德曾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启蒙作了哲学规定：“启蒙是人摆脱其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出路所在。所谓不成熟亦即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就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智。如果其原因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少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和决心，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造成的。Sapere ande（敢于思考）！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的这段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启蒙的精髓，说明启蒙的历史使命就是教育大众，传播知识，启迪理性，解放思想。因此，在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启蒙决非可有可无。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序言中所说的，“启迪人民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启蒙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是文明发展的有力杠杆，这是西方启蒙文明给我们的哲学启示。

1. 从西方三大启蒙说起

在哲学层面上，启蒙就是解放思想，是主体的觉醒，人的成熟。在西方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思想启蒙。每一次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这个时期，希腊社会经济繁荣，民主政治发达，文化事业兴盛。这就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人们能够站在新的高度，在理论思维领域里，对人类自身的力量，对人在自然界和神灵面前的地位进行新的思考。智者学派著名人物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 这一哲学论断虽然是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但它冲破传统的人与神关系的思想束缚，否定神的存在，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强调人的自我意识，把人置于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提高了人的地位，肯定了人的作用。因而，普罗泰戈拉成为古希腊思想启蒙的杰出代表。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著名领袖伯里克利也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② 斯多噶学派从共同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都具有一种别人不得不尊重的价值。他可以提出一个固有权利的要求，这就是使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的权利。这一切，闪烁着西方早期启蒙思想的光辉。

启蒙思想在西方世界熠熠发光的重要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是西方第二大思想启蒙。文艺复兴运动砸断了宗教神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3页。

学的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这一时期的人文学者否定神的权威，提倡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但丁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人文主义者皮科在其公开发表的《论人类尊严》的演说中，肯定人具有自由的意志和无限的能力。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也高度赞扬了人。可见，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历史前进中的一个转折点，正是这个转折点，开辟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新天地。人觉醒了，开始对宗教神学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以自己为对象进行思考。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反思精神和启蒙思想，大大推进了人类精神文明，也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

第三大思想启蒙，就是以 18 世纪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成就最丰，对西方近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综上不难看出，启蒙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

2. 启蒙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

文明是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如果从主客体角度来考察，它的基本形式有两类。第一类是客体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以及社会政治思想和伦

理道德发展的性质和状况。制度文明是制度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表现为社会制度以及体制的进步和完善状态。第二类是主体的文明，即人的文明，表现为人自身的素质状况和成熟程度。人的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物质文明通过物质成果来测算，精神文明用精神成果来量度，制度文明以制度的进步性和完善性来衡量，主体文明则以人的成熟度来度量。而启蒙正是主体文明程度的一种测量器。

这是因为，启蒙就是要拨开蒙蔽着理性光芒的乌云，冲破束缚人们思想的种种限制，使人自觉地走出不成熟状态，成为成熟的人。因此，从哲学抽象的意义上来看，启蒙的实质正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思想的解放，是人的成熟。一个被“启蒙”了的人，必定会是崇尚理性、尊崇科学、思想解放、个性发展的成熟人。相反，一个未被“启蒙”的人，难免不是盲目迷信、蒙昧保守、缺乏自我的非成熟人。启蒙既是主体文明程度的一种直接测量器，因而也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间接检验器。因为客体的文明与主体的文明是密切联系的。固然主体文明依赖于客体文明，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又是人所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创造出“成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不成熟的人，不可能创造出“成熟”的客体文明。所以说，启蒙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

3. 启蒙是文明发展的有力杠杆

我们不能低估启蒙对文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历史上，每次思想启蒙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促进

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在西方，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最鲜明的例证。在中国，明清之际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打着“三代”的旗号，攻击封建专制制度，倡导“以天下为主”、“循天下之公”，认为“人之生也，无不同也”。这类思想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者主张尊重人、保护人以及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确有相通之处，而且在时间上也不晚于西方。正因此，这批思想家中有的还被冠以“中国的伏尔泰”、“中国的孟德斯鸠”之类的雅号，他们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变法革新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证明，启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有力杠杆。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启蒙催化人的文明。启蒙就是要解放人的思想，促进人的觉醒，加速人的成熟，因而它必然孕育和催化人的文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首要作用，就在于把人们从宗教神学和封建主义的迷雾中唤醒，使他们能够挣脱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从黑暗的“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近代文明的理想新人。

其次，启蒙促进精神文明。启蒙是反对蒙昧、无知、迷信，高扬科学、知识和理性的思想文化革命，因而启蒙的深化必然是精神文明的发展。以18世纪法国为中心的启蒙时代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哲学文明、科学文明、艺术文明、教育文明、道德文明和政治思想文明，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再次，启蒙推动制度文明。恩格斯曾说，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启蒙是思想文化革命，必然要为政治革命制造舆论，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充当“前导”，从而推动政治革命，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法国启蒙运动直接孕育和催化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建了新

兴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实现了社会制度文明史上一次巨大飞跃。

最后，启蒙利于物质文明。因为解放思想、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发展理性的启蒙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生产力所必需的。法国启蒙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孕育了法国产业革命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献身新的启蒙时代

"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到现在为止，人类反思精神和启蒙思想一直往前推进，并且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我们正处在"新的启蒙时代"。①

从国际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反思精神和启蒙思想已扩展到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揭露了它的种种弊端，主张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他们的理论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②。在这世纪之交的非常时刻，人类又共同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全球性课题，诸如人口问题、生态平衡问题、"温室效应"问题，国与国、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人们在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学术派别，一批未来学者和国际问题

①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页。

专家的大胆探索，给世界以不小的震撼与启迪。这一切，标志着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

从国内看，我们正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启蒙时代。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可以上溯到晚清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展到“五四”，则成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横扫一切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引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带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 这场革命不仅是实现从计划经济模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模式的革命性变革，而且也是彻底摆脱了以往那种陈腐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跳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传统思维方式怪圈的思想革命。这场思想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在新时期的表现。我们要积极投身于这个新的启蒙时代。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113页。

二　吸取西方启蒙文明精华，加速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是科学对待欧洲启蒙运动优秀遗产的楷模。恩格斯于1874年在《流亡者文献》中，称赞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说他们的著作是“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肯定“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①。时隔约半个世纪，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指出：“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他要求无产阶级的领导者，遵循恩格斯的嘱咐，“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② 在这里，革命导师既明确指出我们对老无神论者应持的正确态度，又告诫我们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历史遗产，必须批判继承，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老无神论仅是一例而已，对于包括启蒙学者在内的一切先进思想，都须如此。列宁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8—649页。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1] 再清楚不过，我们不但要珍视老无神论者的政论，还要举一反三，珍视启蒙思想家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艺术、教育等多方面的宝藏。

毛泽东一贯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曾明确地指出过："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2]，并且还特别提到启蒙时代，说"还有外国的古典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3]。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4] 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是我们积极吸取西方启蒙文明精华，加速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启蒙的核心是解放思想。没有启蒙运动，不可能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启蒙运动毫无价值。解放思想这一启蒙精神，在今天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仍有重要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5]。当然，"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

---

①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4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下同），第 143、279 页。

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靠着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精神，冲破了许多传统思想框框的束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未来的实践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和解决，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发扬启蒙精神，不断解放思想。邓小平说得好：“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②]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远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法宝。

打上资产阶级烙印的西方启蒙思想，无疑具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反宗教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它不只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许多闪光的思想仍有可取之处。如尊崇理性，高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破除封建意识和宗教神学；反人治倡法治，用法制取代专制，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制衡与监督，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否定禁欲主义，确认功利原则，利己与利他统一；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发展科技；注重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经济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道德文明、经济文明、科技文明和教育文明，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2版（下同），第143、2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后记

名垂青史的欧洲启蒙时代，是新兴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宗教神权，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全面构建资产阶级“理性王国”，创造辉煌启蒙文明的伟大时代。学习和研究启蒙文明，对于把握西方近代文明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有着特殊意义。我能够应约承担本书的撰稿任务，既感荣幸，又觉责任重大。经过一年有余的艰苦笔耕，总算结稿。但这份答卷是否合格，还不敢妄言，只能由“上帝”——读者来裁决。不过，令我坦然和欣慰的是，为培育这颗也许并不甜美的“果实”，我未敢有丝毫懈怠，竭尽愚钝，倾其全力，尽其所能。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易杰雄教授，是他对我的信任、鼓励和指导，鞭策着我较圆满地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工作。我还要感谢的是我爱人韩琳女士，她在收集资料、修改誊抄中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没有她的惠助，书稿也难以如期脱手。我也要向给予我启发和帮助的其

他学者和同仁，尤其是本书所参阅的大量文献的著者、编者、译者表示由衷的敬谢之意。

高九江

1998年12月2日于延安

附录：参考书目

1. 马克思：①《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②《资本论》第1卷。
2. 恩格斯：①《英国状况。十八世纪》。②《反杜林论》。③《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⑥《自然辩证法》。
3. 马克思、恩格斯：①《神圣家族》。②《德意志意识形态》。③《共产党宣言》。
4. 列宁：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②《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5.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6.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
7. 梅叶：《遗书》第1、2、3卷，商务印书馆，1959、1960、1961年版。
8. 伏尔泰：《哲学通信》，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1963年版。
10.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1.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2.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李平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3.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4.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
15. 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6.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1977年版。
17. 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8.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9.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0.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2、3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1. 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2. 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3. 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4.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5.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 邢贲思：《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8. 詹姆士·斯鲁威尔：《西方无神论简史》，张继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9. 李武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文史哲》1982年第5期。

30. 林德宏：《科学思想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31. 杨沛霆：《科学技术史》，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2. 王英眉：《略谈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对欧洲音乐文化的影响》，《辽宁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33. 迟轲：《西方美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34.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6. 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7. 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8. 博伊德、金合：《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39. 周辅成主编:《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0. 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1.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2. 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3. 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44.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5. 刘宗绪主编:《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6. 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7. 唐枢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1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48. 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三联书店，1963年版。
49.《外国女权运动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
50. J·M·Thomps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66。
51. Jeanmc Donald: 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5。
52. Ernst Cassirer: Frenc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53. G·Rude: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7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作者=高九江
页数=398
SS号=10229228
出版日期=